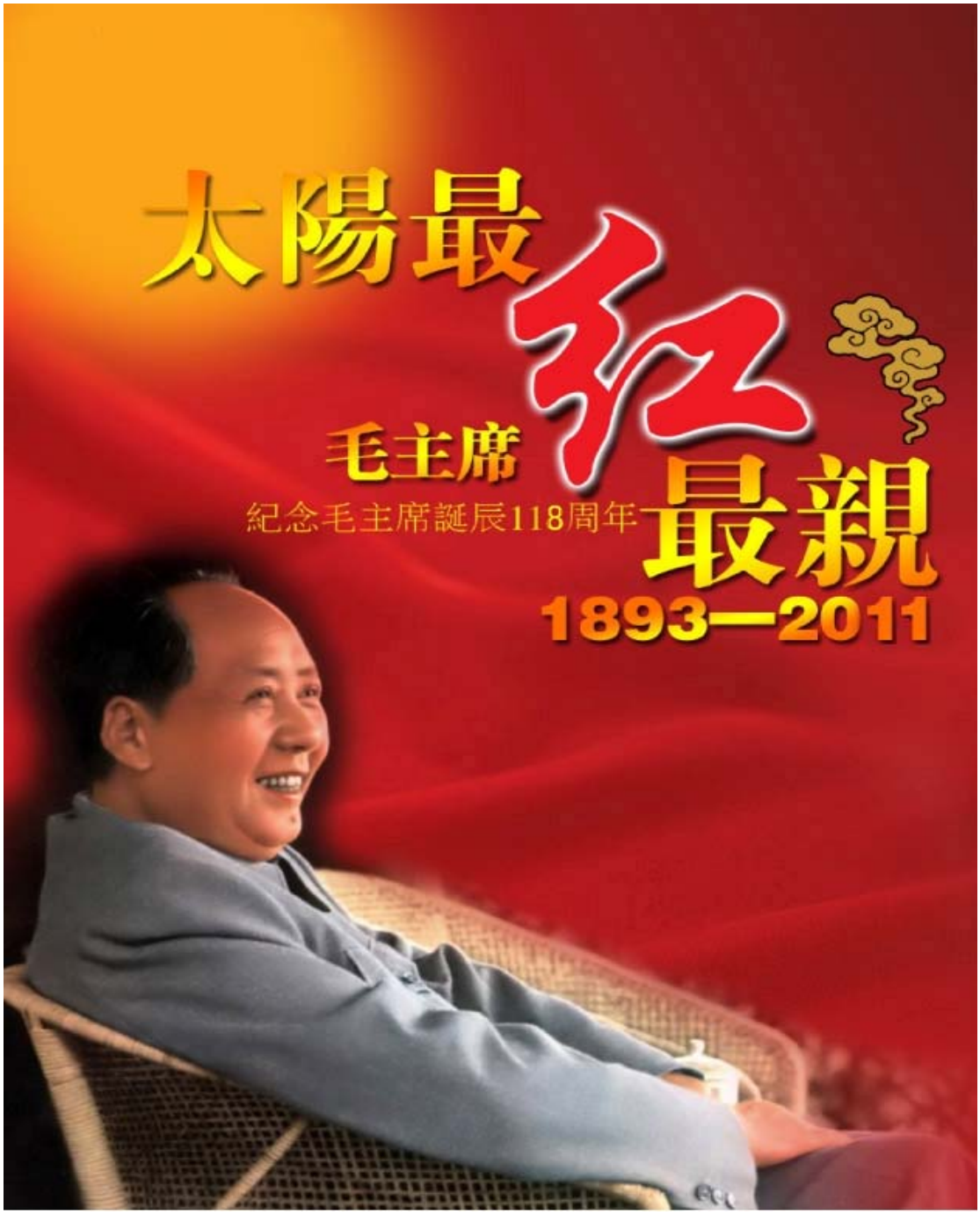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一篇 目 录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4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4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29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131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69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250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20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420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457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534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706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795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21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821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955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1041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1105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105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1175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1188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1197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中共发表三篇文章----------1204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1264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1277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1431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467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1635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
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680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1717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1787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1788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1801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1801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1810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1840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1844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186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1）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注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59 页）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65 页）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注释

（1）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史时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81-82 页）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

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重要批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 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89 页）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

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2]，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

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

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

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

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注释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90--97 页）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谈话要点。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 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释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98-100 页）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

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 ，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 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 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 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

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

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 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 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

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注释

[1]指清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指袁世凯政府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一四年的约法，曹锟政府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一九二五年的宪法草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5-131 页）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32-133 页）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序言一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象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

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粉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言二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2]。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 我们写的按语， 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 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

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

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四十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注释

（1）这本书公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即《序言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218-224 页）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

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1]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6]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7]。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注释

[1]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位妇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264-266 页）

2011 年 3 月 1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2）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 12 月 24 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我们的党必须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党的团结必须不断增强，这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承认的。那么，有什么必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呢？这是不是表示，在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全党的努力来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　　同志们！正是如此。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极大的必要。

我们在前面简要地叙述了党从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得到的成绩。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两个基本的客观事实：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这种包围不但是军事上的，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在东京、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不在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这种企图决不会因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政治上的破坏还会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第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我们知道，任何剥削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我们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资产阶级已经向我们举行过猖狂的进攻，不过这种进攻基本上还是经济性质的；

在这以后，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抵抗本阶级被灭亡的命运，不会不向工人阶级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必然会带上直接的政治的性质。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　　敌人破坏我们的党当然会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而对于无论什么方法的破坏阴谋我们都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诚然，设想和讨论这种危险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如果中央没有预先认识、警戒和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以致当这种危险实际发生的时候党竟处于无准备的状态，那就是更大的不愉快了。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映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空想家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正因为它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敌人才要集中力量用最狡猾的方法来寻找可以破坏它的任何缝隙。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曾经给我们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训：“白党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最左的共产党人，只求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党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拼命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事实上，大家知道，俄国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找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且在这些叛徒被消灭以后，还有过像贝利亚这样的反党反苏的罪恶集团作为他们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国，敌人也找到过他们的代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和张国焘。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党内成立

反党的派别，并和托派相结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因而被驱逐出党。后来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国内战争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高峰；我们都记得，这个分裂活动曾经给革命事业多么严重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当我们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斗争正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决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这就是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根据的一个方面。　　为了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目前党内的情况。很明显，如果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绝对地十全十美（这种状态，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有的），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担心敌人在这个方面的破坏，也就用不着增强那已经强到极点的党的团结了。我们既然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这就是表明，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而使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高兴。　　我想我在这里无须详细说明，我们的党在目前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要求，我们揭露党内的缺点，并不妨害这个基本事实，宁可说正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健全，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草案说我们目前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说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

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怀疑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实的意义之一就是它们威胁着我们党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然包围着我们，他们的思想作风就不会不在我们党的薄弱部分传布起来，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我们党的思想作风是不可调合（和）的，因而这些东西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不足和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复杂，就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侵蚀。草案又说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同志们！所有这些是不是事实呢？究竟我们党内对于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很够，还是认识得不够？究竟现在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骄傲了起来？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骄傲的、不能接受批评和监督的人们，那么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他们就要骄傲成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事例，表明胜利者的骄傲怎样危害着他们的团结而得了可悲的结果。他们的团结在共同受敌人压迫的时候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当敌人的直接压迫被推翻了以后，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了，因此就使团结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这种情形在旧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同旧时代的胜利者都不一样，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党，我们的最后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随后也就消灭国家权力和党本身，因此我们的团结是可以巩固的。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曾经特别警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

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决议将极大地提高全党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完全符合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有效地增强团结，并且可以使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党的鄙弃、抵制和制裁。　　为着增强党的团结，政治局认为应当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中有一种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即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至于对那些坚持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而不愿改正的人，我们党就应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不致遭到破坏，以便使党的团结不致受到损害。　　毫无疑义，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能按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党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党是保证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为了增强党的团结，我们党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缩小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每个同志如果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都是党的损失，大家就都有责任来帮助他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使每个同志都能在我们这个团结和睦的大家

庭里得到共同的进步，共同把党的工作做好，共同把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　　但是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因为它危害着我们党的进步，危害着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也危害着我们党的团结。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示的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轨道上前进，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出发，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以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团结。毫无疑义，这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就能够大大地增强我们全党的战斗力量，改进我们的工作，以达到新的胜利。　　当然，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需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同时应该使那些有上述这类错误想法和错误态度的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政治局认为：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必须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出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各种阴谋，为了反对混进党内来的各种敌对活动和敌对思想，为了正确地区别党内斗争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针，都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同志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一致的，协同动作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

现在我还要说一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付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

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 0 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中″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几个字原来草案上没有，是我加上去再送中央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乡村半工人阶级″是指贫农而说的。在领导问题上，加上″乡村半工人阶级″这几个字，是由于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依靠贫农来团结农民群众的。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骨干，他们在农民中间是起带头作用的。但是，贫农之所以能够在农民革命中起骨干作用或带头作用，毕竟是因为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这几个字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

一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电报也是我起草的。因此，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这已由中央作了纠正。

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答复，以后东北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少错误，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和 XXX 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对 XX 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认为他"在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干部。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 XXX 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

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六）一九四三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九条原则的指示，使它比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处理得较为慎重，但是在工作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第一是在对于情况的估计上扩大化，第二是在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最主要的"逼、供、信"，是在大会上追逼和抢救。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七）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估计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应当是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而关于这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不用说是完全正确的。虽则如此，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还可以再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虽然说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但党中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谨慎，去尽量避免发生错误。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些同志对我说：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这些同志对我的这些批评是对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同志的批评，并当注意力求改正。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饶漱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 1943 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

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　　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十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下面三点补充：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

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 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

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我一贯以来严谨、克己的外表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变成了掩盖我的缺点和错误的伪装，使我的缺点和错误得以滋长和发展起来，而不易被同志们早发觉。加之后来一个时期我由于骄傲自满而作风不民主，日常生活又拘谨到严重地脱离群众，结果“言路”闭塞，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无所警觉。这就是我的错误发展的过程和所以发展到目前严重阶段的原因。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刻刻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及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党权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我

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　　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　　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　　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　　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　　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　　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　　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　　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　　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　　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　　者），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　　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

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着我们；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

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

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权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一样”，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二、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一）党的

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

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　　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　　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　　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　　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　　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　　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　　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　　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　　益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　　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　　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　　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　　部都应当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　　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六届七中　　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　　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中地进行检讨：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　　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　　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　　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

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　　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　　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　　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　　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　　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　　（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　　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　　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　　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　　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　　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一　　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陈的处境，　　而对我校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　　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

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　　原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　　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

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

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　　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

下乡作调查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　　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　　志，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　　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　　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　　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　　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　　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　　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　　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　　的时候，我本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　　一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　　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　　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　　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　　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　　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　　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　　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　　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　　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　　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　　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　　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

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　　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　　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　　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　　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　　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　　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　　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　　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　　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　　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　　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　　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　　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　　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　　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　　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　　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　　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　　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　　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　　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　　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　　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　　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　　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　　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　　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

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　　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　　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　　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　　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　　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　　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　　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　　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　　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　　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　　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　　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　　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　　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　　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　　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　　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　　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　　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　　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　　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　　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　　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　　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　　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　　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　　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　　“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　　感华东特别

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　　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　　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　　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　　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　　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　　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　　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　　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　　安；（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　　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　　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　　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　　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　　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　　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　　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　　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　　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

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　　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　　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

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　　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　　养过程中，

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　　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

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　　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　　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　　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　　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　　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　　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　　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　　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　　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　　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　　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　　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　　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　　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　　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　　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　　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

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　　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　　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　　的主观，

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　　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

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

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　　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　　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　　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　　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　　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　　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　　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　　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　　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　　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

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　　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　　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　　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　　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　　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　　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

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满，并　　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　　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　　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　　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　　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　　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　　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　　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　　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　　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

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　　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　　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

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　　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　　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　　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　　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　　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　　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　　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　　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　　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　　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　　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　　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

组织部内　　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　　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　　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　　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　　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　　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　　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　　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　　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　　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　　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　　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　　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

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　　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　　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　　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　　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　　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　　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　　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　　权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　　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　　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　　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

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　　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　　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　　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　　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　　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　　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　　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　　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　　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

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

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

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　　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　　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　　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　　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　　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　　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　　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　　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　　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　　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　　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　　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　　政

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　　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　　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　　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　　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　　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　　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　　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　　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　　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　　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　　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　　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　　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　　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　　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　　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　　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　　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　　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　　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　　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　　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　　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　　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　　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　　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

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　　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　　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　　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　　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　　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　　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　　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　　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　　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　　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　　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　　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　　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　　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　　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　　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　　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　　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　　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　　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　　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　　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增强党　　内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　　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　　毛主席的这

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　　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　　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一　　惊，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　　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　　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　　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　　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作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　　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　　我在今后警惕和猛省的。

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

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　　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　　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　　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　　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　　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　　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　　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　　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　　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

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一、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刀。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后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岗在

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加强自己的斗争。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

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　　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　　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　　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　　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　　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　　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　　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

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有下列几项结论：　　一、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　　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　　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甲、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　　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　　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　　形成反党的联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高　　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　　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　　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　　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　　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　　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　　在一起企图

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　　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籍口，在中央组织部　　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　　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　　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　　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　　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　　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

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　　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　　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

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　　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　　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　　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　　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　　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　　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　　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　　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　　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　　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　　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　　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　　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　　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

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　　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　　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　　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　　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　　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　　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　　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　　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　　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　　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　　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　　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　　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　　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　　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　　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　　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　　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　　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　　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　　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　　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　　“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　　裕同志

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

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里不多叙说。二、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

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

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　　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　　家的政治本质。　　三、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　　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各条：一、造谣挑拨，对　　上欺骗，对下蒙蔽；二、对待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　　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三、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　　空子；四、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　　使人莫知所措；五、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一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　　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六、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

自称为这是“接题发挥”；七、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八、伪装　　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　　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　　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　　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全暴露　　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　　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夺权　　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　　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　　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　　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　　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从　　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　　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　　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　　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

反对中央领　　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　　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党活　　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饶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作深　　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　　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　　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　　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　　如果真想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　　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

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　　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

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只有如此，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　　大历史任务。　　邓小平　陈毅　谭震林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的《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大大提高了觉悟，坚　　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　　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决议和报　　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对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尤其　　是给了特别沉重的教训。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　　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　　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　　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此次会议在中央的密切指导和关怀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罪恶。会议表现了在对高岗及其同盟者　　饶漱石的反党罪行的斗争上的一致性和团结性，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与拥护。会议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　　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　　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　　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会议并严肃地、尖锐地揭发　　和批判了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提高了　　大家的政治警惕。与会同志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　　一切恶劣影响，并将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　　事业的重大损失，建立和健全党的正常生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　　固和提高中央威信，当作我们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于　　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执　　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地区解放较早、原来的工农业基础较好、

中央派来的干部较多、中央对于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给了许多的便利，并动员了全国力量首先在东北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以及苏联的大量援助——　　——这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因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在许多工作和具体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和错误，特别是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东北局对　　于高岗的罪恶活动的发展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高岗的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　　和阴谋，蓄意已久。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障碍，便　　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　　央的领导，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他在担任

东北局书记期间，即有计划　　地散布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采取两面派的手法，

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造谣挑拨，破坏党的团结，利用东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当　　成他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政治资本。他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　　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把东北局摆在和党中央相对立的地位。他　　在实际上否认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用所谓“东北特殊　　论”与“东北先进论”来和中央竞争领导的地位，有意地不着重宣传东北　　工作的成绩是由于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还利用某些“左”的词句迷　　惑一些党的干部，以求掩饰他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实质。高岗制造　　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的荒谬言论，企图藉此来分裂全党干　　部的团结从而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高岗并在中苏及中朝的关系上，播弄　　是非，进行不利于中苏及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至于高岗私生活的极端堕　　落腐化，则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会议认为高岗这一切阴谋分裂　　党、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高岗　　这种罪恶活动是党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对于高岗　　问题加以严肃的处置。

会议认为东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非法活动，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　　同志的言论，对于他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失掉了　　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报告。在高岗的影响下，

东北局的不少同志往往错误地强调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往往夸大东北地区在支援抗美援朝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功绩，往往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中央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藉口抵制中央的检查和批评，对中　　央的某些政策采取不忠实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干部与群众中，不注意　　宣传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　　信，不注意宣传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提倡个人崇拜，替高岗个人捧场吹　　嘘，捏造高岗个人的功劳，包庇高岗的错误，对于高岗那种腐化生活的大　　量事实熟视无睹。东北局有些同志或者对于高岗有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但也没有在实际上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报告中央。会议认为东北局没有负起中央代表机关的责任，有负中央的委托。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　　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诬蔑　　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　　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　　观念，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　　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

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　　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　　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　　犯更大的错误。　　会议同时指出：东北局及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在高岗问题上　　犯有个别错误或部分错误的同志也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次会议　　上，有的同志已开始认识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值得欢迎的。　　（三）会议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及广大的　　干部、党员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因此，能够保证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　　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是，高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有着相当广泛的　　影响。当然，他们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受影响是部分的，

有的受影响则有较多的方面。受高岗的直接影响与一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东北地区有不少干部对于高岗的恶劣的思　　想作风和腐化行为，内心是有抵抗和厌恶的，但是没有积极采取严肃的态　　度去加以揭发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却是错误的。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所造成的影　　响，主要的表现，例如：滋长着

一种极其危险的骄傲情绪，忽视东北地区　　工作的成绩是因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有了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优越的条　　件，受了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蒙蔽，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正确，自以为一切工作都比其他地区好，忽视中央的领导，既不虚心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也不认真去研究、总结和不断提高本地区、本部　　门各种工作的经验，不愿意正视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喜欢人家奉　　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错误地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党的工作和党的　　集体领导，不强调党在各种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无组织无纪　　律的现象颇为严重；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很不开展；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相当普遍的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党内生活　　很不正常，有浓厚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原则空气稀薄，以及铺张浪费现象，

均没有受到党组织严格的批评和斗争；更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干部竟然抄袭高岗在东北局所使用的那一套而用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按　　照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去从事改造那里的党的组织。这一切的　　倾向和现象都是很危险的。会议对于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进行了初步　　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证明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在东北是有它的市场的，必须引起东北地区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充　　分的警惕，并必须认真地及时地克服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　　（四）会议认为全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着　　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　　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全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　　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军党论”的荒谬论点必须肃清。派　　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一切骄傲情绪、自由　　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以及崇拜个人的思想和宣传都应受到严格的批　　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其腐化生活对党的侵蚀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　　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贯彻，党　　纪国法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发展，

压制批评及对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者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性的　　锻

炼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　　会议坚信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坚决贯彻七　　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战斗性，　　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高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　　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以整顿和严肃党的纪律，维护　　党的统一和团结，并从而改进党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报告》。

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并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　　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　　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　　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　　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　　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军区会议上并　　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　　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　　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　　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　　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　　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

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　　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　　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　　内团结

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　　下：

一、对四中全会精神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认识及教训　　（一）到会同志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　　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　　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　　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是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　　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　　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　　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　　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　　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　　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　　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　　饶的历史材料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底查清的必要。　　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　　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　　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　　致命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　　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　　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　　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　　石搞反党阴谋，权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迅速转变；再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　　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　　完全

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

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不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提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全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面上是尊重的，但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他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表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便在日常工作中也暴露了他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 初步揭

发的主要问题有：（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　　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　　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　　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　　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　　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　　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　　影响的，　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　　思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　　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　　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他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　　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　　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　　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　　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作出任何较有成效　　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

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　　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

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　　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　　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　　约束，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　　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　　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　　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动员一切力量来肃

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　　的错误做法，　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　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　　“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　　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　　展开不久，　就草率收兵。（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　　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

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　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　　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　　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　　没有完成，　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　　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　　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　　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　　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　　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　　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　　因。　　（四）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　　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　　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　　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　　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　　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　　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　　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

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　　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查自己，吸取应得的教训；但同时也指出：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什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漱石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京、杭州时，也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毫不能放松。高、饶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本领。二、对华东局领导及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和批评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

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

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视了放手发动群众；（2）改变了饶漱石空谈

原则， 不解决实际问题和 “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 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 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 倾向，处理问题有讨论有互相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个别错误： （一）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现 象，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维护的，但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 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 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 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一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 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 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全，一揽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少；在这些会议上 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 肯定性的意见，使其他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 重研究不够，以至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 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存在 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 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间不能更好 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

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 们是能够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 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 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 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 题，但对有关

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 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 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

分寸，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 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 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 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 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 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 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 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具体领导 的实现。 三、关于各省市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 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 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 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 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 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

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的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 一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 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 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 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 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 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

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　　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　　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　　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　　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　　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　　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　　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

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　　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无首”；　　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　　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　　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　　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　　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　　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　　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　　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　　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或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　　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　　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高、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　　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　　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　　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　　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

一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　　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即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　　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免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　　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　　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就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摘录）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

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做关于高岗、饶　　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一）　　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了高　　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　　个新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在一九二七年，党进　　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并在以后清除了这些分子，从而能够在　　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胜利地展开了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的斗　　争。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　　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长征，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　　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　　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分子和张国焘在党内进行的破坏活动反映

了当　　时在党外的阶级敌人对党的凶恶的进攻。历史经验证明，党如果不能同这　　些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清除出去，党和革命就会一败涂地。我们的党能够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叛徒和投降分子，所以我们的党就能够　　通过那样险恶的环境而胜利前进。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的区别。革　　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　　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大家知道，随　　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　　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

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　　党。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地包围着我们，时刻企　　图颠覆我们的国家。美帝国主义不但占领着日本和南朝鲜，不但纠合了所　　谓东南亚集团，不但破坏着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且还同他的走狗蒋介石卖　　国集团盘踞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积极准备向我国大陆直接发动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所指挥的反革命特务活动随着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一天天加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　　们虽然还可能并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　　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　　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　　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　　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　　实力，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武器，那　　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

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究竟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所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很明显，我们党决不能容许任何人进行这种阴谋活动，因为只要容许这种阴谋活动，就等于取消了党的一切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就等于党的灭亡。试问，企图用阴谋的方法来夺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和党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爱国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丝毫相同之处呢？这不是适应着帝国主义者和资

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需要又是适应着什么人的需要　　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　　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　　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　　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司　　令部。如果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阴谋家和叛徒的手里，如果这个战斗司令部从内部瓦解和腐烂，其结果当然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只能是资　　本主义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　　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　　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以　　前，即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　　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中央书记处认定这种活动不简单是个别共　　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我　　们党内的反映。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建议起　　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　　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　　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　　底的击破。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　　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和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　　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　　围，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健全和统一，战斗力更强，而这正是我　　国人民能够战胜内外敌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最根本　　的保证。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　　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今后　　我们还要

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个　　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二）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呢？党中央对他们的　　阴谋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　　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　　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这时，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　　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　　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

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这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央　　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　　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的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会议实现了这些　　任务。但高岗却利用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　　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　　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　　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　　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投机分子饶漱石也就在这时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　　中央。当然，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中央当时还不完全了　　解，但是中央已经注意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态度不正常的地方，及时地　　纠正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次会议得到　　了良好的结果。　　但是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　　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他在这次“周游”中大量地散布他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　　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　　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　　计划。

在同一个时期，高岗的合作者饶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饶漱石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向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发动蛮横无理的所谓“斗争”，然后又在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的斗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发言中向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后来查明，张秀山的这个发言，是高岗反党宗派久已准备好了的。他在这个煽惑性的发言中夸大过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错误，诬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不分”、“右倾思想”，并且用了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手段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刘少奇同志。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同志在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授意下的发言，也在整党问题上向中央攻击。饶漱石因为这些发言起了反对中央的作用，表示极为满意和兴奋。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

中央为了制止饶漱石、张秀山等人的分裂活动，同时为了尽可能使他们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特别强调了全党团结的意义，并要求他们负责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的这一指示。当时中央虽然还没有了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全部阴谋，但是中央的措施却打破了这些反党分子利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反对中央的计划。事后，高岗的追随者张秀山向人表示：“组织会议没有解决问题，时机尚不成熟，需要等待。”

这些可耻的阴谋家在这个时候仍旧丝毫不知悔悟，仍旧以为他们在从财经工作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卑鄙活动能使他们不久以后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果实。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自以为他的反中央宣传能够收效，更积极地更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

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高

岗、饶漱石以外的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致支持之下坚决地制止了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　　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　　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　　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三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

这个发言和这个报告都已经为中央政治局所审查和批准。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　　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　　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一　　次自杀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饶漱石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对　　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企图避重就轻，实现　　抵赖，在座谈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饶漱石虽然作出了书面检讨，　　承认了一些别人已经揭露的事实，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避而未提，并且　　还不断地企图抵赖，向党反攻。　　在四中全会以后，全党讨论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政治局并把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党员、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　　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团员在研究了四中全会决议，听了中央政治局关　　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传达以后，都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并且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敌人阴谋破坏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对增强党的团结的认识。在中央政治局　　领导下，一九五四年四月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进一步揭露了高岗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反党活动，同月召集的中央华东局扩　　大会议、五月召集的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六月召集的上海市党代表会　　议和八月召集的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揭露了饶漱石和他的追随者前山　　东分局

代书记向明的反党活动。在向全党公布高岗、饶漱石的罪行以后继续揭发出来的材料，特别是在上述几个会议中揭发的材料，充分地暴露了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丑恶本质。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对于像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全党公认的领导者，高岗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呢？除了造谣诬蔑以外，当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高岗捏造材料，歪曲事实，硬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犯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在暗中向许多同志传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损害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威信。但是只要把这些流言蜚语拿到太阳光底下一看，恰恰证实了高岗本人的反党、分裂党的罪恶和企图篡党的阴谋。

高岗蓄意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要夺取领导权力，他要铲除在他夺取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为达到这种卑鄙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张姓李，只要足以妨害他实现他的野心，就会成为他造谣诬蔑和攻击的对象。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理的，所以他从来

不在　　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　　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　　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所有这一套正是阴谋家的惯技　　和特征。　　特别显著地表明高岗反党活动的反党性质的，就是高岗所散布的“军　　党论”的荒谬思想。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　　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　　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和　　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他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彻　　底改组，由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很明显地，这　　完全是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地位而捏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谁都知道，

我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所创造和组织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完全新型的军队。在这　　一点上，在我们党内和军队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的。我们的党是统一　　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当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据地和军队的　　党”和“白区的党”的区分，而整个人民解放军和军队中的党组织，从来　　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高岗的这一套反党的荒谬理论表明，他的　　活动已经不限于对中央若干负责同志的诬蔑，而是公然地诬蔑我们的党，　　诬蔑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妄想在军队中散播反对　　中央的影响，妄想按照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　　党。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　　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　　他要把某某提成中央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　　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　　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　　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　　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九五二年高岗被调到中央　　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在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他不能实际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殊”、“东北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指示和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像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区，倒是他们在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高岗对于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并且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高岗在中央决定他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竟向人说这是“调虎离山”。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高岗的这种反党的反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在陕甘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他在那个时期的活动已经开始表现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高岗在遇到困难、危险和个人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曾多次表现对革命消极怠工和动摇。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就是腐化的，而在进入城市以后，他更采用各种卑鄙方法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高岗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正是他在政治上完全蜕化的表现。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揭发出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

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解放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实行中央指示，实际上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全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饶漱石在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饶漱石就为了争夺新四军中的领导权力而用欺

骗手段发动反对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他常说他　　对待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手段是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谓“先　　小人”就是找个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方；所谓“后　　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一九五三年，他在　　中央组织部内毫无理由地打击安子文同志也正是想推行这种手段。这是一　　种什么手段？如果不是阴谋家而是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当然绝对不会使　　用这种通行在剥削阶级政治活动中的卑鄙手段。　　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对中央的监督采取抵抗态度。他常常用上海　　情况“特殊”、华东情况“特殊”、“中央的某一些工作部门不就是中央”　　等等理由来对抗中央各工作部门对华东工作的领导与批评。他在华东党组　　织内破坏集体领导，竭力树立他个人的威信。为了便于独揽华东地区的大　　权，他在一九四九年用欺上蒙下的手段为自己博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的职位。他直接指挥着若干在上海市工作的已经为他“制服”了的人，以　　控制上海市的许多重要工作，这样就使上海市委实际上几乎失去了一级党　　委的作用。饶漱石就是这样地来造成在华东和上海市由他个人独断专行的　　状况。　　正因为饶漱石是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而把持了华东和上海的工作，并　　在工作中贩运资产阶级私货，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因他有病决定他到　　北京养病的时候，他就表现了严重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并且害怕他的错误　　会被发现，他曾故意装疯而向毛泽东同志吵闹，试探中央是否还对他信任。

同高岗一样，他把中央调他到北京工作看作“调虎离山”，因而怨恨中央。由于他同高岗一样都是野心家，所以当他按照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观点估　　计高岗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阴谋将要成功的时候，他就赶快挺身而出，担　　负起为高岗打先锋的任务，以免在他们的反党联盟瓜分“斗争果实”的时　　候陷于落后和不利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他伪君子的面具完全揭破，暴露　　出他的阴谋家和投机家的本来面目了。　　饶漱石对上实行割据、抗拒批评监督，对下实行家长统治、破坏集体　　领导的作法，在饶漱石的追随者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身上也有同样的　　表现。向明曾用种种方法公开打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到　　山东的工作组，并且在山东分局建立了家长式的个人统治，借口反分散主　　义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在饶漱石和

高岗结成了反党联　　盟并向中央发动进攻以后，向明积极支持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内和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动的旨在反对中央的斗争，甚至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　　全会以后，向明仍旧掩护和支持饶漱石的错误。物以类聚，为了反对党，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就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站在一起。

（三）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　　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　　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　　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　　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　　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　　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　　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　　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拥护那个反对这个。说到末了，他们所追　　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权力，只要有利于取得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　　化的。　　党和人民决不能够信任阴谋家，因为阴谋家是毫无原则的。他们的行　　为只决定于他们夺取权力的利害打算。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　　把自己装成为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　　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对他们有利的了，

他们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高岗和饶漱石的行为就是这样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样有本领，怎样　　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　　个暂时在表面上说得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护自己，因　　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不说谎，不装出一副　　易于骗人的面孔，这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在工作中，虽然力　　求掩饰自己的面貌，还不敢公开地有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

来　　代替党的路线和纲领，但是他们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　　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　　错误十分严重突出。　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　　“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　　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　　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　　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　　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　　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　　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　　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　　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本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一　　九五〇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　　一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　　上毫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头脑，吹嘘“立即　　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作出悲观估计。这种情　　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突出表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　　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　　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　　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　　整党建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　　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　　的破坏作用。由于受

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　　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　　一长制的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　　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　　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　　上的错误的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　　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　　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　　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　　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从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工人，不　　敢放手让群众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　　很大的损失。 而在另一方面， 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力让步，甚至在　　“五反” 运动初期， 他仍然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　　“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　　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　　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　　捕和所谓“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所谓“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　　部”。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饶漱石虽经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在　　上海主持了一次对反革命的大逮捕，但又借口“人心恐慌”、“妨碍生产”，　　很快停止了群众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饶漱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　　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　　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　　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　　石右倾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的谬论，在许多方面　　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　　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

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　　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　　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他在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反对互助合作的方针，而认为应当依靠富农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　　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向明的投降主义　　路线在整党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并招致了显著的恶果。　　他用“反对孤立整党”的名义抵抗中央的整党方针，拒绝向党员进行系统　　的共产主义教育，听任农村党组织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发展，这在实际　　上就是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我们的党。他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所采取的　　方针，是对富农强调教育协商，而用强制办法来迫使农村基本群众卖粮。　　这很明显地保护富农利益而打击基本群众的政策，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农　　村秩序，损坏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当然，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　　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　　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　　是有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受到了　　中央的纠正。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的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　　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的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

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

“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谎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或某一　　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们个人的劳动，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　　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的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　　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　　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摆在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　　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　　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　　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本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　　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　　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　　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　　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　　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　　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　　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　　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　　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　　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

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　　领高强。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东的反对黎玉同志的错误是当时在山东的许　　多负责同志一起领导进行的斗争，但在问题解决以后，饶漱石向中央作报　　告的时候，却把功劳全部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学问，有本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　　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　　（四）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党所需要的党员和干部是“懂得马克思列宁　　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　　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　　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　　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　　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应当说，我们党内的一切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党正是依靠他们取得了我　　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　　国而奋斗。　　但是正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　　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

联　　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严重危险的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　　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　　动，不惜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一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作　　赌博，能够是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　　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而进行讨论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已深刻地认识到这　　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比较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　　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　　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　　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　　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　　本主义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

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　　那一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　　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　　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　　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　　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　　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　　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也有一些党员曾经这样想，我们党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所以在我们　　的党内不应当发生反党的野心家。这种想法也会妨害他们对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就一方面说来，我们的党既然还处于复杂　　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　　为党内不会产生任何叛徒或蜕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就另一方面说　　来，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之下，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反党分

子才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反党分子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伤害我们的党，相反的，我们的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揭发和战胜他们的阴谋。这正表明我们的党是能够在任何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面前取得胜利的，这正是我们的党的伟大和光荣的证明。还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做是反党的活动。当然，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前一种情况，还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呢？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五）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撤消了他们的原有职务。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党应当从这一次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深刻的

教训。　　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是我们从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中　　所应该取得的基本教训。全党必须充分认识，无论就国际条件还是就国内　　条件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　　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全党特别是党的　　高级干部必须严格地遵守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　　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　　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

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　　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　　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　　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的。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　　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　　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　　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四中全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　　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　　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　　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　　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　　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　　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　　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　　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　　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和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思想的危害性。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　　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　　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他们又努力把自己装成神圣的

偶像，制造对他们的　　盲目崇拜。凡是骄傲自满和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都必然否认群众的力量和智　　慧，否认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必然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和组织之上，　　而这样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和失败。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习气的地方，党的原则性就会薄弱起来，以至完全消失。全党同志，特　　别是全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

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　　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各级党委还不都是认真地执行着集体　　领导的制度，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级组　　织的监督还不是经常和严格的，这些就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可　　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能明了真　　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　　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　　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　　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同　　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和处理　　党员中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　　分子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这一类严重危害　　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　　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　　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　　地鉴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　　义的东西，而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　　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

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　　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　　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　　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　　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　　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由于排除了自己身体内　　部的腐朽的因素而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将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团结，并且更有力地团结全　　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把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事业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摘录）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

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

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

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决议》指出，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研究资料

林蘊暉：《高崗事件與中共高層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 》

一　《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圈以後，從 1938 年 9 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到毛逝世前 1975 年 1 月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除 1954 年 2 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和十屆二中全會外，毛澤東從未缺席。十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長沙因病缺席，全會由周恩來主持；而毛澤東在七屆四中全會缺席的理由，當年發表的全會公報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

眾所周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是以解決高崗、饒漱石篡奪黨內最高權力的事件為主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事關黨內高層的這一重大事件，毛澤東以休假的理由缺席，使對中共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2001 年 9 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對解開這一歷史謎團似有所幫助，現抄錄於後（引文中下加橫線的字體為筆者按原註所加）1：

1 月 28 日（以下是楊尚昆在另外幾頁紙上所記的 1 月 28 日毛澤東同他談話的內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過，各中央局一人，軍委副主席，來電和信印發全會各同志。

組一委員會審查意見，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沖淡了中心。

凱（豐）、楊（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見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為另外決議。

修改經過，由楊給以說明。

（2）文件應交 Юдин（俄文人名，即尤金）、報告、決議（登黨刊）。

自我批評，交？登？

請考慮。準備登、交，在必要時。

對尤金是否說內容？說就要泄密。

會後考慮，書記處或說，或不說，或另一次說，同我們黨是息息相關的。看情況急否，即三種可能情況。

「衝」：

1. 幾位主要同志不衝，可保證。

2. 到會人不衝，事先招呼好，這可以。

3. 他（指高崗）攻彭真，不要緊，可解決。

4. 他攻劉，自己拉開，牽涉多人（可能不大，但準備著），則會期拉長，開小會，報告主席，甚至需主回處理。

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談話的方針：

聽他說，避免「對質」。

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

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

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說；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

全會方針：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說明，說話人不要太多，開兩天。

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之目的在於「過關」。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

「無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陳毅）。

19 日，信送來，交劉（少奇），劉約周（恩來）、陳（雲）、小（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談話。

四個方案：

1. 去杭——不好處理。

2. 主回——也不好處理。

3. 由主指定書記處談話，組織，目前太重，也不好處理。

4. 主指定劉、周與談，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

具體提議：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則請回高，並告劉周：來信已轉，不必來，委託甚麼人談。

招呼——可以不發生問題。

準備有人衝，可以避免。

攻勢——也不要緊，力求避免主回。

全會完後，請鄧（小平）、羅（瑞卿）立即動身，需要 10 天。20 號前二讀黨章（應為憲法——引者註）。立即看材料，法國、美國。

2 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陳〔伯達〕、喬〔胡喬木〕同志）。

3 月 1 號　討論，由劉、周、鄧（小平）負責，3 月份內開會，把人找齊，3 月內完，4 月 1 日交（政治顧問身份），劉、鄧、鄧（子恢）、伯達（伯達可解釋）交蘇共中央徵求意見，5 月 1 日公布。

新民主國家是否交？總路線文件應交。

由恩來召集談話。

（3）會議 3 天為好，必要 4 天，看情況。

方針：堅持、正面批評，「懲、救」。

爭取：逐步改變，改變環境，決議後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增強教育、說服力量；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評（財經錯誤）。

林楓應講。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分配人幫助。對林，由陳（雲）、李（富春）；薄，小平幫助。

他力免不衝，自己是不願擴大的，如向彭真攻，讓其攻下去，也可以過去。自己避開，說不清楚。擴大，開小會；請主回，極力避免。

其目的在過關。

小平可以參加。

上述談話的背景是，1954 年 1 月 21 日楊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來了 1 月 19 日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高要求來杭州，當面與毛商討在四中全會上檢討一事。從毛與楊的談話內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對高崗要來杭州與毛面商一事如何回應，談話提出了四個應對方案，即：1、讓高崗來杭州，不好處理；2、毛澤東回北京，也不好處理；3、由毛澤東指定書記處與高崗談話；4、具體指定劉少奇、周恩來與高崗談，鄧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如毛澤東同意，則請楊尚昆回覆高崗，來信已轉，不必來，毛澤東已委託甚麼人與之談話。並告訴劉少奇、周恩來。

二是與高崗談話的方針：聽高崗自己說，避免「對質」；按決議精神，只作「自我檢討」；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檢討一次不好，可作二次，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

三是對高崗或與會人員是否會在四中全會上「衝」（發動攻擊）作了預測：1、幾位主要同志（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衝，可保證；2、到會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衝；3、高崗攻擊彭真，不要緊，可解決；4、高崗攻擊劉少奇，他自己把問題扯開，牽涉很多人（這種可能性不大，但準備著），這樣會期就得拉長，或開小會，甚至需要毛澤東親自回京處理。應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只作正面說明，會上說話的人不要太多，會議開三天為好，必要四天，看情況而定。會上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的目的在於「過關」。先給大家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目的。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爭取高崗逐步改變，決議通過後環境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林楓，由陳雲、李富春給予幫助，薄一波，由鄧小平幫助。

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一個中心——達到「和平會議」，極力避免毛澤東回京處理。

二　高崗發難與毛、劉分歧

中共黨內發生像高崗如此明目張膽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絕無僅有的。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為何極力採取迴避姿態？顯然事出有因。首先是與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建設新民主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嚴重不滿，並公開進行批評和組織處置有關。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奪取全國勝利以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當時估計是二三十年，然後再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嚴重步驟。這是從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到 1949 年制訂《共同綱領》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共識。但對於劉少奇 1949 年在天津與資本家談話說，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對社會的發展是有功勞的；1950 年，當東北局提出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時，劉少奇指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2 東北即使有一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這個問題提得早了；1951 年，劉少奇又明確指出，黨在現階段的任務，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鬥爭」；同年，劉少奇批評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組織合作社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52 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務院財政部制訂的新稅制，取消了對合作社經濟的優待，薄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又寫上了「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話，新稅制經政務院批准頒布執行後又引起物價風波等，毛澤東都是極不滿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高崗在收到劉少奇 1950 年 1 月關於東北富農黨員的談話紀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3。1951 年 7 月，劉少奇在黨內公開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後，毛澤東隨即明確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對新稅制問題，毛澤東不但尖銳批評，而且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進而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195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5 月 15 日，以政務院名義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決定將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

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領導。

5月19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他看過的，把結果向他報告。毛強調指出：「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 這無疑是對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嚴厲指責。

6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作為黨內的右傾思想進行批判。

這一切，不能不被高崗認為是毛對劉、周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1951 年，高崗得知毛澤東表態支持山西省委關於互助合作的意見後，隨即讓秘書編造了一個關於東北農村生產互助運動的報告給毛澤東，於 10 月 14 日上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高崗的報告後十分讚賞，於 17 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批示說 5：

此件請閱，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

毛還代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要求各地仿效執行 6。1953 年，在批判新稅制的「錯誤」，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的同時，調整了政務院領導的分工，周恩來除應負總責外，只具體分管外事口，然後又把政務院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劃給了國家計委主席高崗管轄。這種政治的貶褒、降升，對高崗來說，不能不認為含有弦外之音。

三　財經會議的「火」是毛點燃的

現在沒有證據說明高崗拱倒劉、周的活動有毛澤東的授意，但高崗從 1953 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到秋天南下游說，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也很難說完全是空穴來風。財經會議上這把「火」就是毛澤東點起來的。

1953 年夏季，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在新稅制問題上的「錯誤」，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主題。指定薄一波在大會上作檢討的是毛澤東。據《周恩來年譜》記載，7 月 11 日，「向毛澤東彙報全國財經會議進行情況。鑒於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7 月 13-25 日，根據毛澤東 11 日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九次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13 日，薄一波作關於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14 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高崗、饒漱石借機鼓動別人猛烈攻擊薄一波，使其成為『桌面鬥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7。高崗在發言中，借批評薄一波的錯誤，直接引用劉少奇關於資本主義剝削、富農黨員、批評山西省委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一些觀點進行批判，搞「批薄射劉」一套，並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攤攤」。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除說過「不能把華北的幾個同志說成宗派」8 外，其他並未表態。只是會議溫度居高不下，周恩來難以為會議做結論，毛澤東才讓周把在外地的陳雲和鄧小平請回來轉圜。8 月 12 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嚴厲批評 9：

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再次尖銳批評了所謂的「分散主義」。全國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於 11 月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向高崗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 10。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少奇沒有必要去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豈敢對劉少奇如此無禮。這表明，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以後多方進行活動，顯然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有關的。

可以用來證明的是，事隔十幾年以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當年高崗攻擊劉少奇的這些「炮彈」又被重新搬了出來。1967 年 3 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擊 1949 年劉少奇在天津與資本家的談話，誣衊劉少奇是「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1969 年 4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把劉少奇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和天津講話作為「修正主義」的

罪行，寫進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之同時，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崗說成是劉少奇圈圈的人——同時在白區工作過的人也統統被打倒。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潛在的必然聯繫。

四　出於無奈把高崗端了出來

高崗自恃腰板硬，對劉少奇登門檢討不予理睬，但終究還是缺少黨內鬥爭的經驗而走了「火」。這就是高崗除向職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許願外，為了爭取陳雲、鄧小平的支持，竟然公開與陳雲說甚麼：「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11 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一旦被拿到桌面上來，顯然就站不住腳。因此，當陳雲、鄧小平將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向毛澤東報告以後，毛澤東就不得不考慮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把高崗端了出來。這就是 1953 年 12 月 19 日，毛澤東召陳雲、鄧小平談話，並指派陳雲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 12。24 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13，並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時，高崗才走了神，覺得事情嚴重了。為了安全過「關」，只得要求面見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的事。1954 年 1 月 7 日，毛澤東在對劉少奇送來的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後，給劉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 14。信中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交代，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這說明，毛對高崗問題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與之同時，毛又敲打劉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單獨給劉的信中，要他也在全會上作檢討 15。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崗 19 日的來信後，毛澤東於 1 月 22 日給劉少奇電報，再次重申 16：

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

在 1 月 7 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

對高崗要求來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給了劉少奇。毛並在電報中說：「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決定「保」高過關，又極力迴避與高見面，看似矛盾，實際又是統一的。因為，高攻劉、周的問題，在政治上毛與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毛在與楊尚昆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想必這就是避免「主回」的謎底。

可見，《楊尚昆日記》記載的：「避免對質，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確有難言之隱。

1954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四十四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相反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不會擅自作主的。那麼，是甚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這是須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范曉春：《也談「高饒事件」發生的某些因素》

發生在 1950 年代中期的「高饒事件」，長期以來被定性為由於高崗、饒漱石個人權欲、野心惡性膨脹而導致的分裂黨的陰謀事件。近些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提出了發生「高饒事件」的制度背景問題 1。其實，「高饒事件」的發生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本文試圖從當時中共高層權力架構開始調整入手對此進行一些歷史的回顧與探討。

一　1953 年中共內部高層權力調整局面的出現

眾所周知，中共自誕生至全面執政前，其高層的權力架構和更替問題，由於複雜而特殊的革命環境以及蘇共的影響，一直未能得以制度化地有效進行。全面執政後，中共仍基本延續了 1945 年六屆七中全會後所形成的領導集體 2，但進入 1953 年，中共內部卻開始出現了高層調整的跡象。

首先，根據中共七大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並召集之。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延期或提前召集」3。由於從戰爭到和平環境的轉換，七大後中共並未及時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4。而進入 1953 年，中共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則發生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戰爭全面停戰大局已定後，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局面。在階級鬥爭方面，工人、農民等對中共擁護力量的增長，基本上改變了同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和知識份子等階級階層間的力量對比。工業化建設方面，蘇聯援建的 156 個大型專案主要部分也最後確定，而在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迫在眉睫之際又找到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將私營經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一現實的途徑。因此，在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徹底勝利之後，中共在蘇共的影響下開始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根據蘇共和中共過往的經驗，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一般都要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形式確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基於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因素的考慮，也要對人事做出相應的調整。

其次，據薄一波回憶，1953 年 3 月初，高崗向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 5，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在這份名單上，政治局委員分兩組寫出，一組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是書記處成員——引者注）以外，寫有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書記，也都是在中共全面執政初期分鎮四方的「諸侯大員」——引者注）；另一組上寫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人選。這個名單安子文曾給高崗看過，也向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談過。6

再次，1953 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人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大權，威望如日中天。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出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等問題。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要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方面自然也應作相應的變動。

此外，1953 年 3 月史達林的去世引發了蘇共高層權力格局的調整。7 月上旬，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決定把貝利亞從蘇共中央清除出去，並開除其黨籍（同年 12 月 23 日被處決——引者注）。9 月份，赫魯雪夫當選為新設置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對世界各國共產黨影響甚巨的史達林時代得以真正結束。

那麼，如果進行中共高層的人事調整，會出現一種怎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在人員安排上會出現怎樣的變動呢？

1952 年 6 月 20 日，毛澤東曾致信史達林提出，「由於經濟建設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7。7 月，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並擬逐步縮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區政府的機構與職權」8。此後，中共採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上調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進京。這一方面為撤銷大行政區做準備 9，另一方面重新佈置高層的權力架構。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的具體安排是：最先調來的鄧小平，1952 年 7 月份來京後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財政部部長。隨後進京的習仲勳於 9 月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於 1953 年 1 月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此後，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調任計劃委員會主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1949 年 10 月即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且華北局駐在北京，不存在「進京」的問題。（2）加強中共中央主席對國家政權和政務的直接領導。1953 年上半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分散主義」和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被撤銷，中共中央主席開始直接對各黨組小組和分黨組幹事會進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對下屬各經濟部門的領導，也不

再通過政務院的中財委，而分別通過政府新增設的五個方面領導人進行，時稱「五口通商」10。這樣，政務院原來事權專一、無可替代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且由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只有外交等少數部門，其職權範圍已大大縮小。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如何對待新民主主義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所分歧，受到毛澤東多次批評，其權力亦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並隨後不得不在中共內部作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 11。

不難看出，中共利用發動反對「分散主義」運動和調整、重用各大行政區領導人（華北局的薄一波除外，並且由於薄一波一直在中央工作還成了調整和批判的物件）在中共高層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個人的相對集權和中共高層權力的制衡分佈。但是，這樣一種權力安排顯然並不是一種令毛澤東滿意的最終結果，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設立和政務院職權的削弱導致一種體制龐雜、部門重疊、關係不清的體制困境的出現。並且，當時中共也已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改革國家體制。此外，更有人事方面重要的原因。

二　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及中共中央的反應

對於這樣一種調整後出現的人事安排格局，趙曉光認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高崗的提拔重用，雖然含有對劉少奇、周恩來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滿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一種刺激和觸動」12。自然這是一家之言。當然，調整的結果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有抑劉少奇、周恩來，而揚高崗、饒漱石的最終權力架構設想。

高崗，「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幹」。在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他主持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工作「走在全國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13。因此，他屢受毛澤東的重用。中共七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後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集東北大行政區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此外，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方針等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的問題上，高崗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1952 年 11 月高崗進京後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53 年中央又決定把 8 個國家

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高崗任主席的計委領導，國家計委遂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權勢一時甚為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與此同時，高崗也有其性格和作風上的缺陷，當然，在中共處於主要依靠暴力奪取與穩定政權的過程中，這並不成其為左右政治生命的決定性因素 14。此外，高崗在東北的一些舉動也讓毛澤東心存疑慮 15，儘管這方面的壓力在史達林逝世後得以明顯減輕。

從中共此前高層人事變更情況看，政治路線對於高層的權力架構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且有著豐富經歷和成功經驗的地方幹部更容易進入中共權力的高層。因此，高崗進京並「一馬當先」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其能否更進一步，實現所謂的「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16 的權力架構，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充滿歷史機緣的「天問」了。

眾所周知，集權體制內權力調整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而從高崗進京後的表現來看，他也確實為鞏固和提升自己的權力積極進行了活動。當然，由於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一種個人集權的格局，也就是無論意見分歧，還是組織調整、人事安排都由毛澤東個人裁決和決斷，也由於當時中共還沒有馬上召開權力更替的代表大會的明確計劃，因此，高崗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作為只能表現為一些「非制度性」管道的行為選擇。也就是在聽命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本人保持密切關係的同時，一邊進行私底下的串連，積極尋找支持者或同盟者，一邊在表面上利用對手工作上的失誤，以反對宗派為名搞公開的黨內鬥爭。當然，在中共黨內，試圖搞「攤攤」和「圈圈」，或以「攤攤」和「圈圈」為名搞活動，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種地震」，在名義上是最終為中共的主義和體制所不允的。

1953 年 6 月 13 日至 8 月 13 日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由於毛澤東不點名的指出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右的錯誤和要求中財委把問題擺到了大會上，以及提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7，高崗、饒漱石等人便抓住薄一波的問題大做劉少奇的文章。

薄一波認為，從全國財經會議後期開始，毛澤東已逐步察覺高、饒的活動不正常。他在談話中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 18。范守信則認為，此間毛澤東是將其作為一種有礙黨的團結的錯誤言行對待的 19。而此後的事實是，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曾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徵求意見，並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而高崗表現得更為活躍，並四出活動；饒漱石則引發了 9 月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的風波。據鄧小平事後回憶，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他還找到陳雲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20。

在 6-8 月的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曾電令在北戴河休養的陳雲、鄧小平回京講「公道話」，以結束財經會議。而此時，陳雲、鄧小平則都選擇了上報毛澤東的處理方式。林彪在完成其軍事任務後就處於長期養病狀態，表現得波瀾不驚。饒漱石則在這一時期表現得較為活躍。

眾所周知，「饒漱石在戰爭年代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受到劉少奇的器重」。中共全面執政後，其擔任華東局和華東行政區的黨政一把手職務，是一方諸侯，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也是所謂的「吏部尚書」。然而，1953 年初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便發動了對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由於中組部是劉少奇分管的，自然就涉及到了劉少奇。財經會議期間，分管中共之組織工作的饒漱石是否已與分管國家計劃工作之高崗「串通一氣」21，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此之前高崗與饒漱石素無淵源，目前關於這一時間節點上的「鐵證」也未問世。但同年 9 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安子文又受到了批判，饒漱石認為自己對組織部「插不進來」，並與劉少奇「頂了牛」22。會議期間，一些中央局組織部長也發言批評了安子文，如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但據他事隔半個世紀後回憶，「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這些意見，都是和毛主席交換過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來講的，並且是安子文請我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意見的，在大會發言時，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場。」23

針對這樣一種高、饒進而劉、周退的態勢出現，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採取了「測試」高崗的作法 24，並於同年 12 月 24 日，經過緊張的醞釀和準備，25 主持召開了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 29 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26。他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即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憲法草案。

12 月 28 日，在陪同蘇聯客人去東北期間，高崗在瀋陽主持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並要求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從瀋陽回京後，他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 27。

1954 年 1 月 7 日，毛澤東在杭州就高崗問題致信劉少奇並中央書記，建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以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指出：會議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22 日又就高崗來信要求到杭州和他商量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一事致信劉少奇，說高崗不宜來此，請劉、周、鄧和高崗商量即可；並再次指出：全會上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28。

2 月 6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與會的劉、周在會上都作了自我批評，高、饒也作了檢討性發言。全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12 日，中共中央即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向幹部和黨員認真傳達並組織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其中，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幹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幹部的團結，尤其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關鍵。」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

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鑒於我們現在還採取著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而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著我們；鑒於我們的黨很大，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還很不夠，一部分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還相當複雜；鑒於一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鑒於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鑒於這一切情況，中央認為，當此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歷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同時，在決議中對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人提出六項規定，如「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因此，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全黨高級幹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稱中央來散佈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29 等等。

應該說，會議和檔案儘管是不指名批評，但既然已指出為「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非法活動」，其意已明，並且依照中共黨內鬥爭之傳統就必然還會有「下文」，也就是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30，以起到從政治、思想和組織等方面徹底解決之功效。因此，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1954 年 2 月 15 日始，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37 人，重要

工作人員 40 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二者進行揭發和批判，也聽取他們的申辯和檢討。

然而，2 月 17 日，高崗卻在寫完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信後自殺未遂，並於當日被實行管教 31。於此，2 月 25 日，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之後，他就走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絕望的自殺道路。而「高崗的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高崗在任東北局書記時，對工作報喜不報憂，不願意檢討，受不得批評。他來中央工作認為是調虎離山，後來仍兼東北局書記才放了心。高崗歷來不願讓中央及中央各部門對東北工作進行檢查，一遇檢查即利用檢查人員的某些弱點大肆攻擊，企圖使人望而卻步。」並認為，從高崗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一切驕傲情緒、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情緒、小團體習氣、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都應受到批判」，「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32，等等。3 月 3 日，這個總結發言的提綱在經毛澤東修改 33 和中央政治局批准後，轉發給了全國各省軍級的黨組織。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則開了 7 次，到會 26 人，結束會議時到會有各大行政區及中央各部 66 人。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 1954 年 3 月 1 日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對饒漱石問題的結論有：「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認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統一的革命政黨，而是把黨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團，認為投機取巧，運用手段，就可以駕淩一切。他在一個地區工作時，從來不願中央各部門對他的工作進行檢查，從來沒有自我批評，總是把自己的缺點掩蓋起來。」「他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成是一個獨立王國」34。3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也批准了這一報告。不難看出，座談會期間高的自殺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隨後，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紛紛召開會議，傳達和學習七屆四中全會和關於「高饒問題」的指示精神，一些單位還進行了揭發和批判高、饒的活動。如 3 月 9 日，中南局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四中全會檔的通知。3 月 17 日至 4 月 8 日，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四中全會的決議。由於華南分局 1952 年出現了所謂方方「地方主義」，「到會同志進行了認真的檢查，一致認為華南黨的組織自從反對了土地改革中的右傾思想和反對地方主義、分散主義以後，全體同志

團結在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組織路線下，黨內的團結是大大增進了。但是，黨的團結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還是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特別是黨內同志對於必須增強黨的團結以擊敗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尋找代理人的陰謀毒計的認識是很不夠的，而這正是地處國防前線的華南黨組織所必須充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35 3 月 13 日至 24 日，西南局舉行第 12 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書記、副書記及西南一級機關和重慶市委相當於地委書記以上幹部，軍隊師以上幹部共 300 多人。3 月 16 日至 21 日，華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3 月 10 日至 27 日，內蒙古分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七屆四中全會決議。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西北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西北局委員，新疆分局和各省（市）委正副書記及各省（市）與西北區機關高級黨員幹部共計 48 人，接著又召開了 3000 多人參加的各級領導幹部大會。由於高崗是從西北局調到東北去的，西北區層層幹部對其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揭發批判，並結合個人的思想工作實際進行了自我對照檢查。新疆分局也在 4 月 8 日至 17 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和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精神。由於新疆分局在牧區工作上未能堅持貫徹中央和西北局的慎重穩進的正確方針，而採取了冒險急進的錯誤方針和政策，也深入檢查了新疆地區黨的團結問題。36

當時，高崗和饒漱石仍分別擔任東北和華東兩個大行政區的黨政軍職務，也由於中央已把他們的問題初步定性為搞「獨立王國」和派性，這就不能不對東北和華東兩區進行清理和整頓，以消除高、饒問題在地方上的影響。

1954 年 3 月 25 日，東北局召開全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省、市、地以上領導幹部參加），出席會議的有 517 人，指定列席的 190 人，會議由代行東北局書記職務的林楓主持。3 月 26 日、27 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達報告，指出：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 37。3 月 28 日，周恩來返回北京，羅瑞卿 38 作為中央的觀察員留下指導會議。

由於中共中央認為「對高崗的錯誤要有集中的、歷史的認識」，「東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犯有原則性錯誤」，「在這次會上先作原則交代」，因此，儘管也強調「高崗的錯誤與東北局每個人的錯誤要區別開」39，但會議很快由東北局幾個書記做檢查轉變為對所謂「五虎上將」的批判 40，並且羅瑞卿在會議總結性發言中還指出：「高崗在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組織內的若干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志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並且說高崗的「活動綱領」就是所謂的「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軍黨論」41 等。4 月 24 日，高幹會通過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認為，「根據與會同志揭露的事實，證明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的個人目的，不顧黨的紀律，在不同程度與不同範圍內追隨高崗污蔑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破壞中央威信，挑撥黨內是非，創造黨內不和，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因而在實際上參加了高崗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形成了一個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接受高崗的策動，接受高崗所謂「東北特殊論」和「東北先進論」這些反黨的觀念，在實際上把東北局和黨中央對立起來。同時，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崗吹噓裝潢，包庇他的錯誤和罪惡；另一方面，在高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楓同志，即在高崗離開東北地區後，他們實際上仍然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致使林楓同志難以行使職權。這是一種嚴重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破壞黨的團結的不可容許的錯誤。會議指出，這些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和在高崗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必須繼續進行深刻檢討，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動，脫離原來宗派的立場，把宗派活動的情況向黨徹底交代，以便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否則他們就會犯更大的錯誤。」會議還認為全區黨的組織，必須根據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本著此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揭發高崗的罪惡，粉碎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徹底肅清高崗的影響，全區黨員首先是高級幹部，應該從高崗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必須糾正。黨內非法活動必須禁止。「會議同時鑒於東北局多年來受高崗的把持，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曾經積極地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因此請求中央考慮改組東北地區黨的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42。 4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批准東北地區高

幹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時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的黨內職務。對此，張明遠始終認為，東北局的高幹會以把與高崗因工作關係而和高崗接觸較多的人打入「高崗反黨集團」而結束；並且，林楓和羅瑞卿都很欣賞所謂的「五虎上將」這個比喻。他們把還不實的會議情況，連同這個錯誤比喻都當作「事實」向中央彙報，得到毛主席的認可。43

在華東局方面，4 月 1 日至 15 日，華東局召開由華東局委員、華東局各部委、華東軍區及各省市高級幹部 60 人參加的擴大會議，除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進一步揭發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外，會議以絕大部分時間著重檢查了華東局的領導。會上，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和常委舒同對華東局和自己的工作也作了檢查和自我批評。到會人員都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會議認為，「饒漱石是一個十分奸滑、巧於偽裝的陰謀家」，「華東黨內還存著適宜於個人野心家發展的「土壤」和「氣候」」，但「不應該不按事實而按印象去「按圖索驥」，去追查甚麼「支持者」、「宣傳員」、「抬轎人」，找甚麼「小饒漱石」等，因為那樣不但會誇大饒的影響作用，而且會鬥錯人，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至於華東黨內是否有積極支持饒漱石反黨活動的人物，是否有人雖然與饒無直接聯繫卻有一套錯誤的東西，會議對這一問題暫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會議上進一步加以檢查」44。4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華東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召集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擴大會議，6 月份又召集了上海市黨代表會議，8 月份召集了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對所謂饒漱石及其追隨者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等人的「反黨活動」進行了揭露、批判和嚴厲的組織處理 45。

三　大行政區的撤銷和中共高層權力架構的最終完成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級以上正式設置過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建制。當時的大行政區政府擁有廣泛的職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46。並且，各大行政區領導群體突出個人的領導權威，形成以中央局書記或第一書記為核心的集權體制，實行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模式。1952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決定對大行政區調整後，高崗、饒漱石等人儘管名義上仍擔任大行政區的職務，但已不具體負責

實際工作，並且大行政區性質和任務改變後，大行政區的權力和許可權也受到很大限制。

有鑒於此，金安平認為，從客觀條件上看，高、饒的活動是充分利用了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從主觀條件上看，高、饒的野心是在他們被委以重任，上調中央後而急速膨脹的；從內容上看，他們陰謀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在地方搞「獨立王國」47。應該說這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的最終目的還不能說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儘管他們有「拱」劉、周的用意和表現，但仍是徹底服膺於毛澤東的，這一史實的材料隨處可見。同時他們的「野心」也不是甚麼「急速膨脹」，因為高、饒都是久經黨內鬥爭考驗的「封疆大吏」、「一方諸侯」，利用「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就「急速膨脹」「野心」，顯然是對複雜歷史過程的一種簡單化處理。

眾所周知，歷史人物的「野心」，包括「急速膨脹」，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通過上述對歷史的回顧和分析，不難發現高崗、饒漱石對形勢判斷的依據、進行活動的實力資本，與當時中共中央高層調整後的權力配置格局，及其執掌大行政區最高權力的經歷，以及當時名義上仍負責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中央高層權力調整使高、饒事實上已走到了歷史前台，而不是還在利用和繼續尋找時機。此外，「過渡形態的大區行政建制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結構，易於助長「獨立王國」的傾向」48；「大區一級如果要在政治上搞串聯來影響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比省一級搞串聯要容易得多」49。儘管從事後看，高、饒並未在其所轄的大行政區形成所謂的「獨立王國」，但其大行政區的經歷和任職無疑增加了其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可能，以及增強了他們對此的信心。此外，從另一個角度講，出於執政初期加速中央集權的考慮，他們的大行政區背景和做法也影響了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黨內權力鬥爭形勢的判斷和處理方式的選擇。

既然中共在對「高饒問題」處理過程中突出了對「獨立王國」和「宗派活動」的批判，也由於高、饒都有大行政區的背景和東北局還提出改組東北局領導機構的請求，這就不能不對 1952 年就已明確的將要取消大行政區的決策起到加速的作用。此外，對「高饒問題」的批判和處理的過程也有效地消除了撤銷大行政區

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疑問和阻力，並最終使這一重大政策的最後定奪和落實變得異常順暢起來。因為，當時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獨立王國」和個人主義等問題的批判，毫無疑問，一方面起到了清除原有「分散主義」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各大行政區在中央對「高饒問題」嚴肅處理的情勢下不得不紛紛向中央表達無條件服從中央權威的誠意，並在實際行動中竭力表現其決心。所以，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卻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一。

大行政區於 1954 年底全部撤銷後，其領導群體的安排是：（1）除陳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長職務外，幾乎全部集中於中央任職；（2）1955 年調整大軍區時，其原任大軍區職務一概被取消 50，有的在軍委總部工作，有的儘管也任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主要從事黨政工作，有的則完全脫離軍隊；（3）除高崗（1954 年 8 月 17 日自殺身亡）、饒漱石（1954 年 3 月，停止一切職務，隔離審查）外，絕大部分繼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而其中的「翹楚」則是西南局的鄧小平。

1954 年 4 月，鄧小平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中央組織部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同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全國普選的基礎上得以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劉少奇當選為第一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而由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在工作制度方面，由國務院總理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負責政府方面的日常領導工作。鄧小平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55 年 3 月 19 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他說這個檔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甚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 51。因此，在 3 月 21-31 日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緊接著，4 月 4 日，鄧小平、林彪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同時選入中央政治局。

1956 年中共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際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定其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高層權力架構方面，有大行政區領導職務背景進入八屆中央政治局的有 8 人，加之曾任山東分局書記的康生和内蒙古分局書記的烏蘭夫，共計 10 人，佔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總數 23 人的 43%左右，其中羅榮桓、陳毅、劉伯承、賀龍、烏蘭夫和薄一波為首次進入政治局。會後，又選出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組成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鄧小平還出任新設立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自此，中共全面執政後第一次形成了其比較穩定的高層權力架構。

2006 年 6 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 年 8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2008 年 7 月，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2011 年 3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3）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

一 十月十五日的谈话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一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

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二（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

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

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

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注释

[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16-124 页）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一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二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能不能巩固呢?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他们也许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

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三百个合作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1]。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

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2]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

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吧，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六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

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

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〇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

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

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十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〇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

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

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说:“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注释

[1]当时一般把办得比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称作一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

[2]这里指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68-191 页）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1]。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

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 0 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

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

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

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

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

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

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

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

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 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 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注释

〔1〕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2）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看本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95--217 页）

2011 年 3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4）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

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

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

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

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2]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267--288 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现在我们国家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进步的。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订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能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农村工作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睡。个别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我们已有过一次扫盲的经验，那次就扫得急了一些，以后又收缩得急了，以致大部分地方干脆完全停止了。停止是不对的，扫盲工作是应该积极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按照“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这一工作，既要纠正冒进倾向，又要反对取消主义。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使计

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订得过高，没有考虑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和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有些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过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码，下面就必然受不了。中央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我们要在今后经常注意。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的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加以具体分析，不能凭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情上是右倾保守，在另一件事情上又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我们对于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能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能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为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略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四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

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异，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的法则。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一些小的原则和表现形式，各国又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两个革命却有许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许多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围的继承性。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认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向外国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本理论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对不对呢？不对。所谓“学”，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论就是在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分中西？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二国际曾经企图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了一些否定、修正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驳倒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学好了就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共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相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艺术上，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绍，列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像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外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照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许多年。其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们不反掉，就没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们也应当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不要吃教条主义的亏。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的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酣。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并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

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几百万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近代文化，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买办阶级有文化，那是奴隶文化。地主阶级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识还不多。比较起来，在没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就可以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不能够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呢？能够的。我们在座的许多人过去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从资产阶级那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转过来了。所以，一定要团结他们，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才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座的都是音乐家，学西洋音乐的，你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整理和发展中国的音乐，要靠你们学西洋音乐的人，好比整理和发展中医要靠西医一样。你们学的西洋东西是有用的，只是你们应当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学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们要重视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要以创造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为努力目标。你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们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千万不能拿唢呐、胡琴去吹奏，还是管弦乐队。我们要提倡民族音乐，但西洋的

管弦乐还是应当要，因为世界上都作兴这种东西。这等于我们穿军服，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和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当然我们的军服同苏联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中国军队色彩。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我们的国家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人民在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制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所有这些变化，不但唤起了中国六亿人民的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世界生活中，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剥削的人民中，不能不发生伟大的吸引力。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我们的大会对于这一切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将促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十一年前，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任务，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实现了。

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想错了。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个总路线是在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

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很明显，如果我们党接受这些意见的任何一种，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六月的统计，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一亿一千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输业和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工业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货源，逐步地实现了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须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骤，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经济，使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步骤呢？现在，我们就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

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雇农群众。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很容易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他们不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约等于五分之一公顷），南方许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在继续个体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们党的号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组织。由于互助比“单干”优越，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四年又增加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一种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底还只有三百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组织优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户。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杜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随后，初级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组成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

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对于下中农以至贫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地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们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当然也不让中农损害贫农的利益，占贫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本上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购七十亿斤粮食的错误，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购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成为一百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它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如前面所说，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有矛盾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

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几年来，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本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

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 0 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一九五 0 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经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在一九五四年，这种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到一九五五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四分之一）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购买的办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允许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经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在资本家中举行讲演会，座谈会，开办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中间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我们的面前还摆着许多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政策，争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那些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但是我们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许有任何的强迫命令。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保证现有的一百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领导几十户、几百户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经验，党必须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经验。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为了有效地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现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绝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谨慎地担负起社员群众所委托给他们的重大领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员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员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

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们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不要轻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损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并执行自己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结教育资方人员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方人员，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说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继续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不长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

三社会主义建设

第-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又八个半月。到明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编制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种成就了。

我们大力发展了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已经扩建了东北钢铁工业基地，开始了内蒙古、华中两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建和

扩建了一系列的电站、煤矿、油井，一系列的有色金属厂矿、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一系列的机器制造厂，一系列的轻工业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施工六百九十四个，完工四百五十五个。实际上，施工的项目将达到八百个左右，而可以完工的项目则将接近五百个。在计划规定的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七亿元中，前三年所完成的和今年计划完成的已经达到三百五十五亿元，占计划数百分之八十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这个规定将超额完成。今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而钢、钢材、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汽车轮胎、棉纱、棉市、纸张等项，今年的计划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千瓦至一万二千千瓦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一九五七年将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可以自给。

我国的农业，在总产值方面和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可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都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增长很少，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八。今年我国虽然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但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产量还是可能达到原计划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在水利方面，我国过去三年内，在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和其他许多河流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行了施工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此外，各地农村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

在运输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建设铁路新线四千余公里，公路干线一万公里，今年都将超额完成。

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迅速的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预计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职工文教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四年总

计约四十四亿元。国家在过去三年中修建的和今年计划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公尺。

应当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个别的指标，例如石油原油、食用植物油、卷烟的产量，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将不能完成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

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和工程项目，虽然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为了完成某些重大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计划，却还必须适当地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作紧张的努力。对于其他限额以上的工程，也要争取尽量地完成预定计划。

各个重工业部门虽然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为了保证基本建设计划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钢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必须相应地增多煤、电、石油，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等等的生产。同时，还应当相应地解决运输和城市建设等问题。

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粮食、棉花必须力求继续增产。油料作物、猪和其他牲畜、有些副业产品在过去几年中增产不快，有的甚至一度下降，必须由农业和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它们的尽速增产，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将紧接着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讨论和通过我们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专门的报告。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呢？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这个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来，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般地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第二个五年内，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上述薄弱的和缺少的项目，争取在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包括部分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我们必须逐步改善这种情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来发现种类更多和数量更多的地下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在第二个五年内，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除继续建设东北、华中、内蒙古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外，将在三门峡周围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很多的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电站、煤矿、石油企业、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将拥有现代先进技术的装备。

重工业各部门的生产需要大大提高。在一九六二年，需要把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四百一十二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由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电的产量由一百五十九亿度增加到四百至四百三十亿度。

轻工业也需要有比较快的发展。在一九六二年，要求棉纱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五百万件增加到八百至九百万件，食用植物油由一百七十九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至三百二十万吨，糖由一百一十万吨增加到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万吨，机制纸由六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万吨。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且应当力争超过这两个指标。大豆、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也必须积极发展；副业中的养猪业，特别需要努力发展。

铁路，公路、水运等项运输事业以及电讯事业都需要继续发展，对于原有线路应当逐步地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继续合理地组织运输，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现在的铁路运输已经在某些地方呈现紧张情况，必须积极改善。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新建铁路八千至九千公里，把兰新铁路修到中苏边境，把西北、西南各省用铁路干线联接起来。

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

按照初步的计算，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除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五年内，职工人数将增加六百万人至七百万人左右；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农民的全部收入也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粮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应，都将有所增长。

从以上所说的简单轮廓可以看出，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按照这个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更大的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也随着有了改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一九五 0 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努力节减军政费用，但是，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六。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军政费用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也必须适当地

集中使用资金。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十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同时，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我们的一部分消费物资必须出口，以便换来工业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装备。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以下，我们将就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当前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

工 业

在工业方面，这里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职工生活问题，企业领导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在一九五二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约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这个比例将有可能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办。

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们想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第一，

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出现商品不足的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以稳定的合理的价格去交换农产品，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建设的时间比较短，资金的周转比较快，所以资金的积累也比较快，而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资金正可以用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对于建设重工业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

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工业区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内，除开充分利用东北和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发展工业上的作用。

在第二个五年内，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业。

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得不够，以致地方工业不能够合理地发挥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机关也曾经不顾全国生产设备是否有余，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因而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这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

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无论地方国营企业或者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样，为了完成国家的建设计

划，工业，运输业以及其他一切部门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努力提高工程的质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我们已经生产了许多质量优良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建成了许多质量优良的工程。但是由于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不高，一部分企业缺乏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制度，特别是一部分企业的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地重视保证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只是片面地重视保证数量和进度，所以有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是不好的，某些产品不合规格，成为次货。商业方面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曾经一度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也降低了许多轻工业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责任心，甚至造成了许多产品质量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些情况已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扭转。一切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技术，并且逐步地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一切企业都要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不合标准的产品和不合规格的工程应当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应当积极地改善原料、材料的质量和原料、材料的供应工作。对于轻工业产品，应当严格地执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并且在一部分产品中逐步地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必须在一切有关的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关于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思想教育，彻底地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职工群众有许多困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

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职工群众说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其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组织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

处理职工生活问题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一切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工作是不是健全。企业的健全的领导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关的努力。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需要减弱。恰恰相反，许多上级机关并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它们对于企业的领导往往是不及和不具体的，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

农 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应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呢？

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机耕面积，预计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计划增加的耕地面积，同第一个五年一样，只能达到几千万亩，即近于全国原有耕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化学肥料的产量，到一九六二年，每亩播种面积平均还摊不到三斤。因此，在第二个五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应当看到，依靠这些措施，实现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水利方面，现有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其余三分之二的耕地中，有许多是可以找到水源灌溉的。在肥料方面，人畜粪尿和绿肥等自然肥料，来源很丰富，肥效也高，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是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肥源的。我国农村有丰富的人力，而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只要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上述措施，完成建议中的第二个五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在第二十五年内，保证粮食和棉花的增产，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保证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产品的增产，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统计，除去自给性的副业不计外，各种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中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甚至超过粮食所占的比重，因而对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对于轻工业、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贸易的供应，又有极大的意义。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数一亿三千八百万只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因此，各个地方的党组织、政府和它的农业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领导。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在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上，应当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的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合作社比较忽视甚至不合理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格政策，一般地是适当的，是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在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几年来，某些经济作物、养猪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不快或者减产，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些偏低。这些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当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

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不但需要国家有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合作社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商 业

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按今年的计划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在对外贸易方面，今年的进出口总值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可分之六十五。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生活资料为主的；一九五 0 年以来，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对设备和器材的需要，并且发展了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按照初步的估算，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二年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基本上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形成，杜会主义商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产品中的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部分，都要经过社会主义商业分配给工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的消费群众。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民对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需要的增长，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建

设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要求出口的物资愈来愈多，今后我国商业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人民群众和对外出口的需要，通过价格政策和采购措施来推动工业和农业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网，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对于工业品、农产品的采购和供应，并且使商业网的安排，适应于商品采购的需要和群众购买的方便。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要求在目前认真地改进购销关系，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和适当地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

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们的国营商业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农产品，除粮食、棉花、油料由国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或者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管理，统一议定商品价格，并且限制了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这就是前面说的，一部分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经过了十二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常波动。解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是说，不管当时某些物价是否合理，首先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在稳定以后，再对某些十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是成功的，它对我国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商业部门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续执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拟出一套适合于目前具体情况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比较完整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方案。收购价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有利于增产的目的，这是我们物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在收购和销售两方面，都必须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对于当地收购、当地销售的商

品，收销差价过大的，应当适当地缩小；而对于低值的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适当地扩大。此外，还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国家的物价政策而寻求不应有的商业利润的行为。

商业工作的巨大的任务，要求全国的商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会做生意。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国商业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商业工作的干部和专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拿一九四九年同今年计划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几万人。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十万零六千张增加到今年的三十三万九千张。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有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每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

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四 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内根本改变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原故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原故吗？

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韵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

国家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由于民主改革依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负起这种领导责任呢？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和大公无私的领导，就是贫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

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说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了。我国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那末，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视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过高地估计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和滥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比较分散，我们过去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比较薄弱。现在他

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

诚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是我国社会上除开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但是不论在过去和现在，这个阶级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

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尽。

由此可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工作就是完全健全的了。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常常脱离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不是发挥了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三千五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经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近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今后，在尚待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给他们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

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认为少数民族一无长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视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单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观点，都必须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

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全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一九五 0 年领导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给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五 国际关系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根本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但苏联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欧亚两洲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九亿多人口，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大家庭。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合作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友好的关系。我国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友好的来往。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正动员国内人民的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工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的政策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力量都

会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声望日益增长，对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堡垒。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在亚洲和非洲，摆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内，共有六亿几千万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在执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五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又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既符合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这一些伟大的历史变化，是同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美国垄断资本利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首先是控制德日等战败国，夺取英法等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它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美帝既主义把它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但是，谎话究竟不能掩盖事实。社会主义同侵略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消灭了依靠侵略发财、依靠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发财的阶级，也就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世界人民看得很清楚：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主张和平共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并且带头裁减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削减了自己的军费。相反，美帝国主义却仍然在扩张军备，反对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害怕和平共处好像害怕世界末日一样；它的武装力量至今还在远离自己的国界几千公里以外霸占着我国的台湾，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西欧各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把“防共”和“反共”的口号当作烟幕来掩盖一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早已流行过了。帝国主义者当然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也知道，强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碰不倒的。因此，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假借“反共”之名，以便压制本国的人民，尽可能地控制和干涉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反抗，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固有的矛盾。现在，受过和正在受着殖民主义灾害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愈来愈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当前最大、最贪婪的殖民主义者。在亚非地区，愈来愈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有力地限制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识破了美国扩张政策对它们危害的真相，而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赞成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趋势，也已经日益发展。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两国，曾经企图凭借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事实上，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只是为美国势力的入侵开辟了道路，而沉重的军费负担日益严重地妨碍着它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的主要盟国对于美国的垄断和控制的

不满和反抗，特别是加深了英美之间的矛盾。同时，西方各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展开广泛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美国人民也已经逐渐地体会到这种政策为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战争的危险。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英法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正处在矛盾和混乱之中。英法两国在目前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下，虽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它们由于企图保持殖民主义的特权，对于民族独立运动却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政策。这种状况，在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以后的发展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英法政府想用武力干涉的方法，破坏埃及的神圣主权，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美国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企图乘机夺取它们在中东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反侵略运动之间的斗争，在中东正在尖锐化。全世界的最广泛的同情是在埃及方面，全世界最广泛的舆论都主张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英法如果不遵循和平解决的途径，而实行武力干涉，那就不但会受到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而且必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亚非两洲、拉丁美洲以及西方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将引起英法两国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世界是要走向和平的；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武力干涉政策只能招致彻底的失败。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岳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必然还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就终将取得胜利。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不久，就同伟大的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伟大的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巨大的援助，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也给了种种的援助。兄弟国家的这种同志式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援

助，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中国身受过殖民主义的灾害，而且中国的领土台湾到现在还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不论它出现在亚洲、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平的力量。

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处境和愿望。我们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首先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要求。中国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体现了这些共同要求。我们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我们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同我们的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我们同这些国家有深厚的传统友谊，而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在我们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这种情况来破坏和阻挠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邻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解决。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我国同欧洲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常关系。

我国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立这种关系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美国一贯地敌视我国，侵占我国的台湾，派监特务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我国实行禁运，并且竭力在国际事务中排斥我国，蛮横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虽然如此，我国政府仍然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我们曾经一再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解决和缓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我国的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侵略。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人民对于保卫祖

国的独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价的。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态度至今还远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结果怎样呢？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一切罪恶的手段来破坏我国，企图孤立我国，但是，伟大的新中国在世界上屹立着。正义是在我们方面，世界的广大的同情是在我们方面。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并不是我国，而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愿继续失败下去，它的出路，只能是对于我国采取现实的合理的态度。这种情况，对于美国人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来往。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中积极地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活动，并且积极地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了同各国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社会人士的交往。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是愈来愈多。事实证明，铁幕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

六 党的领导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壮大了。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受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的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

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也有极少数同志曾经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们则可以独断专行。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党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事实所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担负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务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了，并不是不会犯错误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都犯过暂时的、局部的错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也不是毫无缺点和错误的。因此，党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从而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

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我国原来是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的情绪经常影响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压力，资产阶级也经常从各方面来影响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但是我们的错误不但有杜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一个入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因此，为了避免犯错误，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

鉴于目前我们的党员十分之九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党的历史上正确的路线怎样有效地克服错误路线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

党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

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同时，加入我们党的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辩明是非的能

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而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则要特别着重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三，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我们应当迅速地集中必要的党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从事当前国际问题的研究，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使这一系列研究适合于当前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适合于向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前面说过的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

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

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在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受到了充分的注意。对于这个草案，邓小平同志将作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需要多说。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权利和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草案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在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权利。草案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党章草案还规定，县一级以上各级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所有这些，必将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当然，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只是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纠正了王明，博古等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后，也彻底地改变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

在党内斗争中，党首先严格地区别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

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了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在我们的队伍中确是混入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我们已经清洗了一些，以后也还要继续注意防范和清洗。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过去我们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群众斗争，以后又粉碎了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高饶反党联盟。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但是，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对于在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虽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予恰当的纪律处分，或者适当地调动工作，但是仍然必须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总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就必须让他留在党内改正，并且不应当滥用组织权力，给以不适当的处分。反之，如果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去纠正思想性质的错误，那末，不但思想问题不会解决，错误还会重犯，而且必然伤害党内应有的和睦，甚至会把普通的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组织的分裂。

党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加强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于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这样，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必然日益巩固。而党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不但是我们党本身的利益，

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党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我们要巩固地团结全党，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地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

我国最广大的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的纽带，除开前面已经说过的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以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国工会组织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会员，它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工会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方面，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吸引工人群众，，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另一方面，还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忽视这两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纠正。

已经拥有二千万团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近即将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团在过去几年的有成效的努力，在我国生气勃勃的青年职工、青年农民、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中，正源源不绝地生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并且向党输送着大批的新党员。青年团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在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某些团组织不注意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不用说服教育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点。

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作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妇女群众现在在工农业劳动中和其他许多社会职业部门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

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如同我们党在国内依靠着我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在国际上，我们依靠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依靠着各国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兄弟团结，必须继续向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对待任何兄弟党，都必须采取热情的和谦虚的态度，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大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

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成就里面，包含着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奋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此谨向各国兄弟党，并且经过他们向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并且保证同他们永远团结一致。

让我们全党同志永远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同全国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永远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 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二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成这样一个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以下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

第一，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建立和发展我国重工业中目前还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例如高级合金钢和稀有金属的冶炼，重型机器、专用机床和仪表的制造，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的建设等等。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会削弱重工业。

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

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运输业方面，应当合理地组织运输力量，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对原有的线路（首先是铁路上运输紧张的地段）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并且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目前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不高，一部分日用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质量甚至比以前降低，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地改变。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都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降低成本，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

第六，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

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需要密切地结合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设计和生产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只有依靠这些重大的努力，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技术支援，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地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

第七，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在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上，既须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须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2)）

第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

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十，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发生了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今后，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在科学事业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

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有计划地、逐步地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且在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适合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业务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急躁冒进或者消极保守都是错误的。

四

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

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必须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工作人员必须克服任何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在少数民族工作人员中，也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凡属少数民族地区尚待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并且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发展工业，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干部。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过去几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罪犯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罪犯应当一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但是也要准备在不能和平解决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方式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五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同时，在亚洲和非洲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世界力量；在还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中，民族独立运动也正在日益发展。这一形势，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所引起的国际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都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某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身受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备战政策的压迫，已经开始表现了和平中立的趋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高涨，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高涨，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特别是英美矛盾的加深，坚持扩军备战政策的美国侵略集团日益陷于孤立，日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应当是：（一）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二）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三）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四）继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五）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六）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七）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八）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六

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思想水平是提高了，党的队伍是更加壮大了，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许多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还没有摆脱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使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受过严重的损失，在过去几年的建设事业中也已经造成过一些损失。今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将长期残存着，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将经常面对着许多对于我们完全生疏的新的问题和工作。如果我们沾染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而不虚心学习，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避免主观主义的危害。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员的义务，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我们党在过去几年中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用阴谋手段企图分裂和篡夺我们党，这是同党的团结不相容的。在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以后，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我们也必须把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驱逐出党。但是对于一切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

的同志，党都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将继续巩固我们党的团结，依靠这个团结来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应当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1 年 7 月 1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5）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

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 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

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

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

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

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注释

[1]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为政第二》。

[2]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3]见《周易·系辞上》。

[4]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13--329 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

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

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

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

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

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

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

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4]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

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

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

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

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

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

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注释

（1）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2）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3）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〇——一八三一），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看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5）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30--362 页）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

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

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

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

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

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

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

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

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

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

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

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

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

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

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

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

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

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

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注释

[1]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3] 见《老子·五十八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63--402 页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

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

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内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

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

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

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

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注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03-418 页）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一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1]，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

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

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注释

[1]《林冲夜奔》是明朝人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

[2]军衔制度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19--422 页）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

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三)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

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

（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１〕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２〕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２〕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

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23-429 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30 页）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１〕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

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六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１〕

尚昆〔２〕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

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２〕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

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31-433 页）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 5 月 25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

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 5 月 25 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

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

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１）善意欢迎；（２）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１〕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２〕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

即送刘、周、陈、朱〔３〕阅，尚昆〔４〕用电报发出。

• •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２〕　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３〕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４〕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１〕》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２〕见于６月１０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

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

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２〕　指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

李维汉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
取所需”即是。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即送乔木〔２〕同志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三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

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不平常的春天》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二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２〕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

1957 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2 月 2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 2 月底到 6 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

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 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 1％的人和占 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

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

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注释　〔1〕这篇社论发表前，经毛泽东修改。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１〕

一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
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４００人左右，全国大约有４０００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指示》指出：

一、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使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

二.必须对当地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在这次斗争中的根本态度大体排一个队，主要是划清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以便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坚定不移地对右派进行斗争。

《指示》提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的几个主要问题，即：

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迅速地加以克服;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言行;

用心平气一和讲道理的方法，澄清知识分子中的错误和糊涂思想;

必须注意防止把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中间偏右的人也当作坚决的右派打击;

把“中右”和右派的疑似分子同右派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把仅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的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其批评时不要轻易扣以右派的帽子;

加强同中间分子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理论学习，对其带原则性的错误，用诚恳的友谊的态度指出，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

对于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

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

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

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34--439 页）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1 〕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有两事通知如下：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２〕，全国不是４０００人，而是大约有８０００人。例如北京约有８００人，上海有７００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５０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

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７００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３〕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　泽　东

七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信。

〔２〕　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

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４００人左右，全国大约有４０００人左右”。

〔３〕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

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

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

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

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

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

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

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

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释

〔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40-455 页）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

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

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注释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56--465 页）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七年八月，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按：收入者把这篇讲话错写成一九五八年，按照内容，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柯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吗！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还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

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排

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两种，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排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是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势，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有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去过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看来，用压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类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算两条道路的矛盾。

右派有多少人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查看八大文件第四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会发生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嘛。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套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当时本来想改，已经印发出去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

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二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胡乔木〔２〕同志。此件可用。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２〕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胡乔木〔２〕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３〕再加斟酌。

毛　泽　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１９５６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２〕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３〕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

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2]，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

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

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3]。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

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

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注释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2]见本书第四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注[1]。

[3]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66--479 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

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

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

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

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

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

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

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释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80--495 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

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运动的一般情况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

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分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整风，也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也有教育作用。

四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

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批评和教育，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用大力团结和教育中间派，这样才能孤立右派，壮大左派。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此外，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只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

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在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从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特别是那些鸣放得充分的单位，和那些注意改正工作缺点的单位，成效更显著。整个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右派被孤立被分化，中间派向左靠，左派力量在增加。

但是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必须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当然，有些单位的情况同机关不同，运动发展的阶段也就不完全相同。例如农村，有大鸣大放，有对于坏分子的斗争和对于富裕中农

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同于机关中的反右派。对于农民和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象机关干部那样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工人、农民、学生在着重整改阶段都要继续鸣放，督促和帮助领导干部整改，但是并非他们自己也着重整改，那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此外，在第三、第四阶段如果继续发现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还没有低头，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务。所以对这四个阶段不能看得太死。总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四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并且都必须搞透。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二）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贯的。党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并且争取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教育必须加强，

错误思想必须批判，“毒草”必须锄掉。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１）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２）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３）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最近时期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右派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左右两派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右派要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整风就是他们的“时机”。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也有许多人现在有了转变。相反，一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派甚至左派现在却成了右派。这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政治分化。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１）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２）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３）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

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应该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以后对人民还是有用的。

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该坚决及时地转入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现在有不少单位对于转入整改缺乏决心，应该纠正。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其中少数人具有右派观点外，还有其他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在思想教育和批评反省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一。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对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根本改变许多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切实整顿许多文教组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和地方都要在最近时期定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要通过整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实际，并且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参加工商界骨干的整风，或者另外编组整风。对于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和他们对于工人群众思想的侵蚀，要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他们中间的严重违法活动应该进行斗争，以便教育多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地下工厂”要禁止，要变成地上的，以便加以管理、监督和改造。小型工商业者则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能的时候也可以组织辩论，略如工人、农民中的整风办法。他们中间有严重违法活动的，也要进行揭发和斗争。总之，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象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

（三）关于农村

农村总的情况是好的：合作社基本上是巩固的，粮食增产了，干部作风也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办社的时间短、经验少、灾荒大，所以还有困难和缺点。

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

一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的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

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上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在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捣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同合作社较量一下。此外，他们也是农村中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

党内在最近一个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认为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可以不再强调阶级路线；可以埋头搞生产，放松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没有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打击。在农村干部中，也有少数人由于家庭经济地位变化，资本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些人在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基本问题上，实际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　　由此可见，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的目的是：（１）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２）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影响；（３）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４）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社、整党、整团，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巩固

统购统销政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同样必须是大鸣大放大争，同样必须是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　　现在全国采取了几种不同办法，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地情况不一，不必强求一律。但是，不管采取那种办法，都不应该妨碍大鸣大放。已有的经验证明，惟有大鸣大放，才能大争，惟有大争，才能暴露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行，才能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尤其重要的是，惟有大鸣大放，才能使群众畅所欲言，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使干部头脑清醒起来，以利于改进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在运动中，要坚持“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防止和纠正简单粗暴的作法。　　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　　各地材料证明，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小部分阶级异己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分子。为了加强农村运动的领导，为了同上述这些分子作斗争，为了批判各种右倾思想，必须开好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也必须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　　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才能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如果又犯罪，必须再捉再判。对各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坚决惩办，并且必须坚决取缔会道门，禁止赌博。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该逮捕判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逮捕判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这种偏向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以纠正。　　上述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城市。　　各地农村中都有一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不良分子。对于这些人，如果由地方法院处理就不胜其烦，但是不加处理，对于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又有很大妨害。可以考虑由社员代表大会或者乡人民代表大会定出切实可行的公约，由上一级政府批准，加以约束，并建立调处委员会负责公约的执行。违反这些公约的，可以授权合作社或者乡政府给以适当处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方法。不但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中，都可以试行。城市中有些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分子，还可以遣送到本省农村中，由政府分别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管制生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务院研究适

当办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审议决定。　　对于已经摘掉地主富农“帽子”而又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把“帽子”重新戴上。　　对于一部分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必须进行说理斗争，但是不要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等对待。对富裕中农仍是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　　对于单干户，不能歧视，不能苛待，要争取教育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但是不能给予单干户优于合作社的条件。他们要同社员一样承担对国家的各项义务。　　对于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限制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退社要求的富裕中农，要在经过大辩论和对某些收入降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加以妥善安排（要有适当的让步）之后，达到大部留社、少数出社的目的。对少数坚决闹退社的，可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和剥夺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后，开除他们出社。为了限制合作社社员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自留地、个人开荒、个人经营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要有适当限制。对于单干户，要由乡政府或由乡政府委托合作社切实管起来，不让他们有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合作社的“自由”。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有害活动（如挖合作社“墙脚”、雇工剥削、买青苗、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偷税漏税、出租土地等），必须加以限制或制止。城市的企业和机关要在农村招收工人和临时工的时候，应该经过合作社介绍，或者同合作社订合同，不许自由录用合作社员和单干农民。这点将由国务院作出规定。　　关于如何结合两条道路的辩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问题，中央已发出三个专门指示，这里不再多说。这里只着重说明，农村阶级路线仍有决定意义，忘记了农村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错误的。在整社中必须保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合作社的主要干部必须一般地由贫农和下中农担任。合作社干部必须坚决参加生产劳动。现在许多社的干部这样作了，影响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干部对于这一点执行得不积极、不充分，有的甚至拒绝执行，需要继续加以督促，切实执行，并须经常坚持下去。　　合作社制度的巩固基本上决定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合作化表现出了很大优越性，才是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只有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才能停止富裕中农的动摇，使他们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

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能迅速地发展工业。　　一九五六年一月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四十条纲要草案，鼓舞了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的经验，对四十条草案作了一些修正。提议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以便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推动合作社在社员积极参加之下，制定本社发展农业的长期规划。在全国讨论之后，中央将对这一纲要作再一次的修改，经过年底党代表大会的讨论，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十年内制定农业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指针。　　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一九五六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这些成绩超过解放后的任何一年，有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年成绩的总和。当然也有缺点，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有些缺点，而对伟大成绩估计不足。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好的一面是工作踏实一些，但是有些地方有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注意纠正。　　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和现代化的农业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过去几年对工业宣传得多一些，调了一大批干部去搞工业，这是必要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农业宣传就有些不够。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把社会上近两年来所出现的看不起农业生产、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意上山的不良风气改变过来。能否实现四十条，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领导农业。必须在今后国家建设中，增加农业（包括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尽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和其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　　在五年之内，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必须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使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现在农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水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生活仍然贫困的农户一般不过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在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依靠合作社自

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多的公共财产，才会使合作社象钢骨水泥般地巩固起来，否则会象沙堆一样容易散掉。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要提倡节约，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钱，向农业社投资，或者存入银行、信用社。粮食也要节约。除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以外，农业社和农户还应该储粮备荒。　　今冬明春，应该象前冬去春一样，掀起一个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运动，并适当地进行其他基本建设。对于这项工作，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了专门指示。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当地的具体指标和具体规划。　　合作社的一切增产措施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原则。要善于用说服的方法，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来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各种事业，和解决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认真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败或者效果不好，如果没有经过群众就更难免群众的埋怨。但是只要一切通过群众，即使受了损失，也是大家负责，大家得到教训，利于团结和改正。这点必须教育基层干部经常加以注意。　　（四）关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风问题，是本阶级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有原则的区别。因此，应该着重改进工作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不应该把机关学校中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拿来对待一般的工人群众。　　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十三（加上共青团员共占百分之二十九）。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百分之三左右（有些单位超过百分之五）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因此，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必要通过整风更好地树立和培养工人队伍的骨干和核心力量。有必要进一步清查坏人，纯

洁工人阶级队伍。经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　　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群众的政治任务问题。要使工人群众懂得：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阶级内部的团结；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努力生产，克勤克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在一部分以新工人为主的工厂中，要着重解决新工人的改造立场的问题。在一切新工人中明白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结合工人的切身生活体验和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本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讨论题目。一般可以讨论：（１）工人阶级如何负起领导阶级责任的问题；（２）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３）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问题；（４）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５）工农关系问题（主要是讨论工人生活水平不要过高于农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好关于改进工资福利制度的思想准备。　　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工厂中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新工人的思想，要着重依靠老工人和工龄较长、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工人。必须充分发挥老工人的积极作用，用他们的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团结和教育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几年来不少干部对老工人的作用有些忽视，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如晋级、计件工资、工作安排、劳动保险、子女就业等，对老工人的照顾有些不够，需要加以改进。　　领导上必须认真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执行边整边改的方针。

要检查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领导干部（包括党、政、工、团）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项经常制度。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钻研技术和业务，逐步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要深入生产，深入工人，关怀群众疾苦。生活上和工人打成一片，坚决废除脱离群众的特殊待遇。帮助和引导工段一级干部克服命令主义，使他们作到既能勇于负责，又会走群众路线。　　要大力紧缩机

构，减少党、政、工、团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中过多的非生产人员。注意从工人中培养和生长干部，充分发挥不脱产、半脱产的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作用。强调技术人员和职员同工人相结合，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操作，以便培养出大批既有实际经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　　对于一些影响生产、影响团结、阻碍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各种规章制度，应该坚决修改或者废除。同时要相应地建立必要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以便从制度上巩固整风的成果。　　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这次整风中应该充分运用，并在总结试点经验之后，全面推广。　　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该遵照中央的规定，即：（１）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２）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３）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４）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多数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整风主要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大体上可以仿照机关整风的做法。但是因为他们直接参加生产建设，比较接近工人，和机关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要按照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不应该采取简单化的方法。

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该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是对于：（１）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动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２）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３）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形成宗派斗争。　　对老工人和转业军人中发生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处理。　　手工

业、运输业合作社的整风，应该和整社相结合。要充分发扬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注意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制止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破坏活动，在胜利的大辩论和干部整风的基础上巩固合作社。　　职工家属和城市其他劳动人民，也应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可能地组织鸣放，进行辩论，明确大是大非。　　（五）关于少数民族　　在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应该同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在广大群众中，应该用新旧对比的方法，宣传各民族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和必要，揭露坏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同样必要的。应该认清，一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关键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各民族的党员都必须了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因此，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必须定出计划，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教育，并且按照具体条件，对本民族某些党员中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方针应该改变，今后应该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点的教育，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　　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必须防止急躁，必须慎重地由上而下地有领导地进行，必须注意获得本民族多数党员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支持。汉族干部仍然应该继续注意检查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着重检查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只有经常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各民族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在完成了民主改革而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上不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在适当范围内，用适当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六）关于军队　　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查出了少数右派分子。这对于军队的巩固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军队一般比较纯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告一结束以后，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　　在近几年的社会大变革中，军队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处于和平环境，大批新成分参加军队，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不适当地强调专业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因，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了一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同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和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上述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认真地加以解决。　　在军队各级机关和学校的整风，可以采取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在连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军队担负着国防和训练等繁重任务，在整风期间，必须注意不要松懈战斗准备和训练工作，特别是第一线部队。整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军队的团结，增强纪律，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七）关于党和团　　目前我们的党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党员（内有预备党员二百八十万）。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七十四万余人，农民党员八百五十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一百八十八万余人，其他成分的党员六十万余人。　　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且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　　党内所以发生这些严重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１）大部分党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２）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注意质量不够，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没跟上。（３）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党员是在胜利后的环境中入党的，他们入党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入党后长期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环境中，没有经过同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一百八十八万知识分子党员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象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在运动转入第三第四阶段以后，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加要抓紧整风的任务。除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必须认真改正以外，还要在一般党员中批判右倾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这次整风中，对每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认真改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生活不健全、纪律松懈等缺点。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中，必须爱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教育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革命的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所有党的基层组织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的目的。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对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

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的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对于丧失革命意志、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应该劝他们退党或者清洗出党。　　在决定开除一个党员的时候，要将他们的错误事实核对确实，要遵守规定的手续，并且在开除他们以后，仍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怀他们，指定专人同他们保持联系，进行考察和教育。　　对于预备党员要加强教育，并且进行严格的审查，防止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转为正式党员。　　为了不断地调整党员的成分，补充党的新鲜血液，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在确实保证党员质量的条件下，可以有控制地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特别是老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接收为党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考验了每一个党员，特别是考验了每一个干部。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工作问题。　　我们党从来就是注意选拔优秀的工农分子和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负各种的领导工作的。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路线。　　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经过多地吸收了一批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缺点。　　今后我们仍然应该从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和农民。同样应该从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经过生产和斗争的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的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中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实际工作。凡是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少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文学、艺术、新闻、理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宣传工作者也必须这样做。　　对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应该研究适当办法，首先分配他们到适合于他们的学科的生产单位中去，从事一年到几年的劳动以后，再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他们的工作。　　必须认真创造条件，使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者有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并且使其中能够深造的一部分人，有升入大专学校的机会。　　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干部工作路线，才能使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　　关于干部地方化的问题，是党的

干部工作中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些糊涂观点，需要加以澄清。　　在全国解放初期，中央提出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工作是好的，已经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地方化了，应该继续留下来工作。有少数人继续工作有困难，或者表现不好，应该动员他们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妥善安置。各地都应该提拔相当数量的本地干部作工作，这一点已经做了，还要继续做。现在，在多数地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是融洽的，正常的。但是也有些同志，对于干部地方化缺乏正确的了解，有些人甚至有排斥外来干部的情绪。这是一种错误的地方主义的表现，应该在这次整风中加以纠正。

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首先共产主义化，而地方主义却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本地干部的提拔仍然必须服从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在某些范围内还应该有适当的调剂。例如在县一级，清一色的本地干部就未必有利，更不必说县以上了。　　下面谈一谈青年团的问题。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各级党组织应该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巩固和团员质量的提高。团的工作在近年来是有重大成绩的。但是在这次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中，在团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和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　　对于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共青团员，在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参照对犯各种错误的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但是应该比党员稍放宽一些，应该更着重于教育。　　（八）改进工作，争取全胜　　改进工作和反右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　　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右派本身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在运动中，党内党外提的批评意见很多。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虽较偏激，也并不是没有益处。　　在我们的工作中，反映得比较突出的毛病是：　　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这些东西有的是原来规定就不正确的，有

的是原来正确，但因条件变化、应该改变而未及时改变的；有的是应该由各地去因地制宜作出规定，而不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的，有的是中央各部门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难于避免的，有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有集中过多的现象，也有分散主义的现象。地方的某些规定，也有同样情形。　　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负责同志忙于事务，接近群众太少，对群众中的问题不甚了解。许多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助长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少干部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走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少干部不愿同非党群众和非党人士来往。　　这些现象，不改不行，必须坚决改。　　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把六亿人口团结起来，一心一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需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可以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较易于克服困难，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利于较快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要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必须贯彻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巩固党的和国家的纪律，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为了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目前应该集中于以下三点：　　（１）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有亲密的联系，要多交朋友。干部同群众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规定和制度，提倡艰苦朴素的风气。领导干部要接近下层、接近群众，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２）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该分散的必须分散，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分散主义的现象都要纠正。　　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主要的精神就是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利于加强对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这种改变，肯

定比现行体制要好。但是，新的规定也不会是完满无缺的，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补充和改进。值得指出的是，若干权力下放以后，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因而更需要加强计划和平衡的工作。这点，无论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庞大臃肿，也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必须大力紧缩。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这对于当前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二、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第三、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基层，加速建设。因此，各个单位都应该迅速订出整编方案，动员大批人员到生产中去，到需要加强的基层单位中去，或者另行安置。许多不必要的和重叠的机构应该裁减合并和减少层次。为了紧缩机构，除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尽量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基层工作以外，其他干部也有一部分需要回到生产中去或者回到基层去。在我们的国家中，必须养成干部能上也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的优良风气。（３）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才能鼓舞群众的热情，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群众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　　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为了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本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　　我们要争取运动的全

胜。所谓全胜，就是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并且使斗争的结果能够造成上面所说的那种政治局面。　　现在反右派斗争还需要深入和展开，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改进工作还只是开始。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对于改进工作，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做得比较好。这些单位的经验证明，群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本单位可以马上接受和实现的，只有小部分问题需要由上级或中央统一解决。　　为了认真地改进工作，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让群众的意见得以无保留地充分发表。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要成立由负责人主持的专门小组，广泛收集群众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提出改进工作的计划和方案，逐步实行。各部门、各单位改进工作的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上级和中央。　　现在全国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改进工作的高潮，这些单位的工作情况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面貌。过去拖延多年没有克服的缺点，这次很快就克服了，过去需要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很短时间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但是，也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改进工作没有重视或者重视不够。有的人唯恐揭露缺点，运动一开始就不敢让群众鸣放；有的人在鸣放之后，又利用反右派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企图逃避整改，蒙混过关；个别的人甚至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这些是不能允许的。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群众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而对于领导人员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加强对整风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领导，以求得运动的全胜。

【本文来源于人民数据库，网址：http://data.people.com.cn】

（这篇文章未收入邓小平选集，在网上也很难见到了）

2011 年 7 月 15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1）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

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

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来，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 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 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

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

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

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

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

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答声，未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瓩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瓩），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

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

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命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 12，500 公里，乘 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

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

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

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

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

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原则性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末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纪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

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易。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付业和经济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做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以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和工区、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拨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征去年进行政

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风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求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往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会议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谈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此，促进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

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此经济、比生产、此技术，还要此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的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江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多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应该作出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

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足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中，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首先由它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是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

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各方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抓这项作工的。只是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做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

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是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会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多招些学生，但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或附属工厂，出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数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同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校,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除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业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省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波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的高产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后取得群众同意，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覆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的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变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同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能形成正式条文。

2011 年 4 月 1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2）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 5－7 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 15 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 17 万人。1956 年工资冒了 10 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 年此 1957 年多一倍，1958 年又超过 1956 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 1956 年。那种办法好？1957 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 1958 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 14 项。商业是否也搞 14 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 150 斤，1956 年一跃为 800 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 23 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

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

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

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注：原文为“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

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

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

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

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

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

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注：“瑞金”原文为“瑞金”〉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注：原为“膝”>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

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

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米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

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

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

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

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主席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主席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主席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

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

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

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潠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

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

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

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

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　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篷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躭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

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毛主席指示：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毛主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毛主席说：“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毛主席说：“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〇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

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

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籽，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

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

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

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

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

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 7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 7 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

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

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

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

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

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一一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住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 7 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 7 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敎、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

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

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2011 年 4 月 1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3）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徐水县委书记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毛主席特别强调布置各项工作必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指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指山东省农科所付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在接见山东著名的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们时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 530 万吨翻一翻，达到 1100 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 2500 斤至 3000 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 3000 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一一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

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机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

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

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 福建搞××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斤）。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吨要完成，今年××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

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拚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一一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寃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

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

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

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

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宽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

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

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

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

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本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

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

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

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害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攀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　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超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求是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

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个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

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零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三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亿以上到三百亿。三百亿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到了××。明年应该是××几或者××几亿吧？也不要××几，也不要××几，一下跃到××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亿也只有一年，××没有，××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亿，平均每年××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零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三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就可以搞××亿。前面这八年，五零、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亿，就可以当作××亿（等于一倍）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账。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去了。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只两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矿山的机械，开油田的钻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t 学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化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机械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搞××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万台，后年再搞××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台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万台，一年××万台，后年搞××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万，后年××万，××万

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

（毛泽东同志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住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层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同志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一九五六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一、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

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二、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三、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卑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换。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四、两个出路。劳动力很紧张，这是个大问题。出路一个是改变广种薄收。少种多收，可以省工省水、省肥等。一是机械化，目前是抓工具改革。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

劳动组织分工，要适当固定起来。工业、农业劳动不固定起来不好。

五、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六、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成本一万元，工资八百元，积累七千二百元。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不过七百元，二十五个农民顶一个工人的产值。鞍钢产品可以全国调拨，农业上可以调拨的就不多。所以十二年能过渡了就不错。

七、不论搞什么工作，像搞人民公社，不能走马观花，要搞透一个公社，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有把握。学马列主义也是一样，书看得很多，不透，不好。我最近看参考资料，很仔细。每次看几遍，多看一遍．就多一些收获。

八、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

九、可不可以不走化肥的道路（今年化肥生产一百八十万吨，明年只生产六十到七十万吨，进口化肥也要减少了。）今年没有化肥，粮食搞到八千亿斤，棉花搞到八千万担，证明可以基本不靠无机化肥，主要靠有机肥料和土化肥。

可不可以不走拖拉机的道路，走绳索牵引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是河北省水利化先进的地区？今年的水库用上了没有？（×××：有的用上了，有的没有用上。）

这里有什么铁矿没有？（×××：井陉、平山、获路等十几个县都有铁矿，估计有×××吨。）可以在这里搞个大钢铁厂了，你们不一定在邯郸搞一个大钢厂吧，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个吧。

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有一个县搞一万斤。）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270 斤。）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有十四个县。）那还有十几个没达到。今年小孩摘棉花，将来农业是妇女和娃娃们的事情。

究竟是否需要化肥，要它干什么？我看就搞土化肥好了，不搞洋化肥怎么样？拖拉机是否需要？（××：拖拉机搞深翻地还有用处，带三华五华改成带一个犁可以深耕。）这样子你们要拖拉机了。化学肥料不要可以吧？（×××：有些还是好。）搞土化肥，洋化肥是否少搞一些？你们这里有拖拉机厂没有？（×××：有一个，现在搞鼓风机。）暂时休息，只搞鼓风机，不搞拖拉机。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有几种，有的在一起吃，有的打回家去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吧，食堂里作不作菜？你们食堂有办的好的吧。比较一下，分一、二、三类，都要向一类看齐，人民是否欢迎吃大锅饭？过去不欢迎，现在欢迎了。（×××：正定县妇女罢了一天工。食堂就办起来了。）正定罢了一天工，真有其事，罢一天工有什么不好，进步的罢工，是对落后分子最好的批评。

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孩子一叫一闹就打不好，要叫小孩子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睡的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子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么，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48 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 110 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 70 元，安国是 110 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们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 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很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啸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 400 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

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作，一年才二十四天不算多，过了十一月份后放假一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钢铁这一关还没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现在桃还没有开。还要一个多月。）这时桃还没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十一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 80 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吧，（×××。四十五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你们是两个区合并的，九个县一个市，那和石家庄一样了。你们的粮食去年是 22 亿斤。今年 70 亿斤。翻一番是 44 亿斤。这么你们翻两倍多了。你们每人吃四百斤不够吧？你们这里吃饭还要不要钱？明年粮食计划生产多少？（××：计划 170 亿斤。）你们今年是一千万亩麦子，去年是多少，（××：七百万亩。）七百万亩，今年一千万亩都施底肥了吧？以后还要施追肥，每亩下种多少？（××：25 斤以上的占 95%。）亩产多少？你们这里是两白两黑，两白是棉花、小麦，两黑是钢铁、煤炭。你们种五百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哪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一口猪，一口猪一百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公社

化后猪减少了些。）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明年亩产千斤，亩产八百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202 斤。）明年 302 斤也就满意了。（××介绍了临漳县搞的百里丰产川计划亩产五千斤。）临漳离这里有多远，路好走吧？出门坐火车不好看，这是老太爷的车，坐汽车也就好看了。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不跃进的县？（××：不是他这里，是石家庄县，白旗也拔掉了。）有白旗，当然也不会跃进了。

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 250 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桌子可以砍掉一半，耕它三尺深，其余地叫它休息一年。我在安徽省看每地都烧肥，把那些主根子、杂草，一堆一堆地堆起来，叫作熏亩，地一休息，阳光一晒，一分化，一熏，我看是要走这个方向。在北戴河我提出种地三分之一，其他种草，种树，没水的挖塘养鱼。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过去几千年都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再加上一条机械化。你们这里有钢，有没有机械厂？（××有个小机械厂。）可不可以生产拖拉机？（作不了拖拉机。）你这个人就是志气不大!不用拖拉机行吗？用绳索将来用钢丝牵引。肥料不要洋化肥，只要土化肥行吗？我觉到有机比肥对作物有利，人畜拉的屎尿你们压绿肥用什么？（答：用紫穗槐）这可以代替洋化肥吗？明年可靠它。是否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用拖拉机，少要一点，不是拖拉机化。洋化肥也是大部分不要，少搞一点，用在那些需要的作物上。这是我提出来交换意见。我看没有洋化肥，亩产一万斤。苏联有了它是一百八十五斤。我们是万斤可是没有洋化肥。拖拉机也是一样。土化肥就是洋化肥，第一，是人畜

拉的屎和尿，第二是压绿肥，第三是土化肥，这些都是化肥。（××：全专区有二十三万个化肥厂。）好吧！在当地群众搞，比洋化肥好。

北戴河提出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种树。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柴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

拖拉机是否少搞一点，但是要机械化，用其它的形式，用中国的形式。少搞洋化肥也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机械化是否一定要经过拖拉机？肥料是否一定要经过洋化肥？人畜屎尿绿肥、土化肥、拆炕、折墙、挖河泥，多的很嘛！

你们钢铁任务多大？（××1105 万吨，七万吨钢。）你们钢的原料从哪里来？什么叫低碳钢？合碳多少？（××不清楚，说元朝都在这里炼过钢。）你们怎么知道是元朝的？你们这里有多少矿石？（××：勘察清的有×××吨。）含铁 60％，就×××吨铁。这两个月矿藏资源查清楚些了吧？（××到处说有矿，越来越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了。）由糊涂到清楚，用铁垒梯田、垒墙、垫路。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富。土都是铁，不开矿挖土吗！

你们这里有铜矿没有？（×××勘探清楚的有××××万吨）有铜矿就搞些铜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的好，这样可不可能？解放妇女，看拿些什么人去教育孩子，青年不愿意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重要，还是小人重要？还是小麦、棉花重要？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了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专、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它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这点人口 25％的娃娃带好。在托儿所要比在家跟父母好些。

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饭，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和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的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食堂要划分一下，一、二、三类，找一个一类食堂，叫他们都向它看齐。（××：涉县有一个食堂，吃玉米饭半月不重样，搞得很好。）这好么！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吃早饭就是中午的劳动力，吃午饭就是下午的劳动力，吃晚饭就是明天的劳动力，要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

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要人吃，要人睡。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睡个中午觉，你们研究研究怎么样？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都可以。不叫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现在平均下来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下个命令至少睡六个钟头，睡完了劲更大。劳动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

吃好、睡好、孩子带好。

对小孩要吃好、教好、管好。你们六百五十万人，25％就是一百六十万吧，这是一支很大的娃娃军。有的就是见物不见人，钢铁也是物么，种棉花也是物么，不管娃娃军就是见物不见人。托儿所要比家里有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一定会垮台，不垮台那才怪哩，食堂也是一样，如果不比家里吃的好，那也会垮台。

劳动力如果睡不好觉，私有都没有了，睡觉也是私有哩！在中午让他们睡一个钟头，你不是军事化吗？营长、连长开一次会，好连长应当是关心战士，给战士盖被子，不是老是只睡五个钟头，要睡七个小时行吧？不睡不行，睡觉是个任务，强迫命合一下，群众会欢迎的。这当作问题研究，不是作了决定。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你们这里公社平均一万户左右，你们这里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这里还有回车巷。）廉颇蔺相如还要回车，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

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大搞土法炼钢、秋收种麦、水库用劳动力，群众不能休息。）三大任务，有四百五十万劳动力，怎么组织好些？小土办法要一点，睡觉，一天一定要比七个钟头，这是个任务，你们先试一试。小孩问题，都不愿管人，师范学院的不愿教书，这是本末倒置，愿管物，不愿管人，实在也怪，我愿在小学当教员，去管娃娃。睡不好觉，你们要看到后果，几年后是会受到影响的。苦战，睡觉算苦战任务之一，吃饭要吃饱吃好。睡觉就睡七个钟头。试一试看完成任务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比睡觉少完不成任务。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管人的事情。这都是人的事情.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乐，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

你们这里没有钢铁？（×××：有很多铁矿。）路东有什么铁？（×××：路东没有，都在路西。）有多少参加搞钢铁？（×××：120 万人）包括炼钢铁炼炭、运输？（××：包括。）区有多少人口？（820 万人。）八个里头一个还多。天气冷起来你们怎么办？你们搞起来多少铁？是铁渣？是铁水？（×××：全年任务××万吨，已炼铁××万吨。）不算铁吧，同志。（×××：有 10%的好铁可以上调的。其余我们可以自己炼钢。）可以炼钢是不是商城又炒又打的办法？只炒不打可以吧？（×××：要打。）一个炉子要多少人？（×××：六、七人。）一半炒一半打？（×××：大致是。）你们炼多少钢？（××：全年任务××，已炼钢××。）那你们可以不要干事情，睡大觉。下雨下雪怎么办？你们打算没有？（×××：我们正在开会研究，打算十一月分下山一批。）（×××：采取精兵的方法。）什么时候再上山？明年开春。你们准备下山多少？（××：六十万。）还有六十万住在什么地方？下雨下雪，要叫他们生活好，工作好。山上的人都是青壮年吧？（×××：也有很少年纪大一些的。）有妇女没有？（×××：有，妇女顶大事。）顶大事。（××：有这样个道理，妇女搞农业生产，没有男人熟练，不如男人。搞钢铁男女都不会，大家一块学习。（×××：有的妇女比男的学得还快。）啊！有这个道理。120 万里头有多少妇女，（×××：40%，四、五十万人。）

七里营的棉花收多少？（×××：全年平均每亩皮棉 200 多斤。）我去看的那一块呢？

（×××：还要多些。）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十斤左右，今年都在三十斤以上。）多一半还多。（×××：还有下种几百斤，一千斤的。）太多了，挤死出不来。（×××：分层种，像楼梯一样。）啊，麦子在楼梯上站着。（主席笑，大家都笑。）你们的地耕得深吗？（×××：一尺二寸左右。）没有七、八寸深的？

（×××：有。）五、六寸深的？（×××：很少。）要注意浇水、追肥、锄草、管理，要注意一下。

群众生活怎么样？食堂办的怎么样？（×××：以连为单位办食堂，一个食堂几百人。）要轮流吃饭。（×××：原来有打回家吃的，现在都集中吃。）打回家吃饭就冷了。吃多少粮食？（×××：可放开肚子吃，不限。）这是一件大事，吃饭还有菜，都有菜吃吗？（×××：有。）什么菜？（×××：红薯、萝卜。）（×××：七里营群众普遍可以吃上豆腐。×××：还有豆芽。）冬天吃什么菜？（×××：萝卜。）每人每月吃多少盐？能不能吃一斤？（×××：差不多。一个同志说：现在市称改为十两一斤了。）油呢？一天一个人五钱？你们明年要有计划种油料，你们有棉花，可以吃棉子油，每人每月十五两。（×××：可以。）不仅是饭，还要是菜，菜里还要有盐有油。猪肉一个礼拜吃一次行不行？（×××：行。）鸡蛋呢？（×××：猪肉、鸡蛋国家都收购，不能吃的太多。）

公社的工资普遍发没有？发的什么？（×××：人民币。）人民币从那里得来的？（×××：政府收购物资。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工资？（××：都能发。）靠不住。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它只产一点粮食，哪有钱发工资？（×××：受灾地方困难些，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灾区，有丰收区，可以互相调济。）奖励工资究竟好不好？每个月都要评，争吵，你多我少。（×××：我们是津贴。）你们是津贴怎么分配？（×××：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年七十元。）津贴多少？（××：供给部分 70%，津贴部分 30%。）

钢铁基地上有医生没有？（×××：有。）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你们还有模范食堂？（×××：有。）你们把食堂排排队，分一、二、三类，号召二、三类食堂向一类看齐。（安阳县委书记：安阳挖出一个赵匡胤炼铁的炉子。）你有什么根据（看县志和听老年人说的。）安阳出曹操、袁世凯（坟在那里），没听说赵匡胤在那里炼铁。赵匡胤是洛阳生的人，他的父母是个小官吏，是五代梁、唐、晋、汉、周时的人，你说的可能是宋朝时候的炼铁炉。（大家都笑了。）

管理人员是件大事，一是管小人的，一是管吃饭的，过去都不愿干这种事，不愿当保姆，这个事情不管好怎么办？优越性就是比父母管的好，管的一样就没有优越性，管的比父母差一些，他还要拿回去，没优越性就不行，出个大字报，看你怎么办？大灶不比小灶好，怎么能行呢？现在大家一股劲，将来大家一算细账，说不好。（×××：能办好。）你们都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信心。有个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办的比单吃的好。）有垮台的没有？（×××：没有，许多妇女决心大，把小锅都砸了。）这个革命可革的厉害。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幸福。）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我们的幸福院，现在只收五保户。）他们做活不做？（×××：做。）是单独搞还是跟群众一起搞？（×××：有单独纺纱的。）他们吃饭怎样？（×××：小孩……吃中灶，青壮年吃大灶。）这个好，客人吃饭要不要饭票？（×××：不要，实行供给制。有一个老人来了客，队上给他做四个菜，还有酒，他高兴极了。）伙食是个大事，你们解决得很对。

睡觉问题解决的如何?睡觉要当任务，每人每天能不能睡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总可以。（×××：睡不到六小时。）要强迫命令，一定要睡六小时。紧张时也一定要睡六小时，睡五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疲劳的时候，叫他们睡半小时再起来干，睡觉是一大任务。（×××：现在炼钢铁，秋收秋种，过去这一紧张阶段就可以了。）你们研究出几条睡觉的宪法，规定小人、青壮年、老人的睡觉时间，睡不好将来要受损失。（×××：七里营妇女摘棉花，上午两个小时可以摘六十斤，下午四个小时只摘六十斤，疲劳了劳动效率就不高。）不管你如何紧张，一定要睡六小时，少半个小时也不行。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主要是干部，小人要睡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们不是有营、连

长吗？（×××：有。）叫营长、连长下个命令，躺下来睡，叫农民睡个午觉，你们研究一下，这是大事。一个吃饭，一个睡觉，一个管好小孩子。

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他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我们再搞卫星田。）搞大面积卫星田（×××：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年后，公社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出题目你们研究一下，不要一下弄的没饭吃，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的要死，好，咱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陈伯达同志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2）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一一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

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一四一二一十制，工人最好是八一四一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一一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一一五十年，种树也必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

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

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指标指“××”，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丑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保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

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　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

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于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没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丝、棉、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

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期间，读这些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

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一一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 150－－200 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

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

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

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

“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 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

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同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按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

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〇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

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关于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性质的问题

1、作者摸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与政策有区别，这一点很好，主观的计划应力求适应客观的法则。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不大清楚。他们的计划，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法则，值得研究。

2．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学多研究它的必然性，对客观的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才能认识，几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四月才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

3.“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辩证的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作者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学习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法则。

4．关于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法则，作者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那么多规章制度呢？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间题

1.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作者完全正确（P13），商品生产看它与什么经济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2.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重要，极为有用。

3．不要以为自给自足就是有名誉的，商品生产不是名誉的。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否则不能发工资。

4．我们向两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

5．作者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资料是商品，运行不通。商品不只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

6．我们现在之商品生产不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

7．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8.商品流通之重要是为要共产主义所考虑的，必须在商品充分发展以后。当有权支配一切商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不必要，而趋于消失。

三、关子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法则问题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间题

1．他们宣布土地国有化，实际是社有，我们没有宣布国有化，实际上是比较彻底。

2．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标志，只能够有条件地调拨商品。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算全民所有制。

3．这一著作的最后一封信，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这是彻底错误的。把国家和集体对立起来。

4。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作者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地说，要单独地讨论。

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1。作者说农民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秩序。

2．社会主义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要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秩序，实行部分供给制。这是为了破坏这种秩序。

3．他们社会主义是两种所有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共产主义因素不提倡，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割裂轻重工业，公开提出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也扩大了。

4．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钱就是萌芽。

5．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不造成障碍。

6．作者对于两个过渡没有找出方法来。没有解决以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出路。

7.作者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是好的，但缺少个政治条件，这条件的基本点就是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没有一条办法，没有几个并举，没有设法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斗争，作者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办到的。

六、其他问题

1．政治经济学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在他们的经济学里，其实每一段里都没有“忘我”，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好处是提出了问题。

2．他的批评方法里，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过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3．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谈，教育制度、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没有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到共产主义？作者见物不见人，只见干部、技术，不见群众。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

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

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 104 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

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 150 元到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 150 元到 200 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

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

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

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

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把吴冷西和田家英找去谈话。

毛泽东说：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毛泽东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

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要修 2 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 5 年内才修 2 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又说，其实 1800 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 年）预计炼出的 1000 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 850 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 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 6000 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泽东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 500 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 500 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泽东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毛泽东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 83 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

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泽东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毛泽东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毛泽东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 70 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 60 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

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 65 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说，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 12 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 41 年，我们才搞 9 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 40 条（按：指 15 年－20 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 2 亿吨到 4 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体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

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

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

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

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决了置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

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

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

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躭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

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

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 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

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清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

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开记者招待会，在柏林问题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鲁晓夫也懂得了搞紧张局势。我们也搞点紧张局势，使西方要求我们不要紧张了。让西方怕搞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台湾就开紧急会议，其实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四国首脑会议不召开了，也说是受中国影响。其实会上也没有说四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如果出远门，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经不健全，从前哪里也不去。各种材料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也没有了。杜勒斯十八目的谈话说，你们共产党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个范围，你们只管你们的事，不要管你们以外的事，我们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说我们搞奴隶劳劫，搞集权主义，说我们积累太多。他说总收入扣除工资，就是积累。他把这种积累叫做资本。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是列宁的公式。好好看着杜勒斯十八日的讲话。他承认我们的积累多，组织性强，哲学搞不赢我们。杜勒斯谈话的调子低，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不说了，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英国人老奸巨猾，美国人比较暴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会议，三千七百方教徒发出一封信。主张承认我们。杜勒斯说教会只要规定道德原则，细节不要管。

北戴河会议谈的八个观点灵不灵？还是灵的。北大西洋公约，向民族主义和本国共产主义进攻（重心是进攻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除非出了匈牙利事件。但我们在宣传上是另一回事，还要说他是进攻的。不要自己被自己蒙蔽。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不是进攻，但说服不了苏联人民。谁怕谁多一点？李普曼主张把印度扶植起来抵制我们，看来惧怕我们，怕我们在亚洲、非洲争取领导权，很怕我们经济高涨。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我们

有利。戴高乐出现，横竖要出现，出现了，比较对法规无产阶级有利。中东美军早撤好，还是晚撤好？只有一个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证明他们撤走。台湾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组织这样快。禁运、进联合国、和、战、打原子弹问题，比较对谁有利？怕好越是不怕好？横起一条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议一议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战。挨骂是假象，不是真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人民生活才二百卢布，比我们稍微高一点。重工业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一点。松一点。比较集中，只搞两个文件。纸老虎问题，党内外尚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说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打台湾，为什么还要提出赶上和超越英国。我写一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是真又是假，暂时现象是真的，长远看来纸的。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争应当这样，对自然斗争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上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决

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面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他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着，从长期上着，从战略上着，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的变化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无不包含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过艰苦斗争，不奋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观，从来没有。每个人都是忧感与乐观同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乱，五劳七伤，使烧到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一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矛盾的每一个问题的侧面，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或者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

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跟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地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

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

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

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

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

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1）公报问题。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样子会四分五裂，但是也还不准。欧洲大陆一个集团；对付英美，但内部矛盾重重，德法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们是又团结又斗争。斯大林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要打仗。我们早已说过，一九四六年我们写的文章，发明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争夺中间地带是主要的。为什么不打中间地带，先打苏联呢？以反共为名，去搞蚕食政策，对中间地带侵略，引起中间地带的反抗，有广大中间地带，他们走不过来。包括美、法、德、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们的后方。欧、亚、非在闹乱子，美国如何脱出手来打苏联？

剥削是剥削人，剥削人才能剥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干什么？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打原子弹，还是常规武器。我们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赞成，许多国家都不怕美国，不能订个条约互相不使用？垄断资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原料，没有市场。

公报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说：要搞经济竞赛，要把印度扶起来。印度如何能扶植起来呢？西方是一股悲观气氛，我们是一股高兴气氛。四分五裂这句话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真理，但一讲，是否会引起他们警惕，可是又没有办法。美国在台湾要把自由主义分子挤进去。伊拉克很紧张，这几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胜负还未决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阴谋（卡赛姆－－为什么解散工会？怀疑伊拉克为什么消息灵通）。

（2）三个文件，已定稿。辞职问题：“偶像”总要有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死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里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少，可上可下。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五九年计划搞二个月再说，二月半再议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海。

香港报。骂蒋介石“仓惶辞庙，逃往台湾”。

人代会三月十五日开。

二月一日开会，除检查两个决议外，另外，整顿国家机构是必要的，安排人代会报告，还有教育问题，人民公社再搞点内部指示。

人民公社对宪法有破坏没有？例如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学美国，搞不成文宪法。美国是不成文宪法。一篇一篇凑起来的。

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搞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是指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多则五、六年。是指第三个五年计划。

（3）人民公社文件。还要修修补补，还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时间修改。十八号发表公报和主席辞职问题，十九号发表人民公社决议。

主席辞职问题，如果还有疑问，还可再开一次电话会议，解释解释。

（4）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〇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陈炯明在东江和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凑股子，选举一个人当局长。抓两个月一摸。

还有两句话：“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横联是“政治挂帅”。

下午必须开一次会。出告示，要专政。省委书记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经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问题，做省委书记要全面，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顾全大局有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顾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杨一辰就是不顾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陈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顾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顾大局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扬一辰，高岗、罗章龙。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顾全大局，杨一辰有多少马列主义？一毫也没有。

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紧，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红娘晚上站在外边，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一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

利事业，这就特别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得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所有这些，对于农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闻。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实际的经验和公社发展的远景，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在今后还将大大改善。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现在在各民族农村中（除西藏和某些个别地区以外）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城市中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但是城市和农村有所不同。一则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再则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中已经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厂、机关、学校（除一部分职工家属以外）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组织化了，因而城市的公社化不能不提出一些同农村不同的要求。三则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成立的时间还很短，绝大多数的公社刚一建立，就忙于秋收、秋耕、秋种和全民炼钢铁的紧张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组织，健全制度，系统地解决由于成立公社而发生的关于生产、分配、生活福利、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问题。对于如何办好和发展人民公社，大家的经验还不足，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也难免有一些参差不齐。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统一全党全民对于公社的认识，加强对于公社的领导，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确定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更好地组织公社的生产和生活。要把已经搭起架子的公社切实充实起来，以便使它们能够日益完满地担负起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伟大使命。

二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从现有的经验看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早。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将说，我们想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这个时间是太短了，我们将不能达到目的。这种调子我们早已

听惯了，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他们总是要不断地在事实面前认输的。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好心人，只是太性急了，他们把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等等看得非常容易，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他们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就已经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了，很快就可以甚至现在就可以放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了。因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觉得不能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必须消除。

必须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

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

不错，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由于许多县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有权调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全县性的或者超过县的范围的建设事业，并且许多地方已经在着手进行这些事业；等等。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现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全民所有不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一点。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逐步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各县应当普遍地成立县联社。县联社应当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增加公社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的

部分，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但是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不错，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将有新的增长；这些都是应当承认的。而且，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八月决议中曾经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为了澄清目前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误解，保证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地用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反复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

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

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应当是：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无论在那一方面的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都必须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员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

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逐步改变浅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实现耕作园田化和生产过程机械化、电气化，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缩减耕地面积和在农业方面所使用的劳动力。应当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做到每年全国产粮平均每口人能有两千斤至三千斤，即一吨至一吨半。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应当逐步提高棉、麻、蚕丝、大豆、油料、糖料、茶叶、烟叶、药材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极大地注意加

速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的发展。总之，如像在工业战线一样，一定要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来一个全线大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线的面貌。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样做，一可在农田上大大省水，省肥，省人力，而且将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二可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大大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综合经营；三可改造自然环境，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凡是原来有基础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一定要继续发展，并且逐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革。机器工业也必须充分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和其他各种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领导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各个公社也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

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所需要的消费物资和现金，以便供应社员和发放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为了保证交换计划的实现，要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

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四

农村的人民公社应当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缴纳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部分（包括用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前面所说，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目前在确定工资和供给的比例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力强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实行供给制并不是使人们的生活清一色。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因此，无论在目前和将来，在供给的范围内，必须注意尽可能使社员有适当选择的自由。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长。除供给部分外，目前农村中的工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或者倍数更多一点，但是不要过于悬殊，因为那样就不符合于目前农村劳动熟练程度高低差别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允许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资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无论在城市或者农村，这种工资等级的差别就会显得没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

城市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农村为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城市中的生活费用较高这样一个原因），而且也是一种暂时现象，应当向农民讲清楚。农村中有些社员除自己劳动外，家中还有外出人员（例如某些工人、军人、干部、华侨等）由城市或其他地方寄钱回来，对于这种情形，应当教育其他社员不必斤斤计较。公社在分配的时候，无论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对于这样的社员都应当一视同仁，也不要勉强他们向公社投资，或者捐献。如果他们依靠外出人员维持全部生活，公社也不应当加以干涉，但是可以不另行供给。对于外出上学的学生，除由国家供给或者自己可以供给者外，他们的需要应当由县联社按照学校规定的费用标准，统一负责解决。

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给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也必然愈是丰富。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多余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社员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权仍归原主。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不论是个人相互间的债务，公社和社员相互间的债务，或者社员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一律不要宣布废除。对于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

五

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在领导公社工作的时

候，必须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纠正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认为重视群众生活就会妨害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离开提高觉悟和发展生产，片面地或者过分地强调改善生活，而不提倡为长远利益而艰苦奋斗，也是错误的。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现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我们目前的紧张劳动，也正是为将来的每天六小时劳动以至更短时间的劳动创造条件。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些。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保证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饭、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这个时间一定不可少。目前劳动力紧张，这是事实，但是要着重在搞好工具改革方面和改善劳动组织方面找出路，而不要指望在延长劳动时间方面找出路。必须着重注意安全生产，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力求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一定要保证妇女在产前产后的充分的休息，在月经期内也一定要让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们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把孩子放在那里。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是否需要寄宿，并且可以随时把孩子领回。为了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公社必须大量培养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合格的保育员和教师。

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公社还必须负责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的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在成人中要认真地扫除文盲，组织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认真进行。此外，各公社还必须选送一部分青年去投考城市中的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以便为国家和公社培养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无论那一种学校，都必须贯彻执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九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以便自幼养成劳动习惯，促进身心发育；但是必须充分照顾到儿童的健康，分配以适合儿童体力和兴趣的轻微的、短时间的劳动。

要加强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小学校、卫生院、俱乐部、商店等方面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积极指导社会舆论，使整个社会和整个公社把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其他集体生活福利事业，作好服务性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批判和纠正那种轻视群众生活福利工作、轻视服务性劳动的剥削阶级观点。

要逐步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化的乡镇和村的居民点，包括住宅、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工厂、禾场、畜舍、商店、邮电所、仓库、学校、医院、俱乐部、电影院、体育场、浴室、厕所等。乡镇和村居民点住宅的建设规划，要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我们主张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发展民主团结的家庭生活。这种主张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在住宅建筑方面，必须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

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

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无论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员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这个原则。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应当使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以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县联社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学会在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之间，在经常性生产任务、突击性生产任务、服务性任务之间，合理地分配和调度劳动力，避免这里有事无人做、那里有人无事做的现象。必须不断地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健全劳动检查和评奖的制度，切实保证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

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中必须既有纪律，又有民主。所谓组织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工厂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工厂、像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这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队伍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队伍一样，是一支产业军。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

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

在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应当相应地建立民兵组织。民兵组织和生产组织的领导机构应当是两套，各级民兵组织的指挥员，即团长、营长、连长等，原则上不由公社的主任、管理区主任（大队长）、队长等兼任。这些指挥员应当参加公社的同级管理机构作为成员之一，受同级管理机构和上级民兵指挥机关的双重领导。民兵组织应当根据需要配备武器，武器由地方自办兵工厂生产。基干民兵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普通民兵也要在劳动间隙进行适当的训练，以便为实行全民皆兵准备条件。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人民公社的一切组织，包括民兵的组织在内，都应当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公社不但要组织人民的生产，而且要组织人民的生活。为了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因此，公社必须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决不允许借口组织军事化，或者利用对付敌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组织的民主生活受到丝毫的削弱。公社是我国基层政权的组织，只有充分保证公社的民主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七

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才能在干部和社员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对

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某些人认为有了公社就可以不要党，就可以实行所谓“党社合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党在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除了必须保证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以外，还必须注意教育公社的工作人员发扬优良的作风，首先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经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党的群众路线已经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就是这一胜利的两个标志。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没有群众路线，没有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没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彻底执行群众路线。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于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作风来对待群众。由于生产的大跃进，由于公社化的胜利，某些干部开始冲昏头脑，对人民群众不愿意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表现某种粗暴态度。这种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是必须引起严重的警惕。

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创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个胜利的意义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了大的成绩就忽视小的缺点。相反，成绩愈大，我们愈需要提醒干部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在一片胜利声中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至看不到，甚至不愿意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

八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根据本决议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抓紧一九五八年

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的工作。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思想坏作风，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要对公社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同时，要切实整顿党的组织和公社的组织，保证党和公社的各级领导成员必须是忠实于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并且吸收在大跃进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中受过考验、合乎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入党。

对于党员、干部作风中的问题，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鸣放加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于混入公社领导机构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们从领导机构里清除出去。

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公社中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是否可以作社员，或者作非正式社员，或者仍然由公社监督劳动，都应当在整社的过程中，由群众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地加以讨论和做出决定。

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围内，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两个试点，即在一个或者两个人民公社内，帮助那里的同志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那里的工作，取得经验，作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组织千人、几千人或者万人左右的检查团，由省、地、县三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挂帅，领导整社工作。检查团要在专区和专区之间、县和县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开展参观评比，召集现场会议，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鼓干劲，想办法，具体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及时地推广成功的经验。总之，必须通过这一次整顿，使全国的人民公社的工作普遍地提高一步。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置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

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游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

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

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咸。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陆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

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

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

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记录）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 5500 万吨钢不能和我们 1000 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 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

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 25%，这就占 1／4，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 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 1953 年为止的三十年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政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 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作这是好心不是好意（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 25%，你们考虑是不是

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 25％，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 7 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电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 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 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

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 1958 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 1958 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 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

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

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 1958 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

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

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 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 1959 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 1958 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 1959 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 50%，生产费用占 20%，农民实际所得 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 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 30%，他就加 15%，实际上是 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 70%，消费只占 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

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 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

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 60 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 380 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 1953 年到工 956 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

（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 1958 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 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他产的吗，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吗，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 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 26％连同税收 7％为 33％再扣除 1959 年的生产费 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 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 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 180 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 1958 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

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抡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 30％到 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

（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

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 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 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 年公社积累不超 18%，连同国税 7%，总共不超过 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 11 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 20%，积累、税收 50%，农民只分到 30%，瞒 15%，实际拿

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 18%；，加上国家税收 7%，共 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

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 年到 1956 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 1958 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 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 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 26%，如税收 7%，共 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 1959 年生产费 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 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 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 1958 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

（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

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 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 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 220 元，结果只分给 130 元，砍了 90 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 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

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 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 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 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 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 1959 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 18％，加国家税收 7％左右总共不超过 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

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

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 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

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　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

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 1921 年的事，到现在 38 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

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 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 7 月 14 日革命成功，美国 15 日占领黎巴嫩。我们 8 月 23 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 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 30%，瞒产私分 15%，共 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

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

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 70 万个小社，一社 50 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

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的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炼、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一）》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

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和王××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三）》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

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曰上午七时于武昌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四）》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不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账不能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

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

我们过去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库存减少很多，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一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调整。钱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天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高潮，就要死人的。波浪式的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但是他们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变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除掉几万人，还是一百十几万人，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同情相反，我们同情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少数人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和阿沛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资，二不生产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结婚的，回教是结婚的，天主教多数是结婚的，只有少数不结婚。（周恩来：印度教也结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数人以外，也结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

结婚，不生人，不生产后代。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来一个近代化？同时，教徒（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信教的。但是你们要，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个人自己决定。这些话，我跟达赖一个人谈过。我说，你们为了长久之计，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它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们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来不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边，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资本家也是一辈子都包到。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有利，这样一来，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把仇就解开了。而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吗，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事，既然我们打了大败仗，那么就有打了大胜仗的。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

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你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奈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的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个大家的疑问。我这里回答：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军队，只要二十万的×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包括干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退××多，剩下××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这样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后，如果你们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西藏整个民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番、阿赛那些地方。这个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跟他们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刻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就举行叛乱，武装斗争。现在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现在有许多所谓康边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康人同藏人就发生了矛盾。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饭？那里来呢？就在这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来吃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那些枪收缴了。比如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的队伍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怕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岁女孩子的脚骨拿

来作乐器。还有拿人头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要。所谓灭掉者，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国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之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他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之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比如尼赫鲁总理这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是两面性：一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号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　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

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人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队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是要不得的。

二、留有余地，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需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这就是没给下面留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余地。过去我们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经济工作不能蛮打蛮攻，生产东西不能都停掉。计划工作就要留余地。保证重点是主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是按照政策办事情的。

三、波浪式前进，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波，曲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四、要善于观察形势。要经常注意观察政治动态，经济动态。所谓政治动态，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的工作。

五、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一些，就要缩短一点。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要当机立断。

六、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一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是通气的办法。不要满足于书记处办事，更不要对省委书记封锁消息。

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的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许多人死在朝廷。

八、要集中：集中在书记处、常委会，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党内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开展，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九、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话要看对象。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很多通俗的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泽东《工作方法十六条》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

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

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

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了×××，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

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原稿如此——抄者）。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

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按：此公报是在主席亲自主持下写的。）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者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

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好。（可能有漏字——抄者）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说明：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工作方法九条，此后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增为十六条。以上是根据九条的传印稿和十六条的两种传抄稿整理的）

2011 年 5 月 1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4）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本节资料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不仅敌人，而且朋友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受到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大家在风头上，要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的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

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对。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毛主席对？（注：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内荏”，没有头脑。袁绍还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校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用。——《三国志》曹操评袁绍。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谈话纪录（摘录）

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其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很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有系统的编一本书。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国内形势如何？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①综合平衡；②群众路线；③统一领导；④注意质量。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各部门，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秩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现在是否是农轻重呢？也就是说，要强调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轻、农、商、交的秩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首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了之后，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会有人说闲话，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关于农村的几项具体政策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非恢复不可，可以三年不变，如果可以定，究竟定多少，增产部分是否可以征四留六，有灾减，自留地不征税，这次会议要议一下。

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要使生产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反对半无政府主义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有两条可以普遍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不搞一平，二调。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 0 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

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

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讲话纪录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

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

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 年较 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48．4%，其中工业增长了 66．1%，农副业增长了 25%（粮棉增产 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 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 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 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 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 4 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 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 1958 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 20 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 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 30 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 18 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

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 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

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 4 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 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 4 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 年 7 月 14 日）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　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

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　　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

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

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　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

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

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

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

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 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 30％，总之 30％，加 40％为 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

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

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 年、1957 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

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 56 年下半年、57 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 30 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 1／3 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 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

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 1070 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

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

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年廿六日，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付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

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

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毛泽东对三个文件的批示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请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那些是以使它们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倒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思是驳斥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一九五九年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

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无动于衷，不懂世事，麻木。收那么点材料。李锐怕“湖南集团”，我加入。（对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在城市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谢是炮筒子，

他们对教条主义起名“洋房子初生”、“本本主义”。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对彭德怀）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基础不懂，必出乱子。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客观物质世界经过自己大脑，形成概念、判断、思维、理论、政治纲领。客观影响主观。人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你不懂，也许懂几个名词。不承认这一条（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永世搞不好。客观世界要不断反复，才能进人主观。如商品的二重性，人们天天买东西，几千年，天天买，等价交换，形成社会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即形成的。商品是对立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观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精神是第二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社会，即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两个对立面相统一，人与工具，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构成生产力；生产力再和生产关系统一。生产关系有三部分：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对彭德怀）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大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闻它。政治局委员不懂此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这时，刘少奇进来。）　　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 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如杜威主义，不懂，太复杂，简单意思懂一点。柏格森主义、无政府主义、唯心论、哲学史，看过一些，没有作过深入研究。看书和研究是两回事。冯友兰有研究，才写出《中国哲学史》。看了，不等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你并不清楚，即基础不懂。根据这个基础的另外一些学问，也就不了解。　　（彭德怀又谈到在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种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这两本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考茨基是大马克思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后来变成反革命，同伯恩施坦不同。伯恩施坦跟恩格斯做事，是银行小职员，无理论修养，得到恩格斯信任，逐步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恩格斯死后，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为第二国际首领。伯死后接替的是考茨基。列宁同考茨基决裂，成立第三国际。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跟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

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朱德、项英、李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 10 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二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 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

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 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 年 9 次电话，1 年不到 1 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 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 9 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 3 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 人拜 5 个，其他 5 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 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若不开，有什么办法。人一

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样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 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之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 70％。一亿五较贫苦，9000 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

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刘建勋讲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舟的话闪闪烁烁，马克思主义不多。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3 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根本不认识，就跑过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没见过，后来追上来，新来乍到。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 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 5 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源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 70 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故事是这么来的。　　彭德怀：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说我出国搞了资本吗？（毛泽东：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罗马尼亚见了国防部长，我谈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还有超支户、分空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来过中国，谈话时大使参加。除此以外，都撇开了，没谈。在保加利亚谈，说对他们有帮助的，手施人畜肥。他们地多，气候好，有粮，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这些。　　昨天一谈，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国每天宴会，也不愿讲话。　　我那封信，有两方面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等几种关系，是政治性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从哪里来？小组发言也是谨慎的，正需要鼓劲之时，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经验，认为应好好总结。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毛泽东：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动派欢呼。）信是交给你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此件请审阅、批示。我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毛泽东：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样。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上海会议是观察时期。西藏问题一来，搞西藏去了，这是真事。平时琐事多，忙于事务，大事确未考虑，听听报告而已。　　毛泽东：观察从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　　彭德怀：武昌会议我有书面发言。　　毛泽东：逐步形成你这些观念。你不是乐观，是悲观的。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毛泽东：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

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有右倾活动。　　彭真：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 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毛泽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我对彭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 9 个月，批判了 9 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　　彭德怀：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为了带号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这事概是当年江西反“围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资产阶级意识，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华北会议批评，忍了几年。　　毛泽东：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彭德怀：小平几次不当军分会主席，说我有英雄主义。　　毛泽东：是说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刘少奇：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　　彭德怀：问题提出后，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嘛。　　林彪：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　　贺龙：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林彪：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　　毛泽东：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

向总路线。　　毛泽东：出 18 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7 月 20 日组长会上，反映有同志说，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有人对彭信，23 日前没有表态，只对常委谈。他们对大炼钢铁、公社化、比例失调不满，可能比你们还多。如计委，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10 年改不过来，横在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信中说，“种种原因，虽有安排，难于决断”。这些话呼应一大批人，说责任在上面。计委有什么安排？5 月已经作了决断，计委官僚主义厉害，难推脱，但计委拉不过去。计委没有安排？历来用一大本，1000 多页，从来不请求来谈谈。　　政治挂帅，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党的领导。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　　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其实他讲给林克（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听，林克又讲给我听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我同李济深讲，党内有人不赞成，用田来吓民主人士。10 人中可能 7 个或 9 个不赞成处理内部风潮。没有几个省委书记赞成。一同准备作思想斗争，准备闹事。就是牛鬼蛇神不许放。说我们无民主，只独裁；让放，还不民主？只你这省（指湖南）提出，六个问题难办，中央通知，不适合情况和顶回，紧急的先斩后奏。自我批评了 9 个月，没起瓦解作用。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 月 23 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 50 米了。　　李锐动摇，去年 11 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 9 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　　（周恩来插话：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　　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成的。

对计委绝不原谅，10 年了，还说没有经验。挖掉墙脚，证明没有经验，完全做官。鹤寿那个部，8 个月搞计划；鞍钢还搞计划，不着急。要切实批判，毫不要妥协，一句好话也不讲。当然还不是反革命，还是想把经济搞好。光是动口，矛盾不动手，横直拖拉，团团转，互相依靠（指计委与冶金部），都靠不住。南宁会议后，承认我挂帅。（在江西时）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经过长期斗争，古田会议后，逐步形成党委可管人事。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打到一个地方，以鸡吃尽为原则，吃光再走；根据地建立不建立不在乎，无建根据地思想，叫流寇主义。现在经济部门即如此。蒋门神一派，不能收税。我当武松。军委对中央敷敷衍衍，搞形式；情况如何，没展开讨论。我也有责任。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军委。对政治的理解（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这种运动（指大跃进）不会搞。相信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保护积极性。批评可以，但不能挫伤，从实践中得到教育，阶级斗争靠广大群众。革命标志：单靠先锋队觉悟不够，还要有阶级觉悟，还要同盟者，小资产阶级过不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起义的原则。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已经惶惶不终，条件完全成熟。　　你还是缺政治挂帅，却批评政治挂帅，不是政治家。（彭德怀：于种、技术科学那样复杂，不胜任。辞职现在不提，过去提过好多。）党委抓起来，要有政治空气，技术服从政治。　　彭德怀：中央的东西，军委由总政传达。　　林彪；“小权集中，大权下放。”人家就是这样形容军委的。　　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方不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 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学我 1927 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补足 20 天，这次也 40 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人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

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刘少奇：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 40 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林彪：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

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作很不。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周恩来：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周恩来：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陈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

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 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卞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周恩来：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刘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

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彭真：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 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 年 12 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毛泽东：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刘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德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感情问题。　　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有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 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于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

内容与形式那么一致。（毛泽东：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多少年采取组织决定，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毛泽东：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 60 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　　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　　彭德怀：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　　毛泽东：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彭德怀：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 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 23 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有 16 人动摇）。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个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　　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毛泽东：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不会的。　　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林彪：会出现大马鞍形。　　彭德怀；三句话，出在第二句，问题不少。　　毛泽东：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周惠：看不到信有问题，还是坚定不坚定问题。湖南要鼓劲，矛盾情况，下面新的右倾也早发现。对谭老板我提得尖锐，要反“左”防右。食堂问题，谭主张解散。（毛泽东：谭老板也摇摆。）小舟来电报，也偏右，与谭老板谈，算账，松劲，要反“左”防右，我的思想情况不是右倾的。　　毛泽东：吴起镇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 骨干，前途光明，当时只 7000 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

周恩来；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刘少奇：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9 个元帅、10 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刘少奇：还要一个改造过程。　　彭德怀：40 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　　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　　毛泽东：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政治犯错误，变成反党，拥护祖国。将来是好遗产。都可搞错的。心里虽是马克思主义、总有部分不纯，以无产阶级之名引诱彭，不一定行。　　朱德：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毛泽东：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近几年有些改。意见不合。强迫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命令对，

自己不通，不盲从，执行时动摇；碰死钉子，进步一点。打赣州后，还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样改变。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打会理也不愿意，伤兵没法处理。　　毛泽东：张国焘一条好处，慢。彭德怀：十一二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17 岁当兵。40 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委、候补中委 191 人，到会 147 人，列席 15 人，共 165 人，会议议程：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

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辨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八月二日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

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语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以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

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　　开了 40 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讲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讲社会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讲自然界，恐怕是这么说的吧。我就不懂什么叫人生观（人生观外国书上很少）。两个是一个东西，就是世界观，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部分。为了通俗起见，既然大家关心，人生观谈谈也可以。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那里是没有解决的：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中央常委和他们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客观真理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感觉，山水草木，牛马猪羊，小人老人，才确认清楚。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上义。西方流派，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犯错误的人，要改造世界观，或是部分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说，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　　二、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几位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他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为什么没变？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领袖吧，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这个宇宙观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从 1928 年起，31 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

所谓三七开者，不是跟我个人。如只同我一个人有仇，或者我不对，或者他不对，那一个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 100％，棉花增产 100％那

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 3000 万吨、2000 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 1953 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 至 1953 年 3 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 5 月（指 1957 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他抢先了，看来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在庐山是两种气候。一种，大多数说大跃进、公社化好得很；少数，“俱乐部”的同志就说是糟得很，他们的看法跟罗隆基接近；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罗隆基承认你解放军，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　　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把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机会主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我听张鼎丞讲福建问题，把党权、政权剥夺去，封为“罗明路线”，还有什么邓、毛、谢、古。我被封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这一下刺激我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政治上，叫我“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这对我帮助很大。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是大的分裂活动。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张国焘是个分裂运动。陈独秀是个分裂运动，他搞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派”，打着列宁的招牌。罗章龙在上海成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

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嘛，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还有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还有强迫命令，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不得了，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都是好东西，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这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就是这一年，大跃进，什么放卫星，放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许多，它势必走向反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3000 万吨，2000 万吨，1650 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搞的嘛！除了“俱乐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得到经验。全党都得到这样深刻的教训，叫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还有什么炼钢铁，小土群，说湖南有 5 万个小土炉，3 万个点了火，2 万个没点火。都变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别是经过“俱乐部”同志这骂，40 多天骂，大有好处。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政治是上层建筑，组织生产。苏联的《哲学小辞典》，讲同一性，是形而上学，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生与死有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无同一性吗？请问战争如何转为和平？和平如何转为战争？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抗美援朝，对立的东西有同一性。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杜威主义；关于政治，自由，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由与必然，这些都可涉猎一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保护经济的，使经济合理发展。技术措施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生产进行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　　九、集体领导还要不要？这是赫鲁晓夫特别强调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关于集体领导，有没有？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这回要“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没有“集体领导”的，大概省一级除湖南之外也不多。还有，“民主”是没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首先是讲言论自由。在庐山，我在头两个礼拜，鼻子也是不灵的，看到有点问题就是了。有点灵，不是完全不灵。看嘛，提出 18 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以后拿来一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来一看，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 7 月 2 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 19 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有没有集体领导，这个东西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要派万人检查团，或者千人检查团，或百人检查团检查。这回我们开中央委员会，100 多人开会，你检查究竟有没有集体领导，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好嘛，就不挂帅了嘛。挂还是挂。你们看嘛，100 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满足“集体领导”的要求。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 12 个月 12 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 40 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 20 天，还

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 40 天，不然我们还欠 20 天的账，我还加 5 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照他们那个搞，我看不行。就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集体领导”是假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美国还有国会，你说没有集体领导？尽是独裁？可是所谓“民主”，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所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反无产阶级的。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最近不是发了这个文件吗？），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这个口号是章罗联盟创造出来的，现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就上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6 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

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说：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 7 月 23 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到 20 日那天我找组长们谈过一次，讲耳口并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郑州会议，1957 年青岛会议，就讲了硬着头皮顶住嘛，中央发了指示嘛。今年 3 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几次问小舟，你们放什么？你们要民主，大鸣大放，受了压抑，究竟要放什么东西？他又不讲。听说他有十大纲领。对我就没有讲，只讲了个别问题，比如食堂。后来跟少奇讲了。（少奇：是你谈的）小舟你那几条，我就没有印象，当时我就不记得你第一、二、二、四、五条……因为我跟你谈时，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人在座，就是没有把你的纲领拿出来。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十二、今天是 11 日，下午休会，

明天休会一天，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讲过了，好使你们精神有准备，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俱乐部”的同志们！13 日开大会时，最好你们不要写，那么谨小慎微，那么怕人家抓小辫子！我们德怀同志现在极为谨慎。你学我这样搞点小题目就是。请你准备一下。　　十三、辞职的问题。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过去我们跟彭德怀同志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跟他们谈话，常委会为一方，“俱乐部”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讲话。我高兴，我说他开始取得主动，表示欢迎。我高兴了，就请他来谈了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还是你干吧！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另一个是黄克诚同志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干不干，这两个我提议讨论讨论，不然又是我独裁。你这个常委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又跟彭德怀同志个人说了。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里头散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队伍来一个适当的人就行了，现在他们很紧张。问题是“俱乐部”的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们如不赞成，表示意见。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 10 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二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这两个今天马上就付印，发给所有的同志征求意见。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

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有许多是组长议论过，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这个决议，你们两方、大家要讲话的。草案是少数人起草的，常委会的意见，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知道一个方向，常委有这么一套意见。让对方讲话，你们想一想，或赞成，或不赞成。三个决议；一个公报，迅速发出。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啊！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一批二帮、一斗二帮，批评之后变成一看二帮，看改不改了，还要帮。我相信全体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会大进一步。这次会议要收得好，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　　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说它是反动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组织宗派，进行分裂活动，反对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多数所拥护的总路线。而且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 6 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 7 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 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 9 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 个元帅，跟 9 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我所以在 3 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要抓团结

的旗帜。凡是错误路线都是不提团结的口号，因为他们要分裂。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 30 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安子文：现有 45 万）好多？45 万？哈哈，队伍不少！所以 1957 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 100 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 100 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 45 万嘛。所以现在我们党内，“俱乐部”的同志相当孤立。我说内外夹攻，并非其时。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那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 10 天走了 4 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 4 个省可以代表全国。以上讲的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　　我们的会开到今天 40 天，7 月 16 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 31 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 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 31 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王明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想把这个瘟神送回中国。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 2000 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 1000 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 3000 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十

八、再讲两句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当然美中有个足，疯子可以闹事，但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这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蒋介石搞了 20 年，越反动越好。我的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除了马克思，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他们教育、压迫我们，能搞起来？我看是不行的。现在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不可能国际形势是乐观的，国内形势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完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很好，步骤也好，成绩显着，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认真地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很容易地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 1929 年冬向中央提出过在幕阜山区（即湘鄂赣边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

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地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健部队对平江的进攻以后，在追攻中攻占长沙。这次战斗在军事上虽然是个胜利，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极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汇合成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顾一、三军团的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表现动摇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汉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错误的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德很迟。抗日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步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 1939 年 10 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 1938 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做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1940 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

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地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

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到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 7 月 20 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 7 月 14 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 7 月 21 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 23 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

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但是两人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我跟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 1942 年整风运动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党委同志们怎么看法？当时黄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从国外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同，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回来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去，我 7 月 14 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不愿意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做决定不要再提。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 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前言

各位同志：

建议读这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两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本书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缺点和错误。不要紧，你们读时还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过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在这里即出了《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兴趣，以后可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 180 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一九〇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个文件，“不知道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

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土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有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爬山、游泳、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糜曼，四肢痿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待前，齐姬奉后，往而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客曰：“令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立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

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待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景、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附：枚乘《七发》今译

楚国的太子有了病，一个吴国来的客人去问候他。客人道：“听说太子贵体不安，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太子道：“还疲乏得很，谢谢你关心。”客人趁机进言道：“现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在少壮之年。或许你长期贪恋安乐，日日夜夜没有节制。邪气侵犯，在体内凝结阻塞，以至于心里烦乱郁闷，情绪恶劣好像醉酒似的。常常心惊，睡不安宁。中气不足，听觉不灵，厌恶人声。精神散漫，好像百病齐生。耳目昏昏，喜怒无常。这样下去日子长了，性命就要不保。太子你是不是这样呢？”太子道：“谢谢你。我倚靠国君中力量，常常有些享受，但是还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客人道：“一般贵家子弟，住在深宫内宅之中，内有媒母照料，外有师傅陪伴，要想交结朋友是不可能的。饮食一定是淳美香嫩，肉肥酒浓。衣服一定是温暖轻细而且多，永远热得像过夏天。这样，虽有金石的坚强，也是要销损而解体的，何况筋骨之间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要妨碍血脉的和畅。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就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就是斫伤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就是烂肠子的毒药。如今太子皮肤太细嫩，四肢不灵活，筋骨松弛，血脉阻滞，手脚无力。听使唤的，前有越国的美女，后有齐国的佳人。往来游玩吃喝，在曲折幽深的房子里纵情取乐，这简直是把毒药当着美餐，和猛兽的爪牙戏耍呀。过去的影响已经深远，而又拖延不改，即使叫扁鹊来治疗，巫咸来祷祝也来不及啦。现在对付你这样的病，需要世上的君子，知识广博的人，有机会时给你出出主意，改变改变旧习和成见，常在您的身边，做您的辅佐。那么沉沦的享乐，荒唐的心思，放纵的欲望，就无从产生了。”太子道：“等我病好了一定照你的话行事。”

客人道：“现在太子的病，可以不用药石针炙而用精深的理论来治疗。您不想听听吗？”太子道：“我愿意听。”客人道：“龙门山的桐树，高达十丈还没有分枝。中心纹理盘曲，树根分布很广，上有千仞的高峰，下有百丈的深涧。急流逆波摇荡它。它的根半死半生。冬天的烈风霜雪刺激它，夏天的雷电打击它。早愿有鸟鸣晚上有鸟宿。孤鸿在上面呼号，鹍鸡在下面哀叫。于是在秋冬之间，叫最精于弹琴的师挚砍下它来做成琴。用野茧的丝做弦，用孤子的带钩做隐，用九子寡母的耳珠做琴徽。叫师堂弹奏那名叫《畅》的曲子。叫伯牙来唱歌词。那歌词是这样：“麦芒尖尖啊野鸡晨飞，面向废墟啊背倚枯槐，道路穷绝啊溪流遇回。”鸟儿听了，拢起翅膀不再飞。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再走。虫蚁听了，支起咀巴不再前进。这是天下最感动人的歌声，太子您够勉强起来听听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加上笋蒲。用肥狗的肉来加羹，盖上一层石耳菜。煮饭用楚地的粳稻，或是雕胡的米粒。粘的饭成团，松的到口就散。教尹伊来煎熬，易牙来调味。熊掌炖得烂烂地，加些芍药酱。将薄切的兽脊烤来吃，新鲜的鲤鱼做鱼片。配上秋天变黄的紫苏，白露时节的蔬菜。兰花泡的酒，舀来漱口。还有野鸡肉，豹子胎。少吃些干的，多喝点稀的，就像热汤浇在雪上似的容易消化。这也是天下最可口的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赏赏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又说：“钟、岱等地的良马，年龄到了就用来驾车，跑在前头的像一飞鸟，跑在后面的像距虚。用爵麦喂马，马都成了急性子的，配上结实的马缰，赶上平坦的大道。让伯乐前后视察，让王良、造父来赶车，秦缺，楼季做车右，他们能制止乱跑的马，能扶起翻了的车子。然后和人家下千镒黄金的大睹注，在千里的长途上赛跑。这是天下最快的车子，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乘坐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登上景夷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水，左江右湖，那乐趣是天下少有的，这时可以叫博学有辩才的人，陈说山川的本原，尽举草木的名称，排比事物，编成文辞以类相连。在一番徘徊游览之后，下台到虞怀宫中摆酒。游廊连接四面有檐的建筑，有台的城，结构重迭，采画纷纭。车道交错，池水曲折，养的鸟几有混章、白鹭、孔雀、鹦鸡、天鹅、鹍鹣、鸂鶒。有些鸟头上有翠毛，颈上

有紫缨。螭龙鸟、德牧岛，鸣声相和。鱼类腾跃，鳞翅振奋。清净的水边长着藉草和水蓼，还有蔓生的草和芳香的莲。女桑和河柳，素叶而紫茎，苗松、枕木和樟木、枝条上达青天。梧桐和棕树，一片林子望不到头。各种浓郁的芳香，和种种的声音相杂。树头舒缓地随风摇动，树叶翻复忽明忽暗。大家入座畅饮，乐声振荡快人心意。这时让景春来助兴，让田连来调音。各种美味陈列在面前，各色肴饭都具备。娱目的是精选的美色，悦耳的是流转的好音。这时发出旋风般的《激楚》之曲，飘起郑卫的悠扬乐声。叫先施（西施）、征舒（夏姬）、阳文、段干、吴娃、闾娶、傅予等美人，拖着各色的裙裾，垂着燕尾。眼光对人挑逗，表示心里暗许。她们引流水洗濯，身上带了杜若的香气。头发上好像笼罩着尘雾，涂上了兰膏。换上便服来待奉。这也算是天下美妙盛大的娱乐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玩耍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那么我要为您训练骐骥，驾有窗的轻车，您坐在这样壮马拉的车子上，右边带着夏后氏箭囊里的劲箭，左边带着黄帝的鸟号之弓，去到云梦的林中，围绕生长兰草的洼地奔驰，奔到江边然后缓缓地行进。在青苹之间休息，迎着清风。陶醉在春天的空气里，满怀春意的心为之动荡，然后追赶狡兽，许多支箭射中了轻捷的飞鸟。这时犬马的本领发挥尽致，野兽的脚困乏万分，看马和御车的人使尽了他们的智慧和技巧。威慑着虎豹，吓坏了鹜鸟。奔马的铃当当乱响。跨越游鱼，抓着麋角，踢倒麤兔，践踏麋鹿。这些动物都流着汗珠，窘迫屈伏。无伤而吓死的，足足装满随从的车子。这是规模最壮大的田猎，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干一场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也不能够。”但是他这时眉间呈现了喜色，渐渐地这喜色几乎布满了整个面部。

客人见太子有高兴的样子，就更进一步道：“打猎时夜火烧灭，兵车雷滚。旌旗高举，装饰着鸟羽和牛尾，整齐而众多。放开马蹄追逐，因为爱得野味，个个争先。为拦捕野兽而焚烧过的地面非常广阔，远望去可以看见边缘。然后把毛色纯一躯体完整的牺牲献到诸侯之门。”太子道：“妙啊！我愿意再听下去。”

客人道：“这还不曾完呢。那时丛林之间和沼泽深处，烟雾弥漫，野牛和老虎都跑了出来。勇壮的人非常强悍袒露着身体空手上去搏斗。白刃闪闪，矛戟纷纷。收取猎获物的人同时掌管记功，赏赐银绢铺下杜若，盖上苹草，为牧人布置了筵席。有美酒和佳肴，有细切的烧烤肉，款待宾客。盛满的酒杯并举，言语入

耳动心，诚实无悔，说一不二。忠信的表情就像刻在金石上一样。高声歌唱，长久不厌倦。这真是太子所喜爱的，能够勉强起来去玩玩吗？”太子道：“我很愿意跟你们去，就怕我这病人成为大夫们的累赘。”看起来太子的病已经有起色了。

客人道：“我们将在八月十五日，同诸侯和远方来的朋友们兄弟们齐到广陵的曲江观涛。初到时还不会见到涛的形状，不过看水力所到之处，已经令人大大吃惊。看那水力所驾陵的，所拨起的，所激乱的，所结聚的，所洗荡的，纵然是有才能辩的人，也不能详加描述。既而目迷神乱，心惊胆战。浪涛滚滚而来。初时迷芒一片，少时奇峰突起，忽然声势浩大，超越旷远。似乎要陵驾南山，以望东海。那浪头几乎上冲苍天，而它的边际煞费想象。这时观赏奇景无穷无尽。然后注意东方日出之处，只见浪头迅速地乘流而下，不知要奔到何处才停。有时奔乱曲折地奔泻，忽然纠结着流去再不回头。浪涛冲到南岸然后远逝，看的人心神紧张更加疲惫，涛的形象在心中久久不散，直到天明，然后才心安神定。这时胸中受到荡涤，五脏受到冲刷。洗净手足，又洗颜面、发、齿。驱逐了倦意，去净了尘垢，困惑消失，耳目开朗。在这时候纵然是久病的人也要伸直驼背，招起跛脚，张开瞽目，打通聋耳来观看它，何况小小烦闷病酒的呢？所谓启发昏蒙、解除迷惑，都不消说了”。太子道：“妙得很！那么涛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呢？”

客人道：“那是不见于记载的，不过我曾听师付说过，涛有三点似神非神：雷声轰隆传达百里是其一；江水倒流，海水上潮是其二；山中云气吞吐，日夜不息是其三。初时江水平满而流得极快，然而波涌涛起。开始的时候，水淋淋而下，像许多白鹭在降落，再进一步，就滚滚翻翻，像白车白马，张着白的帷盖。当浪头像云堆似的，纷纷扰扰，就如三军奋起。当两旁的奔流忽然涌起，飘飘地，就如将领乘着轻车在统御军队。驾车的是六条蛟龙，跟着太白帅旗。忽而但见白色的虹蜺在奔驰，前后相连不断。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挨挨挤挤。又见壁垒重重，人多马众有如军队。大声轰轰，漫天沸腾，势不可当。看那两边岸旁，汹涌激怒，盛气冲突，向上击刺，向下投石。正如勇壮的战士，猛扑无畏，冲营抢渡。小湾小港无所不到，跨出崖岸越过沙滩。遭遇者死亡，阻挡者崩溃。开始的时候从或围津口出发，逢山陇而回转，遇川谷而分流。到青篾时盘桓回旋，到檀桓时无声急进，到伍子山速度减低，远奔胥母之战场。上赤岸，扫紫桑。横奔像雷滚，显然威武，如发狂怒水声混混，犹如擂鼓。涛在岸合处被阻而又发怒，上升远跳，

大波扬起，在名叫借借的隘口大战起来。这时鸟来不及飞起，鱼来不及转身。兽来不及逃走。纷纷忙忙，也像波涌云飞一般的混乱。向前扫荡南山，回头冲击北岸，丘陵颠复，然而又荡平两岸。浪头高峻，破坏堤防，直到全胜方才罢休。然后急速地奔泻，任意泛滥，十分横暴。鱼鳖都不能自主，颠倒翻复，稀里花拉，起伏不绝，连神物也觉得骇异。这种景象难以尽述，简直令人吓倒，或者吓得昏头昏脑。这是天下最奇的奇观，太子你能勉强去看看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去啊！”

客人道：“我要为太子推荐有道术的，有才智的人才，如庄周、魏牟、扬朱、墨翟，便蜎、詹何之类，让他们谈谈天下最精深的道理，讨论万事万物的是非，让孔丘和老聃来总结，孟子来稽核，这样，一万个问题也错不了一个。这是天下最切要最美妙的理论了，太子您可以听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站起来，说道：“我现在一切疑虑都消散了，好像已经听到圣人辩士的言论。”这时他出了一身透汗，忽然之间，老病全消。

《七发》简介

《七发》是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作品。枚乘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二代。（公无前 179——143 年）

《七发》的结构是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开头另加一段序曲。叙述缘起，并借一主一客的问答把各段联系起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反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要作充分准备；传达与讨论方式，要好好研究。　　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当这样来总结。会议头一个阶段开得不对头，是照我们的老规矩。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18 个问题中那些东西，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结经验应当像刚才通过的五个文件这样总结法，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因为从去年 11 月郑州会议起，已经八九个月了，一直搞指标落实，什么反对刮“共产风”，等等。开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判，产生了右的倾向。

而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一月会议、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可是气候并不好，因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形势也已好转。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一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了嘛，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左”一阵风。后来中央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一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 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 1939 年、1940 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

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竟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 到 20 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 4 个人，加上李锐只有 5 个人。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 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里，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　　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 5 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二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953 年提

出总路线，这么一个纲领，那时他们受不了，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党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能舒服？他们不舒服的，不愿革自己的命。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勉强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大多数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地富反坏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反映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这一关难过。讲到这里为止，是讲坏话，讲难听的话；底下要讲一些好话，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历史上他们做过好事，反帝反封建，对社会主义有模糊愿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赞成决议，我很高兴。昨天我还相当悲观。我跟你说过，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十，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上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这么多人批评，有分析，留有余地，批评反动的一面，坏的去掉。他们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还待实践，但承认缺点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跃进，已经大跃进了。29 天，关系很恶劣，一定要榨出油来不好，容许有思索，有改正的时间。这方面是收获，表示欢迎，愿意同大多数合作团结，愿意革命。彭德怀跟大家、跟我说了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去耕田。这叫“狷者有所不为”；你还缺一个“狂者进取”，是孔夫子说的。你就是服从命令，不造反，积极方面说，61 岁了，最后算账，以后再说，以前的不算。普列汉诺夫以前大半正确，后来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能成佛？只要你放弃自己的纲领，真正跟大多数人合作，采取团结态度，你就

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会有时觉得光明，有时悲观。大家要做工作，应该同他们往来，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要采取热烈的态度，到他那里去。不要怕沾什么“俱乐部”的边，你怕“俱乐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帮助害病的人，医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采取热烈态度，消极害怕，怕沾边，这不好。不要紧的，会开了这样火，才 5 个人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打了预防针。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我希望同志们在各地传达，如你们开 10 天大会，9 天指出错误，要强调错误那方面；不过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强调，一强调就无事可做了，你就治这个病嘛。到第十天开团结大会，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 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理解，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

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影响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转过来。转不过来我们也没有蚀本。采取团结态度，转过来了，就赚了钱。个把两个人不转过来，也无关大局。中国 6 亿人口，每年增加 1300 万，我看天不会塌下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没有转过来。王明还在莫斯科，洋状告了 3 条：反对共产国际，强迫 80％的人整风作检讨（其实是 100％，这次又是强迫），搞个人独裁。　　我的意见是这样：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义。个人投票不行，还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改变不改变，两种可能。应当权力争取转变过来。中国人民热情，有英明热情的党。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给必要时间是可以的。右派是多少？有 45 万。比人家一个党还多。除了个别的以外（章伯钧、罗隆基、龙云是极少数），45 万右派是笔资产，要开个大会，要争取他们，我曾经讲过，至少 70％可以争取过来。其他以资产阶级右派去见阎王。这些人再活 10 年 20 年，可能只剩下 10％了。白俄还愿意回国呢！牛训练 3 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条件下，还有这样热情的党、干部和人民，应该相信他们（除个别人以外）是可以改过来的。　　过去搞斗争总不休止，军师团营长都斗，发生恐慌。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 3 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也不怕，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惟一见过托洛茨基的是刘仁静，刘仁静现在做翻译。（周恩来：罗章龙也在教书）要给人出路。要准许阿 Q 革命，阿 Q 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

过好的一面，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时一提起立三路线还得了。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次洋状。去年武昌会议，他回了一封请假的信，是热情的。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走绝路不好。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出来，只能在做了决议后的今天来讲，才能讲清楚。　　中央全会开了 15 天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

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一次讲话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无政府主

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没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争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不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的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嘛？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来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暂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静，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

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内，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张闻天信的批示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

×××、××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以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附两首律诗：

七律　　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　　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之后说：“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相吧！也站不下呀！”

毛主席又亲切教导说：“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毛主席看了宴会厅，询问工程情况，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又高度赞扬了建筑工人高度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说：“最近，我们看天安门礼堂，只有十个月，过去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都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休息礼拜天，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

是八小时的，结果他做了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他不要钱呢？他不要。有一些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夜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

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元钱呢？一小时一元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元，就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作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有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讲的伟大创造共产主义礼拜天，有不计报酬在内。”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 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

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

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 1924 年，一个是 1938 年，1939 年，1940 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 Q 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 Q 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 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

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

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

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2011 年 5 月 22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5）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本节资料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关于一九六 0 年的计划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 0 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大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月九日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一月十七日

我们能够管的六亿多人口，其他地方我们都管不了。有些地方有我们的使馆，可以进行一切可以进行的活动，但是，也不等于我们能够当他们的参谋长。我们不能当美、英的参谋长，也不能当苏联的参谋长。要分几个阶段，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争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这主要靠自己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人民，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六〇年一月，毛泽东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

斯大林奖金我们没有就不要搞，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勋章、博士那些东西不要搞了。

一九六〇年春，毛泽东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对一个文件的批语

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议论，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订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以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法。

办法：

一、走出办公室，田间会师。

二、实行“三同”、“三包”。

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办法，既做好中心工作，又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的经验。

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

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卫生工作，这两年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着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关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作，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式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强健，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

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定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遗误。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聂荣臻同志《关于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示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交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细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主要是煤、铁问题。有煤有铁就有钢。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〇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此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各省先摸一两个县，在六级干部会上提出。贪污的钱要退出来，贪污严重的要处理，一定要赔偿。公社的开支，要由党委集体决定，报县批准。我批的山东那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少。”“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错误性质严重，民愤极大的，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带着外部矛盾。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回避问题。

不做本地官。不要全部回避，一律回避破坏一些原则。应该相信多数是好的。大概限制在四分之一才好，主要负责人回避。

先派人去摸几个月，了解情况，然后反客为主，反主为客，请他走开。

有一部分人要坐班房。不要杀人。

外宾参观问题。

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最好看好中坏三种，“强迫”让他们看。如果来不及，看两种也可以，实在不行，也只好不看。

我跟德国人讲，公社有百分之五十是一类社，百分之三十五是二类社，百分之一十五是三类社。四万个公社中，有六千个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听了之后，感到我讲了公道话。

三类社整好不难。先进与落后，一万年也有。外宾参观，中央发过指示，好坏都看，可以比较。

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煤、电、水、盐、木材、石油、农副产品，主要是煤，木材的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的方向问题。

反华问题。

读一个文件（指《关于反华问题》及附件），大家斟酌。反华，其实是大拥小反。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影响很大。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

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

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

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敌人只是少数，这一点不但应当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我们长期对外工作的思想。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

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个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

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文件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 30 是好的，百分之 50 是一般的，百分之 20 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 20 的，有不到百分之 20 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

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搞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 s：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

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零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的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的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搞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

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零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逸，决议文件也不多，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零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万吨。今、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的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搞了，就要欢迎人家。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

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万吨到××××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

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好的不到百分之××。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个单位，烂掉了××个，占百分之×，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

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

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

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三月二十三日）

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

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丁，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具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

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零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零年）办起的。是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也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守卫，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

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2011 年 5 月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1）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本节资料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以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许多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同志。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　　在这个报告里，准备说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党的问题。

一目前形势和任务国内形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十二年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解放后所创立的空前未有的大统一的局面，日益巩固起来。　　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建立了基础比较强大、部门比较齐全的重工业。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

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　　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一步地巩固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提前了两年，在一九六 0 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　　第二，我国的基本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第三，我国机械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各个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第五，地质勘探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我们对于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我国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　　第七，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有很大的成绩。农业机械已经有了一定数数的增长。国营农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这支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已经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　　第九，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十万人。　　第十一，我们在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第十二，我国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这一切成就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能够发挥的潜在力量，是极为巨大的。　　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滋长。　　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

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０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中央认为，有一部分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都及时地制定出来，有些政策则规定得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这几年来，一些过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在这里着重地谈到过去四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研究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清楚错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地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这不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党，表明我们党一贯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而且也表明我们党对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争取新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早已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农村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一九六０年冬季，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在农村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拟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普遍试行，时间并不很久，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虽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农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情况的这种逐渐好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目前许多困难的克服，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六一年秋季，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继续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同志几年来多次指出，计划工作没有做好，指标过高，变动过多。他要求，必须落实，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一九六０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可惜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没有具体执行。一九六一年五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七月间，中央根据许多调查研究的材料，根据这儿年来的工作经验，拟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中央指出了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切实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提出了调整工业指标的具体方案。这两个文件，经过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的讨论，已经正式下达。　　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关于

精减职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著。　　在商业方面，一年多来，中央作出了一些关于调整商业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一九六 0 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规定草案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稳定市场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半年来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根据调查研究的一些材料，中央正在草拟商业工作条例初步草案，过些时候将要发到全国试行。　　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目前农业生产的底子还很薄，能够拿出来支援工业和供应城市的东西还不能很多。工业总产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市场的供应仍然很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一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加重了。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　　这里要指出，由于农业减产，一九六一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五百二十多万吨（一百零五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们还需要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粮食。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要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或者进口一千七百万吨化学肥料。同志们，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把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粮食方面，我们就不能进口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种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妨碍极大，必须迅速改变过来。　　中央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

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必须看到，我们完全有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十二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创造了相当强大的物质条件，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

基本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经验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在最近几年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错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但是，永远不犯错误，完全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设想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功往往是要经过许多挫折的，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们的建设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我们学会建设工作的学费。　　我们能不能在取得建设工作的经验方面，比取得革命经验少花费一些代价呢？应该说是能够的。问题在于我们全党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过去十二年中，特别是过去四年中，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经验。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

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经验，是很可宝贵的。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现在的同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重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同时，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韵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　　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马

克思列宁主义历来反对所谓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决不能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团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任何部门、地方或者企业，如果违反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自由地处理供、产、销的问题，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积累，但是，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积累恰当，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积累过多，反而会妨害生产的发展。　　应该在有计划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应该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　　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该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　　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

的，是不可缺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同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专政或者法西斯专政，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把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实践中、在群众的行动中，继续补充、发展或者改正这种意见，并且使正确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统一。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在制定计划、指挥生产、处理产品等方面，同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也迫切地要求统一的党的政策和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人和农民都怕政出多门，怕政策和计划多变，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如果发生了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也就必然同时出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集中统一的现象。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违反他们的愿望。　　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商业，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以外，还应该有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例如：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还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　　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

“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艰苦奋斗几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　　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挂帅，就是党的路线挂帅，党的政策挂帅。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学会精打细算，并且细致地安排具体工作，反对“政治空谈”。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

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根据积累的经验，正在各个方面制定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使全党全民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　　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经验教训，是全党同志应该深刻领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0年六月间向我们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去做。　　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和全体人民群众所期望的那样，鼓足扎扎实实的干劲，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任务

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们要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这个远大目标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央认为，现在拟定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我国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

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　　钢：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二千八百万吨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上列的产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然综合平衡工作，编出确实符合实际的、并且留有余地的计划。　　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指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　　在一九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有些方面还没有很好地进行。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按实际需要说来，已经迟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　　要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发展大牲畜，必须认真保证制造和修配中型农具所需材料的供应。　　第二，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且力争超过。第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尽可能在春耕以前，至迟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减人任务，并且进一步地规定下半年的精减任务。对于减下去的人，应该妥善地加以安排。这是加强农业战线、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必须坚决保证完成。　　第四，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列入国家

计划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一切停建、缓建项目的设备、材料和建筑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妥善保护，不许损坏。　　第五，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第六，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发展城乡交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和正确的物价政策，改善市场状况，努力保证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要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钢材的品种。　　要切实地加强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短途运输工作。　　第八，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　　第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实现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项任务，切实把调整工作做好，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从而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的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少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全国贯彻执行。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十年奋斗目标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可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人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

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作风是互不相容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理会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当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懂得。我们自己不懂得的事情，群众中有许多人是懂得的。就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问题来说，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中所说的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　　很明显，如果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

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办公共食堂，如果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讨论，事情就不会是那样。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着使同志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们准备在后面再逐步地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

　　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怎么会不妨碍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呢？怎么会不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相抵触呢？怎么会不同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相抵触呢？这种错误的做法怎么会不造成分散主义呢？　　分散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对党中央闹独立性，对人民群众、对下级独断专行，压制民主。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我们纠正了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以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对分散主义熟视无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会使我们很难前进。　　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属于分散主义性质的许多混乱现象。　　先说政策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些同志、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采取了不严肃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或者怀疑观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几年来，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　　有的部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在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自作主张。有的在请示、报告的时候，隐瞒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　　有些地方，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实地向下传达，不认真地执行，或者借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有的甚至采取“封锁”的办法，不让下级和群众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中央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发出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

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拟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发出以后，还发生这种情形。再说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这几年，国家计划指标定得过高，而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不向中央和上级报告，在国家计划以外，另立计划，层层加码，甚至把他们自己的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冲击国家计划，这就更加损害了我们的计划经济。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执行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任务，而是分散力量去干计划外的事情，甚至把国家计划丢在一边，用国家计划规定的某些专用物资，去完成它们自定的计划，或者去搞那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楼、馆、堂、所”的建设。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全局的需要，完成国家规定的上调任务，而是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务”；对往上调的物资是层层扣留，对国家分配下来的物资也是层层扣留；有的还擅自挪用应该由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假借“协作”的名义，私相交换；有的甚至少报产量，隐瞒库存，“监守自盗”，“以邻为壑”。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不执行国家计划，不该实际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员。在精减职工的时候，有些单位讨价还价，甚至边减边加，或者明减暗加。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遵守国家的规定，擅自动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去搞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囤积物资，预付货款，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这几年，擅自动用应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生产这些物资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多。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适合情况的计划，并且把国家的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计划、劳动计划、财政计划都搅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０年，这三年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一十七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建设八个鞍钢所需要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建设三十五个长春汽车厂所需要的投资。中央下达的国家计划内的建设项目，本来已经过多，已经不适当，国家计划外的项目又大大地增加，这就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

资效果不能迅速发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些计划外的投资，虽然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是有许多是非必需的，是乱投乱用的。其中用以建设“楼、馆、堂、所”的，就有十七亿五千万元。单是这一笔完全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就相当于建设每年总产量为三百多万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投资。　　一九五八年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当年全国各方面就新增加职工二千零八十二万人。一九五九年国家要求精减职工八百万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万人。一九六0年国家计划规定增加职工二百万人，实际增加了四百八十三万人，在这三年中，工业部门的职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须坚决精减职工，严禁从农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　　在这里，不准备再用其他的材料来说明国家计划被搅乱的情况。同志们从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义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人说现在没有多少分散主义，或者说分散主义并不严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许多分散主义现象的发生，是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关系的。例如，国家规定的生产、基本建设任务过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国家的物资管理制度也不尽合理，这就给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了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许多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想很快实现。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建设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它们在已经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上，又另加新的任务，提出更急的要求。这些地方、这些部门、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许多干部，主观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的建设事业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各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同整体的关系。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妨碍国家统一部署、损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义现象。　　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严重地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斤斤计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这是分散主义产生和滋长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义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散主义，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单位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损害了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义的种种做法，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散主义不

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对于国家干部，在思想上起着腐蚀作用。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会根源，但是，不可否认，也是同分散主义有关的。　　大家看到，由于分散主义，一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衰退了。　　由于分散主义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上下关系和相互关系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竟然在党内要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有意不提关键性的项目，有意少报投资，等到计划批准以后，再要求另立专案，追加投资。这是不能准确地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超出正常讨论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在同志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不说老实话，不交心，怕吃亏，喜欢当“聪明人”，藏一手，不互相照顾困难，常常使一些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下来，得不到合理解决，使工作受到损害。　　总起来说，分散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有下面四条：　　第一，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破坏党的政策，就必然要损害党的统一。　　第二，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　　第四，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　　显然可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从来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列宁总是强调地指出，马克思是主张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需要集中制，是绝对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集中制和纪律，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溶成一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说，如果没有这些，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纪律的

企图，就会变成空谈。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反复强调说，没有严格的集中制，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能够实现这种经济的只有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要建成这样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活动，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说：“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杜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在谈到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伤害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　　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极端民主化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政党不相容。他说：“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对党组织“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党的纪律概括成为四条：（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说：“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　　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地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在全国解放

以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逐步地消灭经济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关系，作了扼要的阐明。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岳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常常说，要力争上游，什么是我们在工作中首先要力争的上游呢？就是要在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力争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力争上游。如果没有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上游是难于争取得到的，即使一时争取到了，也是不巩固的，不能持久的。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在这里。　　同志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历来是维护中央统一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使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他还是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从而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使党中央的领导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又很迅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央不断地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各地方、各部门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分不开的。　　从遵义会议以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局部地区曾经在一个时期发生过错误，但是，由于有了党

中央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这些错误就很快得到纠正，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避免严重的挫折，而不断地胜利前进。只是在那些完全脱离中央的统一领导，向中央闹独立性，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地方，那里的工作才遭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同上而所说的那种完全脱离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路线性质的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分散主义倾向，如果不坚决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需要把几个问题解释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处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中央的许多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地方的和群众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同地方的工作同志共同商量制定出来的。　　一切正确的政策，一切正确的领导，总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违反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中央的集中领导，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从总结群众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主观的臆想出发。　　中央的政策，国家的统一计划，都是要依靠各地方发挥积极性来实现的。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把许多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把应该下放的管理权力放下去，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确地合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永远要做的，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党中央要求地方发挥的积极性，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只要这种集中统一是适当的，就会有利于地方发挥前一种积极性，防止后一种错误的积极性。各地方的积极性，首先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坚决执行国家统一计划的积极性。各地方应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各种

有利条件，精打细算，合理地使用本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好地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实现。就一九六二年来说，各地方发挥积极性，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政策，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求保证完成这个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上调任务；就是要完成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就是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就是要完成各方面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比较快地摆脱目前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的某种被动局面。　　第二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问题。　　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作出某些补充规定，使中央政策更好地同当地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是，应该指出，中央制定政策，是从全局的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中央的政策，既集中体现全局的利益，又照顾局部的利益。因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政策，只能够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加以具体化，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　　中央制定的政策，有的可能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些方面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应该及时地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然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既定的政策。至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在农业的具体工作上，特别是在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命令主义。　　我们说，要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绝对不是否认因时因地制宜，也绝对不是否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和灵活性。把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瞎指挥、命令主义混为一谈，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问题。　　中央对经济、文教事业，一贯地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央集中过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门的权力过大，而且又层层下放，分得过散，在最近几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既不利于更好地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

的领导，也不利于正确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改变最近几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把权力集中起来。首先是要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以便中央从全局出发，统一安排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更有效地克服当前的困难，更快地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下一步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这里所说的把权力集中起来，也包括要把地方和中央管理部门过去下放过多而现在必须集中的权力，逐级地收上来，由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管理部门直接掌握。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从生产任务的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某些物资的分配、劳动力的调度等方面，给各地方、各部门一定的机动余地和调剂权力，以便它们能够解决本地方、本部门的特殊问题，更好地完成国家统一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拿基本建设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应该把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交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地方的这些项目，都必须包括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以内。　　地方计划是国家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定地方计划是实行分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各地方可以、而且应该合理地利用本地方的各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计，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地方，国家应该给以奖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应该拟订合理的奖励办法。　　应该了解，实行分级管理的根本要求，是各级地方和各级管理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所属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认真地管理好。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所有地方，所有管理机关，都必须遵守党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一切农村人民公社中，都必须继续试行和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一切国营工业企业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在一切商业单位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商业工作条例草案。在高等学校中，也必须切实试行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　　总之，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要有统一的政策，全国要有统一的计划。绝对不允许在中央的政策以外，有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也绝对不允许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外，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

有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以后，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才能保证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为了在经济工作方而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央提出以下十项要求：　　第一，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争取超额克成。地方计划必须纳入国家计划。改变计划或者补充计划，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凡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工业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已经下放给地方的，必须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要工业企业，已经下放了的，应该收归省、市、自治区直接管理。　　第三，所有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无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不准有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　　第四，国家规定的生产资料的调出计划，必须切实保证完成，不准留好调坏、七折八扣，甚至占用不调。国家分配的物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规定使用，不准用来干计划规定以外的事情。超产和节约的生产资料，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处理。　　第五，国家规定的生活资料的收购任务和上调任务，除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经过中央批准减免的以外，必须保证完成，不准多留少调。　　第六，国家确定的劳动计划，必须坚决执行。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不许增加人员。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一律不准超过。第七，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准任意变动。由地方、部门规定的产品价格，需要变动的时候，必须报告全国物价委员会批准。　　第八，国家财政预算规定的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完成，支出不许超过。地方的财政预算，不许列赤字，不许先支后收，不许挪用银行资金。　　第九，国家规定的信贷计划和现金管理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流动资金，必须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核定、批准。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企业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现在有些企业的合理亏损，由国家财政开支；企业的积压物资，由国家统一处理。　　第十，国家规定的出口计划，必须如质、如量、如期地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进口计划，不准各地方、各部门擅自变动。国家的进口物资，必须按照中央的规定分配，不许扣留先分、移作他用。　　为了实现中央的集中统一的

领导，需要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及时地提供真实的情况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出切实的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通力合作，帮助中央计划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一致遵守的国家计划。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不许耍策略，藏一手，隐瞒情况，谎报数字。在计划确定以后，都必须严格遵守，保证实现。　　越是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要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和中央的工作部门，必须切实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力求使自己的领导正确，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有一套既有利于中央集中统一、又有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凡是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完全符合或者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　　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加强和改进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各级计划委员会。必须协助党委和政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成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助手。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对于全党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提高觉悟，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分ㄑ散主义的危害性，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无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在检查分散主义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一般地对事不对人、决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对于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就可以不加追究。至于那些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应该对他们严格处理，今后。如果有人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闹分散主义，就必须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加以处理，在党员群众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不要去反对分散主义，只对他们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全局观点的教育，使大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更好地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办事。

三党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明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党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

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民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们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切实改进我们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起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早已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远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　　以下，要说一说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

说过，要调查，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查研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九四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苦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办事。这就是：“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党中央号召，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上面所说的那些忘记实事求是作风的同志，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了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

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应该指出，这几年来在办错事情的干部中间，大量的是属于这类性质。　　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这些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　　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

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群众路线

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这几年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来，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　　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

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全国的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的和各级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工会、青年团体、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工业企业中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这些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主的不同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应该学会经过这些组织来活跃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作出决定以后，要经过这些组织，去动员群众，使大家心情舒畅地、自觉地执行。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同志是做得不好的，是不及格的。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如像我们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做扎根串连工作那样，如像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典型示范、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那样。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许多同志、许多单位，不注意建立经常工作，不注意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热中于突击工作。他们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

把事情办好。但是，实际上，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的一些“大办”，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办”，也往往不是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去进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结果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损失。这一点，应该引为深刻教训。　　毛泽东同志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革命战争是这样，建设工作也应该是这样。　　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当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而且，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健康的群众运动。　　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今后凡是需要开展运动的事情，属于全国性的，必须由中央斟酌情况决定。凡是不准备普遍推广的事情，都不要登报和广播。　　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没有他们的冲天干劲，建设事业中一切伟大成就都不能取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区别什么样的干劲。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也有主观主义的“干劲”。前一种干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后一种“干劲”是不能要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中曾经发生的“瞎指挥风”，正是这种蛮干的表现。有不少的干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干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

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 a 蛮干作风必须反对。对于坚持这种蛮干作风的干部，如果不泼点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如果不泄他们的蛮干之气，就是说，如果不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且制止他们继续蛮干下去，那末，群众的真正的干劲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我们既不要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大家记得，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现在，有不少同志又把农民群众看得非常落后，不敢把政策和任务告诉他们，不敢对他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放弃领导。这种尾巴主义的错误，也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有些地方，在纠正人民公社工作缺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不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工作中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作中也存在，都必须注意切实纠正。　　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不对的。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恰恰必须走群众路线。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有些任务的确比较重，比较困难，但是也必须完成。就拿粮食的征购任务来说，目前农村的底子比较薄，农民的口粮标准相当低，可以拿出来供应城市的商品粮食的确不能很多。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负担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在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如果不能够从农村征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那末，城市和工矿区的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就无法维持。这样，既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并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他们讲清楚，好好地同他们商量，动员他们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同时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当然，领导机关在提出任务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超过了实际可能，要求过急，强制执行，就会使下级干部没有可能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而只有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有时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也无法完成过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走群众路线。这几年工作中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今后应该注意防止的。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

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

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根据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说的一系列的事情，不难看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下级党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情况。在那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某些干部，喜欢自搞一套，自成系统，自成局面，自由行动，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单位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独立王国”，不喜欢中央和上级过问，不尊重和不认真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这种分散主义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　　有一个地方的党组织，曾经写信给中央说，他们要服从上级，但是，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服从了当地上级的规定，就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如果服从了中央的政策，就要违反当地上级的规定。这个党组织要求中央回答，他们应该服从哪一个上级？　　这个党组织提的问题很重要。它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就是因为在那里有一些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相抵触的规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全党都要服从中央。　　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　　在党内生活的问题上，其次要说的是，党委会内部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级党组织必须有坚强的或者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委会成员要维护和帮助这个领导核心。他又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要善于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他特别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

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　　在党委内部，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但是，有些党委，把分工负责变为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而那些“包干”的同志，又往往独断专行。因此，在一个党委内部，形成了一种各自为政、多头领导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下级组织很难办事。　　这几年来，党建立和加强了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取得了成绩。党委领导一切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　　党中央认为，凡是存在上面这些问题的党委，都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整内部的关系，使党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来。　　关于党内生活，这里还要详细地说一下党内民主问题。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地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党内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绝对不能容许继续存在。　　大家知道，在党内斗争问

题上，我们党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党内过火斗争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这就是“惩前修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是，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一方面，这是由于目前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不懂得如何防止或者抵制这种错误；有些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是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或者是不了解下情，没有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全党同志应该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为了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这样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处在建设时期的我们的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列宁提出的原则，把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发扬成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　　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者都应该虚心地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不许压制民主，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组织一直到党的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对于党员的这种反映，都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反映问题，即使所反映的情况同事实的真相还有出入，也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党组织领导人的模范行动，对于开展党内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党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力戒骄傲自满，都必须同普通党员一样，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在党委会内部认真地发扬民主，造成畅所欲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　　为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经常检查和改进它们的工作。近几年来，不论农村或者城市，许多领导机关，都只忙于日常事务，忙于指使基层组织完成一项一项的具体工作，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不管或者管得很少。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从目前党内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有必要向全党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　　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

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的准则。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　　根据党章的规定，任何党员都不准向党说假话，作假报告，欺骗党；任何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员，都不准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任何党组织的负责人员，都不准滥用职权，任意斗争和处罚党员。今后，任何党员如果犯了这类错误，都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还应该依法处理。　　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都不应该对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而要同一切坏人坏事积极地进行斗争。　　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　　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有些地方的党委，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给以正确的领导和积极的支持，而是给以阻碍和限制。也有一些监察委员会，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就放弃职责，不能为维护党的纪律而坚持斗争。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都必须改变。　　正确地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必将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最近，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进行了轮训干部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收到初步成效。应该认识到，轮训干部是当前全党的一件大事。各地方、各部门，都应该毫无例外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把它做好。在干部轮训中，应该着重学习《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可以肯定，这种学习，对于正确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对于发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是会发生良好作用的。　　为

了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适应当前斗争任务的需要，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下列八项要求：（一）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愤图强；（二）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四）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七）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八）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上面所说到的在我们党内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是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觉察到，都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而且有许多是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的。在我们纠正了缺点、错误，改变了那些不正常的情况之后，由于我们不仅有了正面的经验，还有了反面的经验，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中央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正确作风，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奋斗。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全党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随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　　我们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在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以后，就必须确定

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不扎扎实实地做好具体工作，光有雄心壮志，光叫口号，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我们必须出色地完成当前的任务，逐步地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　　同志们：要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全党同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一定能够有成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定能够逐步地实现十年奋斗目标。　　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光辉灿烂！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万岁！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０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

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０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一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

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不再犯了，已缺点和错误的大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部分已经过去了，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

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

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

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间题，也有立场间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间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

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 98 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

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间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间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军事工作。

一、关于党的工作

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　　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化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两、

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但是，这种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　　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电灯，不学一点，能够搞得出来？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

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人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党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党的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有失，而且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所以，从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看来，得少于失，从长期的实际的本质看来，得大于失。　　但是，不管怎么样，目前到底是有困难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我们要严肃地来对待困难，来继续克服这个困难，使情况大大地好转起来。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

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还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面。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而且又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没有解放的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了的人民也就经常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面。帝国主义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帝国主义还统治了十几亿的人口。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才有利于世界人民，才有利于中国人民，才能够巩固我们的胜利。　　修正主义把革命的旗帜放下了。它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替帝国主义帮忙。这就更需要我们高举革命旗帜，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人类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如同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在一切地方都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人类才能翻身。　　我们在国内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应该让我们国家兴隆起来，繁盛起来，富强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中间的尤其根本的任务。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毕竟还没有摆脱穷困。所以，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

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能够过幸福的日子，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白、而是有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穷得很厉害的情况下富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严重的责任，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伟大的、艰巨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富起来？能不能够繁荣，强大起来？我说，完全能够的。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自，有这样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制造大量的机器，劳动力同机器结合，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国家就富起来了，就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第安人（那些人现在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是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一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强，而不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从亚洲来说，日本原来就比中国落后，可是后来几十年就赶上了中国，而且超过了中国。欧洲也是如此。过去英国是强的，法国是强的，德国是落后的，可是德国后来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俄国在欧洲比德国还落后，但是现在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先进一些，无产阶级又比资产阶

级更先进一些。有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把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个国家就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能够由落后转变为先进。我们中国的落后，在过去也是到了顶点了；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就必然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达到极点的时候，就互相转化。这就是一个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们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打了几十年仗的、有战斗经验的党，我们必然能够把我们国家搞得很富很强。　　现在，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从国内的生活上看来，我们国家似乎还不大像样子，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翻过来的，无论在物质上、文化上，我们都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比英国、法国等所有西欧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比这些国家强大得多。这是我们国家的远景。可以肯定，这个远景是会实现的，我们现在的落后状况是会转变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够光荣地站在世界上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只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会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当前、而且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同志们应该认识这个前景，要好好地去干，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二、关于军事工作（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 4 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

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郡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

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于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

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p4 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

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

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现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

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

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

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

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

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

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 1921 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 CC 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的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毛泽东同志最近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望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

《发至县团党委，不登党刊》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

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十三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九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

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1〕——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记录（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

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　　龙胜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同去年相比，有较为显著的好转。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点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实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的并没有那样多。那是因为界线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据这次分析，目前龙胜全县的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这个估计极其粗略，还有待于地委、县委进一步调查，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谨慎的估计。　　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　　目前龙胜县出现的生产管理形式很多，大致有以下五种：第一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这是它的主要特点所在。责任到人的具体内容是：各段农活分段包给社员个人，分段验收，分段评奖，管理得好的，可以连续包工，特别是从插秧以后到收割以前的这一段田间管理工作，更须事先按每一田块确定质量要求和工分数量，实行包工到人或组，实行评奖评罚的严格的责任制。这是搞好生

产队经营管理十分重要的一着。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它的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品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第二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一种是几年来的老办法，好处是集体抓得紧。它的缺点是：天天派工，天天喊工、等工、评工，不仅十分繁琐，而且窝工严重；又由于责任不明，农活质量没有保证，群众对这种办法一般很不满意，认为再这样搞下去，生产肯定搞不好。看来这种办法必须积极子以改进。　　第三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办法是按田块确定工分数量，包给个人，有的不联系产量，有的联系产量。联系产量的又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超产部分奖工分，产品全部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一种是包产部分归队，超产部分全部归己或与队分成，群众叫做“吃尾巴”，全吃或吃一部分。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原来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干部指导思想明确，领导比较强、工作比较好的，应当说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不过它的劳力固定得太死，不能统一调配；又由于定产到田，尤其是那些超产全部归己的，如果干部指导思想不明确，就很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所以，目前在名义上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　　第四种，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第五种，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按人口或按基本口粮分田，劳力和肥料完全不统一调配，各种各收，各自完成征购任务。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　　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细分起来，还可以多分为几种。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对第三种形式的判断，尤其要慎重。如上所述，采取第三种形式的，从实质上看，有的可能基本上是集体经济，有的可能基本上是变相单干。如果判断错了，把基本上变相单干的当成集体经济，混淆了界线，

显然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把基本上是集体经济的当成了单干，也会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样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　　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对于我们估计形势、确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具体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从龙胜的情况看，界线不清是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什么叫集体所有，什么叫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什么叫集体分配，这三条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看来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的应当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集体去干。生产队应当因活派人，因人派活，根据农活需要和各人的特长，适合集体操作的集体操作，适合一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适合张三的张三干，适合李四的李四干；看牛的可以不下田，做这件事的不一定还要做那件事。合理分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单干不可能分工，集体有可能分工；集体优越于单干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此。只有这样合理分工，集体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并且避免由于每个劳动力都管田而可能发生的弊病。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上述四条原则，生产队必须抓紧如下六点：　　1。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2。农业和副业统一制订生产计划，统一安排生产；　　3。统一调配劳动力；　　4。统一规定社员交肥任务，归集体所有的肥料由生产队集中掌握，统一合理使用；　　5。统一收割，统一分配；6。适当照顾困难户和五保户。　　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　　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目前也还是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艰苦的工作，树立榜样，说服农民自愿跟我们走。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当然各级领导态度必须十分明确和坚定，“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农民利益，农民一定会跟我们走。但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残存着一定数量的单于户，比如说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是并不可怕的。　　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坚持集体经济的，要尽全力帮助他们逐步办好。对兼有两

种因素的，要诱导他们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克服单干因素。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同时必须讲清楚：土地和已经入社的耕牛、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私分了的，政府决不承认；并且严禁买卖，私自买卖土地和其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犯法的。总之，只可以通过耐心的教育和具体的范例去诱导，而不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硬性地去“纠”去“扭”。单干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要走这条路，并且这条路在一部分贫下中农中还保有一定的影响之外；我们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的是由于经营管理太乱；有的是由于领导力量薄弱，或者干部作风不好；有的是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确实完成不了，干部没有办法，就采取消极态度，把田地和任务一起分了。因此，还必须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逐步把问题解决。特别是对其中的贫下中农，要耐心，要诚恳，不要歧视，不要伤感情，不要使情绪对立起来。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到开除出党。　　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有一系列的工作必须逐步做好，就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都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克服了“共产风”，调整了征购任务以后，搞好经营管理就成为巩固集体经济的关键。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一些，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的，从而提供了搞好经营管理的充分可能性。但是决不能认为，一经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好集体经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应当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总结当地行之有效的经验，逐步摸出一套比较好的经营管理办法来，把集体生产搞好。丝毫不必讳言，集体和单干，是在进行着竞赛，只有在生产和生活上赛过单干户，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最后巩固。当然，要一下子把所有坚持集体经营的生

产队都办好，是不容易的。两条道路的这种竞赛，也不是三两年所能结束的。但是从现在起，每个公社都必须下功夫认真搞好一批生产队，真正树立榜样。这样就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发生巨大的吸引力。否则，不但已经单干的不能扭转过来，就是现在还坚持集体经营的某些生产队，也还有可能散掉，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至七日，陶铸和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听取了汇报；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七日晚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座谈的中心是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这是座谈会的记录。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谢富治、谷牧、罗瑞卿、陈毅、杨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

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

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〇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

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

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

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

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贯彻执行；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生活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严格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现象进行斗争，决定：　　一、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由本次中央全体会议进行补选。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和县、自治县、市的监察委员会，亦应当在最近期间，依照党章第五十二条的选举手续，进行补选或改选。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当多数是专职的。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当予以加强。　　二、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定期讨论党的监察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监察组的任务是：经常了解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所在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纪，共产主义道德，国家法律、法令，执行中央的政策、决议的

情况；并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直接检查或者协助所在部门的党组织检查所属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　　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监察组长，列席所在部门党组（党委）的会议；工作需要时，商同所在部门的党组（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门党组（党委）对监察组的工作，应当予以支持。　　各省、宁、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或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　　四、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全体监察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坚决地保护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及时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情况；都必须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和请示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一）从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熟悉情况和进行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主要的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工作，也会带来某些缺陷。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有计划的交流。这就是说，对全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二）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具体地说，中央一级机关的委、部、司、局的正副领导者，中央局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和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常委、部长和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和厅局长，省级以上主要人民团体的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地（市、州）委的书记、

副书记和专员（市长、州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都应当列入交流的范围。　　党外人士、一般的人民团体的干部、有专门业务技术特长的干部和不担任上述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一般不列入交流的范围。　　（三）交流干部的工作，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列入上述范围的干部，在今后一年以内，可以首先交流一批。为了积累经验，第一批交流的人数不要过多，以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为原则。以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常性的交流工作。　　第一批交流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中，应当有中央到地方和地方到中央的，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的，这个省到那个省的，这个专区到那个专区的，这个县到那个县的。　　（四）上述中央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大区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地（市、州）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大区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　　（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当做出交流干部的计划。中央一级机关的干部交流计划，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商同管理干部的各部拟定。第一批交流干部的计划，应当在今年年底以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以后，每一、二年都要制定一次计划。　　大中企业和高等学校中的党员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另行制定。（六）在交流干部的时候，要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不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一个单位中调出过多的领导干部，使工作受到影响。对于一些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和部门，应当通过交流充实起来。对于领导干部人数过多的地区和部门，应当多调出或多下放一些干部。对每一个干部的工作，都要进行妥善的安排。干部的职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可以同原来的职位相当，也可以低于原来的职位；但是，工资级别不要降低。对于少数民族干部，一般在本民族地区内进行交流。　　在交流工作中，必须严格地按照干部管理制度办事。无论免除原职或者任命新职，都必须报告中央或主管党委批准。由选举产生的干部，还应当注意按选举程序办事。　　（七）人民解放军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军委参照上述各点，另行制定，报告中央批准施行。　　（八）人民公社主要干部的交流问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新的条件下，具体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党中央将继续具体地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工业问题，一个是商业问题。除了工业问题准备另作决定以外，党中央对于商业工作问题，现作如下的决定。

一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组织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辛勤劳动，对于农村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着使我们的商业工作更好地前进，党中央认为，需要总结十多年来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更系统地说明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当然也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发展经济，主要地就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这里所说的保障供给，就是要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还要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城乡全体居民生活资料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如果离开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基本出发点，孤立地看待商业，是不能解决商业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还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里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在商业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毫无疑问，商业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是不能没有这种桥梁的。但是，应该怎样搭好这种桥梁呢？应该怎样解决

商业的问题呢？有一些同志，只是在商业问题上打圈子。他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观点。　　党中央认为，这种单纯商业观点，很需要改正。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根本观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是否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是否组织好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这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　　对于商业来说，生产是处在支配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得不好，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如果认为商业工作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巩固，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忽视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所能够起的作用，认为商业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改进我们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要遵循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遵循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的，农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的这一指示，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商业工作的第一位。这就是说，我们商业工作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在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的商业工作要切实面向农村，切实做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工作，做好城市中的供应工作。看不见我国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这个最广阔的市场组织起来，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就会使我们的商业工作迷失方向，也会使我们的工业工作迷失方向，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迷失方向。　　我们的商业工作必须认真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地调整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关系，通过商业工作，更好地调动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依靠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商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指示。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看到，我

们在商业方面同私商的投机倒把作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将还是长期的。特别是在农村中，那里的商业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投机商贩就会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斗争。对于商业战线上的这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是很熟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善于利用商业这一环节，促进工农业生产，组织消费品的供应，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商业战线，同农业战线、工业战线紧紧地结合起来，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继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

农业和工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互相促进．这种互相促进，在许多方面，是要通过商业来实现的。　　商业工作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农民供应东西、向农民收购东西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商业部门在向农民供应东西这一个方面，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善于向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类货源。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主要包括普通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药、良种、耕畜等等。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门的供应系统，来组织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要改进供应的方法，认真地研究各个地方农业的特点和具体需要。生产资料的品种和规格都要对路，质量要好，价格要适当，供应要及时。　　商业部门除了要组织供应农业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还要根据商业部门本身的条件，协助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逐步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以便使我们的农业能够比较迅速地扩大再生产。　　由于农业的新式技术设备，一时还不能增加很多，目前只能重点使用，因此，用竹、木、铁、皮革等制造的中小农具，对一般农业地区来说，在相当时期内，还有普遍的重大作用。农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供应这类农具。商业部门应该积极地同工业部门，特别同手工业部门配合，来满足农民的这种需要。　　为着逐步满足农村对耕畜的需要，商业部门应该根据各个地区耕畜的流转习惯，积极发展耕畜的交换，组织耕畜的调剂，促进耕畜的繁殖。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应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片面地以赢利为目的。商业部门要协同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运销费用，要以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生产单位。凡是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价格过高，不利于

农业生产，应该适当地降低价格。　　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以外，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消费资料，凡是适合农民需要的，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农村，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农民需要而比较缺少的商品，商业部门就要向计划部门和有关的生产部门提出要求，以便采取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生产，逐步地保证供应。　　在向集体经济单位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同他们协商，分别不同的品种，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规定合理的收购任务。对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使农民承担得起，不要收购过头。这就是说，我们要兼顾国家和农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照顾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另方面，要给农民留有余地。　　农副产品的收购，分别采取统购、派购和议购的办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是一种长期性的政策。国家对一部分农副产品实行派购，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暂时性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的增加，应该逐步缩小派购的范围。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商品交换，不论统购、派购、议购，一般地都应该采用合同的形式。通过统购合同、派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来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可以使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有计划地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使国家更有计划地安排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把国家的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计划紧密地衔接起来。　　目前国家对于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实行供应一定比例的工业品的办法，这是必要的，农民是欢迎的。这是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在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应该十分注意扶助集体经济，发展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并且根据工业品的供应情况，使那些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和集体经济单位，得到较多的工业品。　　（1）商品粮食的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工业品，经济作物区还应该得到必要的粮食。　　（2）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工业品，要受到适当的优待，使集体经济单位从国家得到的工业品，逐年增加。　　（3）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粮、棉、油等产品的时候，从国家换得的工业品，应该适当地高于其它农副产品所换得的工业品。　　（4）农作物的产量高、商品率高的集体经济单位，应该优先得到工业品的供应，并且使他们能够维持较高的口粮标准.　　（5）供

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应该是当地农民乐于接受的，不能强行推销，强迫搭配。　　实行这些办法，会促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促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也将有利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步地走向合理，逐步地走向等价交换。　　为了发展城乡商品交换，不但需要有计划地增产大量合用的农业生产资料，而且需要增产大量的轻工业品。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商业工作部门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棉花生产的迅速增长．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增产了，就可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因而商业部门也就有可能给农民提供更多的棉织品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商业部门同国营农场进行交换，也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以利于国营农场生产的发展。

三

我们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　　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商业部门要注意下列各项工作，以保障工业的正常生产和促进工业的发展。　　（1）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地得到价格适当，规格合用、质量优良的原料、材料的供应，同各个工业生产单位逐步建立固定的供应关系，根据国家计划，订立合同。　　（2）协助农业部门和有关工业部门，扶植那些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并且要逐步建立这类新的基地。　　（3）对于可以用作工业原料材料的农副产品，特别是可以制作中小农具的原料、材料（如竹、小杂木、藤、柳条、荆条，等等），商业部门，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应该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收购，促进生产。　　（4）对于生产先进的企业，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的工业部门优先供应他们质量好、数量多的原料、材料，以鼓励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5）对城市工人、职员的生活资料，应该做好供应工作。要特别关心和保证高温、高寒、高空、井下、野外、海洋作业的工人的特殊需要。　　商业部门在做好上述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注意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以利进一步地扩大市场，繁荣经济。　　对于日用工业品的收购，按照下列的规定办理：　　（1）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出产的日用工业品，大部分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一部分由供销合作社收购。　　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收购产品，都要签订合同（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双方按照合同办事。　　（2）

商业部门在订货的时候，对于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单位，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条件，以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改革。　　（3）有些日用工业品的新品种，经过适当的批准手续，生产单位可以自行试销，或者委托零售商店代销。　　（4）有些手工业产品，可以允许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5）商业企业，特别是批发单位，要有必要的季节储备，以利于调剂市场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商业部门在收购工业品的时候，要加强商品检验工作。商业部门供应各工业部门的原料、材料，各工业部门供应商业部门的商品，都应该是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对于不能使用的原料、材料和没有销路的产品，双方都可以拒绝接收。　　商业部门应该充分地了解各地方、各季节的市场情况，及时地、具体地向工业部门反映，以便工业部门根据市场的要求，安排生产计划，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应该密切协作，互相监督，以利于发展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四

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一、国营商业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　　国营商业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领导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进行商业的管理工作，并且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进一步地改造小商小贩，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　　国营商业要掌握主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商品的批发贸易，合理分配商品，同时，由供销合作社分担一部分批发业务。这样，社会主义商业就能够稳定地掌握全国的市场，稳定地掌握农村市场，保证计划市场的支配作用，而利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国营商业应该根据各地区社会购买力的大小，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照顾对外贸易的需要，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照顾各地区历史形成的消费习惯，全面安排，适当分配自己掌握的商品。　　为着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国内统一的市场，国营商业，按照行业系统，按照需要，分别地建立和健全各种商业的专业公司。　　在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相互之间，在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要实行计划分配商品和选购商品相结合的制度。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数量多少，更重要的，是注意质量的好坏。反对硬性摊派和好坏搭配的办法。　　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应该定期召集有关的零售单位和

消费单位举行会议，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在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应该邀请有关的生产部门参加。　　国营商业的零售企业，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根据消费者的合理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二、合作社商业　　我国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同这种生产制度相适应，应该存在着合作社商业。这是国营商业以外的社会主义商业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否认合作社商业的必要性，不充分发挥合作社商业的应有作用，是错误的。　　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做好城乡间、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工作，做好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　　供销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必须把国家委托的购销业务放在第一位，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产品收购计划，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供销合作社应该积极地适当地开展自营业务。自营业务的具体作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例如直接到生产队实行议价收购、实物换购、代购代销等等。　　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就可以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这对于投机倒把，对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种有力的打击。　　供销合作社应该在城市中建立货栈，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同时，收购一部分工业品下乡。在城市的企业、学校、机关中，可以建立消费合作社，或者受国营商业的领导，或者受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供销合作社货栈批发的商品，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销售，也可以通过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销售，也可以自设推销机构。　　供销合作社要同手工业合作社密切协作，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供销合作社收购和供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支援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产品，除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和一小部分由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的以外，都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推销。　　农产原料，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供销合作社可以议价收购，交给工业企业或手工业企业制造成品，在市场上出售.　　供销合作社应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经营作风。要恢复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布帐目，分给社员应得的红利。　　各部门应该积极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在商品分配方面，工业、手工业部门在商品供应方面，银行在贷款方面，税收部门在税率方面，交通运输部门在组织运输方面，都应该积极予以支持。

三、集市贸易　　在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　　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当然，集市贸易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针对着集市贸易这种两重性，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这个要求，要有正确的经济措施，又要有正确的行政管理办法。　　（1）在经济措施方面，主要的是让供销合作社积极参加集市贸易，展开自营业务，通过购销活动，吞吐商品，平抑物价。　　（2）集市贸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合理议定。为着购销双方的方便，供销合作社可以在集市上设立交易所。　　（3）国家不进行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不同品种，允许或者不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把剩余部分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属于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严格禁止私商插手经营。　　（4）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转手买卖，反对弃农经商。　　（5）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加强对于城乡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商贩的领导和管理，适当安排他们的业务和生活，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制止他们的投机为。　　（6）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要对小商小贩进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指定活动地点，规定合理的税收。　　（7）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织集市贸易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

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大统一的国内市场。　　全国的商业工作，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容许有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方针政策，不容许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为着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问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1）全国重要的商品，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中央的有关经济部门，根据统

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同各地方的有关部门，商议拟定。　　（2）工业所需要的重要农产原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按照这个决定第三章的规定，对这些原料的供应，要根据国家计划，特别照顾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和先进工业地区。有些农产原料，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留一个适当部分，照顾出产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　　（3）国营工业出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对于商品的供应，也要按照国家计划，适当照顾那些提供粮食、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有些工业产品，也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适当照顾出产这些产品较多的地区。　　（4）对于次要商品，中央商业部门一般不规定具体品种的调拨计划，只规定调拨商品的价格总额。　（5）由中央划归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商品，在必要的时候，中央也可以同地方协商，调拨一部分。　　（6）全国重要商品的价格，由全国物价委员会会同中央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质量、品种、地区、季节的差别，分别做出规定。次要商品的价格，由各地方物价委员会会同地方的有关部门规定。各经济部门在物价方面发生争议的时候，由物价委员会进行仲裁。　　（7）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基层供销合作社一般应该按集镇设置，有些地方，也可以按公社设置。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批发机构，应该按经济区域设置，不按行政区域设置。　　基层商店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商业计划，直接向生产单位进货。　　（8）大中城市的商业，由市一级的商业领导机构，分别行业，统一管理，不得按行政区界，分割市场。市内区一级的商业机构只领导那些分散的、小型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　　（9）逐步恢复城市同乡村之间、地区同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改变地区同地区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那些不合理的分割市场的现象.凡是国家允许供销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的商品，都可以在省同省、专区同专区、县同县之间，相互流通，不能加以阻碍.　　中央认为，采取上述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的分级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

六

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中央历来坚持的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总是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即使遇到某些暂时困难的时候，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同消费的矛盾，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根本上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矛盾，是由于财富不断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造成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需要不断增长而生产赶不上需要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是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而消费不能不在一定时候受到某些制约的矛盾，也就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还有，国家机关在计划工作和价格政策等方面也会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而结果也常常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可以经过不断调整而逐步解决的。这种矛盾在各个时期，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它不断解决，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　　前些时候，在我们这里，由于物资不足，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曾经一度比较突出。因此，党中央从一九六 0 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在农业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规定了一套具体政策，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具体政策，进一步地丰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成效。特别是“农业六十条”，成效更为显著．农业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由于农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上升，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和城乡市场状况，也有了新的改善。在已经取得的新成就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根据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采取了调整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加强财政金融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也很明显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由于物资不足，在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生产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党的政策是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于物价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分批分期地、慎重地进行调整。　　（1）城市居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　　（2）次要的日用工业品和次要的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有关部门要反复研究，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提出方案，由国家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　　（3）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应该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流通费用，避免产品涨价。过去提价不合理的，应该适当降低。　　（4）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增加生产，保证供应。这类生产资料的价格，应该是集体经济和农民能够接受的。如果因为降价而使生产单位发生亏损，可以由国家适当补贴，以利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生产。　　（5）经过供销合作社参加集市贸易的活动，逐步压低小商、小贩的贩卖价格，使集市贸易的价格同计划市场的价格逐步地接近起来.　　（6）继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信用，对于稳定市场、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在国民经济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合理地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地、有计划地缩小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的范围。　　党中央认为，采取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是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将使我们可能有计划地、逐渐地、因势利导地、比较自然地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改变目前存在着的某些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的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七

一切商业部门，包括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都应该根据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商品损耗，减少经营环节，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以便为市场提供比较便宜的商品，为国家提供比较多的积累。　　中央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整套关于商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制度，目前要特别注意以下几项：　　（1）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健全财务制度，节约费用开支，杜绝浪费现象．反对不计成本、不问盈亏的错误思想。帐簿报表必须确实，不得弄虚作假。所有企业销毁帐簿必须经过法定手续，不得自行销毁。　　（2）取消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商业计划制度和商业管理体

制中不利于减少经营环节的某些规定，应该逐步加以改变。　　（3）商品流转应该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路线，避免迂回运输。从产地到销地的传统的直达运枪路线，跨县、跨专区、跨省的合理的供应方法，都应该逐步加以恢复。　　（4）改善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特别要注意改善鲜活商品和易腐商品的保管维护，减少霉烂损失。在价格体制上，应该给予各级商业企业必要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把残次商品和可能在短期内腐坏的商品削价出售。　　（5）在进一步加强职工政治教育的同时，应该很好地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他们的健康。　　（6）改进商业部门现行的工资制度，有的可以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有的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的办法，以便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7）商业网和销售点的设置、商店的营业时间、商店的营业制度，以及业务的经营方法，都要尽量便利群众。　　（8）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经验、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合理的商业经营方法，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的水平。

八

全国商业部门几百万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的，许多人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以来商业人员经过多次抽调，减少了一批政治骨干和熟练人员。当前许多地方的国营商业单位和供销合作社存在着机构弱、骨干少的问题，同目前商业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从各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地整顿和充实商业队伍。为此，必须：　　（1）补充一批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去担任各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县的商业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应当配备相当于县委常委一级的干部担任。过去从商业部门调出去的有经验的骨干人员，要尽可能归队。　　（2）在几年以内有计划地选调一批大学、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和一部分复员军官，到商业部门中来，培养他们成为有比较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业务上比较熟练的商业工作人员。　　（3）有计划地吸收一批优秀的商业工作人员入党入团。　　（4）对于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中服务的、业务上有专长的老商业工作人员，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有益的经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5）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员，要适当地稳定下来，不要轻易调动。　　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党组织在全体商业人员中，要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加强大家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国家财产、甚至多吃多占等类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商品“走后门”，不断地检查和清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在商业人员中，还应当加强关于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知识的教育，加强关于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的教育，提高商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我们的商业企业遍布全国，同工农业生产、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使几百万商业工作人员都能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效地改善商业的经营管理，必须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地方商业工作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依靠地方党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就地确定，就地解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商业工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常进行检查、督促和帮助，并且注意协调商业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把商业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中央还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协助商业部门做好工作。　　为着做好商业工作，各级党委，还必须善于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在群众中，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央号召全体商业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商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特作以下的决定：　　（一）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党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促使我国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集体化。随后，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党中央

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已经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总的说来，我国的杜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全党、全体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议事日程。虽然，我们对于这个任务抓得稍为迟了一些，但是，从现在起，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时地（而不是拖拖踏踏）、有重点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轻率）来正确处理这个任务，再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农民和全国人民群众盼望很久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且，一定能够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繁荣起来。　　（二）为此，中央认为：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我们要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是错误的。国家必须拟定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支援农业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部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还有科学技术部门，文化教育部门，这一切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须肯定以农业为基础，而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必须按照全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耕作条件的不同特点，拟出分批分期，分别不同阶段，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靠计划。不论那一个部门，在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同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的科学家实行同志式的合作。农业

技术措施，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一切担负领导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党中央的指示，力戒独断专行，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玩弄行政命令手段，不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埋头苦干，和衷共济，学会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衡量利弊，分别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够脚踏实地，使计划真正切合实际，使措施能够行之有效。　　（三）我国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的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就是说，在我国，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内市场，有极大的潜在力量，能够容纳愈来愈多的大量的轻工业品和重工业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除了轻工业部门要利用农业的原料制造更多的轻工业品，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以外，重工业部门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为农业提供当地当时适用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并且还必须努力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以便增加市场需要的消费品。　　（四）同计划部门和各经济工作部门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相适应，应该重新审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比例。中央认为，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科学研究的投资，在经济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应该有计划地提高。这一部分投资，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比其他部分的投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家的农业投资，都必须合理使用，不许浪费，不许任意花钱。国家的每一分物力、财力，都必须用在适当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为着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对于那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

贴。　　（五）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包括正税和附加税）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摊派。当国家的需要超过征购定额的时候，可以由商业部门，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用协商议价的办法，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采购。在这个问题上，国营农场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便为国家提供多一些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六）学会做生意，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改善现在的商业体制，打破“关卡”，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发展和加强合作商业，并且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在合作商业的积极参预下，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地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用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在这里，价格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着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为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能够逐步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工人阶级要同农民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谊，要彼此互助合作，取得谅解，同时，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并且认真地实行合理的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品种差价、季节差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日益众多的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这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工农业品的交换政策，对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对于较快地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并且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问题。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党的方针，继续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拟出妥善的措施。　　（七）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条件。上述的关于支援农业的政策，关于工业发展方向的政策，关于增加农业投资的政策，关于征购的政策，关于价格政

策，都是为着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动全体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些在国家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政策，都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一次修改。人民公社应该根据这个修改的条例，继续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要贯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条例规定，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人民公社的各种体制、各级规模和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经过群众讨论，确定以后，也长期不变。这些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问题上的政策，也都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条例中规定，必须在集体经济内部，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这也是为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同时，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得到公社批准，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以利于社员养猪，从而为集体经济提供肥料。这种饲料地，应该在保持水土、保护山林和草原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在这里，中央提醒各地方的同志们注意：在工业和其它方面加强对农业支援的时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必须十分注意从自己内部发挥潜力。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护和繁殖牲畜，要尽力增加各种农家肥料。决不能因为等待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而轻视畜力，放松积肥工作。即使在将来有了较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时候，畜力和有机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自愿、示范、互助、互利的原则。必须搞好经营管理。要认真地总结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各种经验，吸取其中为群众能够接受的、简便易行的、良好的办法，改进经营管理工作，正确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来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耕作的质量。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民主办队。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一切耕作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分配问题，都应该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是要向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不得由干部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

必须坚决实行勤俭办社，勤俭办队，公开财政。工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情况，资金的情况，都必须定期向社员公布，由群众评论。任何工作干部，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许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辅导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并加以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同意，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对生产队的领导。人民公社的党委和支部，要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还要懂得怎样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在农民中，在各级干部中，经常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要教育农民和各级干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爱护公共财产。要提高党员和团员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集体经济组织中能够进一步地起模范作用。　　（九）粮食是农业多种经营的基础。集体经济必须认真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烟叶、麻类、糖料、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体经济必须把畜牧业放在重要的地位。集体经济还必须努力发展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各级农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和传统习惯，组织农业的多种经营，以便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产，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并且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　　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和典型示范，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增产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措施。应该加强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应该繁殖和推广良种，指导生产队选留良种。应该生产质量好的农药，防治病虫害。应该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应该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装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要根据本地方有益的经验和习惯，实行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以便保护地力，利于增加生产。　　（十）为着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领导，加强农村中的党的基层工作的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懂得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参加工作。中央要求这些下去的同志，真正当群众的小

学生，同原来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好好合作，全面地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办好集体经济，积累农业知识。对于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应该轮流地进行训练，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央希望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了解，他们所担负的工作，是我国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他们应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实现党所给予的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十一）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要做好这件大事，必须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同时，必须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党章，我们国家的宪法，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在不久以前，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特别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要不断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优越性，就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正确的领导。　　（十二）党中央历来坚持大权统一于中央、小权适当分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中央认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在农业工作上是特别重要的。忽视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千篇一律的措施，就会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农业的技术改革，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合作，而不能各自为政。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违反中央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分散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十分有害的。　　以上十二项，是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决定。这些决定要付之实现，还需要各部门、各地区认真总结经验，就有关政策做出一些更具体的规定。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国家。为了这种目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农村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以后，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领导农民逐步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前几年农业生产下降，是由于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还由于我们工作中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农民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严格地批评了和坚决地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同全体农民在一起努力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去年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好转，而且必将继续有更大的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农业生产中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的新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国农业生产高涨的新阶段，将要到来。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

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三、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管理和组织生产。　　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　　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　　人民公社的监察机关是各级监察委员会。规模较小的生产队，可以只设一个监察员。　　人民公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　　五、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应该由社员民主决定。各级规模大小的确定，都应该对生产有利，对经营管理有利，对团结有利，并且便利群众进行监督。　　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有的是小乡一社，有的是大乡一社。各个公社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生产队的

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六、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区、渔业区、林业区，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另定具体办法。

第二章公社

七、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公社社员的代表，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全公社范围内的重大事情，都应该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不能由管理委员会少数人决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要定期开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　　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　　（二）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不许乱

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　　（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合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十二、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公社所有的山林，一般地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不宜于下放的，仍旧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适合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这些山

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不论是山区、半山区、平原区、沿海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积极地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保持水土，严格禁止乱砍乱伐，毁林开荒。在放牛放羊的时候，不准毁坏幼林。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应该根据山林资源的情况和林木生长的规律，根据国家采伐计划以及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确定每年林木采伐的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对于不在计划之内和不合规格的采伐，经营的单位有权制止。林木的采伐，要有严格的批准制度，凡是违反制度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该受到适当的处分。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制订护林公约，并且还要有管理林木的负责人。护林公约应该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每砍伐一棵树木，至少必须补栽三棵，并且保证成活。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　　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　　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　　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

各级组织应该容许他们串乡经营。　　十五、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在各生产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任务。　　在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以外，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不许另立名目，增加任务。　　十六、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十七、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根本方针，经常检查、帮助生产队做好财务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要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监督他们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合理使用资金，防止贪污浪费。　　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帮助和检查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举办会计训练班，培养和训练会计人员。

第三章生产大队

十八、在保留三级组织的人民公社中，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也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选举。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任期都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都可以随时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罢免。　　十九、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　　（一）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　　（二）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　　（三）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四）管好、用好大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五）经营好大队所有的山林和企业，领导好生产队联营的企业，督促和帮助生产队经营好山林和企业；　　（六）在全大队范围内，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帮助生产队安排好社员生活；　　（七）管理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　　（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做以上各项工作的时候，

应该遵照第二章中有关的那些规定；在处理大队办的企业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第十三条关于社办企业的规定。　　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

第四章生产队

二十、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二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者少占用耕地。　　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向生产队调用劳动力，必须同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商量，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许抽调。　　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原来公社、大队所有的农具、小型农业机械、大牲畜，凡是适合于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应该归生产队所有；不适合于一个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可以仍旧归公社或者大队所有；有些也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联合经营。　　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订立收益分配的合同，或者划归社员所有。　　上面所说的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别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十二、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　　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决定增产措施。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的前提下，生产队经营所得的产品和现金，在全队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产品和现金的分配和处理，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二十三、生产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当地的生产习惯和轮作制度，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和

本队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作物的品种，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制订本队的生产计划。　　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必须发动社员充分讨论、补充、修改，特别要征求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经过社员大会通过。　　生产队的计划确定以后，要组织群众，定期检查，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二十四、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　　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在山区和半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育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采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二十五、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　　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产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二十六、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繁殖耕畜和其他大牲畜，要合理使役大牲畜，特别要注意养好母畜、种畜和幼畜。还要注意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　　集体所有的耕畜，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适当的饲养办法，可以实行个人包养、养用合一；也可以合槽喂养。究竟实行那种办法，由生产队的社员讨论决定。生产队应该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　　生产队应该采用民主推选的

办法，严格选择饲养员。对于有经验的、爱护牲畜的饲养员，应该长期固定，不要轻易调动。对于保护、喂养、使用耕畜和防治耕畜疫病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给以奖励。如果因为管理、饲养或者使用不善造成耕畜死亡，应该由群众研究，弄清责任，给有关人员以适当的处分。　　生产队应该奖励繁殖幼畜。对于繁殖幼畜的有关人员，可以奖励粮食或者现金，也可以采取幼畜分成的办法奖励他们。　　生产队的牲畜，可以拿到牲畜交易市场上出售或者调换。出售牲畜的收人，可以纳入当年分配。　　注意培养兽医，特别是培养民间兽医。及时防治牲畜的各种疫病。　　二十七、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现有农具，并且尽可能地添置新农具。　　生产队要选择责任心强的社员，负责保管农具，并且尽可能做到管用合一。　　生产队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修理农具的工匠，负责修理农具。这些工匠，应该是亦工亦农。　　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有些中型农具也可以由社员自行购置，生产队需要借用的时候，必须征求社员本人的同意，并且付给合理的报酬，损坏了的照赔。　　二十八、生产队应该努力增加肥料，制订全年的积肥计划，组织社员常年积肥。为了多积厩肥，要提倡社员多养家畜、家禽。还要鼓励社员多积土杂肥。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增加绿肥的种植面积。　　生产队应该合理规定社员交售肥料的任务，并且按质论价，付给报酬。肥料的报酬，可以记工分，可以付给粮食和现金。超过规定数量、质量又好的，还应该给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奖励。　　二十九、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要根据生产活动的需要和各人的不同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在规定女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数的时候，要照顾到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生产队还要组织一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并且按劳付酬。　　三十、生产队必须努力提高社员的耕作技术。要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聘请他们当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议。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该给以奖励。　　三十一、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

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给以适当的奖励。对于那些劳动不积极，管理不负责，没有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适当降低劳动报酬，或者给以其他的处分。　　三十二、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应该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订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　　在制订劳动定额的时候，要根据各种劳动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工分标准。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农业、畜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手工业、林业、渔业、盐业、运输业等专业劳动的报酬，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　　生产队制订、调整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不仅要注意到农活的数量，尤其要注意到农活的质量，并且都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生产队在一时还不能推行定额管理的地方，必须搞好评工记分的工作。　　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帐目，要定期公布。　　三十三、生产队有完成国家征购粮食、棉花、油料和派购农副产品的义务。国家在规定生产队的征购、派购任务的时候，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　　国家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向国家交售粮、棉、油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　　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从事经济作物、蔬菜、林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的缺粮生产队，在他们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条件下，应该保证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　　三十四、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必须努力增加生产，节约劳动力和生产费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持少扣多分，从各方

面提高社员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员的收入。　　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取那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社员的口粮，应该在收获以后一次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生产队按照丰歉情况，经过社员大会决定，可以适当留些储备粮，以便备荒防灾，互通有无，有借有还，并对困难户、五保户，加以适当的照顾。生产队储备粮的数目，一般不许超过本生产队在上交国家任务以后的可分配的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一，最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二。丰年的储备可以多些，平年可以少些。生产队的储备粮，由生产队自己保管，生产大队和公社都不许调动。储备粮的使用，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并且规定一套便利于群众监督的适当的管理制度，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三十五、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的数量，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少数经济作物区、林区、城市郊区等收入水平较高的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可以多一些。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生产队，可以少留或者不留公积金。　　公积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基本建设用工和生产用工，要分开计算。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可以规定他每年做一定数目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这种基本建设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每个社员全年基本劳动日数的百分之三左右，超过这个规定的基本建设用工，必须从公积金内发给应得的工资。　　在生产队范围内的，维修渠道和塘堰等小型水利的用工，改良土壤的用工，都可以同生产用工一样记工分，参加当年分配。　　三十六、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　　公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

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生产队应该根据他们的劳动能力，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除此以外，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必要的补助。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的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庭的抚恤，也都从公益金内开支。　　三十七、生产队必须实行勤俭办队。办任何事情，都要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一切财务开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凡是不合规定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支付。一切收支帐目，都要按月向社员公布。属于生产队所有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都要认真保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管粮、管物资、管钱、管帐，都要有人负责。生产队长要经常检查和监督财务工作和物资保管工作，但是不要经管现金和物资。　　三十八、生产队必须实行民主办队，充分发挥社员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事先都应该征求社员的意见，向社员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并且把每一种方案的具体办法向社员说清楚，经过充分讨论，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　　生产队社员大会要定期开会，每月最少开一次。社员大会也可以根据生产和分配工作的需要，根据社员的要求，临时召集。　　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生产队长应该由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农民担任。　　生产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随时罢免。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至少每月向社员大会作一次工作报告。对于全队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开支，库存有多少物资，社员做了多少工分，交售了多少肥料，分配多少粮食和现金等等社员所关心的事情，必须向社员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社员有权查问，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随时听取社员的各种不同意见，既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利工程，妨碍交通。　　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

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六章社员

四十四、人民公社社员，在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公社，不同民族的社员应该互相尊重民族习惯，友爱合作。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保障社员自有的农具、工具等生产资料，保障社员自有的牲畜，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寻根据农业生产的习惯，按照农忙农闲的情况，安排劳动时间，实行放假制度，实行劳逸结合。　　要关心社员的身体健康，保护社员劳动中的安全。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属，应该给予适当的抚恤。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对于参加劳动的少年的身体发育，要加以照顾。女社员在产假期间，生活有困难的，应该酌量给以补贴。　　对于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福利、财务开支等方面，社员有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对于社、队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社员有向任何上级控告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四十五、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　　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不得社员本人同意，不付给合理的租金或代价，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占用社员的房屋。如果因为建设或者其他的需要，必须征用社员的房屋，应该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征用民房的规定，给以补偿，并且对迁移户作妥善的安置。　　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应该在人力、物力等方面，

对于社员修建住宅，给以可能的帮助。社员新建房屋的地点，要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尽可能不占用耕地。　　四十六、人民公社社员都应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公社内必须履行自己一切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　　每一个社员，都必须爱护集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同损害集体经济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每一个社员必须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日，完成规定的交售肥料的任务。　　每一个社员都要爱护国家和社、队的公共财产，积极地保护这些财产不受损害。　　人民公社社员，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七章干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咸少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　　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数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　　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

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民主作用，反对强迫命令。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正确领导，反对放任自流。不许压制民主，不许打击报复。要平等地和群众讨论问题，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能畅所欲言；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社员，只许采用商量的办法，不许采用强制的办法对待，不许乱扣帽子。严禁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发口粮”、乱扣工分和不派农活的办法处罚社员。　　五十、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学习经营管理和生产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且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公社一级的干部，应该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在生产队，参加一定天数的集体劳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劳动还要保证一定的质量。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积极地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一百二十天。　　为了不使生产队的干部因公误工减少收入，应该根据各人担负的工作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分别给以定额补贴或者误工补贴。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　　生产大队半脱离生产干部的生活补贴，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由国家财政开支，或者由生产队补贴他们一定数量的工分。在那些采取后一种办法的地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　　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会，除了负担伙食费和旅费以外，还应该发给他们适当的津贴，生产队不再给他们记工分。　　五十一、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规定手续的，一律无效。

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

五十二、生产队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都受公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公社监察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工作，中央监察机关可以直接过问。　　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是：　　（一）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是不是违反本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　（二）

检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的公民权利和社员权利，有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三）检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企业、集体福利事实的现金和实物的收支帐目；检查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　　（四）检查徇私舞弊、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五）受理社员的控告、检举和申诉；　　（六)可以参加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七）向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别的组织和人员提出质问，受质问的单位和人员必须负责及时答复；　　（八）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专人进行检查和调查，一切有关的单位和人员都有义务提供材料。　　对于性质严重的问题，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应该向上级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直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在工作中遇到阻碍和抗拒的时候，有权报请上级处理，一直报请中央监察机关处理。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担任会计、出纳、保管的人员和社、队的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当监察委员和监察员。

第九章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五十五、人民公社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党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人民公杜各级和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把教育和训练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特别要注意教育和训练生产队的干部。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和研究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生产、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　　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通过各种形式，分别向党员、团员和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

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工农联盟的教育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人民公社。　　在党员、团员中间，要经常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和党章、团章的教育。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经常关心群众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要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领导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真正发挥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人民公杜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民兵武装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老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手中。　　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党的工作无人负责和组织生活涣散的现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要定期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检查党员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公社党委员会和他下面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选举。在选举中，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还要注意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　　吸收党员和处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手续。　　公社党委员会要做好党员的审查工作，严密和纯洁党的组织，严防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　　六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在讨论中间，要使到会的人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认真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党委集体决定以后，各有关党组织和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分头去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三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中

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老挝实现了停战和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全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是对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鼓舞和支持。　　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虽然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是长期的、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仍然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

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０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满意地指出，自从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

在农业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这是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已经产生积极的效果。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少的手工业产品以及某些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成本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在商业工作方面也有新的改进，市场供应的情况比以前好了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

速地好起来。　　我国人民一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即使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是一支坚强而可靠的人民军队。我国还有广大的英勇的民兵。它们很好地执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劳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荣任务。它们随时都在警惕地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保卫社会秩序，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　　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但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外的一切走狗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不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狰狞的嘴脸，而且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人民坚决地粉碎了并且将继续粉碎他们的任何窜犯、挑衅、侵略和在国内党内搞颠覆活动等等阴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

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　　在工业方面，首先必须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　　在商业方面，要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去年和今年我们生产的物资已经有所增长，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生产的物资仍然是不够的，仍然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同时，全国城乡人民必须注意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注意节约，注意保留一定的储备，以便逐步富裕起来，并且为天灾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需要而有所准备。　　八届

十中全会深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伟大的新高涨时期。　　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是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其中“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公报草稿时加写的。在这次会议和此前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

2011 年 7 月 12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2）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　　对四个文件的批示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针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情、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对东北和河南两件报告的批示

宋鬃同志报告一分，河南省委报告一分，都可以供各地同志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的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鬃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

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作不完，可以在下半年作。同年作不完，可以在明年作。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是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竖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而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没有一例外也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真正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是有，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

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须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方法，来的力量大。

一个坚决把运动搞起来，一个怕搞乱了。

（鬃同志讲：我懂主席心情，第一要搞，第二要搞好。经常向主席反映情况，得到主席指示，不要搞乱了。）

三个伟大革命斗争，不搞好不行，定要搞好。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中央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

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服教育。照理说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实际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多，证据说比较少。

你们有机会去一个区搞十几天（我们说：没有），你们下去干部是否很紧张，熟

了就不很紧张，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划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搞，人民内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纲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誉。

（众议：有地方走过场，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不是……。

（大家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厦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没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没准备，兵没练好，不要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像解放战争时来打仗，辽沈战役、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像皖南事变那样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

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那里下乡工作，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

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外国有一种说法：他们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

以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尚未成功”这是孙中山的

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只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要批评，要洗手洗澡，还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些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讲社史、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农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步骤是什么？就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分地区地进行。一个县之内，也要分期、分批进行。要注意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允许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开始训练县级干部，再训练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然后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试点很重要，各地都要搞试点，经过试点把情况弄清楚。有的同志，开始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不大相信？后来他去试点以后，就相信了，相信了就

抓起来了。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要有点“紧张”，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就要搞我们这一套。贫、下中农心情不舒畅（此处遗漏了一段）才能出现真正的心情舒畅的局面。

当然也不要急躁，不要蛮干。过去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的地方，要从搞得不深的实际情况出发，要跳起来，一哄而起。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准备好了再打。没有试点，情况不明，或者兵没有练好，干部和贫、下中农没有训练好，就不要急急忙忙的、大规模地开展运动。对干部要着重说服教育，口头说不服的，就用事实材料去说服。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去领导运动，不会打仗的人，不要他当指挥官。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例如，过去有些一类社、队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完全采取现在这一套办法来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着的，在一类社、队，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考验，干部好不好，行不行，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考验。只要我们分期、分批、分地区去搞，经过试点，认真对待，再加上保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大毛病是可以避免的。

三、关于四清问题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1962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1952年搞“三反”、“五反”，是在城市。在农村，1957年搞了一次全民整风，但不是用现在这个方法搞的。合作化以来，农村中的现金、工分、财物、仓库就没有清理过，没有向社员全面公布账目。“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四清”能搞出来。

进行“四清”方法要对，要采取扎根串连，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有些干部不听领导的话，他们却不能不听群众的话，把群众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打击极少数严重贪污盗窃分子。有些人坦白了，退赔了，就可以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要使多数洗温水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四清”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不退群众不允许，太挖苦了，有些干部过不去，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们的。对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方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判；一方面组织专门小组清理账目，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要严防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骂人和任何变相的体罚。已经搞过的要复查。凡是搞得不好，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四、关于组织贫、下中农革命的阶级队伍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的问题。（翻印者注：上文与下文联系起来看，这里一定遗漏了一段，请读者注意），因为那时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没有阶级差别了，总还有左、中、右。

在农村中依靠谁？

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左右。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我们要同地、富、反、坏作斗争，就要团结大多数，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要多数，还是少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牛鬼蛇神专政？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一些农村干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听话，中农好办，贫农糊涂。”其实，地主是要你听他的话，县社干部都不注意听贫农的话，那么贫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依靠贫农、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都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依靠贫、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贫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组织起来了。

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先组织两三户，以后四、五户，有十一、二户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要像滚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一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由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任，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剥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

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一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是个好榜样。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分期分批，使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劳动。比如一百个支部，第一年先有三分之一参加劳动，第二年又有三分之一，就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这样声势就大了，其他的人就要参加进去了。

有些劳动模范现在不参加劳动了，不参加劳动，还作什么模范？不能参加劳动，理由无非是怕耽误工作，会议太多。公社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减少开会。一个县，每年只开一、两次三级干部会议就够了。必须开的会要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

六、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哪有马克思主义？浙江省清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里去了。那里人民开头不赞成冬水田，经过试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贫农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礼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比如走路，像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的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要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的情况就不

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不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也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同志是不知道的，对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些同志就更糊涂了，但是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比如农民认为地主是人，是剥削压迫他们的人。人、地主是两个概念，农民把这两个概念联结起来，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说：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这种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一定识字才懂得，所以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那样年青的同志就懂得一点哲学。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农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节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匡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据五月七日、八日、十一日谈话插话归纳为四大问题）

一、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

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而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鬃、鬃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

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雪峰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灏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1．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人家族的。

2．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4、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5．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四、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鬆）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

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鬆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做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

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一）形势问题。

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後，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调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

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

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鼓励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是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後，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後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负责，这些都办不到。所以，湖南的同志说：“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教育的方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以及中央现在作出的这个决定，

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在十中全会以後，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後，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例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阶级队伍就能很快组织起来。

根据河南的经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上可以采用一下的步骤：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办法，是正确的。河南的经验，还后东北的经验，均见二十个附件中。关于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各地方也都有一批成功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且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湖南农民说得对：“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他们又说得对：“这几年没有贫下中农的组织，就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

河北省从一九六〇年整风整社运动以後两年间，陆续建立其一大批贫下中农的

组织。在十中全会以後，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又正在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

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同地、富、反、坏分子有勾结的人，除了真正坦白交代、洗手洗澡，并且经过贫农、下中农群众讨论，认为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但是，也不得借故把那些在生活细节上有点毛病的贫农、下中农关在门外。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组织的纯洁性，又要注意它的群众性。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贫下中农的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致妨碍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贫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一律不补贴工分。

（八）“四清”问题。

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保定地委的报告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预防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

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

保定地委叫四清，也有的地方叫三清、五清、六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不论叫几清，但农民最关心的是清账目、清工分。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对于账目、工分，或者一直没有清理，或者敷衍了事。

现在，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人。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只要说清楚了，群众是不会做得过分的。

对于一切手脚不干净的党内外干部，这一次“四清”，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至蜕化变质？这是一个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要使他们知道四清是非清不可的，被迫清不如自动清，迟清不如早清，不要企图侥幸。

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

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

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一面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盗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这个运动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已经搞过的，要进行复查。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把这几项工作领导好，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监察、改进领导和作风，手脚不干净的，要首先洗手洗澡，卸掉包袱，端正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在县一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有效地领导好这几项重大工作。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要有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

支部书记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那些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基层干部，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

山西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这些话说得很对。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除了支部书记应当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还要教育公社各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为了保证支部书记每年能够有必要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必须切实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凡是不必要开的会，一律不开，必需开的会，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在干部中交换意见，进行酝酿，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或者到地边、田边去开。这样，既能减少会议次数和缩短会议时间，又能真正解决问题。县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县社以上干部也要坚持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坚持参加劳动的报告，中央已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批转了。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这样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

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几年来，党中央重新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有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蹲下来，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这样，也就迅速地改善了工作，并且大踏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上面说的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这十个问题，就是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办好公社的可靠的道路。这十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请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去研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

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同志团结起来！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批示鬆在农村蹲点至少五个月

（写在中央工作会议简报李雪峰同志发言上面）

此件送鬆一阅，阅后退我。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接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相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

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今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今年六月以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准备工作：一方面，召开了各种干部会议，训练了干部；一方面，进行试点。现在，各地的试点，一部分已经结束，大部分即将结束。各地试点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各地的试点工作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些都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必须解决的问题。下面就是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

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五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　　（１）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这项工作必须认真做好。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有严重问题而没有认真交代和认真检查的人，都不能参加。工作队的成员都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以及中央其他有关文件。　　（２）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情况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这些会议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代表参加。通过这些会议，使大多数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者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主动地“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便初步形成领导队伍。在这些会议上，还要检查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凡是违反了六十条规定的，都要检讨。　　（３）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４）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　　（５）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

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　　（６）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对于群众中那些有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热心做生意、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人，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对于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社员，进行适当的批评。对于一些一贯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给以表扬。（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８）成立贫、下中农组织。　　（９）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　　（１０）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　　（１１）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　　（１２）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改进公社企业和大队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制订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发展生产的规划。　　以上十二项工作，包括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各地情况不同，试点的经验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工作的进行可前可后，有些工作还可以互相穿插、结合进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胜利完成，这是共同的经验。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运动的进行，必须分期分批，在一个地区内应当容许有先有后，参差不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本地区的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一般来说，这次运动在全国农村中彻底完成，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二 、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

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二）领导负责，亲自动手。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只号召、不动手，或者虽然亲自“挂帅”但不亲自“出马”，是不正确的。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领导人员必须随时注意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满足于听汇报、看书面材料，不深入下层，不实地考察，也是不正确的。在整个运动的进程中，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总结经验。这样，才能统筹全局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才能不断地提高干部，不断地加强对运动的指导。　　（三）进行细致的工作，深入地发动群众。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朝”。运动一开始，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干部和群众见面，向他们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中央的政策，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成他们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不论是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四清”，或者开展对敌人斗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工作要做得细致，不能草率从事。必须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些。一般的经验，在一个点，完成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企图在十天半月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难免不出乱子。　　（四）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如果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不去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也是不对的。　　这样做，会造成基层干部同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对立，不利于运动的顺利开展。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至于个别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的社、队，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的社、队，在调查确实，并且经过县委批准以后，应当派得力的工作队下去，撇开那些坏的干部，直接发动和组织贫、下中

农，进行组织整顿，培养积极分子，逐渐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当然，对于这种社、队中的一些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党员和干部，还是应当注意团结他们，一道进行工作。　　（五）在运动中进一步贯彻“六十条”。一切同“六十条”有关的问题，都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决不能把“六十条”丢开，另搞一套。“六十条”贯彻得好坏，应当作为检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得如何的标准之一 。　　（六）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以前，在干部的认识上，往往可能注重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容易忽略生产工作。这两种偏向都应当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 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去。　　（七）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　　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须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面上除了抓紧日常工作以外，还应当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１）以区或者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开会时间十天左右，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提高觉悟，消除顾虑。然后依靠他们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在群众中造成声势。

（２）教育基层干部认识依靠贫、下中农的重大意义。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去推动各项工作。对于生产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贫、下中农，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　　（３）鼓励干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以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求干部结合分配工作，清理工分和帐目，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　　（４）号召干部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好试验田，改进思想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５）继续宣传贯彻“六十条”，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副业生产。

（６）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交代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破坏。对于现行犯要坚决打击，需要组织群众斗争的，必须经过县委批准。　　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也不要求做得像点上那样细致，但是，由于地区广大，又没有工作队的指导、帮助，如果不注意领导，容易出乱子。地方的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大力抓紧面的工作，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动，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预计，经过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后，在面上，可能发现一些情况特别严重、阶级斗争特别尖锐、问题非及时解决不可的社、队。对于这种社、队，应当及时地派工作队下去，把它作为一个点，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是不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百分之六 、七十 。依靠贫、下中农的工作做好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还要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说来，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分清界限，妥善处理。　　（一）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在农民群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极少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思想落后，阶级界限不清，在敌人的欺骗之下，或者做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坏事，或者参与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对于这种人，不可以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给以打击，而是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同阶级敌人坚决决裂。　　（二）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在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一心想个人发财致富，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对于这种思想和行为，必须进行教育和批评。但是，他们是劳动者。一切教育和批

评，都是为了坚定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打击的，决不是这种人，而是为数极少的、经常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牟取暴利、过着寄生生活的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对这类人，应当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依照政策和法律，该补税的补税，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法办的法办。　　（三）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集体经济单位生产的农副产品，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产品，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应当允许在规定的集市上出售。有一些为国家政策所准许的正当的肩挑运销，便利于群众生活，不能当做投机倒把。有一些人，历来是附带做点小生意，只要他们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不从事长途贩运，不破坏市场，也不应当看做是投机倒把。（四）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对待社员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地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不得违反。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决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随意没收在“六十条”的规定范围以内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对于超过部分，如果数量很少，不影响集体经济，一般地可以不动；如果数量较多，应当对农民说服教育，采取适当的方法，收归集体所有。　　上面四个问题，都是在运动中容易混淆界限的重要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贪污盗窃同小偷小摸的界限，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恢复封建宗族统治、进行反革命活动同群众的落后习惯和迷信行为的界限，敲诈勒索、重利剥削同互助互济、亲朋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的界限，等等，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破坏了政策，伤害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害。　　农民群众有了缺点和错误，应当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对于某些有比较严重错误的人，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有一些人，占有了集体的农具和其他财物，或者私拿了国家的物资，应当通过教育，由他们自动地交出来。　　有一些人，占用了集体的耕地，应当通过教育，要他们退出来，但是，作法要合情合理，不要糟踏庄稼，不要荒了土地。　　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有极少数的人，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对这些人应当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认真改过，经过群众同意，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依靠对象，参加贫、下中农组织。总之，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只能采劝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容许开大会斗争，不准乱戴帽子，更不准动手打人。有些地方，曾经发生过乱抓、乱斗，使用刑罚的违法乱纪事件。这种事件，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干部、学生、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重要力量，不可忽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在部队、工厂、机关或者学校中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比较高，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一定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官兵的家属，绝大部分住在农村。　　做好军属工作，对于巩固军队，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认真检查这个政策执行的情况。要教育军人家属珍惜自己的荣誉，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军人家属的光荣，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人家属给以适当照顾。现役军人的婚姻，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加以保护。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要采取上述的方针和做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至于那一部分不到百分之五的人，也不能统统列为打击对象。他们犯有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是，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多数人同阶级敌人还有一些区别，应当尽力争取。在这一部分人当中，真正需要打击的，只是那些极少数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人。　　四 、关于贫、下中农组织　　（一）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之后，再分批吸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贫、下中农群众，又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段基础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组织，必定会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在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曾经

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二）贫、下中农的组织，必须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既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又要保持它的群众性。在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例如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小组的组长）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新、老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这对加强农村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很有作用。在贫、下中农组织最后形成的时候，应当努力争取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群众参加，不能参加的，只是那些同四类分子关系密切、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在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注意吸收各民族中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　　（三）要注意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经常工作。贫、下中农组织，不仅要在政治运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在经常的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要从工作制度上，保证贫、下中农组织能够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和这三级的干部，进行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必须邀请贫、下中农的代表列席会议。要教育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使他们学会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办好集体经济。　　（四）贫、下中农组织能不能有经常工作，能不能经常发挥作用，决定于党的领导。党支部应当经常关心和帮助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一切同社、队有关的重大事情，在党内讨论之前，应当征求贫、下中农组织的意见；在党内讨论之后，应当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同他们商量讨论。一 切农村中的党支部，都必须真正懂得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并且真正学会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　　（五）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充分。在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中间，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贫、下中农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有那些任务和权力，这个组织的基层单位应当放在大队还是生产队，公社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能否又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同党组织和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县一级是否需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省、地两级是否需要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各省、市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一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五 、中农问题　　中农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正确对待。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长期执行的阶级政策。　　在对待中农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待上中农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划分上中农，一方面是如何团结上中农。上中农是农民中间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发生偏差的，往往是在对待这一部分人的政策上。

对上中农处理不当，又往往影响到同其他中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正确处理上中农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用什么标准划分上中农，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中间，还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单纯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结果把一些贫农和其他中农错划为上中农，甚至把一 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这是一种阻碍生产而不是推进生产的做法，因而是很错误的。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　　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的同志以政治态度作为划分上中农的标准。这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个标准，很难于一致，也很难于掌握，结果往往把一些思想落后或者有较多缺点的贫农和其他中农划为上中农，制成农村阶级队伍的混乱。　　以上两种划分上中农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划分上中农的根本标准是，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上中农的生活状况，一般地在其他中农以上，这正是由于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的结果。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要没有轻微剥削，都不能划为新上中农。　　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贫农和其他中农，他们既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又没有任何剥削，都不应当划为新上中农。至于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收入而富裕起来的贫农和下中农，一般地也不要改变他们的成份。　　老中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一般地只划分过上中农（当时叫做富裕中农）和一般的中农。现在，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哪些人是老下中农。所谓老下中农，就是老中农中间占有生产资料较少、需要出卖少量的劳动力或者借少量的债、因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一部分人。在一般的老中农中间，除开老下中农以外的另一部分人，普通就称为中农。这一部分人，和老上中农有区别，他们不剥削别人，因此，不应

当把他们归入上中农。同时，这一部分人，和老下中农也有区别，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一般地不出卖劳动力、不受债利剥削，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只能作为团结的力量。　　鉴于目前在区分农民各阶层的成份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很有必要在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中间，重新学习一 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 〇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 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要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农村的阶级成份，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份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份，作为依据。如果有一些人过去划错了成份，在组织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改正，可以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改正过来。　　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验。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必须团结他们，也要使他们在生产中正确地发挥作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上中农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因为在上中农中间，有一些人带头闹单干，有一些人进行投机倒把，就对所有的上中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击。　　我们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中农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谨慎处理。当着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反对少数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能剥夺他们的社员权利，也不要给被批评的人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更不能侵犯他们依靠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的正当利益。有少数地方，曾经发生过像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那样斗争一些上中农，这类的事应当坚决防止。把上中农推到地主、富农那一边去，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六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

在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说服教育，洗手

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情况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有些领导运动的同志，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当着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往往容易对于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和批评不够严肃，有迁就姑息、马虎了事的情绪；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看得黑漆一团，甚至把他们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是十分有害的，应当改正和防止。各地试点的经验表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干部的问题处理得当，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实际上，教育干部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的过程。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好了，使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检讨了错误，改进了作风，也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

为了团结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对广大的基层干部怎么看法。要有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应当看到，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这是一方面。但是，重要的，还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七 、八 十的人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和下中农，其中大部分又是土地改革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所犯的错误，大量的还是属于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等一般性质的错误，犯严重错误的只是少数。这是另一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估计，然后才有可能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于他们也要作分析。根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占

百分之一左右。其他百分之二 、三 、四的人，错误很严重，而且往往同阶级敌人有牵连，有些人已经被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拉下水，群众意见也很大，但是，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

（二）对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在具体做法上，要抓住四个环节 。

第一 ，划清政策界限。应当划清的政策界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还应当特别把以下两个界限问题，区别清楚，即：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界限；腐化堕落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错误的界限。

第二 ，做好教育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即使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应当以最大努力，在经过批评斗争以后，把他们当中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人，尽量争取、改造过来。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许多地方的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各地可以普遍采用。

第三 ，做好经济退赔工作。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总之，不能使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以便使他们得到教训，不敢再犯。但是，计算要实事求是，退赔、补税和罚款要合情合理，做到既使群众满意，又使犯错误的人过得去。时间不要算得太远，除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以外，一般地可以从六十条第一次修正草案下达农村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算起。贪污盗窃的财物，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一般地可以按照现在的国家牌价或者现行的市场价格，折价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分批退赔。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只要坦白得好，退赔得好，而民愤又不太大，可以不戴贪污分子帽子，但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要调动工作，不能继续担任负责干部和经手财物的职务。　　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都要严格批评。数量大、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原则上必须退赔，一次退不起，可以分期退；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酌情少退。数

量较少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一九六二年算起。

第四 ，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组织处理应当放宽一些。凡是自动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并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于处分。只是那些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代，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才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处分要实事求是，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二以内，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具体的比例，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加以控制。

总之，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要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问题一时弄不清的，可以列为专案，待调查清楚以后，再去处理。凡是不容易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放在运动的后期，也就是在领导和群众比较冷静的时候，进行处理。

（三）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积极工作、热爱集体、办事公道、遵守制度、廉洁奉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以表扬，以便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四）如何对待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在保证贫、下中农成份的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 新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只要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应当继续信任他们，不改变他们的领导职务。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歧视和排斥贫、下中农，或者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群众不信任他们，可以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调整。

老上中农，一般地不宜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个别人，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社会主义觉悟比较高，一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公道能干，群众拥护，各

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继续让他们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　　老上中农成份的党员，应当以党员的标准衡量他们。能不能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不是根据他们的成份，而是根据他们的“德”、“才”的情况。

（五）地主、富农的子女，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人，能不能担任基层干部。

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党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的表现，不能单纯拿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这一条，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对这一部分党员、干部，要抓紧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教育对方，并且不受对方的坏影响。至于同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结婚的人，则当别论，一般地不要让他们做党员或者当干部。

七 、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尚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有些地方也已经在宣传和推广。现在，干部不劳动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伟大的革命意义仍然认识不足，不愿意劳动和轻视劳动的思想，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领导机关，特别是一些县、社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会议多、报表多等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干部参加劳动以后产生的实际困难注意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个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这就是：作宣传，订制度，改进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

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继续向基层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他们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针对着他们的思

想情况，具体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

为了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还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包括规定他们全年的基本劳动日数，规定干部补贴的标准，合理安排工作和劳动，等等。每一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应当完成多少基本劳动日，应当补贴多少工分，都要经过社员群众讨论通过，确定下来。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总数，一定要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以内。

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社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是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个重要保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对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无疑会起很大的带动和督促作用。

中央曾经一再指示，三令五申，要求中央的各专业部门，省、地、县、社的领导机关，大力精简会议，严格控制统计报表。但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认真解决。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县、社两级领导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各种会议，凡是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够在下面开的，不到上面开；可以合并开的，不必单独开；能够分片开的不要集中开；可以在农闲期间开的，不到农忙期间开。县级各专业部门召集公社各级干部开会，都必须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一级召开两天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也必须经过县委批准。统计报表，只能由县的统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统一制发，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制定。县统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四月十五日的通知，对报表的情况进行清理。需要保留的报表，开出清单，发给人民公社。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一律停止填报。省、地两级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对本地区内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中央各业务部门的党组负责人，也要对本部门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把各种会议和统计报表减少到最少限度。

八 、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各地试点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内问题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都很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如果不整顿党的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试点的经验又证明，这次运动不仅能够使每一个党员很好地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也能够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次很好的考查。这些经验都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　　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排整党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加强领导。在组织工作队的时候，应当注意抽调一些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训练工作队，要有一些有关整党的内容。

这一次农村整党工作，是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密切地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达到下面的几个要求：

（１）使所有的党员受到一 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每一个党员用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２）把党组织中间的问题，揭发出来。有重点地对党员的社会成份、阶级立场、政治历史和思想作风，进行一次审查。

（３）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清除出去。

（４）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且屡教不改的党员，进行适当的处理。

（５）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

（６）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

（７）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些要求达到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基本上整顿好了。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先要在党内召开会议，然后再召开在贫、下中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列席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也要

放到运动的后期。处分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要容许受处分的人说明和申辩，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对于一些一 贯消极落后的党员，要反复教育，并且给他们以充分的学习和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适当处理，有一些人还可以留到登记党员的时候，再去处理。

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是不是就在这次运动中进行，现在还不确定。各地可以进行试验，或者只把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登记党员的工作暂不进行；或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的基础上，紧接着就进行党员登记。这个问题，可以经过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行确定。

九 、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且经过斗争，把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同时，又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要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他们。斗争以后，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改造成为新人。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劝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 ，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 ，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　　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应当采劝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 、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 、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 、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

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有倒算行为、投机倒把行为或者盗窃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当严格处理。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以至没收；盗窃，必须如数退赃；倒算，必须如数退还。总之，经济上的处理要严格，但是算账要实事求是。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评审，切实加强对他们的经常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已经摘掉帽子但又有破坏活动、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重新给他戴上；个别确实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也可以摘掉帽子。现在，有些农村，存在着对专政对象情况不清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 个地方，从农村跑到城市，逃避了人民的监督。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对于专政对象的实际情况，应当进行一次清理。

在过去土地改革中，有一些地方漏划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区多些，有的地区少些，也有的地区没有。从全国来说，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在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　　但是，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要清查出来，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根据一些试点的调查，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主、富农家庭，在经济上比中农和贫农的家庭上升得更快。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他们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

当然，对于他们依靠劳动得来的正当利益，还是应当给予保障，在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然对生产不利，对改造他们也不利。

十 、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在农村青年中，地主、富农子女约占百分之十左右。目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

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

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们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上，要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对少数地主、富农子女的反动言行不作必要的斗争。一种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上面的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党的政策。

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地主、富农子女，在土地改革时候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现在就不应当再给他们戴上这类帽子。除了少数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场的，或者因为有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现，经过社员同意，接收他们为人民公社社员。召集四类分子开会，不应当要他们的子女参加，也不应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他们本人参加。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加强对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也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反动行为和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富农子女，在这次运动中，应当进行必

要的斗争和适当的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教育贫、下中农青年，特别是党员和团员，提高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对于已经结了婚的，更要教育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受对方的坏影响，但是，不应当作出硬性的规定，加以限制。　　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地主、富农子女，应当表示欢迎。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凡是在这些干部或者军人直接抚养下长大的，他们的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家庭或者革命军人家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地主、富农子女看待。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还有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干部去虚心地加以考察，便于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陷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淡也谈得不深刻，敷衍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

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做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熟视无睹，永远不到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得较好，上面都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一部分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不知道，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单位、对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的下达许多指示，往往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了两个考察团分别到上海和广东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 给林彪同志的信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

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人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二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鬃、鬃、杨、廖鬃、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达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作，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以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们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附：曹操《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一作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二、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

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

（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

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机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到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像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十二、一九四七年，《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讲话，就是黄镇、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十三、一九三三年我在古田调查，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没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小型会议上的讲话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斗争。

不能纠缠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也好，罗瑞也好，开始就是内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

（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毛主席说：越学越蠢！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话。打了几次就会打了。

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

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

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争搞的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

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总理：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

主席：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总理：去冲破一潭死水。

主席：你（指贺）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做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按：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一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

鬃：不是，是胡绩伟他们。

主席：我全部读光了。按语谁写的？

鬃：按语是胡绩伟写的。主席：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

现在好了，《人民日报》上白菜是怎样长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议论了。让胡绩伟参考《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它里面有不少思想性的东西。有些小孩子专看《人民日报》，我说，你们又不看《中国青年报》，不看《解放军报》。

（鬃来了。）

主席：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鬃：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讨论一下嘛！

主席：讨论一下有什么矛盾。

鬃：大家下去蹲点，认识一致了。

主席：时间短了。

鬃：还是初期，还是第一次，还没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之后才行。

主席：要省、县、社、大队、小队发动了群众，都成立了贫协，才行。

鬃：农村我知道些，对城市了解很少。农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这几天我对城市工厂的材料努力看，也还是初期的经验。

主席：白银厂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

鬃：白银厂搞了两年，高扬文这次的报告，我也看了，看来还要深入。可以再写个总结性的东西。总之，大家蹲点还是第一次的初期的经验，所以很多问题还讲不出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经验，就有头绪了，要有比较，你们懂得点农村以后，再做个比较，就会懂得的。现在看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

体作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主席：要两年呀！打长一点，搞三年也好，横直是要把问题彻底解决。也可能缩短。

鬰：湘潭、山东就是。陈正人提出洛阳拖拉机厂也要搞两年，不要赶时间。

主席：把问题解决。

鬰：熟练了，不用这么长的时间。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鬰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

鬰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鬰：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鬰：这是头一同。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划漏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

主席：如鬰讲的湟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

鬰：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主席：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鬰：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鬰：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

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主席：后两种哪种多？

鬃：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鬃：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主席：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总理：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峯，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主席：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样就太多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争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鬃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没有讲过这一套了。

鬃：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主席：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鬃：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主席：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鬃：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主席：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哩！

鬃：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主席：被剥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鬃：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主席：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鬃：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鬃：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份，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

鬃：那好办，再戴上。

鬃：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主席：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

鬃：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鬃：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

主席：你讲第三部分。

鬃：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鬃：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主席：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鬃：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8％，

人数不能超过10％。

雪峰：是包括现在的在内？

主席：你们看？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雪峰：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

主席：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鬃：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主席：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鬃：现在还是鬃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主席：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账，是河北的发明权？（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鬃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

鬃：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

雪峰：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鬃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主席：我没有这个印象。你们把鬃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鬃的。

康生：鬃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偿。

鬃：你账挂到河北账下，鬃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

主席：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鬃：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主席：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

鬃：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没收。

主席：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鬃：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很坏的。

鬃：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鬃：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分子多吃多占。

主席：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请秘书……。

鬃：要退赔多少？

鬃：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主席：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鬃：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以后可以摘。

主席：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他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

鬃：搞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主席：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

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鬃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鬃：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主席：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鬃：我当时就怀疑。

主席：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喔，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鬃、雪峰：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鬃：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主席：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鬃：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主席：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雪峰：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

鬃：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主席：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鬃：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

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主席：冶金部根子是谁？

鬃：我没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鬃：王鹤寿嘛）

鬃：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

鬃：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马下来，然后改造。

鬃：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

鬃：北大整陆平，资产阶级教授出来保护陆平。鬃同志在延安不是说右吗？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群众。

主席：你姓陆的，鬃整鬃，我是站在你这方面的。鬃还可不可以当校长？不能，鬃鬃嘛！看来清华比较好。（有人问：四清与四不清是农村主要矛盾，这样提行不行？不行！）（又有人问：这些富裕阶层……是什么性质？）

主席：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

鬃：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主席：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鬃：有的没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

主席：你整他，他不布置？

鬃：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主席：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鬃：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农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解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主席：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鬃：然后再集中搞少数严重的。主席：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安源开始联系小职员么！你那安源，官志远、朱锦堂、朱少兼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粤汉铁路要成立工会，一个人不认识，找

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

鬃：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要上当。扎根串连，雪峰同志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

主席：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鬃：老实根子，不一定工作队开始就能找出来，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一定的火候才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是根子。

主席：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搞社会主义。

鬃：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出来，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你说他不是老资格？

主席：李立三不是老资格？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

鬃：不只李立三，蒋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认识他的人多，因为宣布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活动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

主席：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

鬃：凡搞剥削历史，有人不赞成的。找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扎准的，鬃那里就换了百分之三十多嘛！恐怕还是在斗争中逐步发现。

主席：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

鬃：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露。

主席：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

鬃：先背靠背，后坐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不能一下子就当

主席。

主席：他不没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个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总而言之，把那个流氓无产阶级说的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赞成。

鬃：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

主席：王鹤寿有没有转变？

鬃：有进步。

主席：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

鬃：总之，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参加劳动。

鬃：能不能实现“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键。特别要参加劳动。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顶”实行的好，有些干部只学到了炼钢的本事。

鬃：那批人有技才，不应该脱离生产，作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

主席：每天要几小时？

鬃：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小时也就够了。

主席：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鬃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娘不灵，鬃一骂，还是下去了。

鬃：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争取。

主席：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鬃。我当他的助手。

富治：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本是工人的工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鬃：工厂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20％，你们搞出经验来，我们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拿出训练骨干分子。谢富治就是这样搞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

主席：全国都要搞，你（指谢）那个厂抽出一半人来，另搞一个厂子。一个厂办

两个工厂。

鬃：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

主席：也不那么专，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听意见听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下一个死命令，余秋里办法，六万人里有七千人，各种各样议论。……

鬃：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

主席：还是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

（有人提：要组织革命委员会，现在工会贪污的很多，不行了。）

鬃：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鬃：工会系统恐怕不行了，重新组织，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组织，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组织20％—80％的积极分子。

主席：有30％就了不起了。

鬃：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

鬃：不能上交，还是雪峰讲的，三勤夹一懒，自己处理。

主席：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夹一懒好，李雪峰同志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嘛！以邻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夹一懒嘛！怕什么！适当分散。

鬃：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劳动好了。

鬃：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些去？

主席：有家可归的，你们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说那40％就没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哪里去，交到到他（指总理）那里去了。

鬃：我还想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一个乡几万人，一个厂……昨天李雪峰同志讲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马列主义、提高文化，认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一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颜色。江西兴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

主席：还有永新。

鬃：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镰刀与锤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全世界大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现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对我们的新型人物……

主席：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鬃：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一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主席：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鬃：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形成那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鬃：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没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识论不行……

主席：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鬃：有了可以造成……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畅，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畅，地富反坏不舒畅，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畅，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鬃：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虑。

主席：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没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错了死者不可复生。

鬃：像天津厉慧良要杀，也没有材料可用，家庭……。不杀，得罪了广大群众。

主席：京剧界就发生问题。

鬃：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主席：是社员，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让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雪峰：贫农、中农也叫社员，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问题。

总理：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主席：你们再争论争论嘛！（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

（注：方括号内为陈伯达同志发言的有关内容）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时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

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内部矛盾那个时代没有？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话。好话，坏话，特别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这是

工作做的好坏的准则。〕

讲话长了怎么办？李雪峰同志说的话，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没人听嘛！

〔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那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贝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不怕官，只怕管嘛！〕

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军队同志说形势奸，我直接听到

的是许世友、鬆，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末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搞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镨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

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鬃，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连接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种事动员）。

鬃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念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们，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办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你就逃之，不想逃，就蹲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付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

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没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没有用。（刘鬃：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倾，搞清楚一些问题。）（刘子厚：我们集中也是反右倾放包袱。）有成绩没有？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就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员，二十一岁，他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么，他说还有几怕，怕死人，怕扎错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千八百个干部，还说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坏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两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没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一两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倾盆大雨，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一去就公开讲：有那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两个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鬃：没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么。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没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人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钻到那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生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的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那里是这样的扎

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没有？有灾救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没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来！（刘鬃：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习四十天，搞烦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我历来反对这样读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谢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百分之二十的人来训练。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不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纠缠在文件上，训练那么久？搞斗争么。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带《三国演义》打仗的，谁照着书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内行，鬃过去也是内行。鬃也是内行。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问谢富治）你们搞了一千多人的训练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大队为中心或以社为中心开训练班？所谓训练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调查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张承先、李悦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没有搞开。李鬃是保定地委书记，他首先提出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书记李鬃，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家，农村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政治军事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没有。有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粤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没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么。现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

军官学生。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话。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鬃：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蒋、蔡向赣州退，我们向山沟里退，各退各的。

（问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略）不得了，糟糕！多浪费时间，就不要开么！（陈插话：略）一千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总理插话：刚才陈毅讲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城）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张茜在哪个县？（鬃：句容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形工作队，不好。我身边的娃娃学四十天文件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下去才知道。另一个在通县说教授不懂，助教好一点，学生更好一点。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读，你向大家说，我二十几年是靠吃蜜糖长大的，什么都不懂。请叔叔伯伯大娘指导。还是学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书读得太多了，不然怎么是教授。这些人下去是阻碍搞四清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一个是谢富治的经验，办训练班搞斗争。一个是河南经验“三结合”开斗争会。他们搞斗争也搞了一个月四十天。他们不是读文件，而是搞斗争，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总而言之，搞斗争。（鬃：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搞了两个月，搞出两万多元，十几万斤粮食）还是有油水搞，向他们借点钱用，他们的钱多得很，群众还是有希

望的。照顾五保户也好，搞生产也好。会不能开得太小了，有的生产队十几户，十几二十几个人，讲话打不开情面。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开大会顶多也是几百人么！

现在搞不起来，其原因就是不开大会，不宣布来意。

从来没有看到要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一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康生插话：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的。……）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产、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没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户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出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题严重的，当工作队到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烦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一千多户，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下了五百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邓鬃插话）讲长一点，反对急躁情绪。讲五、六年，三、四年，两、三年完成岂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个县集中一万多人是多了。一九二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没有好几个干部。农业部、财务部、武装部……七、八个哩，开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围县城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刘插话）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净，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没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

王鬃提出干部交换问题，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社到那个社。来了新人不摸底，群众敢讲话。新社长、新书记来了，就敢讲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没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

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刘鬃、邓鬃……）

贫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动。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

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後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

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最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

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

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

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

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

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面上，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的工作。

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情况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7、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

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

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从一九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

六、七年内，全国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

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

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跟敌人。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2011年6月5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3）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门的情况），做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厂。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问你们淡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一九六三午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春节谈话记要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康生：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宣统的叔叔载涛生活苦。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3、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生：质量差。

主席：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士钊：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陈叙老，你是研究系，章士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黄老，你的家如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主席：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同志谈谈。

×××：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

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廿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二、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廿三、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

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最近××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工作。总之要搞的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此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的岗位。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

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主席：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要停止。

×××：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是书法吧。

毛主席：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化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化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五八年，就没有现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二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劳动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

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二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二年的预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主席：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大学如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主席：对了，要多样化。

××：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

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 1 页~第 18 页，原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 1864 年（同治三年）7 月 22 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 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 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 6 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

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 34 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 36—37 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 36-62 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 65 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 8 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10 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 18 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 31、32、44、52、60、84、107 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

乱如此，可为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76 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 29、51、52、122 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 28、43、51、108 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 102 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 94 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 6 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 19、29、51 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

保至今也。”（同上，第 33 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 29、47 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己“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 19、44、93 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 106 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 56 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 64 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 69—72 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 56 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 374 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 35 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 92、93 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 104 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 31 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

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 112-113 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 119、121 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 381 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70 页。）评断历史人物主

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 119 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 113—118 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 35、64 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

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 125 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 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就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 49、55、69、107、113 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 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 18—19 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 63 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 84 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五）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

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 39 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 1862 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

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 年 4 月号。刀口余生《被掳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

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47 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玕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

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 1868 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 863 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243 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 110—111 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

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全文完）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批语〔１〕　　江青阅，此文〔３〕有些道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１０）”上。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这期反映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吴泽

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来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这时的李秀成已经不是当年起来闹革命的李秀成了。加上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至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３〕指《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１０）”中选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

“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同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

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

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

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

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

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件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

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

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

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

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校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

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编者按：

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

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正文：

一九六〇年，孟超同志把明代周夷玉的传奇《红梅记》改编成为一个新的昆曲剧本《李慧娘》。这是一出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新编鬼戏。一九六一年北方昆曲剧院首次演出。当时受到《人民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的赞扬，繁星同志并且在《北京晚报》上提出了《有鬼无害论》，为《李慧娘》和一切鬼戏“护法”。孟超同志踌躇满志，于一九六二年春节写了一篇《试泼丹青涂鬼雄》的《代跋》，对《李慧娘》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作了说明。其后，梁壁辉同志写了《“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五月六、七日《文汇报》），李希凡同志写了《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都对《李慧娘》和繁星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现在对这个戏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戏进一步进行批判和讨论，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加强我们对香花毒草的辨别能力。

孟超同志一向是主张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他曾明确地说过：“我的体会：一部艺术作品，它的‘新’，是指通过作者的新的观点，去重新评价和描写历史人物或传说题材，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东西，使古为今用，但又不违背历史真实。”（《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载《戏剧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四期）而在《代跋》中他更大声疾呼地说，要借李慧娘这个“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为什么要借鬼魂来激励今天的“生人”，他是在用什么思想来激励“生人”，他所要激励的又是些什么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因此，正如孟超同志改编这个戏是古为今用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戏同今天的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一）宣传“死后强梁”的荒谬论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　　《李慧娘》虽说是个改编本，但实际上不过借《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和裴禹爱情关系的一段枝节，敷衍铺陈而独立成戏，称得上是新的创作。这个戏的主人公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姬妾李慧娘。在贾似道五十寿辰时，太学生裴禹写诗柬斥骂他，引起李慧娘的感触和激赏。接着，李慧娘在随贾游湖时，又遇到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她心中感佩，不觉赞了一声“壮

哉少年！美哉少年！”恰被贾似道听见，回府后一剑杀死李慧娘。剧本从这（第四场）以后就着重描写化为鬼魂的李慧娘的复仇精神。在完全新编的第四场中，作者致力描写李慧娘的种种“幽恨”，其目的就是突出她“瞅机缘，报仇冤”的思想。以后，她去见被贾似道囚禁的裴禹，并放走了他，目的也不是为“偿还风流债”，而是为了拯人、复仇。最后，这个鬼魂在贾似道追究是谁放走裴禹的时候出场，目的也和《红梅记》原本不同，不仅是为了援救被无故拷打的姊妹们，更主要是为了发泄她的一肚皮不满；她大闹半闲堂，大骂贾似道，一头将贾撞昏在地，大笑三声，唱道：“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一句话，其目的都是为了复仇。

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我们首先看到，作者“镂心刻骨、竭力呕血”地塑造的“英雄”形象李慧娘，乃是一个由人变鬼的形象，而突出表现的是她的鬼魂形象。全剧六场，主要的戏剧行动、戏的高潮都在后三场；亦即李慧娘被杀后变为鬼魂的三场。李慧娘的“英雄”形象是由鬼魂的斗争来完成的；而且按照作者的写法，也只有变为鬼魂才能完成。因此孟超同志称他的主人翁为“鬼雄”。议论这出戏，就不能不议论鬼；承认这出戏，也不能不承认鬼。这出戏在宣传任何思想之先，首先向今天的群众宣传的是鬼魂的存在，宣传“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宣传人鬼之间的爱憎纠纷的鬼话。

《李慧娘》不仅宣传了人死为鬼，而且还通过李慧娘为人时和为鬼时的遭遇，作了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李慧娘在她最后的一段唱词中，就给自己做了这样的结论：“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剧本里正是这样写的。李慧娘在生前只有苦难的命运。她第一次上场的三段唱词中就连叫了五次“苦”：她悲叹着“鲛绡湿透千行泪，幽恨绵绵苦断肠”，“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强挣扎苦度着生死命运，俺釜底游鱼，笼里的哀禽”……一直到她临死，在贾似道的三尺剑下，也只能哀怨地引颈受戮：“你相爷要俺死，俺怎敢怕，恶威风由你发！”可是，当她一旦死去，化为鬼魂，就忽然摇身一变，她不仅“再不受折磨摧残，再不向虎狼前强承欢，再不在粪堆污池里受腌 z ā@①，哪怕他刀兵 p í@②鼓动边关”，得到了彻底的大解脱；她不仅“我如今是：这花园鬼出入没遮拦”，得到了生前所未曾得到的自由；而且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贾似道：“你凭钻营，卖国害民，吃尽宰官粮，却不道到头来和俺一样；怎跳出别伎俩。冤家路逢，相

扭看——哪个强！”得到了生前所从未得到的平等；而且还能够讥笑贾似道：“……你，手提三尺剑，只在空中晃，这威风是逞势虚张，砍不到俺鬼身上。”甚至得到了“愤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的无穷威力。　　按照作者对李慧娘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的描写，人们不能不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不仅人死为鬼，而且鬼比人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死了才有力量。　　我们知道，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从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孟超同志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他不去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反倒大肆宣传鬼魂的存在、鬼魂的威力，这首先就是非常错误的。同时，我们知道，在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都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群众一起，同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具体的现实斗争，争取人民的解放；为了革命的胜利，必要时我们不惜一死。而决不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散布什么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荒谬观点。这不仅是在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是在宣传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使群众相信宿命论的思想，引导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生活，这是一种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　　也许作者会说，他所以要让一个生前受欺的弱女子死后忽然“强梁”起来，目的不是为了抒发“只有死后才得安”的感情，而是让这个鬼魂扩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神通广大的“复仇的女像”，以表达出作者在这个戏里所要着重宣传的所谓复仇精神。　　我们并不反对复仇精神，问题是什么人向什么人复仇，如何复仇。《李慧娘》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自然应该向封建统治者复仇。然而，我们看到，李慧娘生前的形象不过是个只知唉声叹气，忍受凌辱，丝毫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封建行动的软弱女子；她的反抗行为全部是变成鬼魂以后才表现出来的。这样用鬼魂来反封建，就是说，用封建迷信来反对封建统治，如果古代作家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现代作家来说，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谁都知道，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向劳动人民提倡在活着的时候忍受一切剥削迫害，而把想象的“报应”等到死后去实现。这完全是对群众的欺骗，是为了麻痹被剥削人民的斗争意志。何况，即便按照作者所写，死慧娘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反封建的胜利。她不过是将贾似道一头撞昏，并未撞死。即使撞死不过是死慧娘又碰上了死平章，人变了鬼既然就会有如此威力，那么，死平章在阴间岂不又照样可以统治死慧娘吗？

有何胜利可言？这是十分可笑的。用鬼魂来反封建，反不了封建统治的一根毫毛，相反，倒能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其实，作者通过《李慧娘》并不是要向观众宣传什么反封建的历史教训，而是借虚幻的鬼魂故事向观众灌输一种抽象的复仇思想。这一点，我们从《代跋》中看得更加清楚。　　《代跋》中接触到《李慧娘》的主题和人物思想的议论，有七处之多，却没有一处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指出戏的主题思想在于反对封建统治，向封建统治者复仇。作者用抽象的词句反复说明的是：　　强烈的正义的化身；　　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　　正义与邪恶无情的斗争；　　写李慧娘的正义豪情，她以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　　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深沉的感情；　　正气凌霄，冤魂厉鬼理在而语壮，方足以慑邪恶而快人心；　　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是每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阶级标准的。孟超同志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明确地指出封建的邪恶和反封建的正义，而偏偏要闪烁其词地用这些晦暗的抽象的词句呢？这只能说明：在作者思想上，反封建或不反封建，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他所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只是抽象的复仇精神，只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适用的“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而已。然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正义”、“邪恶”、“压抑”、“斗争”等等，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资产阶级作家惯用的手法。他们不敢公开宣扬那些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好用这种抽象的概念来欺骗群众。《李慧娘》中所提倡的复仇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使我个人“备受压抑”，我就要“激昂斗争”，向他复仇。在今天，提倡这样的复仇精神，矛头是指向谁呢？　　（二）李慧娘的躯壳，孟超的灵魂

孟超同志怎么会创造出李慧娘这样一个复仇“鬼雄”的形象来的呢？他在《代跋》中有过清楚的说明。　　《代跋》中说，《李慧娘》“基本上是一抒发感情之戏”，而“情不逾乎理，情不离乎性，情理性皆由于实际感受、实际生活之所影响，之所支配”。这就是说，作者在戏里所抒发的那种“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思想感情，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那末，让我们看看，在《代跋》中，孟超同志是怎样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吧：　　一九五九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 x ī@③ s ū@④，

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而在《李慧娘》的《幽恨》一场中，李慧娘魂魄又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出场呢：集芳园内，月光惨淡，四周阴冷，秋树萧索，哀虫凄鸣，李慧娘魂魄着素衣……

你看，孟是“病榻凉夜”，李则“四周阴冷”；孟是“落叶 x ī@③ s ū@④”，李则“秋树萧索”；孟是“虫声凄厉”，李则“哀虫凄鸣”；孟是“冷月窥窗”，李则“月光惨淡”：孟超为寒热病缠扰之所，似乎就在贾似道的集芳园内！　　这种情景心境，在李慧娘鬼魂上场后的独唱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月惨淡，风凄零。白露冷冷，寒蛩哀鸣，俺无主的幽魂，飘泊难凭，似断线的风筝，又飘到集芳静境。……　　那边是笙歌缕缕迷醉着繁华梦，　　俺这里，孤零零，显阴影，欲哭无声。　　第五场《救裴》中，李慧娘送走裴禹之后，张望门外，呜咽低泣，为自己的身世又做了这样的概括：　　断梗飘萍游子梦，　　凄风苦雨鬼寒心！　　咳，俺李慧娘好凄凉寂寞也！　　不仅李慧娘的凄凉寂寞的感情同孟超同志的心境是这样相象，同时，孟超同志在《代跋》中几次提到李慧娘时，都说她是“强烈的正义的化身”，有着“与庶黎共呼吸的博大的胸怀”；而在谈到自己时，则说：“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你看，孟超同志不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且有着何等“博大的胸怀”！在这一方面，孟超与李慧娘竟也是如此一致。有一个同孟超同志很接近的评论者长白雁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位太阳社的老“诗人是以情写戏的”，戏里的“一切‘情’，虽然出自李慧娘之口，却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在李慧娘的性格成长里，含蕴着诗人的个性。”　　这篇令人肉麻的捧场文章，却也道出了一点真谛，孟超同志对此也从未否认过。由此看来，李慧娘即孟超，孟超即李慧娘，孟超只是在借李慧娘之酒杯，自己之块垒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孟超同志生活在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凄凉寂寞的阴暗感情？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于复仇？《代跋》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超同志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什么是他的情和志呢？《代跋》中有一段完整的“尚情论”，原文太长，这里可以引几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我自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　　这就是孟超同志的真情实感，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他的社会理

想，他的世界观。这些话实际上不过是说，歌唱笑骂、是非爱憎皆备于我，“我”的嬉笑怒骂就是“普天下人”的嬉笑怒骂，“我”的是非爱憎就等于“普天下人”的正义真理。孟超同志所一心向往的，不过就是一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骂谁就骂谁的个人绝对自由的任性放情的社会。　　能够有这样普天下人都适用的正义真理么？能够给他或任何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自由”么？当然不能。在阶级社会里，普天下人从来都有阶级的差异，从来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情和正义真理。所谓“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契合溶结而为一”，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唯我主义的具体表现。请问：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在我们社会中能够不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判吗？难道在我们社会里也可以允许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吗？　　但是，当孟超同志这种个人绝对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得不到任情放纵，反而受到抵制和批评时，他就觉得“备受压抑”了。于是，他就不免牢骚满腹，产生严重的不满现实的情绪和难以明言的阴暗心情。他在《代跋》中谩骂我们的戏剧是“正襟危坐，皋比自封，夸夸其谈，引经说法”，是“冷冰冰的破板凳，干巴巴的枯涩无味的语言”，这岂不也是一种“借戏言志”，透露出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蓬勃发展，他的抵触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满怀仇恨，时时想要反对、咒骂和报复了。然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似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意识到自己见不得阳光，没有前途，因此又感到消沉悲观，凄凉寂寞。正是在这种又是绝望，又要挣扎，又害怕，又仇恨，又不敢公开表露，又忍不住要放情咒骂的复杂心情中，他碰到了《红梅记》原本中“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的“复仇的女象”李慧娘，他当然就“只觉其气贯长虹，可敬可爱，而不觉鬼气森森”，他深深爱上了“周夷玉笔下之李慧娘，震人心魄，甚之感于梦寐，久难释怀，乃以不能自已的感情，妄作试笔”，改编起来了。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披着李慧娘的鬼魂外衣来抒情言志，一方面可以表现得更隐晦、曲折、阴暗，不易被察觉，一方面又可以借古喻今，从而可以更放肆、更无忌惮地放情诅咒。这就是孟超同志为什么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的道理。　　本来，作家在他所写的文艺作品里，总是要反映自己对现实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思想感情必须有利于人民；第二，这种思想感情必须合乎历史真实和

剧中人物性格。但是，我们看到，孟超同志所写的李慧娘根本不是南宋时代那个“知人少阅世不宽”的相府姬妾，而是一个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人物。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孟超同志是借了李慧娘的躯壳，装进了自己的灵魂。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对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只会产生严重的毒害作用。　　（三）用鬼魂激励什么“生人”，激励他们干什么？　　孟超同志为什么要通过李慧娘表现这样一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呢？他并不只是为了借鬼抒情，也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他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因而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看看，他所要激励的，到底是哪些“生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　　在《幽恨》一场中，李慧娘在一阵哀叹之后唱道：　　“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人间流离怨，　　……咳，又怎扬得下人世的苦难！”　　“俺要做一个南无观世音鬼菩萨，　　救苦救难，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　　在《代跋》中，作者作了更清楚的解释，李慧娘是“同千古被压迫者同命运，共呼吸”的，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这样，原来不过是表现个人恩怨的李慧娘鬼魂形象，就被镀上了一层金，把她塑造成一个“千古被压迫者”的代表，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鬼菩萨”了。我们似乎看到，她站在云端之上，俯视“众生”，流露出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同情。但是，她所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些什么“众生”呢？孟超同志未敢明言，却用了许多同“正义”、“邪恶”一样的，诸如“灾黎”、“庶黎”、“人世”、“千古被压迫者”、“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等等语意含糊、界限不清的词汇，这些究竟何所指呢？　　我们知道，“千古”之中，各个阶级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千古被压迫者”。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工农群众，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作了主人，再受不到“人世的苦难”了，再没有什么“灾黎苦”、“流离怨”之类的命运了。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鬼菩萨来和大家共什么命运，同什么呼吸，救什么苦难。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只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心怀不满，坚决不愿改造自己的人；只有他们才会以“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自命，只有他们才会从悲观绝望中渴望出现这位鬼菩萨一样的“救世主”带领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阶级复仇的斗争。因此，

这里说的“千古被压迫者”，在今天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刚被我们赶下历史舞台的压迫者；这里说的“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曾经迫使工农群众生活于苦难泥涂的人。作者通过李慧娘的嘴，一开场就哀叹：“家室破败风沾絮，身世凄凉雨打萍”，这与其说是锦衣玉食的李夫人的感情，毋宁说更象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感情。不管孟超同志愿意不愿意，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感情，是同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沆瀣一气、完全合拍的，是反映了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这也不奇怪，因为不管作者自觉不自觉，一切作品所表现和宣扬的思想感情，总是或者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或者有利于那个社会集团，超然中立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既然《李慧娘》代表的是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它所能激励的“生人”也当然就是这些人，那么，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呢？是不是要他们也去“死后”复仇呢？不是。作者和他所要激励的人都知道死后复仇是一种幻想，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戏里这种死后复仇的描写，只是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顽强抵抗，表现了剥削阶级至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垂死挣扎的心情，表现了他们“死了也要复仇”的刻骨仇恨而已。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救裴》中李慧娘不就是在劝告裴禹说“国事为重，性命为重，留得青山在，哪怕贼横行”吗？

真正的目的，作者所要激励“生人”去干的，不是死后的复仇，而是现实的斗争。作者在《代跋》中说：虽然“有人认为李慧娘……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无补于现实”，但他还是认为对李慧娘应当“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因为，李慧娘“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意思很清楚：李慧娘虽是空幻，但她的“正义”、“风操”是可以学习的。象李慧娘那样死后复仇是“无补于现实”，但如果以李慧娘为榜样，学习她的那种死不瞑目的复仇意志和激昂斗争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使“我”们受“苦难”、受“压抑”的人进行斗争复仇，那就会有“补于现实”。　　孟超同志在《李慧娘》中用历史传说题材和鬼魂形象所宣传的思想，在《代跋》中用曲折、隐晦、含糊的词句所表露的思想，剥开外皮，归根到底，简而言之，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中那些“阶级觉悟”较高，复仇心切的人在教育和鼓舞他们同一营垒中那些“后知后觉”和复仇意志不坚定的人，针对着党和社会主义，“激昂斗争”，奋起“复仇”。这就是全部问题症结所在。　　据《代跋》，《李慧娘》的酝酿时期是一九五九

年秋。这正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持续大跃进之时，正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轰轰烈烈地庆祝建国十周年之时；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一九六〇年春节，孟超同志完成初稿；一九六一年秋，首次上演；一九六二年春节作者写《代跋》。这几年中，正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鼠目寸光，看不到光明前途，只觉得生活苦了，心情灰暗，怨恨现实，觉得“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瞅机缘，报仇冤”，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作者还公然把它“比之金鼓雷鸣，壮三军而摧仇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擂起了《李慧娘》这面“金鼓”，究竟要壮什么“三军”，摧什么“仇虏”，不是清楚不过的事情吗？　　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　　＊　　＊　　从以上几点分析，我们看到《李慧娘》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而且提倡鬼比人强，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李慧娘》正是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表现，正是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

现。　　《李慧娘》这样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为什么竟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被发现，反而受到一片赞扬，听其散播恶劣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没有学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作品的缘故。从对于《李慧娘》的赞扬到批判，我们可以吸取到很重要的教训。希望戏剧工作者能够认真记住这次教训，切切实实地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改造自己，积极参加戏剧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　　（文中所引均出自剧本《李慧娘》及其《代跋》）＊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的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钱，那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榣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

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

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

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是历史所长，他是赵××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剪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文艺界，医务界都组织工作队下乡）

他们都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写不出好东西来，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

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的批判罗尔纲，×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

（刘××：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小钢铁厂有××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2011 年 7 月 13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六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内部报告”》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

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

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

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 30 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 1922 年 12 月 23 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 1923 年 3 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 年 3 月 5 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

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1928-1929 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

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 1936－1938 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 1920 年 10 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

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 10 月 18 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

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 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

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 1918 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

1919 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 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 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 年 10 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 1934 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

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 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 1937-1938 年）的有 98 人，即 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 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 1920 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 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 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 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 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

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 年 12 月 1 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 、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 1934 年 12 月 2 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 1937 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

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 1936 年 9 月 25 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 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 4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 4 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 年联共（布）中央 2 月至 8 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 4 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 1927 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 4000 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 724000 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 2-3 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 1937 年中央 2-3 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 1930 年 1 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 1920 年 2 月 2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 2－3 月全会（1937 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 1934 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 1931 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 1934 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 1937 年较 1936 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 1937－1938 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 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 1938 年 3 月 29 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 15 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 年 10 月 1 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 1939 年 10 月 27 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 10 月 25 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 1935 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

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 年 2 月 2 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 月 4 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 1905 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 10 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 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 年党员，1937 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 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 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 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 2、3 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 3、4 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 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 年到 1938 年共有 383 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 1954 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 7679 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 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 1938 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 1937 年到 1938 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 1937 年到 1938 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 1937 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

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 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 1939 年 1 月 10 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 1937 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

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

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 1941 年 4 月 3 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 4 月 18 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 年 5 月 6 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 5 月 14 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 年 5 月 22 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 6 月 15 日，但也可能在 6 月初开始……”

1941 年 6 月 8 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 6 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 147 个师……”。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

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 30 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

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 月 22 日夜晚 3 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 年到 1941 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

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1942 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

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 1941 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

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 1943 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 年 12 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 年 3 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 年 4 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 1919 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 99％在 1924 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

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 1928 年 1 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 1953 年 2 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 400 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 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 年集体农庄

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 262 亿 8 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 400 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

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 年 10 月 3 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

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

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全文完）

附件一：斯大林对苏联军队清洗的数据统计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前的斯大林时代　被捕的苏联红军领导人数统计：5 个元帅中的 3 个 4 名一级指挥员中的 3 人 12 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 12 人，即全部 67 名军团长中的 60 人 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 397 名旅长中的 221 人 2 名海军一级最高指挥员中的 2 人，即全部 2 名海军二级最高指挥员中的 2 人，即全部 6 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 6 人，即全部 15 名海军二级指挥员中的 9 人 2 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 2 人，即全部 15 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 15 人，即全部 28 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 25 人 97 名师政治委员中的 79 人 36 名旅政治委员中的 35 人　　另统计表明，16 位司令中的 14 人，67 名军团长中的 60 人和 199 位师长中的 136 人都被枪决了。所有 11 位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 80 人中的 75 位离职。军官团里半数以上的军官—-大约 35，000 人被枪毙或者送劳改营了。

二战已经爆发的 1940 年，苏联军队中 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和 60％兵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

附件二：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 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 年代下半期和 40 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

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 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 30 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 30 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 年 12 月 31 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 30 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 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

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 年 2 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 70 页的打字稿报告。2 月 9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 2 月 9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 30 年代下半期到 40 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 2 月 13 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

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 年 2 月 19 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 2 月 23 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 报告出台

1956 年 2 月 24 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 2 月 25 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 年 3 月 1 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 多年之后，即到 1989 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会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至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里毕竟“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它的错

误。自从人类社会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 无产阶级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有，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的无产阶级专长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

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合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使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是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

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就是完全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

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现象，都将是必然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能，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

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

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正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绳子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

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前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 0 年发生的，后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布什，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支部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这条错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险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子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在自己同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能和人民群众的智能，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错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了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面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

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复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有是不正确的，面貌一新 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

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一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矛盾放在其它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

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一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历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

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

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

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

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说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起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

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

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

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的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

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志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它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不是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

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

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纠正过去时期教条

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边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斯大林

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备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者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

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〇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

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及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开始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

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加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沉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

这种倾的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仿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
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

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望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的相互支持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

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　　*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徊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
，从而为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〇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〇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前路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

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能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2011 年 4 月 2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2）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本节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

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

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六十八个党大会的讲话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 21 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 15 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 15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 2000 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 15 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 3000 万吨。那么中国再过 15 年也可能达到 3000 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 4 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 24 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

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 27 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 13，5 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 27 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西方世界贷款，要美元。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十三个变成十二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字也可以，不要

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的宣言上签字的。

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这次十二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助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斯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就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 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 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 50%的、40%，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十二党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六十

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谈谈怎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十一月，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

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自卫，进而夺取政权。（另外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哥穆尔卡率代表团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的讲话

（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个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十月十八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

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关于共同刊物的问题）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

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十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的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

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庭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庭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为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来不是专门为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当时我们都忍下来了，当时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英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一九五 0 年初在莫斯科签

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辞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2011 年 4 月 2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3）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

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

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

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

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

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到８月３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谢·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鲍·尼·波诺马烈夫。

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苏联和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中苏两国的和平政策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主张和平共处的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国家和人民，对于巩固和平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和平力量已经有了空前的增长。

同这种符合我们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鲜明的坚定不移的政策相反，以美国垄断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直反对和平共处和合作，顽固地拒绝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阻挠大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且加紧准备新的战争，威胁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这些帝国主义势力是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它们拼凑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在世界上布满自己的军事基地，越来越粗暴地干涉他国的内政。

最近，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和他们对于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大大加剧了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使战争危险更加严重，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抗议和谴责。

中苏两国严厉谴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中苏两国坚决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近东

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证明，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殖民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维持和恢复违背历史潮流的殖民统治的企图都是危害和平事业，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中苏两国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而努力。双方重申：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按照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一切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在互利和和平竞赛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应当受到鼓励，这种关系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完全符合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的目的。

为了维护和巩固和平，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国间就裁减军备、停止试验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取消一切军事集团和在外国设置的一切军事基地、缔结和平和集体安全公约，达成协议。

但是，战争能否避免，不能仅靠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他们单方面的努力。西方大国的侵略集团至今拒绝对于维护和平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反而肆无忌惮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人类濒于战争灾难的边缘。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竟敢把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地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

双方极其满意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和日益巩固着兄弟般的友好、全面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两国的经济都在飞跃发展。两国的力量日益强大。两国建立在完全平等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种团结和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迅速前进，而且有利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于所讨论的一切问

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双方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所共同面临的任务的估计完全一致，这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团结永远是我们的共同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不遗余力地捍卫这种神圣的团结，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捍卫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明显地表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双方表示完全相信，日益壮大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

尼·谢·赫鲁晓夫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于北京

＊选自《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8月4日＊

2011 年 4 月 2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4）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 1844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现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或者说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根本不同路线的斗争，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场大斗争。

最近结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概括地说来，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纲领草案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与去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违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经表示同意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和平宣言”。这个纲领草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经过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南共领导人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调和的敌人”。

南共领导人所要攻击的“教条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南共纲领草案集中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加以丑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阵营则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南共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

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他们恶毒地诬蔑社会主义阵营，说它也有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霸权斗争的政策”。他们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说成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描写自己是置身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外，即处于所谓超集团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统一”；世界各国，即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是“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论点使人们不能不想起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右翼社会党徒，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说教。这种修正主义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南共领导人的说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1956 年 11 月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是：新的方针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方针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按：这就是所谓南斯拉夫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线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须在各方面努力。”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心究竟是什么。

南共纲领草案出现在目前时期，决不是偶然的。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

度已经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大大地扩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加紧进行破坏。资产阶级历来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不外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的手段，一种是欺骗的手段。在目前国际新形势下面，在右翼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的麻痹作用日益减弱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一段话不但针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宣言还特别着重地指出：“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绘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南共纲领草案的内容正是表现了这样的一副嘴脸。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调和的批判。如果说，上一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论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话，那末，现在我们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纲领而提出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认为，1948 年 6 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1949 年 11 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则是错误的，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经撤消了这个决议。从 1954 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们曾经企图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纳吉集团，而在他们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南共领导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坚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吗？难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结的基础吗？难道拒绝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拒绝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吗？

我们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历史转折点。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１）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２）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１９４５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１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１９５３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

１９５４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１９５６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

１９５７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１９５８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７０％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１９５９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1]

同年，１９５９，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

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

论[3]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3]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 599-603 页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5）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中共发表三篇文章

本节资料

一九六 0 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全世界觉悟的劳动人民，今天都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列宁是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指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世界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人民对于列宁的理论和事业感到十分亲切，中国人民正是从列宁主义找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还在中国很少人知道列宁的时候，列宁就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伟大前途。早在 1913 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提出了亚洲是“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的著名论断。随后，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帝国主义必然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中灭亡，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努力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中国的通俗说法，就是既要有联合又要有斗争）；必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必须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必须坚决信任群众和依靠群众。列宁的这些学说，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武装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能够迅速地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接受，主要地是由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除了进行坚决的斗争求得解放以外，再无任何别的出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极端残酷和极端野蛮的统治下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幻想帝国主义有什么“好心善意”呢？怎么能够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自动让出政权给人民呢？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棗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推进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叛变革命，行人民投入血海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能不以革命的暴力去抵抗反革命的暴力，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和中国取得的许多胜利，越来越显著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取得解放的行动指南，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

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国人民能够胜利地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第一步要争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争取提前实现 1956 一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相当程度的电气化；要努力进行文化革命，基本上普及中小学教育和业余教育，争取提前完成 1956 一 1967 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与此同时，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目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今年内使生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五十万吨、钢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煤产量达到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五亿度以上、粮食和棉花各增产 10％左右，从而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 23％。

对于中国人民能否高速度地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亟尽诽谤嘲笑之能事。远者如过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8 年 11 月就说什么“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成功或持久”。近者如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在今年 2 月又说什么中国加速工业化运动“可能造成这个政权从内部的崩溃”。可是奇怪，帝国主义者的诽谤愈是恶毒，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愈高，建设干劲愈大。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人民的政治团结，一年比一年更好。现在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人怀疑，我们一定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地指出，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他认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而这种创造的才干在工人和农民中是无穷无尽的。列宁这样描写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

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确信我国的发展速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将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有过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说法，就是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正在实行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目前正在蓬勃展开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目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正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最广泛地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用最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参加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地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建设，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少见多怪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对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吵闹不休，现在又在对于我们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了。伟大的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反问道：“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

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苏联用了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不是已经用飞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超过了西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正在追上和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吗？同样，在中国，“一穷二白”、毫无出路的处境，几十年斗争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对苏联四十年建设经验的借鉴，不是也十倍地增强了中国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用飞快的速度向着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猛进吗？西方资产阶级咒骂我们要失败，而我们队伍中居然也有那么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说什么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产物，而不认识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产物。让他们等着看吧，等个十年，他们总可以见个分晓。总之，无论外国和中国的那些一脑子形而上学的庸人，正如列宁所说，只知道把资产阶级关系的 “常态”看作不准有一点变动的金科玉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如同过去没有能力理解苏联的伟大变化那样，现在也没有能力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生动活泼的事物。

中国人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第二个伟大任务，就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争期间，列宁和其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人阶级左派领袖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便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十月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和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立即颁布了和平法令，主张正义的和平。其后，列宁又再三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苏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了世所周知的巨大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的志愿军到朝鲜

前线，同朝鲜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的侵略作了英勇的斗争，迫使侵朝美军接受了停战协定，从而维护了远东的和平。1954 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同年，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先后同印度政府、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对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1955 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亚非各国相互关系中的十项原则。1958 年，中国从朝鲜撤退了全部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一贯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和五洲和平运动，并且再三倡议实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成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原子地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同别国（包括美国）的争端，并且至今还在就这个问题同侵占着中国领土的美国举行着谈判。

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和平宣言，都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和平，指出这一斗争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莫斯科的两个宣言都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已经有实际的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和平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强。这首先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强大了，苏联在军事方明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显著地走到了美国的前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访问，苏联政府在裁减军备，停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重大的努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努力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继续扩大，美国本国广大人民对政府的反和平的外交政策纷纷表示不满和不安，美帝国主义的处境日见困难和孤立了。这种种情况，迫使新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接受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并且在一些场合改变腔调，说他们也有“和平愿望”。事实证明，

世界和平力量正在胜过战争力量，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一种表现，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同列宁在世时候根本不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形势，也根本不同。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新战争计划的斗争中，估计到这种新形势，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形势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决不能说，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因而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根本消灭了任何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列宁主义从来认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列宁说：“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列宁的这些具有根本原则意义的论断，是从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得来的，并且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两年多以前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还以最新的事实论证了列宁的这个原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说：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在战后的年代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怯尼亚、危地马拉、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曼和也门等地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战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顽固地拒绝裁减军备，拒绝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拒绝就立刻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达成协议。他们继续所谓‘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实行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而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一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

“在西德，在美国的扶植下，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从而在欧洲的中心造成了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

“同时，帝国主义者企图强迫中近东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接受臭名远扬的‘杜勒斯一艾森豪威尔主义’，从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在东南亚造成了战争危险。”

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说：

“和平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军备竞赛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起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议。……

“只有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警惕，并彻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卫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平才能够保持住。”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决不能放松。中国人民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立场来进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我们欢迎国际局势的每一步缓和，欢迎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真诚的和平努力，同时把帝国主义继续策划新战争的凶恶活动及时地告诉全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唤起他们的注意，并且指出，只要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联合一致，就一定能够压倒战争力量，我们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美帝国主义痛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它公开宣布自己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人民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立场。中国人民对于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从去年 9 月赫鲁晓夫同志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以来还继续在积极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的事实，作了及时的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就污蔑中国人民似乎不热心于国际局势的和缓。这个漫天大谎简直是太无耻了。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既然实际上是在从事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那么，这就跟和缓国际局势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加以隐瞒，甚至加以粉饰、美化和歌颂，对于国际局势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只能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们益发肆无忌惮。

事实胜于雄辩。试看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自从去年 9 月单维营会谈以来反和平言行的一个最简单的摘要：

1959 年 10 月 16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丁发表演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和平共处，因为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

10 月 21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干涉中国内政，诽谤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地方农奴主反动集团的叛乱。

10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就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三周年发表声明，诬蔑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并且“赞扬”发动这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

11 月 3 日，由于巴拿马运河人民举行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美国占领军实行镇压，打伤一百二十多名巴拿马人。

11 月 13 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说，“西方国家不能接受苏联人所谓的和平共处。”

11 片 22 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在美国“行列”杂志上发表文章，诬蔑苏联有“侵略意图”和推行“扩张主义运动”。

11 月 27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诽谤阿尔巴尼亚“受苏联的统治”。

12 月 1 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说：“到 1963 年时，美国将能够掌握型式更多的投递氢弹头的手段来对付苏联。”

12 月 4 日至 22 日，艾森豪威尔以扩大冷战为目的访问了欧亚非十一国。他在访问中竭力鼓吹加强西方军事集团，说“北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说美国不能放弃中央条约组织，并积极活动扩展美国在国外的导弹基地网。

12 月 9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不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在 10 月 27 日发出的呼吁，拒绝从朝鲜南部撤退美国军队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并且坚持在朝鲜进行在作为交战一方的联合国“监督”下的所谓“自由选举”。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提案。

12 月 15 日，赫脱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计划”，要求这个集团具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威慑力量”和进行局部战争的“充分灵活性’’。

12 月 24 日，美国指使老挝少数极端亲美分子发动军事政变，进一步扩大老挝内战。

12 月 29 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自 1960 年 1 月 1 日开始，“有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自由”。

1960 年 1 月 7 日和 18 日，艾森豪威尔提出国情咨文和预算咨文，要求美国“奉献出我们的任何一点力量”，来提供“威慑力量”，规定 1961 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为四百五十五亿多美元，占总预算的 57。1％。他在国情咨文中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是“警察国家”，诬蔑苏联是“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阴郁的卫星国体系”。

1 月 15 日，尼克松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和它的盟国都不可减少他们的兵力”。

1 月 19 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在华盛顿签字，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直接针对中国、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威胁亚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

2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他并且表示，美国将把核武器的秘密资料交给它的同盟国。

2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再次拒绝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集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2 月 15 日，赫脱发表声明，竟然要求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重新享有国家的独立”。

2 月 16 日，艾森豪威尔在“共同安全”咨文中说，“苏联削减军事人力的事实粟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粟并不改变我们保持集体防御的必要性。”“放弃或削弱我们的共同威慑力量地位将是极为愚蠢的。”他说，美国要“坚定不移地、不事声张地、耐心地坚持为保持我们的共同防务而努力”。他宣布新财政年度的对外军事援助拨款为二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多七亿美元。

2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在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说，美国将继续执行美国国会在 1957 年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即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

2 月 19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演说，表示美国要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仍然“期望”新中国“崩?保 ⑶宜得拦 葱小耙幌钅鼻蟮窒 ㄖ泄 ㄒ庵至 α 吭龊ミ恼 摺保 凹岿种荚诙愿墩庵至 α 康拇胧 薄?

2 月 22 日至 3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访问南美，鼓吹加强“泛美制度”，赞扬美洲国家组织为干涉古巴而在去年 8 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外长会议，并且表示要继续坚持把美洲当作美国人的美洲的所谓门罗主义。

2 月 26 日，美国在违反朝鲜停战协定不断地把导弹武器运入南朝鲜之后，公然在南朝鲜乌山发射“斗牛士”式导弹。

2 月 29 日，美国复照古巴政府，拒绝古巴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古谈判的必要条件，即美国不要采取可能损害古巴人民的措施。并且威胁说：美国始终可以自由采取它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步骤”。在这之前和以后，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古巴。据古巴总理卡斯特罗 3 月 14 日说，美国飞机对古巴的空袭已达四十多次。

3 月 9 日，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萨脱斯威特说，美国在北非“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益”。“美国保持使用它在非洲的某些重要基地的权利，美国和它的盟国继续在非洲取得广泛的重要物资，主要是矿藏，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并且说，“有必要把（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有条不紊地从过去过渡到未来的方法加以协调”。

3 月 16 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开始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军五万人参加。

同一天，即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发表联合公报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一致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政策”。“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柏林的权利”。

3 月 21 日，美国军舰又一次侵犯中国领海。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九十三次严重警告。从 1959 年 10 月到现在，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共达二十一次。

3 月 30 日，艾森豪威尔表示，即使美国现在同意签订关于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下届美国总统仍然可以不受约束。他说，“任何继任者都将有权对这个

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赫脱 4 月 8 日进一步说，从法律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使美国承担较长一段时期的义务的能力”，“仍然限于他自己的任期内”。

4 月 4 日，赫脱发表演说，拒绝苏联关于全面裁军的建议，攻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谈话，说他“使局面复杂化”。赫脱说，“如果任何人期望在最高级会议上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可能会失望”。他对西德的加快重新武装表示“满意”，并且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陆海空部队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4 月 6 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加速发展洲际导弹和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的计划。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把原定三年内制造的洲际导弹的数目从二百七十个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个，核潜艇从七艘增加到四十艘。

4 月 9 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舰队司令本逊叫嚷说，美国将用三十艘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来包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

4 月 14 日，美国代表伊顿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建议，并且再一次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这里所列举的当然极不完全，而且也只限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报刊所公开宣布了的材料。但是请问，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事实呢？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美国当前政策中的主要事实呢？难道能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捏造？难道能够说，这只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些次要的、不值一提的旧时代的遗迹？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事实是，尽管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美帝国主义不但正在竭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迫不及待地扶植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它们成为新战争的策源地。要知道，这一切事实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反对西德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其他为美国所扶植的军国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对这一切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离开这一点也就离开了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不集中力量对美国当局的这种战争政策继续进行坚决的揭露和严肃的斗争，就必然会招来惨重的灾难！

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最前线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权利对这一切事实保持沉默呢？有什么权利只让美国人作这一切，说这一切，知道这一切，而不让中国人和别国人知道事实的真相呢？难道向中国和世界的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就不利于和平，就会加剧紧张局势，而隐瞒真相才能有利于和平与和缓局势吗？难道按照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和平就是这样“保持”的吗？或者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

积极策划新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确实希望我们隐瞒事实的真相，希望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希望我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甚至已经改变，希望我们完全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不去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迫作出的和平表现，使人民群众丧失警惕，或者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战争威力，使人民群众惊惶失措。总之，新战争的策划者希望我们同他们一样地假要和平，要假和平，以便他们可以把战争突然强加于各国人民，仍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但是，新战争的策划者听着吧，你们的希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我们既然是真要和平，要真和平，我们就永远不会堕入你们的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一切危害和平的阴谋诡计，用最大的努力去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广大群众起来同新战争的策划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并且使他们在斗争中既保持充分的警惕，又保持充分的信心，为阻止新战争而斗争到底。只有这样，才是真要和平，才能得到真和平，否则就是假要和平，或者只能得到假和平。

尽管如前所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完全确信，只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再接再厉的斗争，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就一定有可能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帝国主义不能按其本性为所欲为。并且，在万一的情况下，如莫斯科宣言所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死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莫斯科宣言指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为了减弱而恰恰是为了加强和平的前景。因为只有这样，各国人民才不致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才不致屈服

在战争狂人的恫吓和讹诈之下，并且才不致在战争竟然不幸爆发的时候惊惶失措。

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需要灵活和耐心，需要达成一定的谅解和妥协。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过去不曾杜绝过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妥协，今后也不会拒绝这种妥协。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关于东西方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努力，并且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改变它迄今采取的顽固态度，从而使这一会谈能够为裁减军备问题、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以及和缓国际局势问题达成各国人民所期待的协议。

但是，争取世界和平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接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而且，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所同意的协议，帝国主义也可以随时推翻，因此，无论为了取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或是为了保持这些协议，都必须通过斗争。列宁说得好：“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轻易获致，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正因为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本性的产物，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持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反复地宣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一切欺骗手腕，就成为目前和平事业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既然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须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莫斯科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秉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这个联合斗争。他们梦想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说：既然要和平，被压迫的民族就不应该反抗侵略，被剥削的人民就不应该起来革命。他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有不准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义务。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或者被剥削人民说来，革命总是不能输出的。同样，革命是谁也无法和无权禁止的。现代的革命基本上起源于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和本国劳动群众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除非帝国主义者放弃这种侵略、压迫和掠夺，除非帝国主义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也就不会放弃他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却造谣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干涉任何别国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政。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却想强迫或引诱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难道不是绝顶的荒谬吗？

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继续用暴力推行侵略政策、压迫政策和掠夺政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的。因为他们的斗争代表人民的愿望，是削弱帝国主义势力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认为这种斗争的发展和对这种斗争的支持不利于和平事业，这难道不是绝顶荒谬吗？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努力制止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强大，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愈强大，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增长。因此，壮大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就能够更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伟大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首先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的现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对这种支持的感谢，也永远不能忘记用自己的努力去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就着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知道，在北京天安门两侧的大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在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中国人民感觉欣慰的是，我们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团结正在日益发展，我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爱好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也正在日益增进。中国人民将在这个基础上不倦地加强我们同所有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以便为争取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世界人民的团结，在一些国家里疯狂地煽动着反对中国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得到也永远不会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因为这种运动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人民在自己家里勤劳地建设着和平的新生活，努力同自己的邻人友好相处，并没有跑到哪个外国和外洋去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我们知道，列宁所缔造的苏联，从来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也在长时期中受到一些大小国家（包括一些它所援助的国家，例如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的一些为着某种国内目的而反苏的人们的诽谤和攻击。但是这既没有能够丝毫损害于苏联，也没有能够阻碍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好的发展，而只是暴露了那些反苏分子的反和平、反人民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派所煽动的反华运动，也只能得到同样的结局。

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现在特别疯狂地使用各种卑鄙的方法企图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这些挑拨者恶毒已极，而又愚蠢已极。他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在伟大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宣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们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们需要互

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们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进行这种疯狂的挑拨，不是他们地位巩固的表现，而是他们接近死亡的表现。列宁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迅速胜利，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十五年中的迅速胜利，使他们魂梦不安。在这种得到极广大群众支持的惊天动地的胜利面前，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如同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的“泥塑巨人”而已。他们仇视在列宁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猛烈发展和坚强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愈是咒骂，就愈是证明列宁主义的必然胜利。列宁在被革命敌人攻击的时候就高兴，因为这正好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人们对他造谣诽谤，

但是他要听到的赞扬，

不是他们甜蜜的夸奖，

正是他们的怒骂如狂。

列宁主义的正确，难道不是靠敌人的怒骂，而是靠敌人的夸奖来证明的吗？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中，在加强对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努力中，都曾经遇到革命敌人的疯狂攻击。但是这一切正好证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向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向着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勇敢地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必将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途中某些曲折和停滞，毕竟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我们在本文开头曾经提到列宁在 1913 年的论文《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在那篇论文里特别提到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因为当时欧洲的革命发展曾经比较停滞。列宁当时就断言这种停滞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断言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说：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欧洲也跟着亚洲棗不过不是按照亚洲方式棗动作起来了。……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解体和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列宁的这个科学的预见在 1917 年的俄国证实了，接着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现在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不止在亚洲，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来了。天涯地角，再没有一处是帝国主义的安全的后方。西欧和北美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平”。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民族独立运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和平运动的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实际上也越来越像列宁所说的一桶火药。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一致努力，使列宁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获得更大的胜利吧！

根据一九六 0 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六 0 年四月二十二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一

今年 4 月 2 2 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 1 8 7 1 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① 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

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阐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１９１９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②。 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辩驳的真理。 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本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府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

能在一切国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复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将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既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1)(2)) 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

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式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４０％，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复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

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 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正如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

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 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③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

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复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１９６０年的将近６０％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战的危险呢？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 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

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末快，有多末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④。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⑤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⑥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１９１８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

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⑦。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 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

说”中曾说过：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 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 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 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 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 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 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 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 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 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⑧。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 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

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

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2)(3)）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

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

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 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⑨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１９２０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⑩。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４０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１９４１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

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复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１９２０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①。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１９５５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１９５７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①②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

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①③；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

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 在１９１８年６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④。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

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①⑤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①⑥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 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①⑦ 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①⑧ 因此，我们怎样去

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 主义”。①⑨ 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 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 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 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②⑩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②①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恩格斯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 清楚：任

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 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 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 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 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末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②②。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 7 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②③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１９４６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了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

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3)(4)）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１９０５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②④。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②⑤。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 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 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 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 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②⑥。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 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 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 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 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

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１９１９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②⑦。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②⑧。 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 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 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 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

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②⑨。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 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 一思想”。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末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取得胜利的。 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１９２７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

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 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 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 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③⑩。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③①。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

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六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 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 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

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 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 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

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注释：

①“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②“新民主主义论”

③铁托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④“打着别人的旗帜”

⑤“第二国际的破产”

⑥“打着别人的旗帜”

⑦铁托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⑧“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⑩“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①①“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①②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①③见南斯拉夫“战斗报”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一文

①④“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①⑤见伯恩斯坦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①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①⑦“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①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⑨“预言”

②⑩“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①“给欧美工人的信”

②②“革命的任务”

②③“论口号”

②④“军队与革命”

②⑤“国家与革命”

②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②⑦“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②⑧“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②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③⑩“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③①“‘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

一九六０年四月二十二日，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中，坚决地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鼓掌）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名字，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热烈鼓掌）

九十年前，当列宁诞生的时候，人类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锁链，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鼓掌）十月革命实现了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帝国主义妄想扼杀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当时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的指示，使苏联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地从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帮助东欧各国的人民赢得了自己的解放，帮助亚洲各国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热烈鼓掌）现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这些伟大的成就，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热烈鼓掌）

列宁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在同帝国主义、各种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列宁主义是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特性，列宁主义的精华，就在于它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鼓掌）列宁主义不但全部地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所磨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鼓掌）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全面地暴露出来了。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作出新的分析。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列宁，他执行了这个任务。（鼓掌）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彻底地驳斥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对帝国主义的粉饰和辩护。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发展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企图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用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用镇压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争，把千百万人投入血海中，来消除上述这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反

革命战争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恰恰更加剧了这些矛盾，更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大家晓得，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在他著名的那封《远方来信》里，曾经就俄国的革命问题指出，当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这样一个“万能的导演”：它大大加速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并且使得遍体血污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世界历史中的特别急剧的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强大”的外表吓破了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收买，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影响，反对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堕落到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耻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一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前线。列宁拆穿了机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帮凶的面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主张用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鼓掌）

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为了粉碎考茨基之流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修正主义“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为反对旧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比之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得百万倍的政治制度。（鼓掌）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最后目的，还必须继续前进，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列宁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得到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将包括一整个的历史时代。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满怀着信心，他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鼓掌）

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个规律，并且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人类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鼓掌）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热烈鼓掌）

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进到另一个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才取得的。（鼓掌）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帝国主义是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的敌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武装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武装占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采取封锁禁运的办法，和企图利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来消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革命精神，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奴仆所散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作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统治，并且巩固地保卫着我们的革命果实。（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曾经同资产阶级的政党棗国民党棗两次合作，两次分裂，所以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也有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具体地只用了列宁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想，民主主义革命是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革命的不断胜利起着指导作用。（鼓掌）

列宁告诉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不行的。这个党，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应当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应当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反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经过了多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党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热烈鼓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才能够巩固地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民主革命的胜利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是我们极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正确地具体地解决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列宁在说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又说：“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指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开展得愈早，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我国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民主革命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得愈迅速、愈顺利；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经济战线上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如列宁所说的“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因而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跃进。（鼓掌）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只有互相适应的一面，没有互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建设，只要依靠技术，不需要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巩固，无须发展，即使还要发展，还要前进到共产主义，也无须经过斗争，无须经过质的飞跃；所以，人类社会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这在哲学思想上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鼓掌）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

内部矛盾的界限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同上述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其他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它还不是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要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向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积极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指出了我国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鼓掌）

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得到伟大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援助，（鼓掌）得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鼓掌）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援助。（鼓掌）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鼓掌）

对于这种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了根本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全世界人民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革命的发展，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现代修正主

义者却认为，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已经从世界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新时代”。他们认为，不要经过革命，帝国主义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要进行反帝斗争，持久和平就会自然到来。这样，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热烈鼓掌）

现代修正主义者篡改、阉割和背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已经放弃了”。他们借口所谓“应当历史地、非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的理论遗产，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

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占了优势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内部困难重重，它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千方百计地进行挣扎。最近时期，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麻痹世界人民，力图采取某些更加狡猾的、更具有欺骗性的策略。连美帝国主义者，有时也并不隐讳他们要采取所谓更“灵活”的策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交替使用战争手法和和平手法。他们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进行核战争讹诈，另一方面，散布“和平”的烟幕，使用糖衣炮弹，企图造成帝国主义主张和平的假象。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收买，企图软化和分裂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采取这些欺骗的办法，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掠夺和侵略的本质，掩盖他们准备战争的步骤，以图达到瓦解各国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瓦解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奴役各国人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针对着帝国主义反对人民的各种手法，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应当有原则的严肃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各种各样的革命手段和斗争形式，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议会外的和议会内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军事的和思想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充分地揭露帝国主义，拆穿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不断地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更广泛地动

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展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准备和取得人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应该联合自己的后备军。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无产阶级除了应当同他们结成巩固的同盟以外，还应当在各个不同时期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人。当然，无产阶级也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只是一时的、部分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鼓掌）

在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只要有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和相互访问，争取用和平方法而不是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争取订立和平共处的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完全允许的，必要的，是对各国人民有利的。

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热烈鼓掌）

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已经自动放弃，因此，反帝斗争不需要了，革命也不需要了。他们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帝国主义，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涂脂抹粉。在他们的口中，艾森豪威尔成了“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和平的敌人，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总而言之，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似乎同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谁还要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还要坚持革命，那就是妨碍和平，妨碍和平共处，就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笑声）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懂得什么叫做教条主义，并且不断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就具有丰富的经验。教条主义者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不懂得集中力量去反对

最主要的敌人，不懂得去同各种中间力量进行适当的联合，不懂得灵活运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结果是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这种教条主义，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着推进革命，为着打倒敌人。（鼓掌）这些人恰恰同我们相反，他们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革命，企图取消革命，曲解和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且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有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有所改变。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鼓掌）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经改变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问题的提法，并且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所不可能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改变，不但丝毫没有减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且更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而艾森豪威尔是现在美帝国主义的首脑。列宁早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扮演着宪兵的角色。现在，美帝国主义更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绞杀革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破坏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美帝国主义不仅时刻企图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极力向中间地带扩张，妄图独霸世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支柱。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入民要争取民族解放，全世界人民要维护世界和平，都必须把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热烈鼓掌）敢不敢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敢不敢同他

们作斗争，是要不要进行人民革命，要不要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要不要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的试金石。（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就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只有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才能够进一步地有效地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样地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离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会大大削弱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而有利于帝国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起来革命，打碎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档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起着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斗争。（鼓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同样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可以束缚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手足。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的革命斗争。（鼓掌）坚决支持这两种斗争，也就是有力地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鼓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下，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必须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直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作为列宁主义者，必须经常记住列宁的这些基本论点。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笑声、全场活跃）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中，能够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

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因此，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通过生动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具有首要的意义。”

宣言又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高度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代理人粲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是我们神圣的责任。（热烈鼓掌）

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所公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忠实地遵守和执行这个伟大的纲领。（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都必须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鼓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鼓掌）维护

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热烈鼓掌）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持久的和平一定会来到人间。（连续不断地热烈鼓掌）

让我们在伟大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吧！（长时间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根据《陆定一文集》刊印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6）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

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

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二、研究资料

阎明复《刘少奇出席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0 年的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现在大家知道的事实有 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的长波电台事件和共同舰队事件；1959 年，苏联片面地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发生纠纷的时候，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1959 年 10 月，我们国庆的时候，赫鲁晓夫来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紧接着 1960 年的 6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国的突然袭击。这样，中苏两党的关系继续恶化了，赫鲁晓夫从布加勒斯特回去之后，片面决定从中国撤走全部的苏联专家三千多位，撕毁了几百个经济合同，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分歧，导致中苏关系处在破裂的边缘。1960 年 9 月，举行了中苏两国的谈判，也没有消除分歧。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作了召开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莫斯科会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莫斯科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0 月 1 日开始，举行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由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组成了为莫斯科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中国党代表团是小平同志任团长，彭真同志为副团长，

团员里面有李井泉、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还有很强的顾问班子，以胡绳为首。　　这个会议从 10 月 1 日开始到 10 日，召集了七次全体会议，每个代表团都作了一般性的发言。小平同志在 10 月 5 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和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提法，申明了我们的观点。全体会议以后，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秘书处，负责修改文件。文件的草案是苏共代表团提出来的，秘书处是每个党的代表团派两个人参加，中共代表团是康生和乔木同志参加的。从 10 月 10 日到 21 日召开了十一次会议，讨论和修改草案。我们代表团在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组织下，研究了苏共的草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秘书处会议上由康生和乔木根据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方案逐条来提出我们的意见。　　讨论当中，涉及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苏两党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比如说时代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危机、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问题也都属于小平同志在 1989 年跟戈尔巴乔夫谈话中所讲的：我们大家都说了一些空话，我们自己对现时代的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变化理解也不是很深刻，都说了一些空话。同时讨论当中，也涉及到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涉及到兄弟党关系准则的破坏，包括对苏联二十大、二十一大的评价，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强调协商一致。特别是小平同志发言当中，对苏共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民族共产主义、单干、集团活动、派别活动，我们都提出了我们党的看法。　　秘书处的会议也开得十分激烈，除了我们中共代表团提出修改意见，其他的代表团也提出修改意见，大家都发言，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各自为自己的意见来辩护。我们党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苏共代表团发言，同时也组织其他代表团来反驳。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日本等代表团除了阐明自己的意见外，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都表示了支持。　　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别的党的代表团对自己的修改方案，也提出并且进行了辩护，另外一些代表团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会开得很激烈。开不下去了，就成立小组委员会，离开会场到别的屋子去进行谈判，进行妥协，大会套小会，每天开会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开十几个小时。到 21 日，秘书处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一些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 10 月 22 日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

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发言，提出有三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团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是我们党坚持的，就是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讨论什么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强迫少数接受意见的行为和方法，应该采取通过协商、讨论、交换意见，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达成一致，苏共反对这样的提法。第二小平同志讲，文件草案全面肯定了苏共二十一大，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你怎么能够凌驾于全世界所有党之上？一定要服从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决议，这是不对的。第三个问题，小平同志说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还有保留意见。　　1960 年 11 月 10 日到 12 月 1 日，在莫斯科举行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少奇同志，副团长是小平同志，团员有彭真、陆定一、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等等，顾问还是乔冠华、吴冷西等等，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少奇同志亲自率领代表团，显示了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也的确想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弥合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直到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当做局部性质的分歧，形象地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地对待，认真地交换意见，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所以当时确定的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本着这个精神，本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少奇同志亲自带队到莫斯科。　　代表团是 11 月 5 日离开北京到莫斯科的，7 日参加了十月革命 43 周年的纪念活动。11 月 7 日苏共交来了对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的答复。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通知书，什么是答复的答复。这是在 1960 年 6 月 21 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给中共中央一封通知书，其中对我们党的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对我党定调子，这是通知书。我们党中央在 9 月 10 日对通知书提出了答复，驳斥了苏共的攻击和指责，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这是对通知书的答复。11 月 7 日，在 81 国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对中共中央答复的答复，挑起了尖锐的争论，在会议前夕，就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11 月 9 日下午，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少奇同志的住处会见代表团。他们说受苏共中央的

委托，把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告诉我们，立场就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因此赫鲁晓夫在这个即将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到他的答复书中谈到的问题。两党的分歧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提到这个会议上。米高扬说，希望两党的争论就此结束，不要再提了；而且说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专家还会重新派去。　　对此，少奇同志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愿望来的，我们在北京准备了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讲话，稿子都准备好了，现在你们 11 月 7 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愿望，原来的想法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边说团结，不争论，一边又提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说团结不真实。你们的来信我们研究后，将决定我们的立场，看来非要在会议上回答你们不可了。争论是你们挑起来的。　　我们党内的同志知道，少奇同志的原则性很强，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在处理具体的问题上，也有非常突出的灵活性，既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原则方针，又使会议达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很明显，苏共中央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不提争论，把他们的攻击吞下去，表面上是他们照顾团结，而实际上是以散发答复的办法来谴责我们。会议开了将近二十天，每天代表团都在大使馆，在少奇、小平同志的主持下，研究会议出现的情况，确定我们的对策，每天都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和与其他代表团接触的情况向中央报告，重大的决策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和批复。　　11 月 7 日，苏共中央交来的答复的答复，对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对毛主席的论点，比如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进行了攻击。这些攻击，使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必须驳斥，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斗争。当时代表团就讨论，谁代表代表团发言。因为发言以后，苏共以及其他的一些党在苏共的组织下一定会发起攻击，会有很激烈的斗争。所以当时想，少奇第一次不要发言，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如果他发言，那么其他代表团的发言一定会指名道姓地骂少奇同志。所以，当时决定由小平同志来发言，这样，该讲的话就会讲透。这个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1 月 10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发言，多次影射攻击中共。赫鲁晓夫讲话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党带头鼓掌起立，这样全场跟着起立，我们代表团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对赫鲁晓夫发言的态度。实际上，事先也没有商量，赫鲁晓夫讲话中影射攻击毛主席和中共，大家都很气愤，所以在场的同志都看着少奇同志和小

平同志，他们没有站起来我们也没有站起来。　　11 月 14 日，小平同志在全体会议作了长篇的发言，就当时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比如说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和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互相援助和自力更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做了精辟的申明，申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提出了我们不能同意和接受苏共的论点。　　在发言中，小平同志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错误，破坏了中苏关系。小平同志最后呼吁，让我们迅速采取缩小分歧的步骤，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和父子国的关系的。小平同志最后讲，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最后代替了团结，世界的形势必然会发生巨大的逆转，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和平，对于世界进步事业都是灾难。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态表明，小平同志真的不幸言中了。从 11 月 10 日会议开始，特别是 11 月 14 日小平同志的发言后，苏共组织了大批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发言，对我们进行激烈的攻击，为苏共辩护。同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澳大利亚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当中，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里要指出，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当中，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指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错误的，并且讲了很多的事实，说明阿尔巴尼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断绝援助，分裂阿尔巴尼亚党。霍查指出，正是苏共在搞派别活动。

霍查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震动，有很多代表团发言，对霍查进行辱骂。到此刻为止，事态已经非常的明显，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企图操纵多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会议的代表，这一点非常的明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如果苏共中央坚持在草案中保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提法，坚持要写上派别集团活动，拒绝坚守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且发表声明，谴责苏共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中苏两党的关系。代表团把意见报给中央，不久接到中央的指示，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且告诉代表团，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不签字不等于分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代表团就把决定

陆续地通知了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团。　　11 月 21 日，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还有他的总理到少奇同志的住所来拜访少奇同志。他开始讲了一些必须团结的话，然后提出两点意见，怎样修改草案。第一是只写苏共二十大，肯定二十大，不写二十一大，而且在文字上，完全可以照抄 1957 年的声明当中对二十大的提法。第二就是派别活动，谴责派别活动，要写上，写法可以改变，力求使别人不会理解是针对中共。少奇同志就讲了非常精彩的一段话，语重心长，也表明了我们党坚定的态度。少奇同志说，1956 年苏波关系不好，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大家知道，应赫鲁晓夫的邀请，少奇、小平同志专门在苏联和波兰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到莫斯科去调解苏波关系，而且苏联准备动用武力包围华沙，向华沙进军的时候，毛主席连夜会见了苏联大使，讲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你马上告诉赫鲁晓夫，你们要出兵，我们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在全世界谴责你们。赫鲁晓夫迫于中国坚定的态度，就改变了向华沙出兵的决定。实际上，由于中共中央，由于毛主席坚定的态度，保护了波兰，使波兰免受战争的浩劫。　　少奇同志讲，苏波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现在你们关系好了，我们很高兴，当此中苏关系发生争论的时候，也希望波兰同志本此精神，做做工作，而不要增加困难。你们在起草委员会，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波兰起草委员会建议写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对中苏的团结很不利。而且哥穆尔卡的发言中，对霍查同志的态度不能容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阿尔巴尼亚只能同情，不能指责。哥穆尔卡在霍查发言后，接着发言，谩骂霍查，说霍查的讲话是肮脏的，不能容忍，是流氓式的。针对这一点，少奇同志说，你们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至于他提出的两点建议，少奇同志表示，坚决不能同意。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能写上，主要是因为国际文件中，不能够把哪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全面的肯定，拿来作为共同的准则，何况，中共对两次大会有意见，只写二十大也不行，原因一样。1957 年宣言起草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不同的意见，结果让步了，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现在不能犯了，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误。第二，派别集团活动的提法，如果写上，会后患无穷，这明明是说我们的，不能让这种反中共的运动合法化，写了你们合法，反华会更厉害，不写你们无非也是反华，但是是不合法的，也许可能反得少一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写上去，

如果写上去，我们代表团绝对不能签字。这种态度已经取得了我们党中央的批准。哥穆尔卡又讲了一些希望团结的话，说今天来，是自己来的，也没有跟苏共商量，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他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这已经不是政治问题了，而是军事问题，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不能有自己的单独行动，只能服从，不能闹独立。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少奇同志对这一点做了严肃的批评，说哥穆尔卡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是错误的，你说霍查的讲话是肮脏的、流氓的、无耻的，这种讲话就是流氓性、不能容忍的口吻，这无助于团结，应该同情和支持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和小党不可能欺负别人，只会受别人的欺负，如果和苏联一起坚持对它的欺负，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如果我们在 1956 年的时候，不批评苏联对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对你们的压力，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少奇同志讲完这番话后，哥穆尔卡无言以对，就说我来看望你，都是老朋友，本来是想为声明草案达成协议，交换意见，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你们的意见，就这样吧。这是少奇同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实际上通过哥穆尔卡，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苏共。针对苏共和其他一些党对我们的攻击，小平同志在 11 月 24 日的会议上，做了第二次发言，强调了我们的意见。11 月 24 日、26 日，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是彭真、康生、乔木、陆定一参加。由于在 10 月份的起草委员会上，已经就草案的大部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次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28 日、29 日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讨论存在的急迫问题，包括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包括协商一致，包括集团活动、派别活动，这个问题在会议上争论得非常厉害，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到此，会议出现了僵局。11 月 25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邀请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等代表一起开会，呼吁中苏两党克服分歧，达成一致，并且开始斡旋。　　我们代表团和中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及时把情况报告给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杨尚昆同志，告诉他中央正在研究在声明上签字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签字，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签字。事关重大，所以中央已经决定请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北京商量这件事情。

11 月 26 日下午，苏共中央的米高扬、苏斯洛夫来少奇同志的住所，看望少奇同志。表面上是重申邀请少奇同志对苏联的访问，实际上是想探听我们代表团的最后态度。少奇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明确表示了对会议和声明草案的看法。少奇同志讲，对苏联进行访问，我原来有计划，你们现在重申邀请，可以考虑，但是这要跟会议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应该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访问。接着，就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第一，我们是本着团结的态度来的，但是苏共 11 月 7 日的信散发之后，情况就变了。　　第二，这次会议有表面和实质的东西，表面讲团结，搞声明，赫鲁晓夫还两次讲话，实际上是散布 11 月 7 日的信，组织对中共的攻击和谴责，大会实质上就是在苏共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苏共在会内会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来反对中共。所以会议是在错误的方针下进行的，现在已经走到了边缘。希望苏共慎重地考虑，改变这一方针，不至于错误到底，免受历史的谴责。　　第三，大会的气氛极不正常，不讲理，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你们都不能驳倒，而只是一口咬定中共的立场、路线是错误的，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第四，重申草案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而你们硬要坚持写上几点，设置障碍，有使会议得不到结果的可能。　　最后，少奇同志讲，如果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上写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派别活动的问题、肯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还搞一个内部的决议来谴责中共，我们代表团不能签字。　　米高扬、苏斯洛夫辩解了一番，说少奇同志提的几点具体的修改意见，都可以商量，协议是有让步的，总可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见之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就到大使馆去了。少奇同志讲，二十大是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命根子，他们可能要坚持写上这一条，其他的可能不会坚持。正好，在这天的晚上，收到了党中央的来电，指示一定要在文件上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个时候，胡志明同志到大使馆来，见了少奇同志，说他们斡旋了一些党的代表，当天见了赫鲁晓夫，他的态度是二十大不是我苏共提的，是别的党提出的，我们当然赞成写了，宗派集团活动可以不写，但是要搞内部的协议。这是 26 日的事情。　　11 月 27 日的下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在大使馆会见了进行斡旋的领导人，有越南的、印度的、澳大利亚的、朝鲜的、印尼的、日本的。他们几个同志先后讲话，表示希望团结，希望中苏两党找出道路，使会议能够达成共识，避免分裂，并且希望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直接见面，交换意见。少奇同志向他们说明了我们

的意见，说明我们代表团对会议没有达成协议的看法。　　11 月 28 日清晨，胡志明来到少奇同志的住所，约少奇同志一起去见赫鲁晓夫。这很突然，事先没有商量，也没有约定，少奇同志拒绝了。当天，11 月 28 日，收到中央的指示，中央要代表团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是绝对不能同意集团派别宗派的提法，或者是作内部的决议。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讨论，决定本着中央的精神来进行工作。第二天，29 日上午，杨尚昆同志会见了胡志明同志，告诉胡志明，少奇同志随时准备和赫鲁晓夫见面，只要赫鲁晓夫采取主动，什么地方都可以。胡老说，他马上转告苏方。这一天，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代表们就苏共二十大、集团派别活动等进行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候，彭真同志建议休息再开会。在休息的时候，彭真同志与苏方代表交换意见，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到底你们想怎么办。这时候，由于我们坚定地表示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苏共也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所以苏方表示：第一，二十大要写，二十一大可以不写，具体的写法可以照 1957 年的声明，或者另行商量一种新的写法。第二，派别活动的提法可以不写，虽然这是正确的，写派别集团活动不是错误的，但是为了迎合中国同志的要求，可以删去。第三，可以写上协商一致的话。第四，内部秘密决议可以不搞。　　形势急转直下，彭真同志当即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你们苏方提出的方案解决，现在我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团长报告。然后约定时间，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会谈。彭真同志马上就回到使馆，向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的同志报告，少奇同志同意按照此方案进行，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方案，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的，决定立即通报越南、朝鲜、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跟他们进行磋商。他们都表示支持。在胡志明主席的住所，他听了很高兴，老人家眼泪汪汪，要服务员拿香槟酒，为取得的协议干杯。当天晚上，苏方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赫鲁晓夫明天上午 11 点钟约见少奇同志，除了少奇同志之外，谁参加由少奇同志决定，少奇同志认为需要去的都可以去。我们代表团同意了。　　11 月 30 日上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人进行了会谈。少奇同志着重谈了团结的问题，中苏的团结，12 个兄弟国家的团结，并且特别指出，苏联应该注意解决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它，更不能施加压力。在这方面，我们中共可以做一些工作，

但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应该改变。对此，赫鲁晓夫进行辩护，不愿意改善同阿的关系。会谈中，双方表示，希望结束两党的争论，不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 1957 年前的水平。双方商定，会议之后，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当天晚上，少奇同志回访了哥穆尔卡，少奇同志介绍了同苏共达成的协议，劝说波兰善对阿尔巴尼亚。但是哥穆尔卡仍然攻击阿尔巴尼亚，为苏联辩护。同一天下午，起草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斯洛夫拿了最后一个文本，一条条地念。彭真同志就跟我说，不要念别的，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协商一致的提法。我一看，居然没有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彭真同志就说，你跟我走。我们走到苏斯洛夫面前，彭真同志说，我们要跟他谈一个问题。大会是在条式大厅里举行的，旁边就是最高苏维埃开大会的大厅，大厅里耸立着一个大型的列宁肖像，彭真同志拉着苏斯洛夫的手，走到列宁肖像的旁边。彭真同志对苏斯洛夫说，你当着列宁的面讲，为什么违反协议，文件里不写协商一致的内容？苏斯洛夫满面通红，说漏了漏了，一定会写上。这样，文件起草的几个分歧最后达成了一致。　　12 月 1 日，莫斯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接着少奇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少奇同志指出，会议的声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愿望的，是有利于争取和平、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它又一次证明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协商的办法，取得一致，是兄弟党之间解决分歧的唯一道路，虽然过程是曲折的，有一段时间内的气氛不正常，但是兄弟党之间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不少兄弟党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不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妨碍我们和兄弟党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同志党关系。少奇同志最后指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重要性。少奇同志讲完话后，赫鲁晓夫带头鼓掌，苏联代表团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然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少奇同志说，我们不要按照俄文中的国家名称的排列顺序，建议苏共代表团先签字，然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签下去。大家同意了。这样会议结束了。经历了很复杂的斗争，由于我们坚持原则，删掉了苏共企图强加给会议的一些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整个的宣言草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会后，少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莫

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这一路上都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陪同的。走之前，少奇同志去看望了赫鲁晓夫，他病了，在家里，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应该由我们两党来协商一致，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两党应该团结。劝他要善对阿尔巴尼亚。整个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当时是作为翻译参加代表团的工作，由于时间隔了很久，查了档案之后，才把遗忘的东西重新想起来。

少奇同志从列宁格勒、明斯克访问回来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列宁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苏中友好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讲他年轻时代就坚信马列主义。少奇同志是在苏联入党的，所以他说一生都致力于中苏关系的加强，追随共产主义的事业。他讲得非常有感情，当时全场热烈地鼓掌。在整个长篇讲话中，有二十多次热烈的鼓掌。我有一个照片，我当时正好站在他的后面。

2011 年 5 月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7）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本节资料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意大利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墨索里尼黑暗统治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以及在战后时期，都有过令人钦佩的英勇斗争业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意共的同志们和意大利人民，向来怀着深切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谊的一贯立场，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十二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这样，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攻击，对他们发表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则的观点，不

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看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和他的总结发言，看了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人们不能不感到，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了。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惯于用那种晦涩的、暧昧的、使人们不容易看懂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真正观点，但是，如果揭开这一层薄薄的面纱，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观点的实质。他们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的幻想，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根本对立，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一种所谓“新的国际秩序”。他们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极大的幻想，混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专政，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所谓“结构改革”，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并且把所谓“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一九六〇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词，没有说出中国同志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整个争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指责中国“好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一贯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但是，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战争的结局必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们都申述了这些观点。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观点，而不是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同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场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人们记得，三年前，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像我们一样在为和平操心。人们也记得，当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

威尔访问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在欢迎标语中有这样的话：

“罗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并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会见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团结报》。）

现在，我们又听到有人宣传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请问，这种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吗？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证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骗全世界人民吗？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了。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观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他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

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他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奴役。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

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二）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二个分

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三）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

“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页。）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

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

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吗？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竟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申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如果谁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五）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而且把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概念，引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上来。陶里亚蒂说：“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终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从不试图干预。现在，既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论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且片面地说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而这个问题又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问题，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意见。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这个思想贯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要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过：“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的时候，首先指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种所谓“结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争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资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剥削和统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赞成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事实证明，一旦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镇压。这种阶级斗争的不可改变

的规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吗？怎么能够设想，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统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他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可见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但是，他们竟然把这种连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扬，并且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吗？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蜕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纷纷鼓吹所谓“结构改革”论，并且以此攻击共产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所谓“结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遥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有人企图借此为“结构改革”论辩解，这是徒劳的。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利的。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共产党人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共产党人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该

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说过：“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八年出版。）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线吗？

（六）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请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反华的讲台。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铁托集团辩护，吹嘘铁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值“。

我们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们的约束力呢？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清清楚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铁托集团的谴责是错误的吗？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观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吗？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铁托集团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

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铁托集团并没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赏给了铁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铁托集团继续披着“超集团”、“积极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随着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随着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赖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铁托集团的蜕化而逐步实现的。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页。）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现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铁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级分化正在加剧。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起着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听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评价，不是没有益处的。美帝国主义把铁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说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现象的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质，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当你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驳倒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可是，诡辩改变不了真理。他们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没有看到一个资本家。当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洞察真相的。既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铁托集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视而不见，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视而不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嘘他们同铁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允许的”。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铁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们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国有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铁托集团那样亲如手足、而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绝的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七）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观点的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领导人贾·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销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无产阶级

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绝对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尽管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竟然说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具有许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规律的独特路线制造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在另一时间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须代之以新的论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

确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再一次证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说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顺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顺从修正主义的“理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顺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级的唾弃。×　×　×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即使在我们被迫公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我们认

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嚣一时，但是，这并不表现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们的虚弱。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既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一九一三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论述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列宁当时正确地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页。）现在，我们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正重新尖锐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终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马克

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六 0 年三月，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

被伟大的列宁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革命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

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就在于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加剧了的矛盾，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同样，列宁主义也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每一次新证实和新胜利，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

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往往借口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群众，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形式重复着。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口口声声说“忠于列宁”，其实，他们恰恰也是在那里借口历史发展的某些“新材料”来迷惑人们，毁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攻击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即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现代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样，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寿命不长的资本主义，并且简直把现代帝国主义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美化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有化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等，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什么“计划经济的实现”、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开始”，等等。他们大谈其“逐渐的变化”、“革命与改良的统一”、“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但是，却绝口不谈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实现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列宁所努力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正是这个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因为没有这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一些空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列宁说得好，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 。

这里包含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看法的根本分歧。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的时候，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之上的，立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像远避瘟疫一样地远避这个观点，歪曲十月革命的经验，讳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他们实际上把我们的时代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重视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必须发动群众，全力领导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运用那里已有的民主权利，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来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暴力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应当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行广泛的民主，也就是说，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人民民主，以保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总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历史地对待民主问题的，从来不谈什么“抽象民主”，或者说什么“一般民主”。

列宁着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服从于自己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目标，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使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剥夺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权利而使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排斥民主，这不过是一种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

的错误论断”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一切借口抹煞民主的阶级性，抹煞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们宣扬所谓“一般民主”或“全民民主”，实际上只是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崇拜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出发，他们尽量把革命和改良混为一谈，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约束在资产阶级专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他说：“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列宁的这个论点，不但对十月革命说来是正确的，而且对后来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却正是列宁所批判过的这种谬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借口所谓“一般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企图一步一步地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于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下一步一步地复辟。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同样是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了极点，完全糟蹋了列宁主义。

自从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列宁本人起，都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应当经过和平的方法，不应当用武力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张，不但经常见之于我们的言论，而且坚定地表现在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中。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执行者。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这些事实，是枉费心机的。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并没有取消世界上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要争得世界和平，要争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不能无视或者掩盖这些矛盾，像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政治庸人们所企

图做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从各方面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足，缩小帝国主义者活动的地盘，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能够争得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加以制止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一直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两件事，是两类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不能否定后者。

资本主义国家内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斗争，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现代修正主义者虚伪地以要求“和平”、要求“和平共处”为名，企图限制、削弱以至否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适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而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像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伎俩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攻击列宁主义。远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就这样写过：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六十年前所描绘的这种景象，不是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了么？不同的，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不择手段。例如，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教条主义者”主张“用战争来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端无聊的诽谤，不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卑鄙的献媚，又是什么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叫做“教条主义者”）“否认”某种必要的妥协。我们愿意告诉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笼统地否认妥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问题是什么样的妥协，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如何实现妥

协。列宁说得非常对：“‘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 也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那一种妥协是允许的，有利于人民事业的；那一种妥协是不允许的，是叛卖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这样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一直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制订的。

但是，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用各种诽谤的办法，来中伤我们。应当知道，历史上没有任何革命党派不遭受敌人和他们的代理人的诽谤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就遭受过敌人的无数诽谤。“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现在，国际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很可惜，陶里亚蒂同志竟然也参加了这种攻击。

中国共产党被现代修正主义者加上了许多罪名。为什么？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决不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作理论上的让步？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既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既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又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又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既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又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动民族主义？

有些人努力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用可耻的歪曲，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帝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点，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而形成的，是根据中国长期的革命经验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经验而形成的。这一论点，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外强中干的敌人”、“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等等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经常吹嘘要按照列宁的准则办事，实际上，他们总是离开列宁的准则，离开列宁主义的精华，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清楚地暴露出他们远远地离开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么？那些肆意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在替帝国主义帮腔，竭力向要求革命的人民宣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反抗不得的，帝国主义制度是推翻不了的，任何革命都是要不得的，没有希望的。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伙伴多年来向全世界人民进行这样的核讹诈：谁不服从我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各种煽动，完全是根据美帝国主义这种核讹诈的腔调进行的。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坚决主张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曾经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一向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所吓倒；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的力量，自己的正义的政策，它根本不应当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现代修正主义者明明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正确主张，但是他们却硬要制造谎言，欺骗群众，说所谓“教条主义者”希望“把人类推到核战争的边缘”。现代修正主义者经常在讲什么“道德”。他们在制造这种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又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连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完全忘记了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歪曲和攻击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和主张，而故意散布一系列的谎言，其目的就在于不许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进行解放斗争。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在存在着原子武器、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条件下，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为，都是违背“活命的逻辑”的。他们的所谓“活命的逻辑”，实际上是奴隶的逻辑，就是要各国人民磨灭掉革命的

意志，捆绑住自己的手足，驯服地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奴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奴隶的逻辑，主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设独立自主幸福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抵抗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分，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都是“教条主义”的了。总之，他们在实际上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全部列宁主义的学说，都抛弃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谁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说话和行动，谁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谁就是“攻击”和平共处政策，谁就是“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列宁曾经指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说他们“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系列的说教和政策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命运，是由几个大国的

“首脑人物”所主宰，由他们的明智或不明智所主宰，而不是决定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力量和联合斗争。有些人甚至一心想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坐在一条船上，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光荣”，却不愿意同各国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这样的人竟然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中，岂不是一件怪事么？

列宁说过：“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过也正是这样。

列宁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当修正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的“聪明”，夸耀自

己的“创造性”，夸耀自己的观点是“最新的理论”。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最新理论”，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的谬论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罢了！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愚弄人民的滥调的翻版罢了！

修正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修正主义的派别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修正主义的思潮总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当第二国际在事实上理论上都宣告破产的时候，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宁曾经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 。历史证实了列宁的预见。事实上，在列宁逝世以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这个斗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前我们面临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列宁分析过的那些引起修正主义的一般原因今天依然存在。列宁说过：“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 这种情形我们在目前不仅依然看到，而且显然还比过去更加触目。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对付人民群众的策略，有时候用直接的暴力，有时候用某种改良的方法；有时候施用断然的威胁，有时候仿佛稍作表面上的让步。这两种方法或者互相交替使用，或者错综复杂地结合使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资产阶级也就往往会采取更狡猾的政策，以便在工人运动内部引起某种幻想，引起机会主义的反应。列宁说：“资产阶级策

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列宁这句话，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永远有着警戒作用。

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上空蒙罩着一片修正主义的乌云。现代修正主义者公然在进行分裂的活动。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当然是件坏事。但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已经客观存在着，那末，它公开地表现出来，使人们看到，认识清楚，懂得其害处，坏事就会变成好事。现代修正主义者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似乎在洋洋得意。但是，真理终将战胜谬误，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喧嚣一时，胡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最后取得胜利并且得到发展的，必将是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符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有过去的历史为证的。

现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境况比过去好多了。有十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有更加觉醒的世界人民。有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欧亚两洲的丰富经验以后，又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经验。这些经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思想上武装了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这些经验都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对立方面。它们是客观历史事实，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加以篡改、歪曲，是完全徒劳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叶进行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搏战的序幕。今天以列宁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更会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运动和一切人民革命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的标志和信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我们目前这个革命的伟大新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新时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伟大新时代，在欧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出现新觉醒的伟大新时代，可以预卜，也定会使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胜利。

在伟大的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让我们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

高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国和苏联的伟大友谊和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旗帜，高举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推进人类进步、正义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注释：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三页。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四八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〇页。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三页。

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二二四—二三一等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一页。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九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一八一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三五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三五页。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六一页。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九页。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五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九页。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〇页。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四页。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阻止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发展。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迫切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我们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能够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理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我们的共同敌人，而没有任何理由在那里重演亲痛仇快的事件。

不幸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同我们愿望相反的情况。

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说了不少在兄弟党之间停止攻击、加强团结的话，另一方面却极其粗暴地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一步扩大分歧，损害团结；一方面说了不少拥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话，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翻案，公然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当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引证和阐述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大会的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继续致词。在这样的导演下，会场上发出一片喊叫声、吹口哨声和跺脚声。这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现象。中共代表致词以后，大会的执行主席居然提出抗议。他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这是“违反各共产党和革命工人政党之间一切普遍的准则”的。接着，苏联《消息报》就攻击中共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说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

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就只能损害团结，只能是假的团结。坚决维护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共同准则，同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并且在匈牙利策动了反革命暴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确立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共同准则。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对某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团结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对于会议达成一致的协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提出了真诚的劝告。我们当时就指出，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

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竟然遭到某些人一连串的责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和加强团结的愿望，积极支持一些兄弟党关于和缓关系、改善气氛的建议，并且写信给有关的兄弟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以便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指出，在召开会议之前，各兄弟党应当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上和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为上述会议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作的这种积极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关兄弟党的相应的响应。相反地，那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恶劣做法，却愈演愈烈。在最近一个时期召开的几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都继续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在有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攻击了朝鲜劳动党。

这股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达到新的高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受到了多方面的庇护，而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却受到完全非同志式的、粗野的对待。这种做法，是极其庸俗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某些同志看来，坚持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是不能容许的，是非法的；而受到莫斯科声明谴责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反而是应当欢迎的，是合法的。他们一方面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大讲团结；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向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喝采叫好。这种十分恶劣的情况，是在精心策划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严重性。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共同基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正面临着被公开

撕毁的严重的危险。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流合污。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作为团结的基础，还是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团结”的基础。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真正加强团结，还是口头上讲团结，实际上制造分裂。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关系到究竟是要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还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讲得十分清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正是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和必须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反对莫斯科宣言，也根本反对莫斯科声明，并且拿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纲领相对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对立，主张采取所谓“超集团”的立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已经“过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水火不相容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说：“全体会议认为，代表团执行了南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没有签署这个会议的宣言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计。”

至于说到莫斯科声明，铁托集团对它的攻击就更加猖狂了。就是那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有些人狂热欢迎的铁托集团代表弗拉霍维奇，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南共联盟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莫斯科会议走了在各种观点和倾向间谋求妥协的路线，走了‘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路线；这样，在统一的声明范围内，反映了世界上当代社会的客观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立场），混在一起了。”南共联盟中央一九六一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声明的决议中说：“莫斯科声明不仅对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努力，都只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不是应当进行批判呢？这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原则性立场，也是得到其他兄弟党的赞同的。大家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赫鲁晓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中国同志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修正主义原则的批评，都是十分正确和十分深刻的”。

大家还记得，正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应该不应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曾经说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各党在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谴责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场，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

他还说：“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最锐利的阶级武器。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以换取贷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们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纲领，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修正主义纲领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很可惜，铁托集团自己从来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勾销错误。如果硬要说铁托集团“勾销了”错误，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我们愿意请那些为铁托集团辩护的人，听听铁托集团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内部问题上的原则性的立场的话，这只是浪费时间”。

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德尔，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他说：“现在看来，批评家们不断地向我们建议的，正是他们开始放弃的东西；而批评我们的，正是他们开始接受的东西。”

直到最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铁托从苏联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一下火车就说：“讨论南斯拉夫现在将如何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过了几天之后，铁托又说：“我们在那里

（指在苏联）还谈到，南斯拉夫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铁托和卡德尔的话表明，铁托集团坚决否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确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故意要说什么铁托集团“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的人，在这里不是说谎又是什么呢？

近来，某些人大谈他们同铁托集团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日益接近的。我们要问：既然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末，是不是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向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日益接近了呢？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某些人公然宣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死板的公式”。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兄弟党揭露和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如果坚持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就是“使用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就是“坚持野兽的道德”。请问，把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说成是什么“死板的公式”，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究竟目的何在呢？是不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如果根据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竟然成为“野兽的道德”，那末，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恨不得“咬死”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又算是什么道德呢？

我们还听到陶里亚蒂同志竟然这样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〇年的决议（按：这是指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问，对于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陶里亚蒂同志究竟有什么权利宣布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呢？究竟有什么权利来随便“纠正”、随便撕毁庄严的国际协议呢？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末，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

很明显，某些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庄严的文件，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对于自己签了字的文件，自己不遵守，还要辱骂那些遵守的人，这完全是背信弃义。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那些热中于给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企图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全部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那就等于说，过去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而叛徒铁托集团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莫斯科宣言和莫

斯科声明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现代修正主义已经不能反对，更说不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那就等于说，大家都应当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如果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就要全部改变，就要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如果这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共同基础呢？这不是存心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吗？

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中国共产党，将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各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团结，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

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是不是认真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真正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首要标志。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两个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国际文件，对于各国兄弟党都具有约束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有遵守的义务，而绝对没有破坏的权利。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没有权利去改变它，都没有权利宣布它无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兄弟党，不论它的地位多么重要，它的作用多么大，它的决议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只能对它自己一个党具有约束力。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准则，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纲领、决

议、方针、政策，强加于其他兄弟党；也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领导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自相矛盾的话，当做圣旨，要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更不能容许根据一个党或一些党的意志，任意地把这个或那个兄弟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一脚踢出去，或者任意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硬拉进来。

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变化迅速，由于各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各兄弟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当兄弟党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通过内部的平等的协商，消除分歧，达成一致；而绝对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也不应当利用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更不应当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很明显，如果今天公开攻击这个兄弟党，明天又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那还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言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讲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态度。正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所指出的：“在这个并非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代表大会上，一方面谈论停止对意见分歧的公开争论和加强团结，而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兄弟党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片面的批评。我们认为，这不能看作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所一致主张的团结一致。”

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晚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诚挚地期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

要的条件。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进行挣扎，妄想阻挡和扭转时代的潮流，妄想阻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妄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共同的战斗。任何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通不过的，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一切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们中间是通不过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越是受到鼓舞。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增强一切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心，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不应该辜负全世界人民的期待。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一定要真团结，反对假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载的居约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赛中，特别卖劲，超过了许多攻击我们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了朝鲜、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已经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内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内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内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们没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没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谁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我们愿意告诉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们：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

我们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们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们。现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语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觉得，现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们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重复别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们还说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说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

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贯认为，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们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们的意见。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加强，我们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战斗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

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当时还预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论点，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他们把戴维营会谈说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纪元”，甚至说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别热中于颂扬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说他“真诚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他们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说—竞争。“他们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给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锁“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说：“全面彻底裁军还会创造崭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军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资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夕，具体地说，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说明真相和劝告，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不问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指责中国的正确立场。他们还说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

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了那个错误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间。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当时大肆宣传说，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训孩子放规矩点“。

在戴维营会谈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们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传他们的错误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记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共处的语言“、“美国发生了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九十诞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们在文章中讨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颠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们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同我们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赞成谴责艾森豪威尔，并且散布了许多错误观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

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谈的同志们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并没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服从指挥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们的指挥棒，真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们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重步骤，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惯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间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们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规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责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错误，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吗？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们不敢批评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争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错误的人，反而指责中国同志“将国家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结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真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赞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给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谈到这次兄弟党内部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合说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创议

者。我们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间，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错误观点，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们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谎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继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见”，并且说中国同志的“立场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谁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责中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比较正确地了解他们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则，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们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曾经多次劝告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该采取主动，应该通过内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耐心等待，而不应该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骤。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给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些真诚努力，并没有受到重视。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

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说，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负责，那是故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们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绝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吗？

多列士等同志责备中国报纸“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错误论点“。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们内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们把争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另一个兄弟党，说它的领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银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许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辩护，也不容许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争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吗？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们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别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们的理亏心虚。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责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裁军及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们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他们把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且大肆贩卖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思想。这就在这些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军，等待他们放弃使用武力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们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要对殖民统治者的武装镇压进行反抗，否则据说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谬的“理论“，他们竟然辱骂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项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则的妥协而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吗？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谴责美

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们同古巴的团结，加强他们的斗争“吗？请问多列士同志，你们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们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说穿了，那是因为你们跟着指挥棒转，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场，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须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就掉转枪口，把斗争的锋芒，从美国强盗转向坚持正确立场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诬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们，辱骂他们是所谓“革命词句的英雄”，说他们“说空话”，说他们“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说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说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话？！这是在指责谁呢？如果是指责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简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责反对美国强盗、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们自己的所谓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骗人的吗？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没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说空话”、“投机”；而没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视察”，被放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教，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

我们愿意告诉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因为你们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脱，硬要人们相信连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谓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因为你们替那些既犯冒险主义、又犯投降主义错误的同志辩护，替那种侵犯一个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辩护；因为你们不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说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最少的诚意”。这种指责是荒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受到严重挫败，由于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三

年多来，中印边界纠纷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鲁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竟然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采取所谓“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错误的做法，不但不予谴责，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士同志一再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〇年就说，中国共产党“给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现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责。

在这里，我们无需多说，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们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们忘记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并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吗？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员和省议员没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认为没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错误，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出席。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评。我要重说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没有保证执行。“（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报》）请问多列士同志，如果说尼赫鲁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错，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谁的过错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鲁的欢迎，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评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

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痛改前非，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轨道上来。相反的，他们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饰自己的错误。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现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别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说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继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公然为叛徒铁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骗得了人吗？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们对于停止争论、恢复团结，并不是真心诚意的。

特别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铁托集团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明的问题，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问题；并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而是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许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许把叛徒拉进我们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没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抗，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辩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实行封锁政策，隐瞒真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辩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负责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包括我们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知道真相，让他们自己来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你们也能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吗？你们有这样的胆量吗？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贯自命为什么“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创造性”吧。

我们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谴责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是，在戴维营会谈前夕，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争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员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谓“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纯粹是骗人的阴谋”。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说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可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说，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说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谴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说铁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资本家的津贴”，这些“资本家给他们津贴，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近，有人说要“帮助”铁托集团“在一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

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责我们的这种立场说，这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说，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说应该停止公开争论，一面又继续进行攻击；于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并且说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挥棒转。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挥棒转，绝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间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别人走就行了。究竟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竟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概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鹦鹉学舌的本领，少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这样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诽谤，不管怎样连篇累牍，丝毫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法国工人阶级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给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级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创作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们同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调要中国同志改正错误。但是，真正需要改正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辩论，我们仍然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

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们希望他们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结，反对损害这种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辩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辩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辩论。我们一贯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内部进行辩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辩论。我们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现在，这些同志在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说要停止公开辩论了。我们要问：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错误的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错误，向被你们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准备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争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领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在，

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铁托集团拉进来。我们愿意老实告诉他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谈，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骤。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们一贯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会谈。事实上，我们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谈。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讨论”的要求。据说，这是另一个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谈，交换意见，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野蛮地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吧！让我们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目录

一、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几点简要的结论四 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离奇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

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当代的“议会迷”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历史的分析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伟大的范例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一面镜子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原则性和灵活性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引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过去我们没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从来主张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从来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①；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

解”①；说我们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②；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②，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末，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连续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再说吧！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①　见意共《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②　见《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路易吉·隆哥《政权问题》。

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内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

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粉碎他们的进攻，正确地给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同这次论战交织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现在出现的第三次大论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　　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复活动。他们的这类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①，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①。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发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论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谴责现代

修正主义者“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②。铁托集团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纲领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语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指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竟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污。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

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③，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争论公开化，那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们的这种挑战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人们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谁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　　凡是读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论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

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贯串着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线索。按照这条线索，不论在国际问题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同社会民主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意共的提纲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许多提法、许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鲜，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扬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纲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多么辽远。　　①　参看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演说。　　②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一页。　　③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一页。((1)(2))

三、当代世界的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作为提出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他们的估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问题上，也在意大利问题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颇为得意的新概念。　　一、“应当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争范围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　　二、“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①　　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①。“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①。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②。　　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①。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

力范围了”③。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②　　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①　　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①。　　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全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②。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①。　　十一、“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②。　　十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②。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　　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们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　　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一

次新的“变革”呢？

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①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　　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连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④。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⑤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

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①。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怎么可以把帝国主义力求保持自己的统治，国际形势不稳定性这类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认识问题，而不看作为资本帝国主义规律起作用的问题呢？怎么可以假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一旦“认识正确”，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物一旦变成“明智派”，而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革命，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就能够根本改变呢？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掌握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材料的总和，必须认识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显然，只有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和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当前具体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而使自己的政策放在可靠的理论阵地上。可惜，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上恰恰没有严肃地正视这些矛盾，因而必然使他们的纲领根本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里也提到许多矛盾，但是奇怪的是，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陶里亚

蒂同志，恰恰回避这些主要的矛盾。　　意共十大提纲在讲到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罗列了这样一些矛盾：　　“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强的同时，这样一种趋向也加强了，即不仅在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并且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其中的一个联盟（即欧洲共同市场）促成了西欧市场的扩大，这就刺激了若干国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大垄断资本集团领导下的、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相结合的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下列各方面引起了新的矛盾，即某些工业发达地区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的、甚至相对加剧的落后和衰落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与到处陷入严重困难和危机的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消费水平高的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大量财富消耗于扩军、非生产性开支和无止境的奢侈与人民群众生活和进步所必需的各种问题（住宅、学校、社会保险等等）无法得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这里列了一大堆的所谓矛盾，或者所谓“新矛盾”，但是，偏偏没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等等。他们把“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的矛盾，说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矛盾。　　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承认有大垄断资本集团，还承认有国家集团，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矛盾。他们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以及“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那里抄袭来的，是列宁所认为的“超等废话”。　　大家知道，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⑥的重要论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在起作用。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在这个绝对规律之外，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多年来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

十三点四，到一九六〇年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六一年又降为百分之四十三。　　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它仍然没有完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美国力求保持和扩展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并且日益尖锐化的现实的矛盾。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以外，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必然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的尖锐化。这里交错着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交错着帝国主义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斗争。刚果事件，最近围绕欧洲共同市场问题的争吵，美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引起的争吵，就是这类斗争的突出的例子。　　意共十大提纲虽然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不平衡和跳跃的发展过程，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并没有从这种新现象，看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矛盾的扩大，矛盾的加深；没有看出这种新现象会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垄断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地区上大大缩小了；此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动摇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斗争，不是比过去缓和了，而是比过去更加激烈了。　　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形势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平运动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力量，无疑义地大大超过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的力量。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方面；优势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方面。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估量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完

全错误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规律，也并没有排斥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而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界限，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各种矛盾，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力量，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纲领恰恰是有着这类的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陶里亚蒂等同志身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心却放在虚无缥缈的幻梦之中。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人，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世界全局出发，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正确的出路。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不着边际地、无关痛痒地说些关于这类矛盾的空话，而在实际上掩盖这些矛盾，企图把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引向迷途。　　陶里亚蒂同志和铁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说成是什么“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⑦，并且认为只要“改变这一局势”，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合作的”新世界⑦。这样，世界两大社会体系的矛盾就会随之消失。　　陶里亚蒂同志这类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尽管他天天在希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人物“明智”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按照陶里亚蒂同志的希望，自己解除武装，自己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想法，在实质上，只能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或者取消自己的防御力量，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帝国主义者从来所希望的所谓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和平演变”，或者“自行演变”。　　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尖锐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看成是两个军事集团的矛盾，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呢？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也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　　必须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们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们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苏两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也进行国际贸易，但是，它们用不着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而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在那里，资本帝国主义的规律就会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明”豺狼，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肥肉”而去争夺、去吞噬。它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地镇压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的人民斗争和起义。不论资本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极其激烈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军火利润的斗争，也总是经常地进行着。这种斗争，虽然有时稍为缓和，有时达成某种妥协，有时甚至形成什么“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是，这种缓和，这种妥协，这种联盟，总是孕育着它们相互之间的更尖锐、更激烈、更大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在反苏的名义下，它首先向着英、法、德、日、意等国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侵略、吞并或控制；同时，还在反苏的名义下，利用第二次大战后的条件，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在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控制下面。这种控制，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极其辽阔的中间

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破坏和侵略活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著名谈话。他揭穿了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反苏叫嚣的烟幕，对于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概括说明：“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⑧((2)(3))　　十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这样用最清楚的语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如何设法建立它的世界大帝国；同时用最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应当怎样力求人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说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间，是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叫嚣，一方面，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

国家；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和奴役政策，首先要遇到中间地带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实际上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引火物，燃起了这些地区十几年来连绵不断的革命烈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这种烈火正在蔓延，而且必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蔓延。　　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害，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十六年来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十六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欧洲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

洛伐克十二个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第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第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并且在继续摧毁着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的阵地。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活跃和新的发展。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重新起来，正在不同程度上图谋摆脱美国的统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它们又重新成为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西德又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美帝国主义者狭路相逢了。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也日益激化。　　第六，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加剧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加剧了。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只要各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是能够被打败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争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变化同时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愈加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愈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愈开展，那末，就愈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者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愈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住世界和平。　　这些变化同时还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愈尖锐，在它们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着新的斗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为着推行侵略政策，除了宣传反苏以外，近年来特别大肆宣传反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华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进行各种破坏我国、威胁我国的罪恶活动。同时，人们还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利用反华宣传去达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要控制和奴役日本、南朝鲜和整个东南

亚。所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等，都是美国控制和奴役这些地带一系列国家的手段。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支持印度反动派，支持尼赫鲁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从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之一的印度，变为美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把原来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变为美元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首先需要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制造一种口实，制造一种烟幕，这就是“反华”，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虽然它们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者把尼赫鲁政府这次反华军事行动，看作是它控制印度的大好机会。在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反华”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窜进印度，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它在印度的势力。　　美帝国主义者这次大规模地窜进印度，这是美国反动派在印度实行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重大步骤，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攫取市场和势力范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明争暗斗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者这个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同时也必然促使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矛盾的发展。　　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除了继续出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的许多地区之外，还出现在资本主义老发源地的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角逐，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触及到西欧的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夺西欧这类工业发达的地区。由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以英国为首的由七国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美国积极策动的“大西洋共同体”，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欧市场争夺的尖锐化越来越显著了。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向四面八方开展意大利的贸易”①，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　　除了在西欧以外，最近美国限制日本棉制品进口引起的公开争吵，表明美国和日本相互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了。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③。还有人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们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任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仍然处在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国家独立了，可是它们的经济仍然受着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有些国家中，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但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新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很多民族的生存。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像我们中国这样已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也还有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不承认地球上存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至今还被无理剥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依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　　十六年来世界的变化，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时期以来，一直受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迫。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从这些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喂肥了自己。他们拿这些地区人民的血和汗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肥料”⑨，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极端贫困化，并且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物极必反。这些外来的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们长期进行的奴役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唤醒过来，逼得他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直到进行武装反抗和武装起义。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不断地遭受过残酷的镇压，遭受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总是再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如何走向它的反

面。在一九四九年，伟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⑩　　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现实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胜利的伟大范例。　　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继中国革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宏大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地区的斗争即使可能遇到某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抵挡不了这种斗争洪流的。　　现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包围之中。这种斗争对于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支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资本主义国家本国的农民斗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　　人们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①①列宁曾经痛斥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回避了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列宁痛斥他们说：“记得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这次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而是躲躲闪闪，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①②列宁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的矛盾”①③。斯大林也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①④。　　人们还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

曾经针对着当时的情况，这样设想过：“在爱尔兰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①⑤。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正当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论文，其中说过：“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①⑥。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他认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们的时代是正确的①⑦。他曾经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⑧。　　斯大林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论点。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　　列宁主义“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①⑨。　　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这一篇论文中，斯大林论述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②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了欧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争取胜利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他们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将是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大力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两支伟大同盟军的问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体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保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亲眼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像现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

革命斗争，没有亲眼看到一连串的胜利，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所揭示的规律，却愈来愈被生活所证实。第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更加证明这种原理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丰富了这种原理。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

缺乏经验”②①；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对：“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②②　　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们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说：你们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们不要“对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没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输了，到那时候，你们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这种态度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本身的利益。总之，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国际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3)(4))

几点简要的结论

在这里，可以把以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论点，再总述一下：　　第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美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不但奴役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控制战时的同盟国，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国家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美帝国主义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它的狂妄野心也使它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益陷于孤立，它的力量实际上正在不断削弱，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人民、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能够在斗争中把美帝国主义打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是不妙的，各国人民的力量在上升中。　　第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西欧，为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不到这点，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锐化，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这样，共产党人也就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事业的最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继续巩固、继续强大，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加不敢轻易触犯它。因为它们知道，触犯这个堡垒，对它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不仅要尝到很大的苦头，而且直接关系到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　　第四，有人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简单地只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看

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五，有人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认为只要取消他们所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②，或者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①，这种矛盾就可以在实际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融合为一。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力求加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外的竞争地位，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的这种地位。同时，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地加强军事机器，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排斥它们的国外竞争者，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加紧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少数垄断寡头对雇佣奴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暴虐专政。认为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过渡为社会主义，那里的劳动人民能够或者正在参加国家领导，因此认为“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②。这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呓语，又是什么呢？历史并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绝望中寻找出路。他们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苏冲突”上面。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老早就说出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最近对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攻击和诬蔑，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起劲地耍弄挑拨离间的把戏。但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未免过低估计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力量，未免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未免过高估计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起的作用。历史事实终归要使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倒霉的总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错误，就是他们的提纲、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本离开了阶级分析。　　列宁曾经嘲笑民粹派说：“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剥削是‘可能’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列宁说他们“一辈子都满足于这种‘假如’和‘假若’”②③。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不能像民粹派那样吧！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提纲和报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恰恰是放在这类“假如”或“假若”的设计上面。因此，他们得

出的新概念只能是一堆非常糊涂的概念。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②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③　陶里亚蒂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今天有可能避免战争》。　④《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七九页。　⑤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二七页。　⑥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一页。　⑦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⑧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一九一——一一九二页。　⑨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〇卷，第一三七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八页。①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四五四页。　①②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页。　①③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九页。　①④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〇页。　①⑤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五三——二五四页。①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四页。　①⑦　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一二——四一三页。　①⑧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三八页。　①⑨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②⑩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　②①　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②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四七页。　②③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一八页

四　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几年来，有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喃喃

不休地作了多少演说，盈篇累牍地写了多少文章，在市场上抛出了多少大书小书，但是，却不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不同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消灭战争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要求在一天早晨废除国家。现在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要求在一天早晨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自负地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是“人类意识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教条主义者”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懂得接受他们的这个科学礼物。　　看来，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正在大力推销这种礼物。他们说，要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唯一的战略是他们自己所解释的“和平共处战略”，而他们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战略”的内容，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拥护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在目前和平时期，就拥有四十多万人的压迫人民的常备军队，有约十万人的警察和近八万人的宪兵这类武装队伍，还有美国的拥有导弹的军事基地。在这样的国家中，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和平与和平共处”，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要求意大利政府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那当然是对的。除此以外，你们是否还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同垄断资产阶级实行“和平与和平共处”呢？你们所说的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是否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撤除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是否意味着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呢？如果做不到这些，那末，在意大利怎样实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和平与和平共处”呢？推而广之，又怎样能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呢？　　当然，如果能够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不是很好么？我们为什么不举手赞成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问题显然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过：“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①。　　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又一次说明了这个理想。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②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说过中

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为永久和平而战；说过“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③。　　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上说，战争是“由于阶级的出现”④产生的。同时，他说：“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③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完全符合列宁反复说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点的。　　在一九〇五年，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年，列宁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⑤　　在一九一五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⑥　　列宁，他作为一个高度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最大的力量研究了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痛斥考茨基那一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谬论，给人类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正确的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却一点也不愿意考虑列宁是用怎样的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的，不愿意考虑列宁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任何科学结论。尽管如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别人背弃了列宁，只有他们才是“列宁的化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也许有些人会说，无须你们饶舌，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

题的论点；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列宁这些论点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把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当成过时的东西，这是铁托集团首先公开提出的。他们认为，自从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列宁所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用以考察各种战争、判断不同战争性质的理论基地，已经不适用了。照他们看来，战争从此已经不是这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什么阶级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的说法，实际上是铁托集团早已有过的说法。　　显然，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不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原理，而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镇压，不会因此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也不会因此放弃对他们相互间为争夺超额利润而引起的冲突。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力求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施加影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仿佛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者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这些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比如，美帝国主义者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策动的战争，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究竟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所进行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武装冲突，算不算是战争？如果这不算是战争，那又算是什么？如果算是战争，那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它的政策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认为，“能够避免地方性的小战争”⑦；又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尚未在各处得到胜利，在人类社会中，战争也会成为不可能。”⑦这大概就是陶里亚蒂同志对“我们的学说本身”“作一些新的考虑”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陶里亚蒂等同志这些话，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间说的。我们姑且把一九六〇年以前发生的事件搁起不说吧。在一九六〇年这一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不同类型的军事冲突和武装干涉，其中多数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地方性的小战争”：　　这一年是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的第六年。这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吴庭艳继续残酷压迫南越人民，激起南越人民更大的武装反抗。　　一月至二月，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同叙利亚发生了武装冲突。　　二月五日，美国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登陆，武装干涉

该国内政。　　五月一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七月十日，比利时武装干涉刚果；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到刚果，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八月，美国支持老挝沙湾拿吉集团挑起内战。　　或许一九六〇年发生的事件不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范围之内，那末，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事件是否就能够证实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预言呢？　　可以考察一下事实：　　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才被迫实现停火。这个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七年多之久了。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进行的反人民的“特种战争”，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　　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服务的“联合国军”（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军队）还在镇压刚果人民。一九六一年初，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美、比帝国主义者唆使其走狗杀害。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向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加丹加省进行了三次武装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葡萄牙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军队。对要求民族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一血腥罪行，仍在继续进行中。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拥军武装入侵古巴，在七十二小时内，在吉隆滩被英勇的古巴军民全部消灭。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英国军队在科威特登陆。十九日，法国军队袭击突尼斯的比塞大港。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美国出动军舰、飞机，再次武装干涉多米尼加。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荷兰殖民者的海军在西伊里安附近海面袭击印度尼西亚的海军。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西伊里安展开了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游击斗争。　　一九六二年五月，美国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并企图直接出兵干涉。十七日，美国军队进驻泰国；二十四日，英国宣布派遣一中队空军进入泰国。美英这些年事行动，直接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经过老挝人民的坚决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共同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其“议定书”。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武装船只轰击古巴首都哈瓦那滨海住宅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门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指使沙特阿拉伯出兵干涉。　　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不断地武装入侵中国地区；十月二十日，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

军事进攻。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采取海盗行为，对古巴进行震动世界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祖国主权的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两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剥削、横暴镇压和武装干涉，继续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反抗，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莱人民的反英武装起义。事实反复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个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真理。现在和将来的事实依然会证实列宁所说的这些真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既然按照他们政策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地区挑起战争，那末，谁也不可能阻止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压迫的战争。　　或许，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认为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战争都不算是战争。他们仅仅承认，只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才算是战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新观点。　　列宁老早就批评过认为“在欧洲以上的战争不算是战争”的这类荒谬观点。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一篇演讲中这样嘲笑地说：“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⑧　　现在，实际上就有列宁所批评的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圈子没有战争，就是天下太平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否在摧残和屠杀人民，是否在进行军事干涉和武装冲突，是否在挑起战争，都不算是什么一回事。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这些地方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星星之火”，会闯下大祸，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地方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们具有什么性质，而笼统地武断斥责这些战争。能够说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吗？　　还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一说到战争，就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仿佛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以外，就没有其他战争可言了。这个说法也是铁托集团首先发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竟然也同铁托集团唱一个调子。这些人根本不愿意看一看现实生活，也不愿意想一想历史。　　如果这些人的脑子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就会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世界

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居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当然，如果这些人的脑子不那么健忘的话，也还可以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苏战争发生以前，这次大战将近两年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进行的。这两年的大战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成为这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强盗的主力军，但是，也不能把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的大战看成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参加这次反法西斯阵线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还有英、美、法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可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利害冲突所引起的，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　　大战的发生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大战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形势继续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陶里亚蒂等同志说，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这话并没有说错。实际上，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指出了的。列宁根据对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估计，这样说过：“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⑨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世界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经自行消失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梦想和准备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再侵略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已经不会再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了呢？是不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残暴地折磨、镇压本国的人民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不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规律，去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就永远不能了解这些问题。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⑩。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　　列

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①①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①②。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和平”，所谓“和平共处战略”，实际上是把争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明智”上面，而不是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他们用各种办法束缚各国人民斗争的手脚，企图麻痹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使各国人民放弃革命行动，从而削弱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反动气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原子武器出现以后，社会规律已经不起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陶里亚蒂同志的看法也是这样。关于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主要分歧，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论述。下面，我们准备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当地、也足够地估计到新武器、新军事技术对军队组织和战争的作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③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都不是唯武器论者。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过，“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又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①④。　　为着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引列宁的一段话。他说：“在任何战争中，

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①⑤　　充分估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根本原理。可是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常常忘记了这个原理。当原子武器在第二次大战末期出现的时候，有些人的头脑就开始糊涂起来了，认为原了弹能够解决战争。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①⑥。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英国贵族蒙巴顿，他发表过谈话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①⑦。　　当然，毛泽东同志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是充分估计到的。他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①⑧。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销毁核武器。同时，我们也一贯认为，无论如何，原子武器终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胜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能阻止各国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间，斯大林这样说过：“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想像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①⑨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喧嚷一种所谓军事理论，认为空军优势、突然袭击，就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2)(3))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核武器出现以后，一些帝国主义者又在喧嚷这种理论，进行核讹诈，认为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解决战争胜负。可以肯定，他们的这种理论，也一定要遭到破产。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像铁托集团那样，却替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吹嘘这种理论，用以恐吓各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表现了它奴役世界的恶毒野心，同时表现了它自己的恐惧。必须知道，首先动用核武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致命的后果的。　　一、帝国主义者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其他国家，必然使它们自己在全世界陷于极端的

孤立。因为这种进攻是对人类正义的最大罪行，是同全人类为敌。　　二、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使本国人民处在对核武器的恐惧之中。帝国主义者坚持核讹诈政策，必将逐步地激起本国人民的觉悟，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参加美国向日本第一次投掷原子弹的一个空军人员，由于战后全世界人民谴责原子轰炸，曾企图自杀，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本身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是如何不得人心。　　三、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地盘，扩大市场，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奴役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考虑，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结果，同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四、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导弹。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前面所说的，是帝国主义者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必然引起的后果的一些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其重要根据之一，也在这里。　　同时，还必须知道，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扩充核军备的政策，也增加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就是：　　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被迫承受空前沉重的军事开支的负担，本国国民经济越来越走向畸形的军事化，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它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　　二、帝国主义者进行军备竞赛，特别是进行核军备竞赛，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曾说：“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②⑩　　现在更可以这样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扩充核军备的政策，正在支配着并且吞噬着北美和西欧，可是这种政策，这种新的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制度自己毁灭的萌芽。　　可见，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实行扩充核军备政策，结果只能使它们自己反对自己。如果它们敢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必将是使它们自己毁灭自己。　　结论是什么呢？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人类毁灭”的说法相反，结论只能是：　　第一，将是人类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消灭人类；　　第二，将是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被人类所消灭，而不是人类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消灭。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

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的命运今天是不确定的”。②①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在核战争的威胁下，谈论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按照这种说法，那末，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哪里去了呢？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真理，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正的“宿命论”、“怀疑论”和“悲观论”吗？　　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这样说过：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②②　　真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他们大肆歪曲、谴责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硬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如果这些人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会知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这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②③。难道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度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制度。”②④难道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旧制度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这是用无理取闹的手段代替严肃的争论。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和谐的调子”吗？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用能容许的语气进行论争”吗？其实，陶

里亚蒂同志本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复灭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应当在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在反动暴政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意大利”②⑤。　　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罪恶滔天的手段，使各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经历重大的苦难。但是，这种考虑是为着唤起人民的觉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找出正确的解放斗争的道路，找出人类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摆脱苦难、获得和平的道路，找出有效地制止核战争的道路。　　谁都知道，甚至连美帝国主义者也知道，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绝不是为了侵犯别的国家。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上，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首先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防御战争。　　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也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核优势，也根本不会、不允许、不需要利用核武器去进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方针、政策，就是这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方针、政策。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故意歪曲我们的态度、方针、政策，制造一些卑鄙无聊的诽谤和谎言，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应当指出，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离奇的提法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论点。　　在任何国家中，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没有革命的要求，谁也不能够从外面把革命强加给他们；如果那里没有革命危机、没有成熟的革命条件，谁也不能够在那里制造革命。当然，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要求革命、自己起来革命，那末，谁也不能够阻止他们革命，像谁也不能够阻止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

南越的革命一样。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实行和平共处，就是意味着“排除外国为了‘输出’反革命或革命来进行干涉的可能性”②⑥。请问：所谓“外国输出革命”，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输出革命呢？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从来就是这么说的。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这样说吗？至于说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对外输出反革命的。谁能够说，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输出过反革命呢？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伟大的十月革命吗？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中国革命吗？谁能够否认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呢？谁能够否认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涉古巴的革命呢？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国际宪兵，现在不正是在世界各地方大力输出反革命吗？不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干涉各国内政吗？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的国家，不了解“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而在谈论和平共处的时候，避开帝国主义者一直输出反革命这样的事实，笼统地把所谓“输出反革命”和“输出革命”相提并论，这种离奇的提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　　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坚决谴责战争”，“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列宁从来都是认为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没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现在有人竟然不知羞耻地把自己比做列宁，说列宁、以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同他们一样反对战争的。他们阉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谁都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他主张，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向国际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觉悟的工人们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

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②⑦。列宁提出的这个法令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件。可是，现在有人竟然敢于歪典这个文件，割裂这个文件，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压迫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故意地篡改为“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些人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歪曲列宁主义，歪曲历史，还要振振有词地说别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实质”，这不是一种奇谈与怪论吗？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就是因为我们反对一切曲解列宁主义的奇谈与怪论，坚持恢复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原来面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的。有人恶意地把这条路线说成是：“按照这种‘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通过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这些人把保卫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要和平就是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屈膝，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取消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只是乞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恩赐”世界和平，而不是依靠世界上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去争取世界和平。他们的这种“理论”，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说明。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有以下一段话：　　“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势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

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现在，在这里，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论点，再简要地重说一下：　　第一，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十几年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更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斗争，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孤立的。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那末，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避免核战争是可能的，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二，世界各国人民要保卫住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制止核战争，必须互相支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反对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平等贸易。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有人认为，和平共处将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跟着变革，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⑧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②⑨。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问题、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根本歪曲了列宁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　　第四，我们一向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但是，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⑩　　第五，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调和的。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利害所驱使的，是它们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因为实际利益而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这种说法等于说帝国主义已经脱胎换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第六，既然资本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那末，谁也不可能保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不会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侵略的战争，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谁也不可能制止已经觉悟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反抗的革命战争。　　第七，列宁所肯定和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个原理现在依然有效。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说来，它们进行战争或者要求和平，都是为了追求或者保持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继续，政策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从来否认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说的，“‘战争是和平时期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策的继续’的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③①。　　第八，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将要到来，消灭一切战争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但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只能是在人类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个制度消灭以前。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③②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基本的论点就是这样。　　我们的论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相互间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对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这些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考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驳倒这些论点，因此，他们

只好依靠肆意歪曲、制造谎言等办法，企图打倒真理。　　但是，真理怎么会被打倒呢？那些妄图打倒真理的人，迟早总要被真理所打倒。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一些吗？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自以为世界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捧运转的，而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发展的。说到这一点，使我们回忆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　　“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③③　　让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包含在自己的主观里的历史唯心论者好好地想想这段话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六七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六六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四页。　　⑤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五三〇——五三一页。　　⑥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七九页。＊这段译文略有订正。这篇文章中，其他引用经典著作的地方，有的译文也略有订正。　　⑦　见一九六二年一月意共中央新闻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意共代表团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若干发言》一书。　　⑧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三六九——三七〇页。　　⑨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一七四页。　　⑩　见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　　①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七七页。　　①②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六九页。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①④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〇卷，第五六页。　　①⑤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一七页。　　①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三页。　　①⑦　参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六页。①⑧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二页。　　①⑨　《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问》。《苏联对外政策（一九四六年）》，莫斯科一九五二年俄文版，第七〇页。

②⑩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七五页。 ②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 ②② 见《红旗》一九六〇年第八期，第一一——一二页。 ②③ 《反杜林论》第二八〇页。 ②④ 《列宁全集》第三〇卷，第二三一页。 ②⑤ 转引自一九五〇年五月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一书。 ②⑥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②⑦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二二九、二二八页。 ②⑧ 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九六〇年第八期，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平——当代的关键问题》。 ②⑨ 见《团结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没有根据的论战》一文。 ③⑩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页。 ③①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九四页。 ③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二二页。 ③③ 《列宁全集》第一四卷，第二六页。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①；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②。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③。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③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④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

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⑥。“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⑥　　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⑦“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⑥，“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⑧。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⑥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⑤。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代表人民群众”⑨，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⑤。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②，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④。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④。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⑥，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⑥。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①①。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

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①①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①②。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③。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　　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里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　　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产阶级呢？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一九六〇年七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

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①④。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①⑤　　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①⑥。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

产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⑤。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⑦。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⑥。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①⑦，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⑥。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⑤。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为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①⑦。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①⑦。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⑥。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⑥。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论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

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①⑧。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①⑨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②⑩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　　或许，在一九四八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间，陶里

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①⑨。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一九六〇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在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阶级进入政权’。”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2)(3))　　一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说：“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⑥；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⑥。他们还说：“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

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⑦。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①⑦。“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①⑦。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②①　　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②②。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②③。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

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②④。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②⑤，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②⑤，“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⑧。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　　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

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②⑥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纲说：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②⑦。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②⑧。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⑦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说：“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③他又说：“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

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④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③，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③。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③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②；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⑥。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②⑨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既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

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②⑨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③⑩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

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⑨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交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

左右。　　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利的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　　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3)(4))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⑥，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

了。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④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③①。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⑥。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④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③②。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列

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③③。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③④。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③⑤。　　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③⑥。　　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

产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③⑦。在一八五二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③⑧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③⑨。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④⑩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

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④①。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④①，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④①，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④②，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④③。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④④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一九五六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①。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

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⑤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⑥。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④⑥。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①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四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③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④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⑥《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⑦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⑧《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⑨见意共《再生》周刊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⑩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①①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①②《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七卷，第七八页。　①③《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七一页。　①④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①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一页。　①⑥《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四页。　①⑦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　①⑧《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　①⑨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②⑩《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三〇九页。　②①见苏共《真理报》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②②《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〇页。　②③《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八页。　②④《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三二一页。

②⑤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②⑥《列宁全集》第三〇卷，第四〇页。　②⑦见《新时代》一九一二年第四十六期考茨基《新策略》一文。　②⑧《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六页。　②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页。　③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八页。　③①《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二九一四三〇页。　③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二一一页。　③③《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三〇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③⑤《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九页。　③⑥《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三页。　③⑦参看《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六页。　③⑧《国家与

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九页。　　③⑨《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六六页。　　④⑩《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四二页。　　④①参看《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④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四七页。　　④③《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三页。　　④④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六页。　　④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二页。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们一会儿说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轻视”；一会儿说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说这是“因为害怕”。他们喧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们的说法矛盾百出，几乎语无伦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论点。但是，他们的一切说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①又说：“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②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里读书的小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课中一般词汇的释义的试题时说，纸老虎就是用纸糊的老虎，那倒满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观点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自命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②的陶里亚蒂同志，在回答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的时候，却搬出这样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来，这岂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吗？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

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③　　不愿倾听真理的人比聋子还要聋。谁个说过，用肩膀推一下，帝国主义就倒了？谁个说过，为打倒它不需要花费力气和不需要进行斗争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引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④

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三大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重性，而且说明了它们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的两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

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一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⑥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是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

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⑦　　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企图驳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人，你们应当首先驳倒列宁的论点。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驳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等论点呢？这不是表示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不论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的说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出的，是为着通俗地说明问题的本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来说明问题，有许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说明了问题。　　有人表面上曾经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们思想上的极端贫困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何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军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绝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经为他们的老板们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计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绝境中找到可靠的出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纪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1)(2)) 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说他们是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他们现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们想反对

什么冒险主义，他们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险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们反对革命的目的。　　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论俄国杜马（沙皇议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说过：“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问题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问题更要关心。”⑧　　现在，我们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说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缓和和削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这些英雄们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们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须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们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一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或者是轻举妄动，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则，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们敢于藐视敌人，而且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能够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一般说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顺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范例。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话来结束的：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⑨　　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本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⑩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高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

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①①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一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②　　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①③　　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　　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　　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

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④　　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　　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行斗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一九〇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如此等等。　　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　　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

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①⑤

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①⑥。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①⑦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问题，即战术问题，也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

动派是腐朽的，是没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轻视敌人而必须重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们在人民中还有欺骗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就必须经历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放弃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们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谈，或者盲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么，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①⑧。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①⑨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

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　　一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人民的最终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微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终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说成是“经院哲学”，说成是“两面态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一面态度”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②⑩）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②①　　请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仔细地读一读列宁的这两段话吧！这两段话是真正可以作为某些人的政治镜子的。①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见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③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四页。　　④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〇页。　　⑤《〈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八页。　　⑥《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三页。　　⑦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页。　　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Ⅱ）》。《列宁全集》第一〇卷。第四五三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〇四页。　　⑩《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五七页。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二八七页。　　①②《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八二页。　　①③《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俄文第二版，第二九一页。　　①④《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二七八页。　　①⑤《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七七页。　　①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五页。　　①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七——一二六八页。　　①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七页。①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二〇、二二二页。　　②⑩《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页。　　②①《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大党。在法西斯统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列宁，都是经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许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因为

世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2)(3))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一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为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②　　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③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

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④　　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④　　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　　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⑤。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一，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⑥。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　　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　　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

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⑦。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

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⑧　　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⑨　　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伟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详地作了许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说：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⑩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现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话。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罪过”。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　　有人故意避开我们引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们引用了一些什么话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们“一段一段的引证”①①。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①②。他们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语言来攻击我们，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们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别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教师”。　　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唠唠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语言，他们的许多根本论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袭过来的。　　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　　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研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己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③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①④。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

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①⑤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列宁说：“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①⑥现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著名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来考察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

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经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说过，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①⑧。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①⑨　　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②⑩。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本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②①。　　莫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

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②②　　现在有些人，完全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己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②③。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列宁经常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②④　　列宁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

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①④　　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经验，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争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往往轻举妄动，陷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末，它就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规律，它在理论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错误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他说：⑶⑷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⑤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没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继续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则的政策。　　什么是原则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风倒，而抛弃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而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们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则，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则。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④这个论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 “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②⑥ 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许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订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绝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传说“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

策呢？　　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回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抛弃原则政策。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　　列宁说得很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②⑦　　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篇社论，曾经说过："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脚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

“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有人把古巴事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②⑧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②⑨　　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②《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一〇页。　　③《共

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一页。　　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〇页。　　⑤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论‘铁托集团’》一文。　　⑥法共中央全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决议。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二九、五三〇页。　　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二——九三页。

⑨《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二页。　　⑩《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　　①①见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文。

①②见《人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纪律》一文。①③《“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四四页。　　①④《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八页。　　①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二二页。　　①⑥《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一一卷，第三七七页。　　①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一页。　　①⑧《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八四页。　　①⑨《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二〇四页。　　②⑩《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九页。　　②①《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二二页。　　②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〇页。　　②③《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五页。　　②④《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一九——二〇页。②⑤《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〇一页。　　②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八页。　　②⑦《论妥协》。《列宁全集》第三〇卷，第四五〇页。　　②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〇六页。　　②⑨《论党》，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二二页。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

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　　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分裂的代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伯恩斯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经多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抛弃了。伯恩斯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现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嚣张，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们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话，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

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许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劲地闹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是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分裂的手法，在人们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没有好结局的。我们曾经劝告那些闹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马”，可是有人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马”。看来，他们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继续闹下去。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

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①　　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

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②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们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无助于团结的。我们一直主张，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论战，回到内部协商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的主张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们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适宜的。　　我们当时就指出，要举行兄弟党会议，并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间有争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和缓关系、恢复团结的步骤，即使是微小的步骤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　　我们当时就建议，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们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间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交换意见，这对于兄弟党会议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规定的。我们曾经多次地说明过这些意见。现在，我们再一次地说明这些意见。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如果是诚意的话，是言行一致的话，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历来所希望的。　　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

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①《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六页。　　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一——四二页（全文完）

2011 年 4 月 29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8）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人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三）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约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〇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

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们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教训。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

（十三）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利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各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

一九六〇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哪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年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

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

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十八）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他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级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处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二十）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

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议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是独立和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

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三）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

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有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是，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成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地、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　　*　　*　　*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

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担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

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2011 年 4 月 3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9）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

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

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

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

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

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

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

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

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Ｕ－２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

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

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失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比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

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

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

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

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

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

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

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

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

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

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

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请问：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

，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

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

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

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企业经理

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

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

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

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pre>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

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复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凡·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Ｕ－2 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Ｕ－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

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

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

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

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

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

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

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

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

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考茨基：《民族问题》）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

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考茨基：《再论裁军》。）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美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

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〇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

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

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

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无产阶级

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零九页。）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页至四百四十六页。）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页至三百三十四页。）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至三百七十六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页。）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

能的。”（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页至四十八页。）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

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页。）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

。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幅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

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

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

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

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页。）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页。）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页。）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经验和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

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

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复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

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

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

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〇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

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耍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

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挟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

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0）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本节资料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缘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成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

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

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

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仿砜怂纪?“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

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

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拚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

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

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

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

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

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页。）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

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一意要同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页至第三百二十九页。）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的贺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 70 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它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

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

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

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

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

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

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

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

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〇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1）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本节资料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并且指责我们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评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们“向后倒退”。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谁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列

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②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③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妲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些差别已经消失，只有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

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①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②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①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③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④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⑤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

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

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①“没有阶级冲突”，②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③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

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①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②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③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④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①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②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③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④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①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②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③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④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⑤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⑥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〇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⑦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 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

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①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

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

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①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

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驳所谓“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①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的谬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

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①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②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④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②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③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②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③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①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说，赫鲁晓夫大事吹嘘的所谓“全民民主”，同所谓“全民国家”一样，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拣起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②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驳所谓“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有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①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现实的辩证法”。②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著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①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

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①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②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③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④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⑤

事实很清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⑥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①这完全是骗人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呢？

赫鲁晓夫挂起“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可是，这种骗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许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

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

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①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②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③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他说，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羡慕”。①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场主加斯特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件，②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纲领。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别要学习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原则。他很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说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③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愿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④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⑤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⑥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⑦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⑧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

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佑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①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

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分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毫的麻□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

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

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

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中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

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　　*　　*

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不怕。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2）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

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

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

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

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

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

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

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

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〇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

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一）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会议。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这种立场。你们在来信中说我们“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完全是用谎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消除被你们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你们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绝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倡议。接着，你们就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后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的逆流。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原来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从而有利于准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而你们对于中苏两党会谈毫无诚意，并且在会谈期间，发表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扩大和加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进一步堵塞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春，为了克服你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争取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我们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由于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中只是空唤团结，而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所以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筹备和召开

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四项建议。这四项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你们在最近几个月里，干了些什么呢？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们向兄弟党发出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策划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过去多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你们至今不给，还欠着我们的账。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通过反华决议，叫嚷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行动”。

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你们的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内部大搞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结。例如，你们策划志贺、铃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你们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们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给我们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

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会议，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就暴露了你们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们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们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们要开的是一个分裂会议，所以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这封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始终主张“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过去，当你们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具体建议的时候，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具体建议，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现在，当你们决心要开分裂会议的时候，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始终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们过去也说过，在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开国际会议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说，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险”。现在，你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用闪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大概认为，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人们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你们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结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会议做准备。

很明显，你们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们为召开一次团结大会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你们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会议，这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结大会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

你们的来信表明，你们已经为国际会议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

你们在来信中说，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便“制定共同的立场”。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

你们的来信狂妄地声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表示要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坚定地前进”。你们还用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不赞成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那就是“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这就是说，你们明目张胆地要把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成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所说的要“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就是要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宣言和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

从你们多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和行动来看，你们来信中提出的准备强加于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它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你们所说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就是要搞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

你们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这就是要兄弟国家服从你们的指挥棒，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成你们的附属国，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你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这就是“议会道路”和“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你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这就是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这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你们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偷换了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这就是要联合被你们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们所说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强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〇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必须指出，你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源。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并且日益破产。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就必须对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你们硬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三）

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是一整套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部署。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味。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经建议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你们不同意。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你们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们的合情合理的意见，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

你们想必记得，成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是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谈前夕，中共中央在给你们的信件中建议的；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成员，是由各兄弟党协商确定的。这二十六个兄弟党，只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世袭权，并不是筹备各次国际会议的常设机构的成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设机构。

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经说过，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〇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二十六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两个党，究竟由哪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许多兄弟党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国际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和参加的成员的问题，必须由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不论召开什么样的筹备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第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中国共产党和许多兄弟党都认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召开国际会议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骤。你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们在来信中还说：“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现在，你们在来信中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分割开来，对于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具体建议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中苏两党会谈“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你们分明是把中苏两党会谈看作是可有可无，企图撇开中苏两党会谈，在中苏两党没有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这不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又是什么呢？

第三，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成员。你们的来信说，参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并签署文件的党，都可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叛徒铁托集团参加过一九五七年会议，签署过《和平宣言》。你们显然是要把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一致谴责的铁托集团拉进兄弟党国际会议。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你们的来信，还在国际会议的新成员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只有拥护你们的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党才可以参加，同修正主义宣布决裂而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不准参加。老实告诉你们，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些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当然有权利参加，谁也没有权利拒绝他们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会议，你们要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你们一道搞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四，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集者。你们的来信说，苏共负有召集国际会议的“特殊责任”，并且引证了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但是，你们所引证的这个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是说，必须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负责召集国际会议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独断专行。我们还要指出，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确立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因此，召集国际会议必须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绝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们同意开会。如果你们胆敢破坏这个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你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召集国际会议。

在上述有关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的所有问题上，世界各国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意见，这些意见都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对于这些问题，各国兄弟党必须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如果你们以霸主自居，下令强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样的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四）

几年来，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普遍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许多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面前，挺身而起，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或小组，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个斗争中，现代修正主义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许多党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已经被革命人民抛到一边。这一切，都同你们的愿望相反，使你们感到焦虑不安，感到无限恐惧。

你们在来信中大肆攻击我们什么“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这只能表明你们被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吓破了胆，已经到了神经错乱、胡言乱语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出现的分裂，都是你们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猖狂地进行颠覆活动和派别活动的结果。正是你们，挥舞指挥棒，硬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一些兄弟党，并且指使这些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者，横蛮地排斥和迫害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造成了这些党的分裂。既然这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剥夺了在党内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只能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下去。你们越是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就越会有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你们进行斗争。斗争的逻辑必然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你们摆出一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法官的架势，说重建和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政党都“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好象一切事物只要你们不承认、不批准，它们就在地球上不存在似的。这是一切腐朽势力对待新生力量的哲学。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新生力量，都是在腐朽势力死也不肯承认的情况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美帝国主义过去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现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你们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照样在全世界存在和发展。你们越是恶毒地咒骂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同你们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还必须警告你们，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兄弟党所进行的干涉和颠覆活动，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只能暴露你们同反动派同流合污、破坏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丑恶面目。你们最近片面地公布了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悍然发动了对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斗争前线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你们勾结美日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贺和铃木等人，颠覆日本共产党，破坏日本革命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共产党反对你们的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反对你们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说到公开论战，谁都知道，那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想当初，你们一心要搞公开论战，怎样劝你们，你们都不听，越劝你们不要搞，你们搞得越起劲。你们满以为，只要这样搞下去，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压倒，把他们从地球上灭掉。谁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在这场大辩论中，你们的修正主义面目很快地、有些是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则是迅速地壮大了。这场大辩论，变成了清除修正主义渣滓的熔炉，预示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涨的必将来临。现在你们怕也没有用了，扑也扑不灭了。火既然已经由你们放起来，公开论战的火焰已经燃遍了全世界，你们现在又想用纸把它包起来，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你们在来信中指责我们要“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你们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于你们今年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还没有开始答复，对于你们一年来发表的三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保留答复的权利。只要你们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不肯公开承认错误，我们就一定要把大论战继续进行下去。既然你们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且坚持要把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我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党，一个严肃的党，理所当然地要彻底揭露和批判你们的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彻底弄清是非，兄弟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基础呢，又怎么能够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呢？

你们的来信，又一次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论战文章和材料的建议。看来，我们的建议使你们吓得发抖。你们辩解说，你们不发表我们的材料，是为了不破坏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你们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和材料，恶毒地诬蔑和谩骂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难道不是破坏中苏友谊吗？你们咒骂我们是什么“假马克思主义”、“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直接反苏主义”、“反共主义”、“好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霸权主义”、“北京变节者”、“现代的革命工贼”、“假革命分子”、“现今右翼社会党人的教父”、“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同不可救药的殖民主义者结成一伙”，等等，你们这样大骂特骂，难道是维护中苏友谊吗？显然，你们拒绝我们的建议，不敢在你们的报刊上发表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和材料，是因为你们心里明白，广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是珍惜中苏友谊的，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材料，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们的日子就更加混不下去了。

你们在来信中，为了给自己壮胆，声称越往后越会证明你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既然如此，你们又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样声嘶力竭地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呢？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呢？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要开国际会议呢？你们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岂不很好吗？说穿了，时间并不在你们方面，你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形势逼人，你们的来信，理不直，气不壮，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们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又能怪谁呢？　　（五）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谁都能够看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这样严重，争论是这样剧烈，如果急急忙忙地召开国际会议，只会开坏，不会开好。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严正警告，抛弃协商一致的原则，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那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公开分裂。

自从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开过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这并没有妨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的，在这十四年中，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各种类型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验证明，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使本国人民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一九五七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已经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的兄弟党会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但是你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就把宣言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大肆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把它强加于兄弟党。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我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但是你们仍然毫不悔改，又把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坚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呢？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

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象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四年八月，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片面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与那些拒绝为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充当同谋者的各兄弟党站在一起，宣称将本着保卫马列主义的一贯立场反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阴谋　　新华社十日讯　里约热内卢消息：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间通过决议，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决定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决议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片面地决定了在明年年中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它已指定了在十二月举行曾组成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党代表的会议。

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其目的是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正式化，并孤立那些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党。他们主要的着眼点，就是打击在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斗争中站在前列地位并且给予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切实支援的中国共产党。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伪善地为召开这一会议辩解，他们借口说，必须克服现有的分歧，寻求相互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所希望的，是加剧分歧并使任何谅解变得更加困难。苏联领导人明明知道，既然分歧到了这样的地步，既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了无数的谩骂式的攻击，那么，在一次他们所企图举行的这样的会议上，是不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求有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正确的解决办法。他们从脖子以下已经深陷在修正主义的泥沼之中，尽了一切力量来分裂工人运动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力量。

应对共产主义队伍中发生的不健康现象负责的，是苏共领导人。他们在自己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一条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采用最卑劣的手法企图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其他各党。他们破坏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他们粗暴地、完全无理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甚至号召推翻这个党的领导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莫须有的指责，从而挑起了公开争论，并发动了罪恶的反华运动。他们诽谤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锡兰和其他各国奋起反对修正主义并采取了革命态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共领导人一面这样做，同时又同和平与人类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勾结。这样，他们就背叛了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所召集的会议，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将到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些驯服地服从赫鲁晓夫指挥棒的修正主义者。例如，被邀请参加起草讨论文件的十二月莫斯科预备会议的，有巴西的共产党的代表，这个党并不代表巴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志，而且它由于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路线，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人民力量在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四月一日军事政变中遭到失败。

苏共定于一九六五年举行的会议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它应受到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谴责。正当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和老挝、在古巴和刚果以及其他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其侵略活动的时候，正当这一事实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加团结起来的时候，任何使分裂加深的措施，都是对各国人民及和平的利益的不可饶恕的侵犯。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这一运动本身性质所产生的要求，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的一个需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巨大的愿望。但是，团结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周围并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不倦的斗争中缔造起来。在目前条件下，要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次会议能够开好，苏共和其他脱离了正确道路的党就必须抛弃其错误的方针，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为目标的会议，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要求对争论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辩论，并进行一场十分深刻的思想斗争。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着自己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立场，反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阴谋，并与那些拒绝为这一正策划中的、通过上述会议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罪行充当同谋者的各兄弟党站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秘鲁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严正谴责赫鲁晓夫集团分裂主义阴谋，表示将不参加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擅自决定召开的分裂会议，支持中共等马列主义党的坚定态度反对腐朽的修正主义思潮

新华社利马九日电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九月十六日发表声明，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片面和未经协商地决定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明全文如下：

“鉴于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片面和不经协商地召集一次世界共产党的会议，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声明：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已很深刻，如果事先不经过必要的会谈和协商而轻率地举行会议，那只会有助于实现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制造严重混乱的人的分裂主义企图。有分歧的党必须举行会谈、辩论和讨论，以便最后举行所有各兄弟党的世界会议。那些拒绝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真正会议作耐心准备工作的人表明，实际上他们丝毫也不关心团结，而一味追求分裂。二、苏联共产党领导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兄弟关系的一切准则，擅自决定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指定哪一些党应该事先举行会议来制定作为讨论基础的文件，甚至已确定了开会的日期，这一事实明显证明，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关于反对专横手段的叫喊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下流的谎言。在召集各国共产党举行世界性会议前，应该进行一切有益的准备工作，特别应该同各党进行协商，了解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容许存在老子党和儿子党。三、秘鲁共产党宣布它真心诚意地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只有那些最近几年来粗暴地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对错误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决心真心诚意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才可能实现各国兄弟党的团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即使只提出这种团结，也是荒谬绝伦的。四、秘鲁共产党将不参加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人召集的分裂会议，从现在起反对和谴责这次会议，并通告全世界兄弟党，任何企图代表我党出席这个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会议的‘代表团’都是冒充的，它只代表被开除出党的一小撮叛徒，他们今天致力于同阶级敌人合作，以便给秘鲁工人阶级的党以狡猾的背信弃义的打击。五、秘鲁共产党支持和欢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朝鲜、阿尔巴尼亚、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所持的坚定态度，它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腐朽的修正主义思潮，揭露赫鲁晓夫和铁托国际集团的分裂主义阴谋。

秘鲁共产党政治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于利马。”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不支持召开使分裂合法化的国际会议，两党一致认为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以革命的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

新华社十一日讯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二日发表了九月二十九日在雅加达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应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桑穆加塔桑同志和夏菲同志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来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访问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锡兰共产党中央全国组织委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同志和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夏菲同志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在雅加达举行。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苏皮特同志。锡兰同志们还访问了“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这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机关），桑穆加塔桑同志向“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师生讲了话。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一些双方关心的问题，并且就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两党和两国人民面临的问题达成了意见一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支持和同情锡兰共产党为团结锡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建立充分独立和民主的锡兰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赞赏锡兰共产党的革命立场，和它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锡兰共产党坚定声明，它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实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尤其是实现它要摧毁“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计划的当前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锡兰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会实现他们成立一个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当前目标，作为加速实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双方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并且认为揭露和击败美帝国主义是在他们两国展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主要任务，并且认为这是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所做的积极贡献。

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印度尼西亚海和所传最近要在印度尼西亚海建立美英联合基地的决定，以及表明美帝国主义支持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的约翰逊—拉赫曼联合声明，和美帝国主义继续不断地干涉越南和老挝——这一切不仅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正在策划反对东南亚人民的罪恶阴谋，而且也为两国更密切的合作和互相支持对方的反帝斗争提供了基础。

两党极其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南越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双方热情地欢迎和热烈祝贺南越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

下的英勇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还向给予美国侵略者应有的反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礼。

两党都认为，老挝问题必须由老挝人民自己根据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来解决。两党还宣布坚决支持南朝鲜、柬埔寨、古巴、委内瑞拉、刚果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颠覆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是造成一切国际紧张局势和动乱的祸根。两党确认，可以迫使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退却，只要各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团结起来，对美帝国主义展开坚持不渝的和无情的斗争，就能够最后击败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对现代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带来的严重意见分歧深为关切。这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并使世界帝国主义得到好处。两党一致认为必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象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一样。为了加强反帝国际联合阵线，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是必要的。

两党非常重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进一步加强这种团结的必要性。它们认为，这种团结必须以接受正确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为基础。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两党认为这样一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且必须是遵照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在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样的会议必须以协商和意见一致的原则为基础，以保证它不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的合法化。

两党一致同意它们不应当支持召开一次旨在使分裂合法化的国际会议的活动，并且认为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继续不断地进行协商和努力——双边地或是多边地——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两党表示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取得最后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真理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和更紧密的团结。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的战斗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人民和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万岁！

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主义和和平的革命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于雅加达

桑穆加塔桑代表锡兰共产党

艾地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驳斥苏共领导人扬言似乎他们有权片面召集国际会议的各种谬论，指出强行召开使国际共运分裂的国际会议的人必须承担分裂责任

新华社东京十二日电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是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的社论。全文如下：

一

这几年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扩大了不团结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显著地削弱了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战斗力，从而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势力，即侵略和战争、民族压迫和反动、反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嚣张起来，给了它们以发动各种侵略和进行破坏革命运动活动的余地。

这一点，只要举出目前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半岛进行的极其蛮横的侵略和干涉这一事例，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众所周知，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革命人民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陷于困境。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按照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展开了共同斗争，那么，毫无疑问，环绕印度支那半岛的国际局势，是会比现在更有利于我们。

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迫切要求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发展由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的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所进行的斗争而早日争取实现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是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应尽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我们党一再声明，为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消除不团结的原因，原则上同意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为了筹备这个会议而举行的一系列的党的预备会议和个别会谈，都应当按照下述方针和采取下述方法举行，即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且实际上促进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团结。为此而需要的条件是必须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基础。

众所周知，意见分歧的性质很严重，它涉及到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以及贯穿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原则问题。最近，甚至在兄弟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有人说什么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问题，不是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争夺领导权”。这种论调，不过是供认自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从根本上陷入了与资产阶级评论家相同的庸俗观点。

国际范围的争论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因为它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如果“声明”里规定的各国共产党一致确认的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得到遵守，换一句话说，如果各兄弟党的独立、平等以及自主得到尊重，通过内部协商达成一致的准则得到遵循，那么，尽管有如上述性质的意见分歧也决不会发展到象今天如此严重的不团结的地步。

然而实际上，苏共二十二大践踏了一九六〇年的声明，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而且把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分歧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此外，象某些党目前对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那样，对我们党也进行了蛮横的干涉。结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象今天这样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

造成这种局面的最大的责任，正如日共中央在八月二十六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具体论述的那样，应当由苏共领导负责。

这一点从如下的事实看也能够得到证实：即在国际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观点同苏共一致的欧洲党中间，也出现了反对苏共领导采取大国主义态度的党，它们反

对苏共领导不尊重兄弟党的独立、平等的立场，不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无视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而强加于人。

如果真心愿意冷静地正视这种情况并且从现实出发去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团结，那么，为了筹备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就应当严格遵守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这是为了使会议的筹备工作获得成功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如果无视这一点，那么，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上罗列多少美丽的词藻，也是无法掩饰其分裂意图的。

二

然而，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预定在明年中期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片面地决定从十二月十五日起，由二十六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并且不管二十六个兄弟党中的哪一个党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不派代表，也硬要推行这个计划。

八月十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国际会议是走向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的社论，公开地表示了这一意见。

这些人也在说什么“苏联共产党主张举行会议，是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阻止分裂”，“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不是为了把哪个党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或是随心所欲地把哪个国家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驱逐出去，不是为了相互谩骂和指责”，说什么“苏联共产党采取的立场是：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意见分歧的时候，首先应该采取共同的立场，阐明联合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点，集中力量为寻找克服当前困难的道路而努力”。

如果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么，当然应该就会议的筹备工作，很好地同兄弟党进行协商，考虑兄弟党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人却片面地决定由筹备一九六〇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从十二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起草委员会”的活动，并且说“不论哪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活动”。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预定召开只有赞同苏共领导提案的党参加的会议。不仅如此，还说什么“拒绝参加会议，就是要使分裂‘固定下来’”，这是想把片面的决定强加于人，或者把分裂的责任转嫁于人。

在那时候，这些人说，好象由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是当时已经决定并得到确认的事项，然而，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二十六个党是为筹备一九

六〇年的国际会议而确定的，它们的任务已经在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向会议提出草案而宣告结束。而且，这次会议对于这二十六个党担任下次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只是这样，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议上，一部分党的代表提出的、应该设立一个由一些党组成的常设机构的建议，也被否决了。因此，如果要召开筹备新的国际会议的预备会议，它的组成必须重新由兄弟党协商决定。

三

有一部分人为了使他们企图片面召集的“国际会议”“合法化”，说什么似乎有一批兄弟党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本身。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兄弟党是反对包括筹备会议在内的国际会议的。

意见不一致的，是关于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以及筹备会议的召开日期、组成和议题等问题。如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没有原则上的分歧，那么在举行不举行筹备会议的问题上、在举行筹备会议的日期和组成的问题上，都不能成为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想反对分裂，争取真正的团结，那就决不能说这个问题仅仅是会议的形式的程序问题，它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按照《真理报》的主张，谁不赞成关于国际会议的日期、组成和议题的片面提案，谁就是被它指责为“规避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不择手段地企图破坏会议的人”。这也是企图通过“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来模糊它企图片面召开导致分裂的“国际会议”的活动，因此，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正象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中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从反对分裂、争取真正的团结的立场出发，应该不断努力就会议的程序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放弃这种努力，片面地决定召开筹备会议的日期、组成、议题等问题，并且硬要强制推行这个计划，这才是要使分裂“固定下来”。

关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说“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并且以此为根据，扬言似乎苏联共产党有权召集国际会议。

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决定”，更没有参与通过这样的“决定”。我们党支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可是在宣言中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决定”。如果这

个“决定”不是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发表的宣言一起，而是另外通过的，那么，这样的“决定”至少不能约束除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以外的其它兄弟党。

而且，即使按一般情况来说，这个“决定”也不能成为使现在企图片面召集的“国际会议”合法化的依据。

原因是，即使各个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会议上通过这个“决定”使它能成为它们召集下一次会议在手续上的一个根据，很明显，此外也还是没有更重要的根据。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兄弟党参加下，讨论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问题的一九六〇年会议，确认记载在声明中的东西，是各兄弟党应当遵守的准则，除此之外，没有确认过别的东西。还有，这个“决定”所说的“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这一句话，其意思自然是说根据各兄弟党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就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在召开新的会议的手续问题上，事实上也还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包括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有一系列的党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是片面的，而且会造成公开的分裂，因而拒绝参加。

有一部分人辩解说，“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这一句话，其意思不是说“对召开会议必须要各兄弟党一致同意”。这是违反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的“协商一致”精神的、随心所欲的解释。

四

有一部分人还认为，关于国际会议的问题，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已经协商了两年多，他们说，“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决定所规定的关于进行协商的条件，完全得到了满足。”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当各国共产党讨论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时，象一九六〇年所进行的筹备工作那样，召开一次能够准备新的会议的基本文件草案和准备与召开会议有关的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提案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曾经被认为是适宜的。”

譬如，根据《真理报》的主张，似乎已经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协商。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哪一个党，进行了这样的协商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想知道具体情况。

再就我们党来说，从来没有人事前同我们商量过关于召开这种国际会议的问题。相反地，今年三月，我们党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时，就苏共领导今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采取什么方针一事，提出过询问，苏共代表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答复。

诚然，包括我们党在内，有许多兄弟党对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各有关的兄弟党之间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必要的协商。而且，这些意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因此，所谓就国际会议问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的说法，也是违背事实和根本站不住脚的。苏共领导这次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根本没有采纳一系列的党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即不应当强行召开一个没有做好为团结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国际会议。既然要同对方进行协商，就应当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并且使意见趋于一致，这是前提，但是，丝毫也不想认真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发表完全是单方面的建议，而且还说已经充分地进行了协商，这是违反事实和不讲道理的。

为摆脱这种自我矛盾而采取的手法，就是他们所谓的归根到底、“绝大多数的党”支持苏共领导的建议。有一部分人说，“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对于有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表示赞同”。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理由，使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合法化。况且，只由这些党单方面地就苏共领导所主张的那样一种预备会议的组成问题和以后的开会方针进行协商，而在事前没有同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党就这些问题进行协商，那就更加可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排他的。

众所周知，一九六〇年的声明明确地确认：无论是国际会议或是一系列的党的会议和个别的会谈，都必须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并且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议上，一部分兄弟党的代表主张用多数表决的方法来处理意见分歧，但是，会议否决了这种主张。

如果想忠实地遵守一切兄弟党所确认的这一事项，那么，当然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采取全体一致通过的制度；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则。

对于由独立平等的兄弟党所组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才是维持团结的正确方法；即使某种立场和看法得到多数党的支持，如果企图把它强加于其他党的头上，那显然是违反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根本原则的。

五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了解，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观点来看，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片面的建议及其“论据”，完全不能成为正当的根据。

我们党已经再三申述过，坚决不同意召开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导向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已经陷于极其复杂的，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认为，最后的分裂要比目前的情况更坏。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的团结，必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因为，如果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巩固的团结，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完成变革世界的伟大事业，也无法正确地满足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迫切要求。

我们必须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结。但是，从现状看来，难道一下子就把原则问题都加以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那种条件还没有成熟。

企图强行早日召开国际会议的人们，也无法完全否认这个现实，他们承认存在“不能一下子找到共同语言，而就一切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并说在这种时候，“如果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聚集一堂申述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意见，集体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有益的”。如果只看这一段话，好象这些人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人不仅想把关于预备会议的日期和组成的片面的建议强加于兄弟党，而且坚持那种一贯地违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和看法，并且以此为前提，企图起草新的基本文件，说什么“这是新的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

一系列的兄弟党已经表示不参加根据片面的建议召开的、将会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如果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起草一个新的基本文件，以

代替由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全体一致通过的一九六〇年的声明，那么，很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名副其实地走向分裂。而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的人们，必须承担这个分裂的责任。

六

然而，在就原则问题可能达成一致协议的条件成熟之前，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争取某种行动的统一呢？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和宫本总书记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即使围绕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最后解决，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具体表现进行斗争，各国共产党也需要根据“宣言”和“声明”争取当前的行动的统一。

而且，假如没有放弃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意志，还感到对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负有责任的话，至少是不会不赞成这种行动的统一的。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进行捣乱和攻击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签订这种行动统一的协议，这将给予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以打击，而成为使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集中力量进行有效斗争的保证。

我们认为，即使是通过争论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阴谋活动。这才是朝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真正团结的方向前进的现实道路。

将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目前还没有召开，所以现在为时还不算晚。我们广泛地向各兄弟党建议，停止召开根据片面的站不住脚的建议和方法举行的“国际会议”——事实上，这必然是有害于团结的——而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讨论关于团结一致、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展开斗争的具体的联合行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关于筹备这样的国际会议的问题，希望至少要取得出席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所有的党的同意，立即在必要的有关兄弟党之间进行应有的讨论，而且这样作也是必要的。我们向所有的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团结、并希望国际工人阶级与和平民主力量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进行有效斗争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这个呼吁。

我们再次强调，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已经起来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衷心愿望，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负有的崇高义务。

现在嘴上唱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调子，而实际上企图在导致最后分裂的道路上奔跑的人们，过去也曾说过，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分裂，那将是对子孙犯下的严重的罪行。

我们诚恳地劝告这些人，现在是时候了，你们要认真地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停止走分裂的道路，倾听我们的建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坚决反对赫鲁晓夫集团召开彻底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呼吁苏共党员同各国共产党人团结起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

新华社地拉那十二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十月六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旨在彻底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公开信呼吁苏联共产党员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赫鲁晓夫集团这一阴谋，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列宁所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伟大的列宁的党和制止赫鲁晓夫的反苏和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共同斗争。

公开信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经历着在自己的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造成这种严重局势的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集团。这个集团通过政变手法和阴谋，篡夺了伟大列宁所缔造的光荣的党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导权之后，现在又走上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的叛卖的道路，它成了腐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破坏其团结基础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逆流的主要叛卖者和传播者。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曾经多次呼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你们党的领导放弃修正主义和分裂路线，勇敢地检查自己的立场，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批判自己的沙文主义立场和对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敌对行动，同它们重新建立友好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然而，赫鲁晓夫集团不仅对这种理智的呼声充耳不闻，蔑视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同志式的忠告，而且更加顽固地继续在背叛的道路上走下去，对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变本加厉进行攻击和采取敌对行动。事态的发展和种种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赫鲁晓夫是一个叛徒，是执意要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的死敌。

公开信说，不久前作出要蛮横非法地召开追随赫鲁晓夫集团的那些党的特别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新的大阴谋，这十分明显地证明赫鲁晓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力图把尽可能多的党拉进这个反共新阴谋，来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彻底分裂成为定局。为此，赫鲁晓夫集团写信通知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个党，他决定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并大约在明年年中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件邀请我们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要求尽早通知这个代表团的组成。

鉴于赫鲁晓夫集团已经死不回头和不可救药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要把它引上正路的一切努力和希望已经完全落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不答复该集团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来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已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

公开信说，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决定向你们，向苏联共产党党员，向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锋队员发出这封公开信。我们希望通过这封信以兄弟的至诚，开诚布公地向你们道破赫鲁晓夫多年以来对你们隐瞒的真相。

公开信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就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大肆叫嚷，他力图使你们和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相信，这是一次所谓不可缺少的会议，说什么这次会议将能解决分歧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一个大骗局，是虚张声势，是危险的阴谋。

事实上，无论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来看，还是就其筹备的方式以及其政治纲领来看，都是根本无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事业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破坏团结，永远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支撑修正主义的摇摇欲坠的阵地，加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从而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帮大忙。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分裂会议，断然声讨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一新阴谋。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什么拒绝参加并且声讨这次会议呢？

第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确信，在目前的条件和形势下，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在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且目前围绕着这些问题正展开一场大辩论的时候，匆忙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无助于解决分歧，无助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牢固基础上加强团结，它根本不是什么“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最有效的道路”，恰恰相反，是走向彻底分裂的道路。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日益加深和恶化现存的分歧，日益破坏团结，他们愈来愈深地陷进背叛和分裂的泥坑。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使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变得更加困难，就使会议变得更加遥遥无期。现在必须做更多的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为召开将真正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告，赫鲁晓夫集团发起召开的会议是绝对蛮横非法的会议，因为赫鲁晓夫集团粗暴地践踏了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指导各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和原则。没有同其他党协商，没有事先得到其他党的赞同，谁也无权任意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们公开宣告，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事先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协商过。

赫鲁晓夫完全蛮横地决定以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代替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所确认的通过同志式的权利平等的协商来取得一致的原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表示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这是公然破坏兄弟党的权利平等和独立，因为这是企图把所谓多数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即使我们谈多数，谈名符其实的多数，谈真的而不是假的多数，那么多数根本不在修正主义者那边。许多兄弟党已经表示反对在目前条件和情况下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这些党的党员

约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一半，这还不算另外一些其领导已经滑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的党的党员所形成的一支庞大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队伍，他们也谴责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的、背信弃义的行径。

第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告，赫鲁晓夫集团蛮横地、非法地、匆匆忙忙地召开所谓国际会议，事实上只是为了召开一次分裂会议。这也可以从苏共中央委员会七月三十日的信件中清楚地看出来。信件说：“我们认为，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信件还说：“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则在于制定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即使事先已表示反对在目前条件和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的许多党不派代表参加，赫鲁晓夫也执意要召开会议。这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召开的会议，将只是某些党的领导人、而且基本上是追随赫鲁晓夫的那些人的会议，将是一次修正主义者的会议。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揭穿赫鲁晓夫的所谓争取团结一致的全部骗局，使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主义的阴谋暴露无遗。

公开信说，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赫鲁晓夫集团急急忙忙召开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为了达到如下两个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加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谴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共产党，并且把它们“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是要为修正主义阵线的娄罗们打气，使所有修正主义者听从其指挥，把一部“新宪章”强加于他们，来束缚住他们的手脚。

对于遭到各种极其严重的困难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来说，其命运取决于是否能达到上述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全世界革命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有原则的坚决斗争，不仅撕破了赫鲁晓夫集团修正主义者的假面具，挫败了他们的敌对阴谋，而且在现代修正主义者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局面。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在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霸权和作威作福的反抗趋势上。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分裂，逼迫他们的修正主义同伙，并强行加以控制和统制，制止任何哪怕是虚有其表的独立表现。

赫鲁晓夫企图通过他所准备的这个会议来实现的阴谋，不仅在识破了赫鲁晓夫损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阴险目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前完全碰壁，而且在他的某些修正主义同伙那里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首先应该指出，某些反对赫鲁晓夫所建议的会议但是还是要参加的修正主义者，毕竟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比赫鲁晓夫本人更彻底，他们反对召开国际会议，并非出于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重，而是要用不同于赫鲁晓夫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更有效、对自己风险较小的办法，来实现彻底分裂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使人们对他们的立场等等存幻想，以延长自己的寿命。此外，他们之所以反对，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约束，他们要“摆脱”赫鲁晓夫集团，他们要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时机和方式随意同社会民主党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直接勾搭。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现在所施展的阴谋诡计，所使用的策略，掩饰不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视。

公开信接着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主张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但是，它始终主张召开有助于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会议。它始终坚决反对召开造成公开分裂或者造成在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假团结的任何会议。

公开信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团结的唯一基础。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者是根本谈不上团结的。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计划，是分裂的计划，是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

公开信强调指出，赫鲁晓夫集团一直在为召开一次公开分裂会议展开活动。正是他们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开始造成分裂。正是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行径加深了分裂。现在，正是他们要彻底分裂。但是，修正主义者不要忘记，他们举行会议之日，将作为他们公开彻底背叛、同时作为标志着他们最后一败涂地的日子载入史册。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在排除修正主义者、打垮修正主义者之后而奋勇前进，它将在战斗的征程上实现团结。这将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为之进行英勇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团结。

公开信接着详尽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多年来竭力在苏联共产党人、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面前制造的种种骗局。

公开信指出，赫鲁晓夫竭力要使人们相信，他的当权开辟了一个新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公开信说，这不过是弥天大谎。赫鲁晓夫的当权，确实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开始，但这是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是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叛变、蜕化变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破坏团结和制造分裂敞开大门的转折点，是为同帝国主义及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其他敌人靠拢和联合、为破坏革命和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的转折点。

迄今，没有任何人和任何集团，象赫鲁晓夫及其集团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那样严重的损害和灾祸。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样大的叛徒集团和如此疯狂、如此危险的敌人。

赫鲁晓夫集团现在竭力要做的，正是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敌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分子当年未能做到的事。

丑化、诋毁、肆意攻击和诬蔑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难道有谁比得过赫鲁晓夫吗？

公开信指出，赫鲁晓夫抹煞了苏联最光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克服了极大的困难，英勇地对付了资本主义的疯狂包围，肃清了反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中赢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使苏联成为发达、先进、在国际上享有空前威望和具有空前影响的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赫鲁晓夫把这整个时期描写成了苏联充满着恐怖、迫害、监狱和集中营、法制和民主遭到破坏、专横暴虐、贫困和饥饿的时期。赫鲁晓夫这样做，给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给了帝国主义者攻击和诋毁苏联的武器。

公开信指出，叛徒赫鲁晓夫不是镇压托洛茨基集团，不是全部消灭敌人和把他们焚尸扬灰，而是把苏联历史性胜利的伟大保卫者和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遗体焚尸扬灰，他把全部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地恢复了名誉，宣布他们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并且决定要为他们建立纪念碑。

公开信说，只有叛徒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对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斯大林进行这种最骇人听闻的诬蔑和攻击。同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背叛共产主义的最疯狂的叛徒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的反斯大林、反共攻击相比，赫鲁晓夫甚至超过了他们。他是怎样攻击斯大林的呢？他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等等。另一方面却对他称之为“在他们的人民中享有完全的信任”、“认真地为维护和平而操心”的“明智”的人——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人阿谀奉承。甚至把帝国主义头子之一肯尼迪之死看作是“人类的巨大损失”，而且宣布共产党人也为他志哀。只有骗子、没有骨气和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斯大林。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热烈颂扬他，说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人民的朋友和亲爱的父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伟大的统帅”、“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导师”。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以庸俗市侩才会使用的伎俩对斯大林进行卑鄙的诬蔑和攻击，这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对苏联党、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的侮辱，他也侮辱了光荣的苏联军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劳动者，他还侮辱了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前，赫鲁晓夫本人曾经说过：“这些人举起了恶毒的手想打击斯大林同志。打击斯大林，就等于打击我们全体，打击劳动人民，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干下这种勾当的恰恰是赫鲁晓夫自己。他打击斯大林，也就是打击全体，打击共产主义，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既然把斯大林三十年的领导看成是一种变态，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路，并且竭尽全力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他也就是自己在打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他是在苏联推行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叫嚷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其真正的目的和真正的含义就在这里。

公开信接着说，赫鲁晓夫集团打击最神圣的事物，打击苏联人民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打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他企图解除人民的武装，夺去他们手中的政权，使党蜕化变质。他践踏和抛弃了布尔什

维克党始终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的传统和革命精神。他在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领域里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强加于党，这条路线使苏联党和人民曾经为之英勇斗争、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和洒下鲜血而在苏联取得的社会主义历史性胜利处于危险之中。

为了实现这条路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各级党和国家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清洗，排斥它不信任的所有干部，用忠于它的路线的干部替换它不信任的干部。

今天在赫鲁晓夫周围为他效劳的那些人，是在思想上已经蜕化变质、背叛苏联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巩固自己政治上的统治。以这个阶层为基础的赫鲁晓夫集团，正在把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赫鲁晓夫集团专政的国家。

公开信说，他的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论点，是一个大骗局。这个论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四四八页）赫鲁晓夫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倒退，是向资本主义跨出了十分危险的一步。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国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用来掩盖他的集团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对苏联人民的专政的假面具。赫鲁晓夫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要保持国家的政权，作为实现其反革命目的的手段，以便把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员置于被压迫和受统治的地位。同样危险的所谓“全民党”的论点勾销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政党开辟道路。赫鲁晓夫不时对党和政权机构进行的各种调整和改组，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公开信强调指出，广大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迫切地面对着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神圣的职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列宁所创建的共产党。公开信还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十年来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谴责他破坏了经济的有计划的经营管理和集中领导，他鼓励为利润而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他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他全盘破坏了全民所有制。

公开信指出，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翻版。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降低到“一盘土豆烧牛肉”。他把美国、美国工业家伊顿之流的经验和美国农场主加斯特之流的建议奉为他的共产主义的榜样。他甚至不惜向美帝国主义者求援，要用美元和贷款来“建设”苏联的共产主义。

公开信说，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正把苏联推向资本主义而不是推向共产主义去。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革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是听任赫鲁晓夫集团为所欲为地实现其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呢？还是起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果、并且制止赫鲁晓夫的这股反苏和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呢？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政治路线破坏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声望、权威和作用。他以苏联的名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和窒息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和斗争，欺骗和恫吓各国人民，美化和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集团把那些要把苏联置于死地的人们当作苏联的盟友和友人。他把战争和侵略的主要祸根、国际剥削者和宪兵、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苏联的盟友和友人。他把早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自由以及世界和平的力量进行破坏活动、为帝国主义百般效劳、靠美元过日子、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谴责的铁托集团，把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和疯狂的反共分子，反动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当成了他的朋友和同盟者。他把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当成了朋友和同盟者，他武装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唆使它压迫印度人民、唆使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侵略。他把包括波恩复仇主义者在内的世界一切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也当成了他的朋友和同盟者，而且赫鲁晓夫正在竭力同波恩复仇主义者勾结起来。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把他的斗争矛头指向苏联的真正的、忠实的盟友和友人。他怀着深仇大恨穷凶极恶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在两国伟大人民和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之间散布敌对情绪。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所需要的，不是赫鲁晓夫日夜梦想和力图实现的苏联和美国的联盟，而是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合作和友谊。

公开信谴责赫鲁晓夫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领导人所进行的疯狂攻击、骇人听闻的诽谤和诬蔑、所采取的敌对行动。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集团对不听从它的指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反对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进行了凶恶的斗争。它对它们使用了阶级敌人所使用的种种武器和手法。它粗暴地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侵犯它们的主权和独立，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企图迫使它们屈膝，制造分裂和策划阴谋，象它最近对日本共产党所做的那样；它利用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等联合机构来把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这个集团的控制之下，对它们进行剥削，以达到它的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目的。

赫鲁晓夫集团的这种路线和活动给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反动派帮了大忙，他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事业。

公开信接着说，赫鲁晓夫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帝国主义靠拢并与之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从而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对和平、对苏联本身、对苏联的安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赫鲁晓夫为了靠拢美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和解，在采取冒险行动之后，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无耻地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甚至企图出卖古巴的主权。赫鲁晓夫出卖刚果人民的民族利益，投票赞成美帝国主义者指挥的联合国部队的干涉。这种妥协给刚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带来了尽人皆知的悲惨后果。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是对各国人民的大背叛和大骗局；事实上，这个条约损害苏联本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它使美帝国主义得以单方面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和增强自己的原子力量，继续进行核讹诈，来威胁和恫吓各国人民。

赫鲁晓夫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同帝国主义进行的交易不胜枚举。尽管连续几年中围绕着签订对德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大事喧嚣，他现在几乎完全把这个问题束诸高阁，而且在他访问西德的前夕，准备同波恩复仇主义者达成新的妥协，来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切身利益。当世界各国人民怀着蔑视，坚决同声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侵略行动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了不得罪美国人，勉勉强强、用寥寥几个字对东京湾事件表示遗憾，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赫鲁晓夫不仅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千方百计阻挡其他国家人民进行革命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企图阻挠和扼杀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散播对帝国主义及其头目的各种和平主义幻想，他规劝各国人民保持宁静，不要激怒帝国主义，而要向帝国主义屈服，因为据他说：“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他用原子战争的恐怖来威胁和恫吓各国人民，宣扬不惜代价的和平。他甚至建议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建立国际警察部队，从而成为国际宪兵，来同美帝国主义一道镇压全世界的任何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

公开信指出，因此美帝国主义，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大事赞扬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他的政策和立场，这不是毫无缘故的。

帝国主义头目、阶级敌人，象对赫鲁晓夫那样对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烈地大事称赞，对他的方针政策这样公开地表示赞赏、高兴和寄予希望，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典型的事例。单单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对谁有利，他的观点和行动又是为谁服务的。

公开信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本身受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各个共产党，全世界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现在都奋起投入一场坚定不移的有原则的斗争。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正在进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在世界上好多国家里，例如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和锡兰，建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党；在另外许多国家里，象意大利和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印度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形势的发展只能是这样。毕生致力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不能不起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这一大背叛。我们深信，这场斗争将日益深广地展开，而且正是这场斗争将使修正主义遭到最后的失败。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公开信说，亲爱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同志们：你们要在这场斗争中担负起重大的责任、起重要的作用。最大的祸根，恰恰是在你们党的领导方面，那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修正主义现在之所以成为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危

险，那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它在世界上最老的、最有威信的党，在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斯大林的党内出现，而且涉及到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利用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威望、利用国家权力和他所掌握的一切庞大手段，力图欺骗苏联共产党党员，把它的修正主义方针强加于他们，收买许多党的领导，并把他们拖进机会主义的泥坑。

在赫鲁晓夫的背叛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下，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你们应该对你们的党、对人民、对光荣的祖国以及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尽到崇高的革命职责，你们不能容许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集团玩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现在是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了。

革命的苏联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把过去的传统和功绩遗忘掉。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须本着同样的革命精神、同样的决心和同样的原则精神来发扬这些传统，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名声，高举被赫鲁晓夫丢弃的革命旗帜。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根本利益要求你们这样做。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向你们、苏联共产党党员发出这封公开信，因为我们真诚地爱你们，因为我们象昨天一样把你们当作战友，因为我们爱你们的党，我们爱苏联人民，我们爱苏联。我们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决没有把苏联共产党、苏联同赫鲁晓夫集团混为一谈。赫鲁晓夫集团破坏苏联—阿尔巴尼亚友谊，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制造敌对情绪和分裂的企图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对你们党和你们国家的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兄弟情义没有消失而且也永远不会消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苏联的朋友。尽管一个叛徒集团目前在苏联当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保卫伟大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受国内外敌人的损害。我们没有忘记而且也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决不会忘记它对我们国家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主义援助。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立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为击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而坚决进行不调和的有原则的斗争，对苏联各族人民友好、忠诚和保持亲如兄弟的国际主义的完全团结一致。

公开信指出，苏联人民曾战胜了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和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公开信说，现在，你们党、苏联，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遭到了外部的帝国主义

者和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阴谋的威胁。在和平时期策划的这一阴谋，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对整个革命的命运，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策划这一阴谋的主犯是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以及赫鲁晓夫集团。你们曾经为之付出生命的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事业，在召唤你们再次奋起，以你们作为列宁主义战士所特有的同样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来挫败威胁着你们的这一反革命大阴谋。象昨天一样，今天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保卫苏联的这场正义斗争中，你们不是孤立的，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各国人民，都站在你们一边。这支力量，远比你们过去同阶级敌人、苏联的敌人进行战斗时你们的拥护者和盟友所构成的力量要强大。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背着人说话的习惯，只愿意公开坦率地说话，因此真诚而坚决地宣告，它同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的十月革命所产生的苏联。你们热爱苏联，我们也热爱苏联。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和无产者，所有的劳动者和进步的人们，都热爱苏联。因此，我们把为反对修正主义—帝国主义阴谋，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必须进行的这场斗争看作是一项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说什么“即使苏联走上错误的道路，我们也同苏联站在一起”，那就不是保卫苏联。只有叛徒才会那样认为。那样就不是保卫苏联。那样只是庇护背叛行为。

公开信最后表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现在和将来都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要为保卫伟大的共同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保卫苏联而斗争到底。

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的完全的信心和不可动摇的信任：我们的同志，列宁和斯大林的光荣的党的共产党人，象过去作为鼓舞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的伟大表率一样，他们今天也一定能以高度的革命觉悟来完成历史交托他们的职责。

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保卫苏联，苏联共产党人定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同世界各国的

所有共产党人和无产者一道，同心协力，展开强有力的斗争，来揭露和彻底击败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就第一国际一百周年发表社论：制止现代修正主义者越权强行召开分裂会议，所有真正共产主义者必须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坚定地进行反修斗争

新华社平壤十三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九月二十八日就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发表社论时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不顾兄弟党的反对，企图蛮横地越权强行召开国际会议，以便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引向组织上的分裂。社论呼吁所有共产党人起来进行原则性的坚决斗争，制止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宗派分裂活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劳动新闻》这篇题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的社论强调说，“现在，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成了各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的堡垒。

“因此，保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护它的团结，乃是当前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最重要而神圣的革命任务。”

社论说，“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平等、互相尊重、独立自主、不干涉内部事务、相互支持与合作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作为基础。“在目前兄弟党的关系中，不允许运用少数、多数或是什么集中制原则。“每个党都是独立和平等的，都对本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担着责任。“要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目前的新环境下加强团结一致，就必须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

社论指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彻底排斥大国主义，决不应容许任何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行为。

社论谈到了第一国际的光辉历史，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年代中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改良代替

革命的机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以及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建立起来的、后来又由列宁、斯大林继承、维护和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

社论说，一百年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粉碎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只有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各种阶级敌人的坚决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社论说，对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对它们阴险狡猾的各种伎俩，坚持原则的立场，这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一直是以彻底揭露帝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真面目、动员群众展开反对它们的斗争来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绝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绝不能对他们蒙上假面具的欺骗政策抱有幻想，绝不能在中途抛弃革命。只要地球上存在着压迫者和剥削者，斗争就不会停止。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行斗争。

社论说，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还证明，只有永远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建立和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保卫革命成果，才能够胜利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在阶级消灭以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之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加强资产阶级影响，就是在反革命势力进攻面前解除革命队伍的武装。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象爱护眼珠一样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指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者——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保障它的统一。社论说，团结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武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社论指出，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并把它光辉地体现在我国革命实践，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忠实履行了自己担负的义务。

社论指出，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广大地区取得了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空前壮大加强。在国际舞台上，同帝国主义势力相比，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力量的优势日益增强。帝国主义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衰退和没落的过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坚决维护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积极斗争，就将进一步加速革命的胜利。

社论说：“但是，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正在给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障碍。“他们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极力美化、阿谀和屈服于帝国主义，抛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否认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他们并且把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绝对化，企图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溶解在‘和平主义’的泥坑之中。“他们企图麻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诬蔑这一斗争是‘小资产阶级运动’，给世界革命运动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他们妨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团结。“他们不断地进行宗派活动和破坏活动，策划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不顾兄弟党的反对，横行霸道地越权企图强行召集国际会议，企图将分歧引向组织上的分裂。”

社论强调指出，“已经造成的事态要求所有共产党人起来进行原则性的坚决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新的胜利，如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过的那样，如象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所做过的那样，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继承人——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阶级义务。”

社论说，“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背信弃义活动必须粉碎；他们的宗派的、分裂主义的活动必须坚决制止；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维护。”

社论说，“只要所有的共产党人一致起来进行斗争，坚定不移地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分裂就会被制止，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坚定的维护。”

社论最后表示：朝鲜劳动党今后将一如既往仍然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坚决斗争到底。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赫鲁晓夫下台

新华社十六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尼基塔·赫鲁晓夫已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阿列克谢·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今天宣布，在十月十四日（星期三）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体会议，研究了赫鲁晓夫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职务的请求。

已经发表了苏共中央全会的正式公报，公报说：

“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十月十四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新华社十六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这里正式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阿·米高扬的主持下，在十月十五日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今天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下列正式公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年十月十五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依·米高扬同志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提出的鉴于他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他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命令，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们热烈祝贺阿·尼·柯西金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尼·柯西金同志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他的信任，并且保证他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他的职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应的命令将于今天公布。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赫鲁晓夫下台了。

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

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

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无论是同情赫鲁晓夫的，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有利害冲突的，都对于这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的突然垮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问题，也发表了文章和文件，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鲁晓夫怎样下台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利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违背苏联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总起来说，有以下这些：

一、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一笔勾销苏联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

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伟大的苏联，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提供了最肮脏的武器。

二、他公然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荒谬地主张苏美两国首脑“决定人类命运”，一直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真诚地希望和平”。他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一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盗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三、他为了迎合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的需要，阻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不惜损害苏联本国的国防力量，串通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大骗局。赫鲁晓夫签订这个条约，是丧心病狂地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谓“和平过渡”的名义下，百般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条错误路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条错误路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变成毫无生气的新式社会民主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竭力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伙同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指使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派遣侵略军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刚果人民，并且用苏联的运输工具把所谓“联合国军”运进刚果；他实际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法国的“内政”；他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态度，煞费苦心地为美国挑衅者解围，替侵略强盗开脱罪责。

六、他公然违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遗余力地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把已经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铁托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经蜕化成为

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复宣称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表示要向这个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虚心学习。

七、他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尽方法打击它，破坏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八、他极端仇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同时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纠纷，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他在所谓“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门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许多兄弟党内，公然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制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坏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准则，以老子党自居，一意孤行地决定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他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实行了一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他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把党分割成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要把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轨道上去。他对苏联农业和工业的瞎指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就是赫鲁晓夫的所谓“功绩”。

象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骄横跋扈，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人物。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场结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规律。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经是嚣张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们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经是霸占了国际领导地位的“庞然大物”，可是，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载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经把自己装扮成好象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说得很对：“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象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们，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没。赫鲁晓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辈的后尘。不管人们曾经怎样劝说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终究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赫鲁晓夫垮台了，他处心积虑地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也破产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将不断战胜修正主义思潮，继续向前发展；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仍将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继续向前发展。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词地为赫鲁晓夫“招魂”，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所谓“贡献”和“功绩”，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具有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二、研究资料

一九六八年，威廉·海兰和理查德德德·沃利斯·施赖奥克：《赫鲁晓夫的垮台》

美国纽约丰克和瓦格纳尔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赫鲁晓夫的垮台》的书，作者是对苏联问题有长期研究经历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威廉·海兰和理查德德德·沃利斯·施赖奥克。他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过程作了专题研究和分析，一九六八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分为八章，从一九六一年前后苏修内外政策接连失败写起，叙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以及苏修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的争吵和倾轧，最后对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垮台时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述。作者说勃列日涅夫等人搞赫鲁晓夫时是“毫不留情的”，他们就象是“揪着赫鲁晓夫的脖子”把他“扔进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垃圾堆。”“尽管事情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在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表决，其实，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是秘密策划出来的，而不是投票的结果。”

现将该书最后一章的内容摘要于后（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对赫鲁晓夫日益广泛的不满

（一）

赫鲁晓夫最后垮台的时候，垮得是很突然、很迅速、很彻底的。尽管八、九月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已遇到特别严重的政治困难，然而回顾起来，不仅可以看出十月事变的一般先兆，而且可以看出一种特殊的事态发展，它有意无意地给人以某种即将发生动乱的感觉，这就是出现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陶里亚蒂的遗嘱通篇是一种悲观的调子，对苏联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感到沮丧。在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对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表示极大的不满（虽然未提赫鲁晓夫的名），并流露出十分厌恶的情绪。现在很明白，陶里亚蒂的情绪不仅是一个灰

心丧气的外国人的情绪，实际上也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亲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的情绪。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把党分成两个组织的作法，曾经遭到党内很多人的抵制。到一九六四年秋，赫鲁晓夫得罪的不仅仅是党的官员了，他几乎得罪了每一个人：军方——由于限制预算早已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担心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主管重工业的官员——他们是军方天然的同盟者，一直率先地受到赫鲁晓夫的侮辱和嘲笑；政府机关的官员——他们被赫鲁晓夫一个接一个的改组弄得不知所措，担心丧失特权和工作岗位；就连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赫鲁晓夫会成为艺术自由的庇护人，也对赫鲁晓夫的放纵行为和市侩作风不满。

这种日益广泛的不满，传染和反映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层的纷争还由于一些最高决策问题而加剧，诸如赫鲁晓夫对德国、中国、越南等问题的处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以至他在国外的粗鲁行为等等。最高层中一些人的政治野心又使纷争更加激化。

赫鲁晓夫九月间提出的经济改组和调整优先发展次序等问题，很快就成了事变的导火线。赫鲁晓夫的方法简单极了，他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问题一个紧接一个地推到危急关头——首先是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紧接着在十二月和北京摊牌；最后可能在次年初访问西德。在中国问题上的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同东欧的复杂关系，已经足够令人惊慌不安的了，何况还有以拟议中的波恩之行为开端的对西方的种种冒险行动。这一切，使得主席团应付不了，其实是使赫鲁晓夫自己应付不了，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反对他的联盟提供了基础，如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的结合。

如果说，这时已经出现了不满赫鲁晓夫的联盟，那也是非正式的，萌芽状态的，还缺乏一个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去把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及从赫鲁晓夫日益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弱点中捞取好处。的确，勃列日涅夫争取在六十年代当第一书记的条件是够多的。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学毕业的冶金工程师，战时的将官（搞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者（历任州和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斯大林时期他爬得很高（是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但不算太高。他很早就追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青云直上时长期为赫鲁晓夫效劳，搞得还不错，但也

不算太好。在这些经历中，他深深懂得，要避免以过份追随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而出名。他既不盲从，也不搞自由主义，他是一个稳当的党的工作者，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

（二）

苏斯洛夫一九四一年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一九四七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他对赫鲁晓夫在国际运动中的失败深为不满，认为勃列日涅夫这号人比赫鲁晓夫更容易接受他的影响。但苏斯洛夫本人的势力有限，他只能对党内保守分子起巨大的影响。他既没有在莫斯科党的中央机构里组成一支追随他的队伍，也没有机会在地方上培植势力。但苏斯洛夫在军事——重工业派系中肯定能找到信念相同的人，同时在党的领导层中也颇受尊重。

实用主义者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代言人是柯西金。战前柯西金是列宁格勒的年青的市长。后来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经济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倡导者，他要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同消费者的需要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在实现其经济计划的很多目标方面可以得到柯西金的有力支持。对于更加强调轻工业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利别尔曼主义”，柯西金是能够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但是，柯西金无论如何不可能赞同赫鲁晓夫把党分成两个组织，不会赞同赫鲁晓夫的盲目冲动，也不会赞同赫鲁晓夫过份热心甚至是狂热地专注于某些特殊的项目和他所宠爱的工业，如化学工业。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野心越来越大，苏斯洛夫的不满与日俱增，柯西金的沮丧更加发展，这就为他们试图联合打下了基础。这三个人结在一起，代表了领导层里广泛的不同利益。至少其中两个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各级组织中可以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支持和拥护。

赫鲁晓夫九月三十日离开莫斯科到索契去。他的离去是很突然的。本来他还在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样就未能出席苏加诺的告别晚会和欢送仪式，亦未能会见预定十月一日抵莫斯科的新任东德总理斯多夫。赫鲁晓夫的离去引起一些猜测，说他实际上是被主席团弄走的。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同僚是乐于让他离开的，以便他们有点时间来仔细考虑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的全盘新计划。但难于置信的是，究竟有谁能命令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况且赫鲁晓夫对克里姆林

宫的一套政治阴谋活动是深有经验的，如果他已经怀疑到正在酝酿着动乱，他是不会走的。

筹划政变推翻第一书记涉及许多实际困难，譬如其中之一是勃列日涅夫已定于十月五日开始访问东德，参加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很明显，勃列日涅夫这时并不处在采取行动推翻赫鲁晓夫的有利时机。同样，很明显，他不是这样一种人，即把诸事安排妥当后就离开莫斯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它共谋者。说实在的，当勃列日涅夫仍在东柏林时，并没有什么反赫鲁晓夫政变的准备工作。

十月初是平平安安地度过的。首都的政治生活照常进行，至少在表面上如此，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都露了面，接见了新任东德总理，出席了纪念东德成立十五周年的展览会的开幕式。主席团大多数成员都在莫斯科。十月二日，莫斯科报纸发表了赫鲁晓夫九月底向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所作的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报告的摘要。十月三日，苏联通讯社简短地报道了一则消息，说赫鲁晓夫去黑海途中曾在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停留，并访问了一个国营农场。赫鲁晓夫到索契后，仍然扮演国家元首的角色，接待了络绎不绝的来宾：日本、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西德地下共产党领导人雷曼，以及赫鲁晓夫当权时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外国人——法国内阁部长加斯东·巴勒维斯基。所有这一切，很难说是一个受主席团控制的人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于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自东德飞返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他对于星期一上午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是很挂记在心上的。这次会议将讨论赫鲁晓夫的新经济计划。勃列日涅夫知道委员们对赫鲁晓夫并不那么唯命是从，对赫鲁晓夫激进的建议的辩论也许会拖得很长和吵得很凶，并有可能导致领导层的全面危机。他也知道没有多少时间能用来制订战略和准备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了，因为十月十四日（星期三）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就将抵达莫斯科，而且他会要求马上会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的时间，也将由早已吹得天花乱坠的宇宙空间冒险的成就来决定。如果“上升号”宇宙飞船三人飞行成功，那么赫鲁晓夫肯定会回到莫斯科主持欢迎仪式。

勃列日涅夫在机场会见了苏斯洛夫。当天晚上两人肯定进行了商谈。也许就是在这天晚上两人商谈时，最后决定了要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

两人估计力量对比时，一定计算了票数，并且断定在十位主席团成员中（因病不参加工作的科兹洛夫除外）有五票是拿得稳的。苏斯洛夫可能告诉勃列日涅夫：当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时，反赫鲁晓夫的情绪总的说来并未减退。苏斯洛夫可能特别提到柯西金是不愿轻易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方案的。并提到波利扬斯基——与农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主席团委员——对赫鲁晓夫在制订农业政策上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并对赫鲁晓夫随意任用过去的农业专家波利雅科夫表示愤怒。至于勃列日涅夫，肯定会保证他在第聂伯罗彼得夫斯克的老部下基里连科的一票是没有问题的。

（三）

勃列日涅夫当然知道哪些人可能站在另一边。预料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至少在最初可能结成一个顽固的三人同盟。他们可能得到年迈的什维尔尼克和沃罗诺夫的支持。沃罗诺夫是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与勃列日涅夫的人——基里连科在俄罗斯共和国争权夺利。

主席团内五比五的情况对于搞政变阴谋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反赫鲁晓夫分子首先必须设法把赫鲁晓夫从他的主要支持者中孤立出来，做不到的话，也要把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三人孤立起来。显然，这些都必须在中央委员会裁决之前做好。实际上，事情必须安排成这样，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确认反赫鲁晓夫政变已是既成事实，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相信，要阻止政变已不能由它自己作主。

归根结底，掌握成败关键的是军队和秘密警察。权势很大的秘密警察和最高军事指挥当局是由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人负责的。但是，军队和秘密警察都有理由不听赫鲁晓夫的话。同时，阴谋家们总是可以用一些办法来收买几个关键人物，如允许他们扩大权力和提高威望，或是对他们——尤其是对军队——的特殊需要给予更大的关心。

谢列平虽不正式主管秘密警察，但他通过他的密友和同事——秘密警察头子谢米恰斯内伊，对秘密警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设法和谢列平接近。如果谢列平被争取过来，秘密警察至少可能采取中立。谢列平不仅可能被人说服应当考虑他自己的前途，而且他还明显地（也是错误地）认为，在事变过程中有机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勃列日涅夫还有一条独立的渠道通到警察和情报机构里。他以前在乌克兰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尼·米罗诺夫，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插手各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党控制警察和情报工作的一条渠道。米罗诺夫也许在促使谢列平参与政变阴谋方面起了作用。军方显然没有全心全意地参加这次阴谋。在政变的头几天，军方分裂和怀疑的迹象就显露出来了。十月十四日，《红星报》发表了总参谋长比留佐夫元帅赞扬赫鲁晓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这样晚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席团已经决定行动起来反对赫鲁晓夫之后，意味着比留佐夫作出了反抗的姿态，或者至少是故意不理会主席团的决定。比留佐夫是军内“火箭派”的头头，这一派颇受赫鲁晓夫重视。

但是掌握关键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过去为赫鲁晓夫服务得很好，但后来他对赫鲁晓夫的军事政策的趋势，尤其是对赫鲁晓夫贬低地面部队的倾向，已越来越不满。作为二次大战中突破德国防线进入中欧的庞大的坦克部队的司令之一，作为一个老战士，马利诺夫斯基很难适应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的激进的观点。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使得马利诺夫斯基易于被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拉过去。当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摊牌时）声称苏维埃军队支持反对派时，这些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取得胜利就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了。

星期一（十月十二日）下午，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时有八人出席，米高扬可能后来才参加。反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利扬斯基和基里连科——可能强迫赫鲁晓夫立即下台。

但是，波德戈尔内——这时他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大阴谋——可能很不乐意。什维尔尼克，接着是米高扬，也站在波德戈尔内一边。沃罗诺夫非常狡猾，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第一书记，因而保持沉默，或者干脆站到勃列日涅夫一边。波德戈尔内是赫鲁晓夫把他从乌克兰提拔上来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思想方面的或是个人方面的——要去反对赫鲁晓夫，因为这场政变将是让他的头号竞争者勃列日涅夫来取代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在危机前几天的活动，表明他并不知道即将出事。十月九日，波德戈尔内曾代表中央领导去基什涅夫参加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国庆。在那里，他作过一篇很长的演说，几乎在每一细节上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曾同在索契的赫鲁晓夫通过电

话。米高扬十月三日到黑海陪赫鲁晓夫度假去了，在索契至少一直呆到十月十二日下午。他事先也根本不知道有政变。（一九六五年米高扬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许是被迫的，部分原因是他基本上按赫鲁晓夫的利益行事，或者是图谋耍两面派。）

（四）

由于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致，才向那些坚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了一个体面的妥协方案，即给赫鲁晓夫一个机会，体面地辞去党政最高职务并保留中央委员的资格；要是赫鲁晓夫拒绝辞职，那末主席团就将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投票表决，把赫鲁晓夫清洗出去。无论是体面辞职或是清洗出去，都必须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予以正式批准。这一妥协方案，当然等于是勃列日涅夫势力的胜利。最后的摊牌

十月十三日（星期二）早晨，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他当天的活动计划。他显然已经怀疑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他的怀疑也许是由于他在和莫斯科的联系中出现某些微小的不正常情况所引起的，也许是从他的女婿阿朱别依那里得到某种警告（阿朱别依或许听到了主席团举行非常会议的消息）。午后不久，赫鲁晓夫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最后的战斗开始了。

据说，赫鲁晓夫下飞机后，迎接他的是谢米恰斯内伊和谢列平两人。是不是对赫鲁晓夫实行了或是想实行任何形式的事实上的逮捕，那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赫鲁晓夫至少可能是在谢米恰斯内伊的陪同下，直接来到克里姆林宫与主席团见面的。在那里，他发现勃列日涅夫正在担任主席，这一情况迫使他在一个他不习惯的靠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赫鲁晓夫肯定感到迷惑不解和气氛紧张，开始他可能要求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可能代表集体作了回答。接着，赫鲁晓夫显然表示了抗议，说主席团没有资格就他的引退问题投票表决，并声称没有他的同意，主席团无权召开会议。勃列日涅夫则把他的抗议撇在一边。

俟赫鲁晓夫无意“辞职”的情况明朗了，苏斯洛夫就站起来发言，从内容实质一直到方式作风，提出了主席团对赫鲁晓夫处理国家事务的反对意见。苏斯洛夫的简短发言，包括了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的专横跋扈和高压手段，他尽力树立个人迷信，在同中国打交道中的策略错误，他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等等。对于这些指控，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来为自己辩解，

因为事情已经很明白，他已无法动摇站在反对他一边的大多数。但是，他确曾退而采取了一九五七年在同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对抗时挽救过他的那种策略，即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这当然是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早就预料到的，于是赫鲁晓夫被告知，召开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早已发出去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赫鲁晓夫一定开始意识到大势已去了。

中央委员会可能是十月十四日（星期三）早上开始的。会开得很长，很激烈。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还详细开列了一个问题单子，这就是后来在党的可靠分子中传阅的“二十九条”。苏斯洛夫的发言从未发表，但其基本内容实际上事先已作过报道。八月份（即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苏共《历史问题》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不寻常的文章，其内容虽是赞扬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看来实际上是反对他的。例如：文章断言“群众无疑有权监督领导人，检查他们，撤换他们”。文章警告说：“如果领导人不再按党的意志办事，开始把自己置于反对群众的地位，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个人的统治就将失去合理的基础，他迟早是要失败的……”人们可以联想到，苏斯洛夫在为主席团的行动辩护时，正是说了这些话。苏斯洛夫概括列举的赫鲁晓夫的种种罪状，同这篇文章所议论的某个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提法非常相似。如经济主义，蛊惑人心，命令主义，开空头支票，狂妄自大，等等。

苏斯洛夫作报告时，赫鲁晓夫被迫坐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厅靠边的一张椅子上，痛苦地倾听着。目击者称，赫鲁晓夫面红耳赤，非常激动。苏斯洛夫讲完后，赫鲁晓夫被允许反驳，其内容没有详细报道，仅说是攻击性的、侮辱人的以及污秽的。据说他的讲话几次被打断，但他仍喋喋不休。他讲完后，精疲力尽，显然已无能为力了。接着波利扬斯基发言，指责赫鲁晓夫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农业政策方面。最后，就撤销赫鲁晓夫党内一切职务问题进行了表决。赫鲁晓夫失败了。虽不是一致通过的——赫鲁晓夫可能获得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这时赫鲁晓夫提出书面辞呈，并哀求中央委员们让他在政府部门担任农业部长，对此很多委员都以一笑置之。

赫鲁晓夫最后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当然从未正式透露过。说也奇怪，甚至很有讽刺意味，他最后公开发表过的一句话，正是十月十一日他在电视节目一开始对三位作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行员所说的那句话。他说：“再见吧！”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3）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本节资料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领导人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任新职同时庆贺“上升”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　　新华社十六日讯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列·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电报还对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表示庆贺。电报全文如下：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得悉勃列日涅夫同志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同志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衷心地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祝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2011 年 5 月 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4）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本节资料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制造的分裂会议，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举行了。三月十日，发表了一个名为《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它是一个很不象样子的会议。

参加莫斯科分裂会议的，除了苏联，还有十五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加上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两个已经分裂出去的修正主义派，连举世闻名的叛徒丹吉集团也被拉了去滥竽充数，一共是十九个单位。

在苏共领导命令规定要参加这个会议的二十六个党当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七个兄弟党坚决拒绝参加这次分裂会议。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也谴责和反对这次分裂会议。

拿参加分裂会议的十九个单位来说，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在它们中间，有的是诚心诚意维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半心半意维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因为难言的苦衷而不能不奉命参加捧场的，也许有的是抱着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时候陷入圈套的。

谁也无法否认，这个会，就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信件中，下命令要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那个非法的分裂会议。

有人问，这样的说法，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苏共新领导不是推迟开会的日期了吗？不是把起草委员会的名称改成协商会晤了吗？不是在公报中讲了团结对敌等等的好话吗？

从表面上看，苏共新领导是耍了一些花招，做了一些改变，赫鲁晓夫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有一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从本质上看，苏共新领导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衣钵，忠心耿耿地执行了赫鲁晓夫所下的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请看以下的事实：

苏共新领导几次三番地向我们声明，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一定要同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命令召开的非法的分裂会议联系在一起。

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在此前后苏共中央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中，以及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的通告》中，苏共新领导都重申了赫鲁晓夫所下的命令。他们坚持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必须在苏共领导决定的那个起草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他们并且说，已经得出了结论，“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着手进行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

他们仍旧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只通知一九六〇年的那个早已不存在了的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党去开会，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他们仍旧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不管多少党不参加，他们都要开。果然，在不少兄弟党的坚决反对和拒绝参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开了。

他们推迟会议的日期，只不过是迫于形势。但是，他们仍旧采取老子党下命令的方式，规定会议要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果然，就在这天开了。

他们还在临开会之前，给会议改换一个名称，披上一件“协商会晤”的外衣。其实，改换成“协商会晤”的名义，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的性质。

由此可见，苏共新领导虽然在作法上，耍了许多手腕，变了许多花样，但是，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的陈货。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欺骗的色彩，骗人家去开会，承认他们老子党的地位，承认他们有今天这样干，明天那样干，挥舞指挥棒的权利，跟着他们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绝路。

问题很清楚，如果苏共新领导真的要团结，而不是继承赫鲁晓夫的老一套，玩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那么，为什么不抛弃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赫鲁晓夫下的命令呢，为什么又要搞一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件呢，为什么不能接受兄弟党的劝告，放弃那个非法的分裂会议，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呢？

本来，赫鲁晓夫下了台，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坚决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满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会议做起，来表明他们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我们曾经诚恳地希望苏共新领导，能够利用这个好机会，同我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新途径。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回答呢？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革命节，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的时候，苏共新领导就明白表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顽固地坚持召开非法的分裂会议的立场。而且，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会议的计划，倒是经过他的继承者的手来实现了。

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共新领导这些人，所以非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不可，并不是因为他们同赫鲁晓夫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而是因为赫鲁晓夫搞得实在太臭了，有些做法太蠢了，赫鲁晓夫本人已经成为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严重障碍。他们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更带欺骗性的花样，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更好地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系统化了的，用苏共纲领形式固定化起来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总路线。

（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但是，我们不是美国，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是要揭露苏共新领导这些阴谋诡计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判断一个政党，同判断一个人一样，“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①。“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当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②。

根据这个原则，让我们看一看苏共新领导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懂得，苏共新领导的那些漂亮话，都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样，我们也就会懂得这个公报中某些口号的真实含义。

公报中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我们要问，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给各国人民革命带来损害的呢？很清楚，那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所集中表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分歧，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道路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分歧。现在，既然苏共新领导执行的还是赫鲁晓夫的一整套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总路线，这只能表明，苏共新领导还是在继续加深分歧，破坏团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损害。

公报中说，“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这种说法，完全是虚伪的，是为着给苏共新领导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涂上一层薄薄的脂粉。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处在萌芽状态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规劝和批评的态度，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回头。我们曾经多次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之间，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应当求同存异。但是，这些话，赫鲁晓夫之流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断扩大分歧，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搞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和国内外政策，制订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分歧的性质，就很清楚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同修正主义总路线的根本对立。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下了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进一步从组织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经对苏共新领导寄以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出发，抛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可是，苏共新领导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修正主义总路线和修正主义的政策，并且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还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召开分裂会议的严重步骤。非常清楚，苏共新领导已经进一步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基础加以摧毁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叫嚷什么“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除了为着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言呢？

苏共新领导说，我们可以“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哟！这也是骗人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敌我关系根本颠倒了。现在，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当做自己的朋友，把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当做自己的敌人。这样，又怎样谈得到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对待美帝国主义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吧。

一句话，苏共新领导还是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大肆宣扬苏美之间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大肆吹捧美国强盗头子约翰逊是“明智派”，极力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苏共新领导在同美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时候，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吵吵嚷嚷。但是，他们是“实干家”。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就急急忙忙地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了好几笔交易。其中有一些，是赫鲁晓夫领导时期长期没有达成协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共新领导竟然同意以捐献的名义，偿付美国用联合国名义武装干涉刚果的费用。他们还积极支持美国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建立一支常设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来替美帝国主义镇压和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服务。他们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亲美、媚美和降美政策。

在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一个反美前线的革命斗争，苏共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它们纳入苏美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现在，苏共新领导叫嚷支持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扑灭南越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正当美国强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疯狂地进行轰炸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理应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坚持召开分裂会议，采取严重的分裂步骤，来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用这个分裂会议的名义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个声明发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苏共新领导就在莫斯科派出军警和马队，横蛮镇压反美游行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并且不断对这些参加反美斗争的外国留学生进行迫害。同时，苏联政府马上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

苏共新领导用自己的行为揭穿了自己的骗局，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各国革命人民。

看来，苏共新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倒真是越来越大，简直难解难分了。越是这样下去，他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开来的东西，当然也只能越来越大，而“联合起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苏共新领导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吧。

一句话，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反华、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日本共产党、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新西兰共产党、反对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政策。

苏共新领导仍旧坚持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及一九六四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中的全部观点。他们现在还在全党和全民中，大张旗鼓地组织学习这些反华材料。这就是说，他们继承了赫鲁晓夫反华反共仓库中的全部的破烂不堪的武器。他们并且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

苏共新领导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会议前后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整套错误的政策。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实行控制政策。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肆无忌惮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对兄弟党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一直勾结日本的托洛茨基分子、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日共叛徒，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日本共产党，公开支持志贺、铃木、神山等一小撮叛徒。他们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力量，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破坏印度尼西亚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攻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西兰共产党，企图颠覆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缅甸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1)(2)）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竭力支持印度工人阶级的叛徒、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走狗丹吉集团，支持这个叛徒集团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苏共新领导所说的“共同对敌”，究竟要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所说的“一致行动”，究竟是干的什么事。人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要扩大使兄弟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继续一股劲儿地扩大使它们分开的东西。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苏共新领导叫嚷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假的，投降美帝国主义才是他们的本质；发表声明反美是假的，镇压反美斗争的人民群众才是他们的本质；支持革命是假的，破坏革命才是他们的本质；“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之类的话都是假的，到处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直到召开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才是他们的本质。

总起说来，苏共新领导干的是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他们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四联四反的老一套：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和其他革命国家；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

（三）回答几个问题

莫斯科分裂会议的公报中，重弹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老调，说什么“派代表参加这次会晤的各党表示了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接着又说，“他们认为，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继续就共同关心的当代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公报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苏共领导，彻底破坏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发动了公开论战，对兄弟党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进行了“侮辱性质”的攻击。公报也不敢触及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所作出的无数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决议、声明、文章，究竟算不算数。

我们很懂得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所说的停止公开论战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不分是非，不讲道理，只许修正主义者诬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和批评修正主义者。

迄今为止，对于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和诬蔑，我们只发表了数量很少的一些文章进行答辩，远远没有回答完，有许多根本还没有回答。如果他们不公开声明撤销那些反华的决议、声明和文章，公开承认错误，妄想要我们默不作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难道大老爷们骂了人之后，耸耸肩膀，就完事了吗？难道你们想骂就骂，想停就停，不许我们据理回答吗？难道兄弟党之间有这样一条不平等的、毫不讲理的原则吗？

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阐明对于公开论战问题的立场，现在我们再一次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既然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既然现代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那么多，他们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我们当然有权利公开批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年。

公报还提出，“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谁都懂得，这里所讲的，无非还是所谓“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所谓反对“派别活动”这一类的话，我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那里，已经听到好几年了。真正搞派别活动的，的确大有人在，这就是赫鲁晓夫和他的门徒，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就是那些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就是那些要把共产党蜕化成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向革命，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闹派别活动。他们为首着反对革命，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能不众叛亲离，最后只剩下一小撮人，成为一个可怜的派别。而这些先生们口中所攻击的“派别”，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革命派。应当严肃地指出，这次莫斯科分裂小会本身，就是一个最严重的派别活动。

中国共产党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世界各国凡是坚持革命的、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一切力量，包括一切政党、集团和个人，我们都赞成，都支持。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买卖。修正主义者越是骂我们，越是证明我们的正确，我们越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自己需要检讨的话，那就是同苏共领导在许多国家对修正主义派的支持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一些国家革命的左派支持得还不够，今后必须大大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老实说，只许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信奉者们互相勾结，来反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许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互相支持，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信奉者的斗争，过去行不通，今后也永远行不通。

公报对于赫鲁晓夫去年下的命令，要在一九六五年年中召开的所谓新的国际会议，究竟是取消了，还是推迟了，一笔也没有交代。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积极而全面地筹备”哟，什么“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哟。同时，还主张举行什么“参加一九六〇年会议的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这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还要死抱着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命令中的那个所谓“起草委员会”不放吗？或者还是要搞赫鲁晓夫在这个命令中要开的那个八十一党会议吗？或者又要耍什么新的花样吗？

我们必须正告苏共新领导，你们召开了非法的分裂会议，这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都应当由你们来承担。

由于你们召开了分裂会议，就给召开兄弟党团结的国际会议，设置了新的严重的障碍。过去我们说，为了开好团结会议，消除障碍的准备工作，大约要四五年，现在看来，至少要增加一倍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苏共新领导总算是开过分裂会议了。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向帝国主义讨好，就可以勉勉强强地维持住修正主义“法统”了，还可以作为一套政治魔术来起一些欺骗作用。但是，他们这样做，既吓不倒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也骗不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他们过去阻止不了，今后更加阻止不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和干部是要革命的。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花岗石脑筋，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

信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现在，还硬要别人信仰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当然就更加困难了。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的，本

来也越来越少了。现在还硬要别人听从那根继承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当然就更加不灵了。苏共新领导苦心经营的分裂小会，开成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这就表明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和破产，也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持反对分裂会议的斗争，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感谢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了分裂会议。这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迅速地帮助人们揭开了苏共新领导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纱，暴露了他们修正主义的本来面目。它帮助人们从苏共新领导的花言巧语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它帮助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懂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必然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出现，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决不能结束。

莫斯科分裂会议的公报说，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迫切任务”上来。什么是迫切任务呢？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帮助那些不明了真相的人去明了真相，帮助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豫不定的人同革命人民一道前进，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苏共新领导召开分裂会议的严重行动，给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主动的权利。我们更加有理由公开批评和彻底揭露苏共新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的左派，推动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推动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愿意再一次向苏共新领导提出诚恳的劝告，你们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

在我们看来，如果你们真的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又难，又不难。问题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做到：　　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

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

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

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要真正地做到消除分歧，团结对敌，就必须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什么停止公开论战，什么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这一切，全部都是空谈。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

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以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不断用自己的行动，暴露他们的反动真面目，充当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我们相信：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归要站在反帝革命阵线上，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归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上前进。我们相信：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

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终将扫除一切障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世界革命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一切妖魔鬼怪通通要被消灭干净。

全世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2006 年 8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5 月 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1）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本节资料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3]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2 页）0

一九五 0 年，毛泽东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谊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一九五 0 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

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一、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二、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命令；

三、爱护朝鲜人民利益；

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缺点，增进团结。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3 页）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

二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

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围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希望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8-52 页）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人的指示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

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70-71 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〇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1-106 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 XXX、XXX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们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预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

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鲜朝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注：本文是毛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电报。）

2011 年 6 月 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2）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本节资料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一八九五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强占，沦亡五十年，台湾同胞过着极其惨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活。但中国人民自始至终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作着不懈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为了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包括台湾的解放。由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归还中国。但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卖国政府和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大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不甘于失败的美帝国主义竟庇护蒋介石残余匪帮在台湾苟延残喘。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侵占我国台湾，几年来积极扶植蒋介石残余匪帮，并把台湾作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妄图利用台湾蒋匪作为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具，阴谋使蒋介石残余匪帮在中国复辟，再来奴役和压迫全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侵略罪行，是对它自己签订的国际协定的背信行为。它竟不守诺言到了这样的地步，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诚意”，“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之后，不过几个月，杜鲁门自己就宣布侵占台湾。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更毫不掩饰美国要继续占领台湾，并利用台湾蒋匪帮来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不惜撕破假面具，公开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和六万万中国人民为敌。

美国侵占我国台湾，并勾结蒋介石残余匪帮进行军事阴谋活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容忍的侵略和挑衅行为，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及世界和平。

这几年来，美国破坏亚洲和平，妄图挑起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的军事冒险的阴谋，一再遭到挫败。美帝国主义者的实力政策，在亚洲不得人心，威信扫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日益强大起来，它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日益提高起来。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碰不得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美国好战分子老实一点，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以十亿美元以上的大批飞机、军舰和各种军火供给蒋匪，并派庞大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改编、训练和扩充蒋匪残兵败将；同时，美国指使蒋匪向我沿海地区和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派遣特务潜入中国大陆，对来我国通商的各国商船进行海盗拦劫。美国为了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为了破坏亚洲和平，制造紧张局势，竟拼凑包括南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台湾蒋匪在内的所谓“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并硬把蒋匪代表塞在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上，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美国侵略者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正直人类所不能容忍的。

最近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它阻挠和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已经确定地失败了，它的“长期统治亚洲”的荒谬政策更加接近于破产了，于是，它就显得更加疯狂，与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加紧勾结，发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漫天叫嚣，制造亚洲紧张局势。

美国战争贩子范佛里特在台湾进行阴谋活动时，曾扬言美国要和蒋匪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现在，蒋匪和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都已证实，美国这个决心与中国人民长期为敌的冒险计划，正在华盛顿和台北进行“会谈”中。同时，美国国会中的一批蒋介石的“发言人”，臭名远扬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的议员们，如曾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内做了一百多次演讲，奔走叫喊援助蒋匪的诺兰之流，也特别狂热地策动国会通过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决议。必须指出，这种行动是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支持的。这就清楚地表明美国统治集团是如何急迫地企图借助于台湾亡命之徒，继续进行冒险。

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加紧扩充蒋匪军事力量。据最近泛亚社透露，美蒋已拟定一个“三年扩军计划”，“预定在未来三年中将台湾的海、陆、空军力提高为目前的若干倍”，而这个计划“反映出华府的政策，在时局的刺激之下，已不限于防守台湾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审议本年度军事“援蒋”和远东其他国

家的拨款时，公然说要加强蒋匪的“攻势能力”，“对中国大陆发出不断的威胁”；并说“如果目前的（印度支那）战争取得停火或其他解决办法，可能这种援助更为重要。”美国战术空军司令威兰居然叫嚣如果印度支那停战实现，那末“世界现在所遭受的战争威胁比最近的任何时期都大”。

但是，谁都看得见美国好战集团歇斯底里叫嚣和挑衅活动背后的空虚和卑怯。美国把它的外交政策，像诺兰之流所鼓吹的那样，“建筑在与台湾、南朝鲜及其他剧烈反共的小国联盟的基础之上”（英国“观察家报”），这就表现了美国的战争叫喊者心理上的惊人的堕落。美国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它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站起来了的、强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让台湾同胞回到祖国自由幸福的怀抱里来。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彻底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使中国革命得到完全的胜利。

美国侵占台湾，企图扩大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指责。甚至坚决反共的人，也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强占台湾的狂妄政策的危险性。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七月十四日在英国下院的发言中说：“（美国）有些性急的人仍然想对共产党中国进行战争，想让蒋介石复辟。这种想法，从军事方面说，是愚蠢的，从政治方面说，它忽视了一切革命由外来攻击而巩固起来的事实。”艾德礼说：“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数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美国的外来援助，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早就完蛋了。”艾德礼的这番话道出了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时，艾德礼却重复了杜勒斯所提出过的腐臭方案，即所谓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谁也知道，所谓“联合国托管”，就是把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家的领土，交给美国去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当归还中国，美国侵略者应该从台湾滚开，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必须被彻底消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英国下院对艾德礼的发言进行答辩时，竟然重复侮蔑中国人民的论调说：“中国的行为没有一个地方应该促使美国政府把台湾移交给共产党中国”。这种绝对不是对中国人民持友好态度的言论，出自表示愿意改进中英外交关系的英国首相之口，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极大惊异。邱吉尔难道能够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吗？他当然不能否认，那么，他就没有任何借口来替美国侵略

台湾的行为辩护。试问邱吉尔：如果你们英国的苏格兰或威尔斯被外国侵占，你是不是也认为它就不应该再归还英国呢？无怪乎邱吉尔在下院的演说，当时就受到议员们的讥笑了。

美国在积极武装蒋介石匪帮以推行它对中国的冒险政策的同时，还加紧促使亚洲一些国家的傀儡集团，如吉田、李承晚、銮披汶和麦格赛赛，与蒋匪帮勾结起来，拼凑“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作为它的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亚洲的工具，其阴谋目的是在造起祸端，来颠覆我国人民政权，破坏亚洲及世界和平。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的这些反动统治者，竟不惜损害自己本国的民族利益，甘愿做美帝国主义的走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的反动统治者，用承认蒋介石残余匪帮政权的办法，来帮助美国帝国主义者实现其“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阴谋，它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显然是极其危险的。蒋介石匪帮是一群已被中国人民完全唾弃的亡命之徒，与蒋匪帮实行勾结，必然要与六万万的中国人民为敌，这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中国人民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伟大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情存在。如果谁要顽固地这样做去，谁就要得到应有的后果。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我们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台湾。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中，使台湾同胞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蒋介石卖国集团窃据台湾，决不能容忍美国侵略集团侵占台湾。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政府庇护之下逃到台湾，把台湾变成了叛国者的巢穴。这个卖国集团几年来把台湾丰富的物产和资源出卖给美国政府，换取美国军事援助，并在台湾压迫爱国运动，屠杀爱国同胞，搜括人民财富，强迫青年充当炮灰，使我台湾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卖国集团对我海外华侨实行欺骗和迫害，掠夺华侨财产，引诱华侨青年参加匪军。这个卖国集团仗着美国海空军的

庇护，袭击祖国沿海岛屿，轰炸祖国沿海城市，打劫祖国商船和与祖国通商的船舶，派遣特务进行暗害活动，抢劫和杀害渔民，不断地对祖国进行骚扰性的和破坏性的战争。这个卖国集团最近更阴谋与美国政府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妄图配合美国武装力量，进攻祖国大陆，挑拨世界战争，使人类遭受空前的浩劫。这个卖国集团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是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

举世皆知，美国侵略集团一向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零年六月，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同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我领土台湾。这样，美国政府就破坏了它自己参加签定的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现在，朝鲜战争停止了，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了，国际紧张局势正在逐步趋于和缓。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却进一步地扶植蒋介石卖国集团，企图扩大对我国的武装干涉和战争威胁。美国侵略集团正在策划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正在拼凑日本反动势力、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组织所谓“东北亚防御联盟”，并正在积极拉拢英法、策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美国侵略集团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毫无疑义，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敌对目标。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着和平政策。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的外交报告中说过：“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威胁别国的安全，也决不容忍别国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我们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意志。

为了保障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

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人民神圣的历史任务。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我中国人民才能完成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获得伟大解放事业的完全胜利，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我们热烈拥护我中央人民政府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伟大号召。我们誓以全力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为了解放台湾，我全国同胞必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

为了解放台湾，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必须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取每一个战斗的胜利，直到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彻底消灭！

为了解放台湾，我全国同胞，特别是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同胞，必须加强戒备，肃清特务，努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斗争！

为了解放台湾，我台湾同胞必须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加强团结，积蓄力量，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消灭是定了的。我们要对一切跟随蒋贼逃到台湾的人指明出路。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正义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方面。我中国人民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全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保障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害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攀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

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　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

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超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求是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

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则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条，他们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他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

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那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是侵略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飞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件条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

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除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利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可能是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十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

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亿斤，可能到××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摘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

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一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们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况，那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

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和黎巴嫩的夏蒙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他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们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要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的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件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那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万，争取××万吨。后年再搞××万吨，不是××万吨吗？苦战三年，××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是五千万吨，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吨。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万吨，接近苏联，再加×年，到××

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吨，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年，×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到××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只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家。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同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美国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

你那个东西横直没用了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

在今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

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主席在谈判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毛主席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毛主席又说，农业和农村工作不能放松，明年农业生产还要继续大发展。关于目前正在全

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说，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2]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看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根据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台湾局势等问题复胡志明的电报

胡主席同志：

九月八日来信[2]收到，谢谢你。

我认为：

（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

（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毛　泽　东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给周恩来、黄克诚的信

一

周总理、黄克诚同志：

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二件及我军命令一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廿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对料罗湾三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

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较准炮位，黑夜如法泡〈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华沙谈判[2]，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冠华）[3]诸位意见如何？

顺祝旗开得胜！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如同意，内信请寄叶飞，刘亚楼，厦门前指付讨论。不要勉强同意。是则是，非则非，以实际可行者见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国防部长　彭德怀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上午１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再告台湾同胞书稿

（新华社十三日北京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本日上午一时发表文告，题为再告台湾同胞。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一星期过去了，炮没有打，一方清静。全世界欢迎，你们快乐。有几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余悸犹存，胡思乱想。例如说：共产党向你们建议的是一条诡计。诡计吗？历史会来证明不是，而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例如说：七天之后又要大打。你们对我的第一封信有一个字没有看清楚，那就是“暂以七天以为期”的那个暂字，意谓可能延长，七天是暂时规定。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一说共产党靠不住，你们有三十年和我们打交道经验。让我们算一下帐吧。我们和你们历史上有过两次和谈。一次，１９４５年，各党派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重庆，通过了一个全民团结共同建国的协定。是谁撕毁这个协定的呢？国民党。又一次，一九四九年，两党代表团聚于北京，议定了四十八条和平协定，双方全权代表签字同意。是谁不愿意批准这个协定宁愿继续打下去的呢？国民党。由此看来，你们经验虽多，不会总结。你们不自反省，反而归结为共产党不可信任。颠倒是非，一至于此！你们靠美国吃饭。靠得住吗？肯定靠不住，迟早他们要把你们抛到东洋大海里去的。下毒手要一下子置你们领导人于死地的，不是美国人吗？那个美国走狗孙立人将军，不是被你们处置了吗？他是你们的一个武贼。洋奴胡适，组成派别，以自由、民主为名，专门拆国民党的台。你们不是大张挞伐，拼命抵抗过一阵子吗？他算是一个文贼，仗美反华，余威尚在，我看你们还难安枕吧。你们看，美国人有一毫一厘一丝一忽所谓仁义道德吗？其他种种，千件万件气死人的事，你们一一亲历，不必我来多说。积怨如山，一旦爆发，于是有去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役。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要大书特书的。什么美国大使馆，三拳两脚，打个稀烂。做得对！做得好！因为那些人欺人太甚。你们有些人说：共产党离间你们与美国人的关系。什么叫离间？你们对待一个文贼，一个武贼，一个大使馆，较之我们说几句闲话，即便叫做离间，谁的分量重一些呢？我们就是企图唤醒你们，坚决跟美帝国主义离开，跟伟大祖国靠拢，这样难道不好吗？我们无求于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

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七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为此，我们决定，再停七十天，从本日算起。期满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延长。你们怕我们大举进攻。那么，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多运粮，厚筑墙。你们中间又有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是共产党的又一条诡计。告诉你们：确是如此，但非诡计。谈判未举行，和平未实现，贵我之间战争状态依然存在，当然只好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但是这里所说的谈，不是华沙会议的谈判，专指我们两党之间的谈判。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华沙未便谈此。华沙谈的，是一个美国人走路的问题。美国人同我们讲生意，想以金、马换台、澎，造出两个中国来。他们的梦多么甜蜜啊！停火，停火，再一个停火！我们不知道美国官员们究有多少常识。看起来似乎不很多吧。说他们代表美国自己谈这个问题吧，中美之间并未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说他们代表你们吧，也是冒充。你们的领导人反对华沙谈判，并且讥笑停火。你们没有委托美国人当代表。假如委托了，我们也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中国两个政党不去直接谈判，要委托一个外国做代表呢？这种谈判，我们感到羞耻，因此不可以谈。华沙谈的，只能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一万年也是如此。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 oe?王。说到齐 oe 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命令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击炮，从本日起，再停止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就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划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已，己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利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样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出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又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议。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太不高明。例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同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能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切切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
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
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

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稿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

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摔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么？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　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毛泽东《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对宦乡《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

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二）对《从美国总统竞选看美国的内政》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

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

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根据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手稿）

2011 年 6 月 12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3）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二

注意：作为１１月１８日杜勒斯演说的题目。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２５２３期刊载了杜勒斯演说的全文，题为《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其中说：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在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扩张主义的目的而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这个材料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第 606-607 页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１）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２）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

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１９４５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１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１９５３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

１９５４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１９５６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

１９５７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１９５８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７０％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１９５９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同年，１９５９，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3]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2011 年 6 月 13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4）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本节资料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彭德怀同志：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以上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黄、粟：

（一）可照韦国清、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可不发；

（二）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

毛　泽　东

四月十七日

刘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根根手稿刊印。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韦〔３〕三同志酌定。

中　　央

六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胡志明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

胡志明同志：

当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般的越南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周总理阅。你的报告〔１〕和各党派联合声明〔２〕，均应就此问题〔３〕加以批评。

毛　泽　东

八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周恩来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的外交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阐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后来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２〕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通过，并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３〕　指美国拉拢英国、法国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胡志明同志：

在印度支那和平已经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极愉快的心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热烈地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九周年。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刘、周〔１〕：

此件〔２〕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２〕　指越南劳动党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一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五百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一百万人的穿着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还都河内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还都典礼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毛　泽　东

周　恩　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给彭德怀、黄克诚的电报

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　泽　东

四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祝贺胡志明〔１〕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当您六十五岁寿辰时，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热烈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黄文欢为胡志明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

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

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

刘、周、朱、小平〔２〕阅，退彭德怀同志。

已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三同志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毛　泽　东

十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1〕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１９５７年８月３１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

“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一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贵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根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敬爱的胡志明同志：

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　　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全体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又遭到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周围，进行了九年英勇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越南北方的解放。越南人民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解放之后，越南北方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指标而奋斗。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维护日内瓦协议，为和平统一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美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越南南方，竭力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但是它的这些罪恶活动正在激起越南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并且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发展同亚非和平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庆祝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越南人民在十五年中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预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１９６０年９月１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越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

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 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　泽　东　八月六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１〕的批语　　一　　江青阅，退毛存。二　　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　　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外交部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

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一九六五年三月和四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一九六五年六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十二个问题和两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２〕　这个批语是针对记者附注中所说的以下情况而写的：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额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2011 年 6 月 13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5）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本节资料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赛福鼎〔１〕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２〕（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总理：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斟〈酌〉定。

毛　泽　东

四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工作。

〔２〕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送阅、统战部转报的赛福鼎对解决北疆群众外逃问题的意见上。赛福鼎在“意见”中说，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塔城等地部分群众外逃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处理的意见，提出必要时让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即决定赛福鼎回新疆工作。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 23 日讯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窜犯大陆沿海地区。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蒋介石匪帮从今年初起，就疯狂地为窜犯沿海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一个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叫做“反攻行动委员会”）已经成立，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蒋匪帮早在 3

月间就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并且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时间。为了准备窜犯时的运输，蒋匪帮已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蒋匪帮还设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并且在 4 月间通过了所谓“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 5 月 1 日起，在十四个月内征收相当于六千多万美元的所谓“国防临时特别捐”。蒋匪帮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在沿海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目前，台湾已经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在美军的参预下，蒋匪军还不断进行了以窜犯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2 月间美蒋海空军进行了联合“攻防演习”，3 月间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潜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5 月间进行了商民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最近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一带和澎湖、金门等岛屿，部队的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非常忙碌。种种情况表明，蒋匪帮已经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

美帝国主义是蒋介石匪帮策划中的军事冒险的唆使者和支持者。本年度美国对蒋匪帮的“军事援助”比过去两年大大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最近陆续运到台湾。大家知道，蒋介石匪帮是靠“美援”过活的，没有“美援”，连生存都不可能，至于进行军事冒险，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接济就更不能想像。所以，美帝国主义对蒋匪帮的接济突然增加，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说明蒋匪帮所准备进行的军事冒险，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共同策划的。

人们还注意到，今春以来，肯尼迪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断到台湾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美国陆军部长施塔尔、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兹、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等人。此外，到台湾活动的还有曾经主持对古巴入侵的美国特务头子、前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他现在还是美国国防部中主持所谓“特种战争”的负责人之一。这些美国军政要员在台期间都曾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对新闻界闪烁其词地谈到蒋匪军进犯大陆的问题。兰尼兹尔在 3 月底说，蒋介石部队“正在枕戈待旦地加强备战之中”。舍奇 4 月初说，台湾海峡地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事件”。哈里曼 4 月初说，“援助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种有益于美国的安全的良好投资。”美军台湾防御司令梅耳森 5 月间要

求台湾美国军事人员“要以一种对紧急和献身的新的领悟去展望将来的各种需要”。而驻台湾的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 5 月 20 日甚至叫嚷说，只要美国政府下令，他的部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轰炸中国大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美国太平洋陆军情报署署长魏博和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等，还先后去过金门。美国军舰在我国沿海活动频繁，特别是继 4、5 月间连续多次侵入我山东省青岛地区海域之后，6 月 11 日两次侵入我福建省平潭以东海域，6 月 12 日又两次侵入我山东省青岛以南海域。美国合众国际社亚洲总分社社长霍布雷奇特 3 月间曾报道，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

肯尼迪政府为什么要唆使和支持蒋匪帮窜犯大陆沿海地区呢？有头脑的人都明白，美帝国主义的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是：蒋匪帮的军事冒险，如果侥幸得逞，美帝国主义既可以在中国大陆建立桥头堡，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信，又可以使蒋匪帮兵力分散，财政更加困难，不得不更加对美帝国主义唯命是听。反之，如果冒险失败，那末，在蒋匪帮的实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它多年来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一脚踢开蒋介石，用新的傀儡来接管台湾，实现它的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最近关于需要一个比蒋介石“更英明的人物”来统治台湾的谈论，显然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冒险能够得逞吗？蒋匪帮花了那么大的劲，做了那么多准备，要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但是，蒋匪帮的本钱实在可怜得很。从政治上说，中国人民早就领教过蒋介石匪帮二十多年的血腥统治，永远不会忘记四大家族、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知道蒋介石匪帮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它曾经把中国的主权完全奉送给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叫中国人民听任美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在十三年前推翻了蒋匪帮的统治，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蒋介石匪帮又妄想卷土重来，重新把中国人民抛回黑暗的深渊，重新把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旧恨新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让蒋匪帮这样的杀人犯和卖国贼重新骑在自己的头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在国际上又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蒋匪帮妄想利用我们目前某些暂时的困难，以为登上大陆就会

到处有人响应，好吧，就让它来试试看吧！蒋匪帮和一切反动派，不到最后灭亡，总不会放弃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他们又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因此他们总是一败再败，至死不悟。从军事上说，目前蒋匪帮全部兵力，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在泰国、老挝流窜的在内，一共只有五十多万人。其中陆军不到四十万人，老兵已经是“胡子兵”，新兵大部分是在台湾强迫征集来的。蒋匪军多数人士气低落，人心厌战，仅仅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才得以盘踞台湾等沿海岛屿。现在他们竟然妄想窜犯大陆，送上门来，正是中国人民求之不得的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蒋介石是著名的运输大队长，好久业务荒疏，看来手痒难耐了，那末，就等他再送一批美国武器来吧，我们将照例接收，不给收条。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陆的战争中曾经歼灭过八百万蒋匪军，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曾经把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头破血流。我军是正义之师，士气高昂，有优良的装备和强固的国防设施，有巩固的后方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这样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蒋匪帮要进犯大陆，那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此间权威人士对新华社记者说：毛主席一向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肃清敌特，巩固后方。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更要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界人士，特别是民兵们，要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注意防止和及时消灭潜伏的和空降的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如果蒋匪帮胆敢在哪里冒险窜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在哪里。

二、研究资料

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1962 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 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 月 29 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1] 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2]

今年 8 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查阅资料，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 1962 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内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根源：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 年 11 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 24 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377 万。[3]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方面化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 1851 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4] 沙皇的军队还曾于 1871 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 年 2 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 13 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

民，已有 7 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 1881 年到 1884 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 10 余万人。[5] 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 30 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 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 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 1944 年至 1946 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6]　　1945 年 8 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 1946 年 6 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 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 1947 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7]　　1949 年初，当 CCP 领导的人民革命

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 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8]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9] 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10] 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11]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12] 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

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 年 3 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 1958 年才全部得到更换。[13]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 1959 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 68 种。[14] 此外，在 50 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15]　　如此 10 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 60 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 25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 X 产 X 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CCP，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16]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犁地区中苏边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 1500 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17] 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

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18]　　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 1949 年 8 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19]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 1962 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 300 余公里，而且只有 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20]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地、严密地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21]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 1960 年 6 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22]　　60 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 1961 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 82 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 2 人，

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 154 次。[23] 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 1960 年冬天至 1961 年 4 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新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毫无疑问，伊犁边境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苏侨问题：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 20-30 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内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　　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 30 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 年 11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24] 1946 年 2 月 1 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25]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 年 11 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 万人。[26]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 年发展苏侨 2000 人，1947 年即增加到 13000 人，1948-1949 年更猛增为 40000 人。[27]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 6.5 万户，共 20 余万人。[28]　　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 1958 年 2 月 8 日到 1959 年 3 月 6 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 4575 本侨证，其中只有 15 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的批准的。1959 年 7 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 80 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29] 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3 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 86757 人。[30] 1954 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 1959 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 132873 人，其中苏侨 86890 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 至 1963 年，全州仍有苏侨 11310 人。[31]　　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还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 28 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护照。[32] 此外，由于 1959 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33] 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政府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5 年 7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

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 年 10 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34] 此后，新疆自治区于 12 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 1957 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馆进行交涉。1959 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35] 是年 6-7 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36]　　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 1959 年 7 月、1961 年 8 月、11 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 187 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至 1962 年上半年止，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 1470 本。[37]

关于新疆苏侨的遣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 50 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54 年 4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 23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 6000 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并设立办公室。以后，

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38]　　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 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 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 500 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 500 户遣返。计划在 6、7、8 三个月办完此项工作，9 月 1 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 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39] 这样，1954 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 500 户 2464 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 1954 年至 1959 年 11 月 20 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 86890 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 45983 人，合计达 13 万余人。[40]　　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 1954 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出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 2、3 月份，苏方都有数量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41] 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 50 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是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生产问题。1959 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 11、12 月份，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 4-6 月份。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4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62 年。　　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

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 1947 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43]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尽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需要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当时，苏联方面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1950 年初中苏条约谈判时，苏联外交部曾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 en 来进行了汇报，并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苏联国籍。周 en 来对此举表示欢迎。以后，中苏两国政府还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44]　　50 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宽。于是，问题便拖延下来。[45] 尽管在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处理苏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屡次延长，仍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 1960 年以前，伊犁地区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 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 22%，另还有 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46] 1958 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很少，只余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 95 人之多。1960 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 1047 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未搞彻底，故此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至 1962 年，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苏籍干部 1001 人。[47] 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他们的苏籍身份。[48]　　应该

说，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态度的。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大体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但是，由于极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联领事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因此，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客观上严重存在着。[49] 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新疆的苏侨及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实际上为苏联在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血缘的纽带联系，使得新疆苏侨具有与东北、上海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为以后伊塔事件的发生确立了基本的前提。不过，从50年代的情况来看，新疆苏侨回国是自1954年以来由苏方提出经中苏双方政府认可的正常现象，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还是服从苏联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的。同时，对中方关于苏籍干部尽量留在中国的要求，苏联也是赞同的。这即是说，当时的苏侨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苏侨举家迁往苏联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是苏方坚持这样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为什么过去时有发生的平常现象到1962年初竟会酿成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呢？众所周知，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问题在于，这两件事对以后的伊塔事件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导致伊塔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　　1958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1960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

是否就构成了 1962 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新疆自治区于 1958 年 3 月开始部署和实施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计划，其显著特点与内地一样，也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一再修改，层层加码。最后确定，1962 年与 1957 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要增长 6.2 倍，平均每年增长 48.5%；工业总产值要增长 16.6 倍，平均每年增长 77%。新疆还提出，一定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把自治区建设成为中国的钢铁、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煤炭、粮食、畜牧业、棉花、制糖八大基地。1958 年 9 月新疆开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动员，同样是一哄而起，短短一个多月便在全自治区建成 562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民 96 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 99.7%，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问题。[50]　　然而，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50 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61 年有农业劳力 262 万人，比 1957 年增长 17%；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61 年灌溉面积为 4500 万亩，比 1952 年增长 1 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61 年耕地面积 5050 万亩，播种面积 4156 万亩，均比 1957 年增长 61%。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 年为 1957 年的 73%），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 1957 年的 1709 万头增加到 1962 年的 2250 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7 年为 29.1 亿斤，1960 年为 39.5 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 1962 年仍达到 35 亿斤。1957 年至 1960 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6 亿元增长到 7.9 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 1962 年依然保持在 7.5 亿元的水平。[51]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 1959 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 1961 年，新疆全区城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 400 多斤减少到 300 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60 年 1 月至 1961 年 3 月，自流来疆人员达 22 万余人，仅 1960 年 1 至 10 月就流入 15.3

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9 年至 1961 年 11 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 89 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 30 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疆人口由 1957 年的 561 万人增加到 1961 年的 730 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 170 余万人，增长了 33%。[52] 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 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制人员外流；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来人员，[53] 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出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 1961 年 6 月全疆仍有库存粮 2.9 亿斤。不仅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别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 1960 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 1960 至 1962 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 30000 吨、肉 8000 吨支援国家。[54]　　这一时期新疆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粮食危机，如 1960 年春季，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发生了部分群众缺粮、饥饿、生病，乃至人员死亡的事件。但究其原因，却并非真正由于缺粮所致。到 1960 年 3 月，拜城县尚有库存粮 1800 余万斤，分配给该县的回销指标还有 400 余万斤。正如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 4 月召开的拜城县紧急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有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县委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民间的疾苦，既不听下级反映，也不向上级汇报，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此，自治区党委在下发的做好全区粮食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新疆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缺粮问题，在条件比过去更好的情况下，更不能允许发生粮食问题，尤其不能允许再发生像拜城这样的粮食问题。[55]　　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王恩茂在 1962 年 2 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粮食问题主要发生在北疆，那里不少地区口粮和饲料的标准都有所下降，人民在穿的、用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56] 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

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1958 年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1958 年秋收后，实际入库粮食比上报数相差 3300 多万斤，以至 1959 年 5 月清仓时发现，粮食库存比帐面短少 1990-1 万斤。此外，在畜牧业生产上，因 1959 年冬季雪厚和 1960 年春季气候恶劣，全州牲畜死亡近百万头。进入 1960 年后，有的地方人民口粮安排不落实，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在个别收成较差的农场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公社中出现过。同时，为了避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犁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农村回销粮，在春播结束后将剩余种子清点转为口粮，并在城乡推广了一种做饭增量法，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57]　　就全州 1960 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 4.8 亿斤，比 1959 年还增产了 20-30%，农村牧区每人平均 1200 斤。与内地许多地区灾情极为严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 6 月份虽然也有十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十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 600 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 12 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 3405 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 46.4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74.86%。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58]　　到 1961 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 700 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 3000 万斤。[59] 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况做一次检查，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60] 总之，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 30%的细粮，70%的杂粮，[61] 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　　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

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出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出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苏联因素：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在新疆的鼓动　　1958 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经过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中苏两党在 50 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 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从 60 年代初到伊塔事件发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 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如果有人没有证明其苏侨身份的文件，领馆就让他们给其在苏亲属写信要证件。一些人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拉来登记。苏联领事并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与此同时，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是年，伊犁地区查获 5 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共查得照片 5269 张，非法登记的群众即有 13186 人。[62]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

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 1960 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 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 6459 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 8 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为数也不少。[63]　　1961 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64] 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65] 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并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指称：苏联政府 1936 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66] 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 8 人集团，就在该市苏侨协会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秘密登记了 6000 多人，收取现金 2000 余元。[67]　　50 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 60 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 1961 年 9 月 3 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仍然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68] 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观伊犁州的苏侨遣返情况：1954 至 1959 年 6 年遣返苏侨 86890 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 45983 人；而 1960 至 1962 年 3 年中遣返苏侨 8559 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 20907 人。[69] 这

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 年 8 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70]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字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 1960 年 5 月到 1961 年 3 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71]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 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72] 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份子。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60 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 1950 年曾自动撤销，但到 1961 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73]　　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

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74]　　1961 至 1962 年，苏方发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 年一季度苏方来信 5038 封，1962 年第一季度增至 6609 封，增长 31%；乌鲁木齐，1961 年全年苏方来信 40324 封，平均每月 3360 封，1962 年 1-5 月增至 51978 封，平均每月 10395 封，平均每月增长 209%。又如塔城地区 1961 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 340 件，1962 年第一季度增至 632 件，增长 85.2%；乌鲁木齐 1961 年苏方寄来包裹 675 件，平均每月 139 件，1962 年 1-5 月达 851 件，平均每月 170 件，平均每月增长 22.3%。另如塔城地区 1961 年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 462 件，1962 年一季度增至 923 件，增长 99.8%；乌鲁木齐 1961 年一季度收到 550 件，1962 年一季度增至 704 件，增长 28%。[75]　　第四，1962 年 4-5 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1 年冬和 1962 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 6 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 4743 人次。特别是 1962 年 4 月 4 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 5 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 1573 人次，并有意将 7 日约见的人推迟到 8 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 500 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已负责"等语。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 4 月中起至 5 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 74570 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 61361 人。[76]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篷、一间毡房的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

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和霍尔果斯、察布查尔中苏沿边境地区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并于夜晚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苏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 日关口子"、"25 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77]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干部被打伤，各地在此项工作中均以民兵作后盾，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劝阻。4 月 29 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后，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举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谣言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制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78]

5 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 月 14 和 15 日，有 100 余人到伊宁苏联领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5 月中下旬，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 27、28 两日即售出 800 余张。5 月 29 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

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 6 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 45 人。在 5.29 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倒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79]

5 月 30 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80]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 1962 年 4 月至 8 月，增设边防站 58 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 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1963 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 年秋至 1964 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81]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 1962 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8 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无证据说明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

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促使了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

伊塔事件：1962 年六万新疆人叛逃苏联内幕

1962 年 4 月 22 日一早，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就涌来大批拖儿带女的边民，要求去苏联，他们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高呼：“我们要到苏联去！”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 20 多个县的 6 万 7 千多边境居民，抛弃了生活多年埋有亲人的土地，抛弃了草原和城镇，坐汽车、拖拉机、牛拉的木轮车，拖儿带女，带着牛羊，穿越霍尔果斯山口、阿拉山口、巴克图、清河……3000 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涌向苏联。

仅仅几天后，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星罗棋布的毡房已寥寥无几，牛羊失牧，田地荒芜，四野肃杀。地方政府陷于瘫痪。

4 月 23 日，中国总理紧急召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命令兵团：立即组织一支高质量的队伍，分赴边境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生产。代耕、代牧、代管，同时着手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群。

5 月 13 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委托，兵团直属单位和各垦区抽调大批干部战士，赶赴边境地区，完成“三代”任务。抽调参加“三代”的干部职工，都是老战士、老模范、支边青年，知识青年中的党员、团员，他们受命时被告知，在参加 3 至 5 个月的“三代”任务后，就回到他们刚建设起来的农场和城市……

“伊塔事件”点燃了中苏边境局部紧张转入全线冲突的导火索。“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 年 4 月 22 日，“伊塔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

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 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 月 22 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千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

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哑！”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

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 他不敢！”

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

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漫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二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

“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

“爸，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熬夜”。

“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我是顺其自然。”

“爸，人家医生说的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思齐一下子认真起来。

“他那个道理，就不发展了！”毛泽东笑了起来。

这时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

“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他又笑着说：“思齐，茂之你们结婚了，工作和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

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

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

两人点点头，随卫上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丢，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 20 年，也许 30 年，大家会明白的。”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思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问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 30 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 1992 年 1 月 2 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 30 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 30 年前那个夜晚。 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 年河东，30 年河西。 正如 30 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 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取材自陈志斌、孙晓《冰点下的对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第 1 版）

2011 年 6 月 21 日初稿